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 31

2020 年秋季号  
总第 31 期

---

#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主 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  
指导老师：沈洪成  
主 编：孙旌程  
副 主 编：汝艺 吴娟  
编 辑：童欣 刘静雯 吴晓彤 相妍 房子琪  
胡麟 王岚茜 白静艳 徐婧仪 邢小龙  
投稿 E-mail : sociology\_hhu@163.com  
刊 号：校 031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微信公众账号

## 目 录

### 暑期调查

- 基层政府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以山东省 CD 县“合村并居”为例..... 张晓芸 (05)
- “95”后大学生群体“恐婚”情况调查报告..... 张 佳 (16)
- 养老设施何以邻避? ——S 市 H 社区康养中心的困局..... 孙舒然 (28)
- 陪读妈妈群体调查报告——以江苏省 J 县高级中学西门外陪读社区 X 村为例..... 周 蕾 (36)
- Vlog 视频制作同质化现象研究——以 b 站为例..... 李芊趣 (52)
- 并非弱者——一项有关地摊经济与从业者刻板印象的实地研究..... 米艺涵 (66)
- 农村女工对自身境遇的解释及工人子女教育状况研究..... 蔡颖冷 (73)

### 环境研究

- 污染企业的“漂绿”实践及其逻辑..... 汪 璇 (80)
- 垃圾分类试点的社区参与分化与政府主导定位——基于 BN 市的实证分析 ..... 秦祥瑞 沈 毅 (91)

### 性别与社会

- 丧偶式育儿: 城市新生代母亲的母职困境及形成机制..... 徐依婷 (100)
- 从“外嫁女”回归看传统土地观念的变迁——以北方 Z 村为例..... 董 伟 (110)
- 性观念与性行为错位状况下的个体适应性研究..... 吴 迪 (116)
- 宗教何以促进社会信仰回归? ..... 吴 尔 (123)

### 社工专栏

- 时空视角下疫情中的社会工作服务反思..... 房子琪 (127)

癌病与持续性的痛——基于《癌病与持续性的痛-我的叙事疗愈行动》.....	王 睿 (135)
综艺节目中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实践与反思.....	王 肖 (142)
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服务困境研究.....	韩廷梁 (150)

## 硕士毕业论文信息

2020 届社会学专业硕士毕业论文信息统计表.....	(158)
2020 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论文信息统计表.....	(160)

## 新闻快讯

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心发展研讨会成功举行.....	(15)
我院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在第十二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苏皖片区年会荣获佳绩.....	(51)
我校四名教授当选中国社会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和理事.....	(79)
第七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换届会议在昆明召开.....	(117)
施国庆教授参加上海 2020 参事国是论坛暨长三角参事专题研讨会.....	(128)
专著《“癌症村”调查》的英文版在欧洲出版.....	(136)
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主办的“社会性别、多样化以及包容性”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在加拿大刊印出版.....	(157)



# 暑期 调查

暑期调查实践为社会学专业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扎根田野、方法提升和视野拓展的宝贵机会。在2020年的暑期调查实践中，社会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与2018级、2019级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进入田野调查地点，独立对基层治理、养老机构、短视频制作、地摊经济等热点问题进行调研，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最终形成了暑期调查报告。在综合社会学系老师意见的基础上，编辑部内部成员再次进行遴选，本期推选出一下7篇优秀的调查报告，希望与读者进行交流。

## 基层政府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

——以山东省CD县合村并居为例

张晓芸

**摘要:**今年3月份，山东省开展了“合村并居”的大规模试点工作。自政策实施以来由于状况频发而备受关注，引起了学界与民众的广泛讨论。本文以C、D两县为研究对象，对不同身份的农民进行了面谈和电话访谈，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来分析他们的利益诉求。最终将农民的利益诉求初步总结为获得合理的补偿、政府有明确的安置规划以及享有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通过分析归纳“合村并居”中合理公众参与的模式和方式，发现“整体式协商模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公众参与模式，召开公众协商会议、召开座谈会、建立意见表达途径和成立公众监督组织是可以借鉴的公众参与方式。更为适宜的决策方式和公众参与方式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 合村并居 社会调查 公众参与 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

###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致使出现了严重的“空心村”和农村土地闲置问题。为了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路径以及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2020年3月以来，山东、河南等多地开展了“合村并居”的试点工作。“合村并居”是通过将多个自然村合并建立新农村社区，以实现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集约利用土地的目的<sup>[1]</sup>。

早在十年前，山东省就开始探索“合村并居”的可行性，近期的大规模试点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崔红志（2020）<sup>[2]</sup>、于永刚（2020）<sup>[3]</sup>、王丙川和龚雪（2010）<sup>[4]</sup>等学者对“合村并居”持赞同意见，认为“合村并居”能够有效提高公共资源投入效率、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城市发展提供建设用地。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贺雪峰（2020）<sup>[5]</sup>认为，以大拆大建的方式推进“合村并居”

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同时造成资金浪费。姜玉欣（2014）<sup>[6]</sup>认为，“合村并居”不符合乡村发展的规律，破坏了乡土文化和风貌。还有学者对“合村并居”持中立态度，认为“合村并居”有一定的益处，但决不能搞“一刀切”。例如，党国英（2009）<sup>[7]</sup>主张应慎重对待，因地制宜，认为从农业规律上看，真正的农民有自己的产品仓库和生产资料仓库，需要就近进行农业田间操作，并不适合集中居住，而且集中居住一般会增加搬迁者的生活成本，因此要循序渐进。田珍和秦兴方（2011）<sup>[8]</sup>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要避免“一窝蜂”似的短期行为，更不能搞“一刀切”和模式化。今年三月份以来大规模“合村并居”试点除了学者们对此积极发表观点外，很多群众在知乎、微博等平台对此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观点不一。

从理论上来看，“合村并居”无疑是促进人地和谐、实现乡村振兴的有益之举。但大量的案例表明，由于强制拆迁、拆而未建、补偿不足等问题，“合村并居”在部分地区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威胁了社会的安定。因此，亟需探索“合村并居”的合理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基于此本研究以山东省的“合村并居”案例为研究对象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力求从公众参与的视角为基层社会治理建言献策。

## 二、研究方法 with 调查对象

### （一）研究方法

受新冠疫情防控的影响，外来人员难以深入农村和社区进行调查，因此，本文对在山东省内处于内陆地区相对封闭的C县主要通过“云访谈”的方式对不同身份的村民进行访谈。而后期对于开放的沿海小县城D主要采取陌拜与入户访谈等方式。具体而言，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 1. 深度访谈方法

利用网络或面访的途径对受访对象进行非结构式访谈。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访人在“合村并居”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的主要遭遇和经历，二是受访人对“合村并居”政策实施存在的看法和意见，三是受访人在“合村并居”推行过程中的主要利益诉求。

#### 2.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方法是系统地搜集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相关政策文件，并有选择性地略读和细读，通过对文献的分析获得需要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本研究主要在前期确定研究主题，对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等相关理论的分析，对典型案例经验的总结研究等方面应用文献分析法。

### （二）调研地点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调研地点位于山东省境内的C、D两县，C县是山东省菏泽市的下辖县，是2020年3月以来菏泽市“合村并居”的试点地之一。C县总面积1969平方千米，辖5个街道办事处，22个乡镇。根据2019年《菏泽统计年鉴》，C县的总户数为583645户，常住人口为142.1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3908.822亿元<sup>[9]</sup>。D县是山东省烟台市的下辖县，总面积901平方千米，辖5个街道、8个镇，家庭户人口为244062户，常住人口为68.825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935亿元。C县有两个镇被列为了“合村并居”的试点乡镇，D县有三个镇已在小规模探索“合村并居”最优方案。本研究的所有调查对象分别来源于其中的C县的L镇与D县的M镇，受访人的主要信息如下表所示，应受访者对隐私保密的要求，以字母代替县名，调查对象的姓名均为化名。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职业或身份特征
张洪	男	29	L 镇	外出务工人员，于 2016 年开始到济南市务工，经营小本生意。已婚，尚无子女，父母留守家中。
张合	男	62	L 镇	农民，张洪的父亲。育有二女一子，均不在家中，现与妻子留守在农村。
李光	男	41	L 镇	农民，党员，干部亲属。
刘婷	女	43	L 镇	普通农民，种田维持温饱，不善社交
赵真	男	39	L 镇	普通农民，与刘婷是夫妻关系，为人老实憨厚
成祥	男	56	M 镇	本村务农、批发零售自产农产品的农民，农闲时炒股，对时讯接触了解较多
成梅	女	22	M 镇	成祥的小女儿，在外省某知名高校就读，疫情期间滞留家中
曲美	女	56	M 镇	在当地镇政府后勤处负责职工的餐饮服务，对政府政策与相关行动了解颇多
陈华	女	66	M 镇	热心大婶
小俊	男	25	M 镇	初中辍学，父母离异，工作多次更迭，现在当地从事危险品押运工作，居住于城中村

### 三、农民的遭遇及主要利益诉求

能否充分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重要评判标准，也是政府治理过程中需要适当公众参与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深入了解农民在“合村并居”政策实施中的利益诉求，以此为依据确定合理的政府治理模式及公众参与程度。本研究通过面访或互联网访谈，了解了不同身份的农民的不同遭遇和经历，不同的经历使其利益诉求也略有不同。

#### （一）农民的遭遇

##### 1. 外出务工人员及留守老人

张洪是外出务工人员的代表，今年 29 岁，自 2016 年开始到济南市务工，与妻子共同经营了一家小型餐馆，尚无子女，张洪有两个姐姐，均已远嫁。2020 年 4 月中旬，张洪的农村老家突然召开了村民大会，宣布该村进入了“合村并居”的范围，需率先拆村。这一决定让张洪留守在家的父母（张合夫妇）有些措手不及。尽管政府要求村民签订拆迁协议，但对于新社区的建设情况、建成时间却无法给出明确的信息。因此，不少村民，特别是留守老人，选择了拒绝签订协议。

张洪：“政府动员号召我们每家每户签拆迁协议，但问题是没告诉我们新房子、新社区什么时候改好，我爸妈还可以来济南这边找我，但村里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留守老人，有的不愿意，有的年纪大了身体不方便投亲靠友，你把他们房子都拆了，让他们怎么办？所以我的爸妈和村里其他留守的老人都没有签订协议。”

由此，张合夫妇和部分村民成为了“钉子户”。自 5 月份开始，张合几乎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滋扰。

张合：“隔三差五就有人在我家门口放鞭炮，都是大小伙子，我们老俩也不敢出去赶他们走。我家的农田的东南角有半亩地也让人给挖了，庄稼都给我毁了。最可气的是，经常无故给我家把电断了。后

来，门口的路也都毁了，我连出门都不方便。日子没法过，我只能去找我儿子了。”

不堪其扰的张合夫妇于6月份投奔在济南工作的儿子。但张合夫妇离开后不久，在没有接到任何短信、电话通知的情况下，家中的房子被强拆了。针对这种情况，张洪报过警，写过上访信，打过市长热线，但都没用。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看看有关合村并居的相关讨论，了解一下政策。虽于事无补，却也只能认命。

## 2. 本地农民

赵真和刘婷是L镇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同样在“合村并居”政策推行过程中，遭遇过不公正的待遇。2020年5月30日上午，政府工作人员来到了赵真和刘婷的家中。

刘婷：“5月30号，有人到了我家，来了三次，前两次用手敲门，因为我老公出去赶集不在家，家里只有我跟俩孩子，还有我公公，我公公身体不太好，这种情况我们敢给他们开门。第三次再来的时候就开始用砖砸门了，孩子们都吓哭了。没辙，我只能给他们开门。”

随即，刘婷被六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工作组很谨慎，一上车，刘婷的手机就被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了。因怕有人跟踪，面包车在国道上绕了一圈，才开到乡政府的一个社区办事处。

刘婷：“把我带到办事处以后，六个人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了晚上2点，这算怎么回事啊。”

工作组对刘婷做了长达16个小时的工作，一方面，他们给刘婷描绘了许多美好前景，说将来住社区了，有更大的广场跳舞，政府提供电商培训，她可以做生意。有位干部甚至许诺，刘婷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到时候可以考个中专，到乡政府上班。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合村并居是国家政策，做“钉子户”会影响子女上大学、考公务员，还影响子女结婚。

自刘婷被带走以后，她的丈夫赵真不久便回到了家中，见状立即打电话报了警。派出所民警立马就找到了谈话的地方，并让刘婷签了一个出警回执，解释说这不是非法拘禁，而是做工作。乡干部见这情形，立马表示：你看，派出所也听政府的，报警也没用。乡干部说了很多，但刘婷眼皮子底下的诉求，他们却没一句确切的话。

刘婷：“我问他们，给我们房子拆了我们住哪，新社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建，什么时候建好？他们都没法给我明确的答复。”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明年八月十五就搬新小区。刘婷反驳，隔壁水库搬迁村，村子被拆了两年了，村民还在流浪。最终，刘婷还是没签字。

赵真：“他们把我媳妇儿带走了一天，手机也打不通，人也联系不上，家里人都急坏了。一直到半夜一点多还没动静，最后是我们村支书给协调，才把人放回来。”

到晚上快两点时，家里打电话给村支书，说如果刘婷出了问题，唯他是问。村支书无奈，只能和乡政府协调，工作组终于把刘婷送回了家。

除此之外，赵真夫妇还谈到了他们反对“合村并居”拆迁的理由和想法。

赵真：“我们也真不是非得跟政府对着干，关键是给出的政策和条件实在是让我们没法答应。说拆我们房子，新小区还没改好你凭什么拆我们房子。再说了，你的拆迁补偿费用太低了，即便你把新小区改好了，你给的那俩钱也不够我们住进新小区的。我大概其算了算，把我们房子拆了，我们还得倒贴十来万块钱才能住进新房子，这谁能愿意？另外，搬上楼房真不如现在这样方便。”

补偿款过低、担心住进楼房以后的生活状况等原因让很多村民感到十分为难。



### 3. 党员及干部亲属

李光也是本地的农民，与赵真夫妇不同的是，他具有党员的身份，同时他的表哥在乡政府工作，党员和干部亲属的身份让他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合村并居”推行过程中，李光被告知，凡是党员、干部，甚至干部亲属，都必须“识大体，顾大局”，完全服从政策的安排。

李光：“我是个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合村并居’的事上，我没有一点发言权。但考虑到搬进楼房以后干农活不方便，生活成本增加这些事儿，我跟很多人一样没在协议上签字儿。我表哥在乡里做事儿，每个礼拜都上我家来劝我，让我签字。这事儿我表哥很难办，如果不能做通我还有我们家别的亲戚的工作，上边领导就说要停了我表哥的工作。我也很为难，签字吧，我又不愿意，我们村有被人拆了的，现在根本就没人住，有的去亲戚朋友家，有的只能在地头儿上搭个临时的窝棚住，可不签字吧，又怕把我表哥给耽误了，弄得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

从现实状况来看，基层的工作力度越大，调动的社会资源越多，群众感受到的政策压力也就越大。从结果上看，很多村民签了拆迁合同，但似乎并没有多少是真心拥护“合村并居”政策的。

### 4. 颇为小康的半农半工户

对比L镇拆迁中农民的苦不堪言，M镇尚未实行“合村并居”的农民对这一政策持颇为乐观的态度。成祥与曲美是M镇颇为富裕小乡村里的一对夫妻，成祥平日里打理着种着蔬菜水果的零散地，农闲之余还炒股赚点小钱；曲美在镇政府后勤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两人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在一线城市成家立业，小女儿在外省读大学，受疫情影响，大女儿一直没有回家，而小女儿待在家中尚未返校。当谈到合村并居的问题时，成祥一家呈现出较为积极的反馈。

成祥：“这个事儿，俺们这边都说了十来年了，这一直也没施行，说是上面批的指标少。看俺们这边有的村已经整了，几个村合到一起，那个住的地方还有祠堂什么的条件还都挺好的……。听信儿说离俺们不远的那几个村就准备合并了，已经开始重选村支书了。前段时间村里又是挖管道送暖又是改造厕所的……。从老早大队就开始收地，不想种地的都把地卖了，岁数大了谁还想种地，体格不行了，更甭说小年轻的了，现在的小年轻哪有种地的……。这个事儿昂，别人我不知道，我是能接受，我这个人……。”

曲美：“听X村拆迁的说，三环以内拆迁，两套老房能换三套楼呢，我们这边三环以外了，估计不能那么成了，不过补偿应该也不能太差。住楼就好了，要不年年姑娘回娘家都嫌家里冷，屋太大了你知道嘛，这房得有一百年了，翻修了也不行，还是透风其实。再一个，姑娘老让搬过去一块住，那大城市再好也没有自己家好哇不是，等搬楼了咱这条件也不差呀。不过啊，说归说，感觉我们这边一时半会不能搬。”

成梅：“现在村里基本上都剩老人了，年轻人都去城中心买房住了，很多老房子都空置着，这样的话土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现在我们这边发展也挺快的，也没有需要保护的遗址什么的，好好规划建设个什么产业之类的，还能留住年轻人，不然大家就都留大城市了，没人愿意回来，毕竟要发展得快，还是得有人才嘛。”

从成祥一家的表述里我们了解到，M镇“合村并居”的消息对村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大家该盘算的盘算，该了解的了解，早有了近十年的心理准备了。另一方面，临近村庄的拆迁补偿和拆迁效果颇为不错，村民们也比较安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厕所革命”其实是对农民旧有习惯的温柔变革。并非强制所有农民一下子全部改造完毕，在提供补偿和人力的基础上允许分批改造，这意味着人

们可以在根据第一批改造后状况决定是否进行厕所改造。积累了“厕所革命”等惠民举措的好感，农民对于“合村并居”的态度也会相对积极。

#### 5. 衣食无忧的农闲户

不仅成祥一家对于“合村并居”的态度比较积极乐观，子女都在城里成家立业的陈婶也表示可以接受。陈婶是一个开明又热心肠的人，每次做了好吃的都会给邻里分一分，一个胡同里的小孩小猫小狗都是陈婶照看大的，平时村里家长里短的矛盾乡亲们爱找陈婶说。像陈婶这个年纪的人要么住在城里儿女家里帮忙带孩子，要么自己仍在老房子里住，偶尔去城里子女那里住两天，帮忙带带孩子、看看家。

陈婶：“上面让搬就搬嘛，在闺女儿家帮看孩子，也都在楼里，也没什么习惯不习惯的。等小孩再回来也不再嫌弃这嫌弃那的了。俺家也没有地了，我都给卖了，闺女儿给钱，还种地干啥，不够忙活的，加上岁数也大了，是真干不动了。听说补偿也挺好的，老了能用几个钱儿，有个地住就行。现在哪哪都落冷了，啥也不囤了……。”

当问及是否大家都愿意合村并居以及合村并居过程中最关心什么问题，陈婶脸上开始流露出沉思的神色。

“一般不斤不离都能搬。有些可能得做做工作，你像有些老的大半辈子都住在村里了，儿女从城里接去住也从来不去一住不惯楼，也用不几个钱还天天去地里起早贪黑的那么干，还倔得要命，说不听。哎，就是干活嘞命，不干点什么难受！再就是有的在外面混的孩儿估摸会回来扒持他爸妈的房昂，你说说，造的什么孽呀！我们这些老姐妹倒是好打点，就那么嘎实嘞嘛，其实也不，人家怎么弄咱就怎么弄嘛，别拖人后腿。”

“拆二代”小俊可以算是合村并居的热烈支持者了。身为家里独生子的他，之后可以继承的老房数量至少会有三套，家里也给他准备了车，就等驾照考下来了。有房有车不愁吃喝，每天上班打发时间顺便赚点零花钱。

小俊：“我巴不得赶快拆呢，拆完我至少得有三套房，我干涉么不好？到时候挣点小钱到处旅个游，没事搁家待着多好。我姥那边的房子就快拆到了，你看新建的楼盘发展的多快，那外面的环境还整得挺好。我到时候就是坐拥好几套房产的人了，还怕没有小姑娘跟咱呐？”

M镇的村民所表现出来的担忧更多是发展性的：合村并居之后是否仍可以继续经营口粮地、是否能够合理规划土地引进外企、集市会被怎么处理、娱乐场所的配备以及搬迁房的条件等。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也反映出“合村并居”并不是完全行不通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关键在于是否满足了利益群体的需求。

据调查了解，M镇的“合村并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村并居”，知情者透露，借着这股风拿地审批会更顺利。很多村逐渐开始在村头码着整整齐齐的几排楼房，算是渐进式的拆迁，一般这样片区的平房先是拆了，闲置好久然后开始建，大部分都同意拆，也有不愿拆的，露着房屋内部结构的独门独户屹立在一大片废墟里，但大家相安无事，没有什么大吵大闹。

#### （二）农民的主要利益诉求

从上述对农民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在“合村并居”的相关问题上，农民存在着很多合理的利益诉求，但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侵犯了农民的合法利益，这是农民反对和社会矛盾加剧的根本原因。农民的利益诉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农民们辛苦一辈子花三四十万甚至六七十万盖的两层或者三层小洋楼，钩机铲车挖掘机都给拆了，只给几百一平的补偿，都不够盖房子的成本！还得再借几十万甚至更多去盖房子或买房子，这不是坑害老百姓吗！”

第一个方面是合理的拆迁补偿。在C县L镇的拆迁补偿标准确定的过程中，政府并未请正规公司来评估，只是工作组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评估表，只列了正房、偏房、宅基地、青苗补偿等几项大类，每个大类有个总价。其中，正方(北屋)按500-700元每平方米计算，偏方按200-300元每平方米计算，土胚房评估价格会更低，宅基地不算价格。按照这样的补偿标准，村民利用拆迁补偿款无法置换一套130平方米的毛坯房，如果要入住则还需花费十几万的装修费。补偿的费用过低致使很多村民对“合村并居”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所谓合理的补偿标准在农民心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能够利用拆迁补偿费用和安置补助费用置换新居，二是保证原有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

“房子先拆后建，人住哪呢？上楼之后，农具、粮食、拖拉机收割机要放到哪里，怎么晒粮？土地收了，又不给安排工作，靠啥吃饭？……”

第二个方面是明确的搬迁及后期扶持计划。从上述对农民的遭遇经历的论述可以看出，政府在对新社区建造时间、新社区建造地点、新社区建设完工时间、农民入住时间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划的情况下，便要求农民拆除自己的房屋，致使得很多村民流离失所。同时，很多农民对于搬入楼房以后的生活状况以表示了担忧。不少村民表示，住进楼房以后会面临着农具无处安放、下农田干活距离更远等问题。老年人普遍担忧住进楼房后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只要搬进楼房，水、气、取暖等费用，一年怎么也得增加几千元生活成本，很多老人说，“冲个厕所也要花钱”。还有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一旦搬进楼房，老年人和年轻人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是诸多人伦悲剧的导火索。政府对于后期的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思路和规划，这更加剧了农民心中的不安。

“我们的补偿安置没有批文没有公章没有合同，只是跟村民签订了一个自愿搬迁协议，刚开始村领导说是塌陷地搬迁，镇里领导又说是复垦搬迁，与村民签订的协议都是霸王条款，现在又让我们签一个补充协议，如果不签补充协议就让签一个自愿放弃搬迁协议，以后断水电，后果自负。”

由此分析，“合村并居”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是充分的知情权和公众参与权。201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将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至少三十日，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可见，农民在拆迁安置方案、拆迁补偿方案、后期扶持方案等方面都应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地方政府在没有任何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决定了方案，现阶段的方案由于没有公众参与，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

#### 四、“合村并居”的合理公众参与程度与方式

基层政府在制定拆迁方案、补偿方案时并没有合理的公众参与，致使得农民没有合理的利益表达途径，政府不了解农民的利益诉求，更无法制定出符合其利益要求的相关方案和实施方式。因此，公众参与的缺失是当前一切问题的根源。

##### （一）公众参与模式的理论分析-有效决策的视角

### 1. 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

合理的公民参与是影响公共决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决策情境下，政府管理者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择不同范围、不同深度的公民参与形式，即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融入到政府管理过程中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公民参与的优势。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模型中的两个核心变量：政策质量约束和政策可接受性。托马斯公民参与决策理论根据公民参与程度的不同将政府的公共决策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sup>[10]</sup>（见表2）。

表2 公共决策模式及其特点

公共决策模式		决策模式特点	公民参与方式
自主式决策模式	自主式管理决策	政府独资决策	无公民参与
	改良式自主管理决策	向公民咨询信息，但不分享决策权	政府采取公民调查的方法与关键公民接触
协商式决策模式	分散式公民协商决策	公民参与决策发挥有限影响力。	斡旋调节
	整体式公民协商决策	公民参与决策发挥有限影响力	咨询委员会
公共决策模式	公共决策	政府与公民共同决策	听证会议

以L镇为例，其政策实施所采取的便是改良式自主管理决策的模式，只是通知村民有这样的政策需要执行，但村民的意见或建议对最终决策没有丝毫影响。“拆迁价格谈不好就强拆，老百姓在屋子里、在院子里，就用钩机铲车挖掘机强拆！为逼迫农民搬迁，断水断电，把路挖断，把拒不搬迁的村民的田地挖完，庄稼毁完！”

执行的单向性源于决策的单向性，没有一个良性的沟通，决策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根据不同公共决策模式的特点以及相关的关键问题，我们可以分析出L镇公共决策模式的选择模型（图1阴影部分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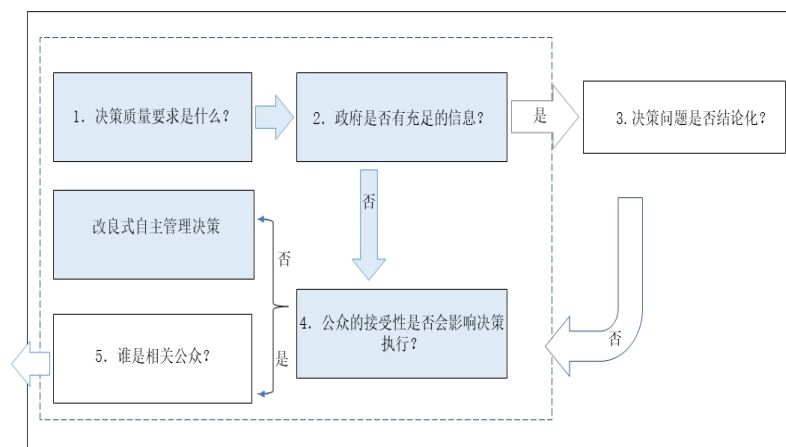


图1 L镇公共决策模式选择模型

## 2. “合村并居”公共决策的特征及公众参与模式

“合村并居”的公共决策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由于“合村并居”政策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一公共决策对决策质量的要求较高，草率、低质量的决策极有可能会造成农民的反对和抗议，甚至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动荡。第二，政府在“合村并居”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并没有掌握完全的信息，如新社区的选址、拆迁补偿标准的确定等很多信息需要专业机构的评估以及农民的参与才能获得。第三，公众的接受性会对决策的执行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公众对“合村并居”持反对态度，政策则无法推进，强制推行同样会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第四，“合村并居”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相关公众群体是明确的，即被搬迁的农民。第五，“合村并居”中，政府与公众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政府最主要的目标是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乡村振兴，而农民的主要目标是正常生活秩序不被打破、原本的生活水平不降低。

### （二）“合村并居”中的公众参与方式

“整体式公民协商决策”的大规模公众参与需要以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方式作为保证。根据“合村并居”不同环节的不同特征，结合M镇的调研结果，发现采用以下四种公众参与的方式会产生比较好的预期。

#### 1. 召开公众协商会议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办事处领导通过村干部通知村民，我们村被列入2020年乡村振兴计划，村民们都感到很激动，这是村民们多年期盼的，因为我们处于县城郊区，土地多数已经完成流转，村民进城务工也很方便，所以对于我们村能列入计划都很支持。”

公众协商会议的公众参与方式更适用于拆迁方案的制定阶段。基层政府应该首先拟定拆迁方案的草案，而后针对草案以社区或村镇为单位召开广泛的公众协商会议。广泛地听取农民对于草案的意见，并根据农民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再对修改后的方案进行公示。通过召开公众协商会议的方式能够有效地使方案吸纳农民的意见，让拆迁方案充分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诉求。

#### 2. 召开听证会

“我们后续不论是建设保证金的缴纳还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签字，都有商有量的，几乎是没有阻力的顺利进行。4月22号完成旧房测量并且报完安置楼户型，8月1号拆迁办又对安置小区建设项目选址进行了公示，拆迁工作一直稳步进行……”

召开听证会的公众参与方式比较适用于拆迁补偿方案及拆迁安置方案等相对专业的方案制定上。以拆迁补偿方案为例，政府应请专业的估价公司建立科学的补偿标准。具体而言，根据201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政府应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定综合区片地价，依据综合区片地价予以农民合理地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 3. 建立公众意见表达的途径

“我们都做好迎接拆迁安置的时候，8月20号村支书通知我们停止拆迁，村民们都感到疑惑和不解，各村村民自发写请愿书、拨打市民热线，希望上级政府能充分听到广大底层群众的心声。”

“合村并居”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应为农民建立起表达意见的途径和渠道，让农民的意见可以随时被政府知晓，并不断完善相关决策。建立公众意见表达的途径和渠道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建

立专门的热线电话或意见表达信箱，并设立专人负责接听电话或收取信件，并反馈给相关工作人员；二是成立专门的部门或办公室负责接待表达意见的农民，并如实反映农民的意见；三是定期召开座谈会，集中时间解决农民的问题和困惑，并对其意见给与回应。

#### 4. 成立公众监督组织

“怕房子的质量不好，我们预编了一个小队轮着班过来监工，基本都是平时农闲户，什么也不耽误。”

村民可以选取村中德高望重、受公众信赖的人组成公众监督组织作为村民的代表，起到了维系村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公众监督组织特别应该在拆迁等方案的实施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监督新社区的施工进度、施工质量，监督拆迁补偿款是否足额、按时发放等。公众监督组织发现问题后一要和农民群众及时协商，二要代表农民群众与政府协商，并监督政府解决问题的情况。

### 五、结语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山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合村并居”试点工作。“合村并居”从政策目标上来看，对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益处，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利用腾退的宅基地资源发展乡村产业，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但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对公众参与的忽略，致使农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以山东省 C 县为例，基层政府在推行“合村并居”政策的全过程中，忽视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没有依据公共决策的特点确立合理的公众参与模式，在新社区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强制拆迁村民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过低让村民自己背负巨大的经济压力，对不服从政策安排的村民软硬兼施。基层政府种种行径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法律的有关规定，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威胁了社会的稳定。

基于这种现状，本研究选择了几位“合村并居”试点地的村民作为不同身份农民的代表，进行了面访和线上云访谈。通过访谈可以总结出农民的三点主要的利益诉求：第一，当前基层政府基于农民的拆迁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用过低，农民还需要倒贴十余万元才能住进新社区，农民希望能够获得合理的补偿，既要保证能够利用拆迁补偿费置换新居，又要保证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第二，政府在没有新小区尚未开建的情况下，便要求农民拆除自己的房屋，农民希望政府能够拿出明确的建设计划，如新小区在哪里建、何时开建、合适竣工等问题，同时希望政府能够有明确的后期扶持计划，让农民不会因为搬迁而降低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第三，基层政府在推进“合村并居”政策时，严重忽略了农民的公众参与，致使很多决策方案农民希望政府开辟途径允许其参与到政府的“合村并居”相关决策之中，同时希望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途径。本研究认为，农民上述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的缺失，因此“合村并居”中的公众参与模式和方式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分析。

#### 参考文献：

- [1]张秀吉，2011，《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利益多元与治理——以齐河县农村合村并居为例》，《山东社会科学》第 2 期。
- [2]崔红志，2020，《合村并居动因、效果及相关建议》，《中国发展观察》第 Z6 期。
- [3]于永刚，2020，《合村并居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中国集体经济》第 13 期。
- [4]王丙川、龚雪，2010，《合村并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基于山东省潍坊、德州、济宁等地的

考察分析》，《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5]贺雪峰，2020，《“合村并居”一定要拆农民房子吗》，《决策》第6期。

[6]姜玉欣，2014，《合村并居的运行逻辑及风险应对——基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下的研究》，《东岳论丛》第9期。

[7]党国英，2009，《不可盲目推行“大村庄制”》，《村委主任》第12期。

[8]田珍、秦兴方，2011，《基于农民视角的集中居住政策选择——以扬州市为例》，《学海》第1期。

[9]张本标主编，2019，《菏泽统计年鉴——2019》。

[10]约翰·克莱顿·托马斯，2014，《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李国龙，2018，《托马斯的公民参与与公共决策理论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

[12]张露萍、姜成武、李建志，2010，《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公众参与的程序构建》，《辽宁行政学院学报》第11期。

☆ 作者简介：张晓芸，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刘静雯

※ ※

### 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心发展研讨会成功举行

2020年6月27日上午，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中心发展研讨会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厚学楼909会议室（线下）和腾讯会议（线上）同步举行。会议伊始，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阿江教授做了中心发展情况报告。他表示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后，获批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余项、教育部及江苏社科基金十余项，涉及水污染、垃圾处理、低碳社会、海洋环境、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河海大学社科处李娜副处长对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朱新华教授表示他看到了勃勃生机、潜力无限的环境社会学。他代表学院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和校友对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关心、支持与帮助。同时，他祝愿中心的机制更加健全、成果更加突出。最后，他希望中心能够发挥河海社会学优良传统，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建设智库。

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施国庆教授对中心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建议。一是要有“坚持”的精神；二是要敢于创新，不断开拓；三是要搭建好的平台；四是要加大与校内、校外以及国外相关研究团队的合作，开拓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

随后，各位校友云聚于腾讯会议，与校内各位专家学者开展线上座谈。与会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做了积极回应。

会议尾声，陈涛副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校友的积极支持和响应，表示中心将以成立十周年为契机，开启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他同时欢迎各位校友积极关注并参与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后续学术活动。

# “95”后大学生群体“恐婚”情况调查报告

张 佳

---

**摘要:**“恐婚”话题再次进入人们视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新一代年轻人的“恐婚”话语，有关青年的婚恋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本文通过对“95后”大学生的“恐婚”情况调查发现，虽然“恐婚”的年轻人占多数，但其“恐婚”程度较为一般，并没有像网络上渲染得如此严重，大部分人也并非逃避、拒绝婚姻，并且依旧憧憬爱情。在经济、生育以及家庭情感压力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年轻人已经能够清楚意识到婚姻的责任及成本的付出，进而主动单身、推迟结婚时间或者迫不得已选择在“大龄阶段”结婚。年轻人的婚姻恐惧，实际上更多是他们对未知的压力的恐惧，也表现为一种对婚姻的拖延，是其对现实的适应与改变。

**关键词:**“95后” 大学生 婚姻观念 恐婚

---

## 一、引言

有关年轻人的婚恋问题是一个兼具私人 and 公共性质的话题，看似单纯的个人选择和困扰不仅囿于外在的社会环境，也会对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影响。民政部数据显示，自2014年至2019年的全国结婚人数不断下降，2019年更是跌出千万大关，而与此同时离婚人数也在不断上涨，离婚率同样呈上升趋势，根据民政部所提供的公式计算可知2019年离婚率达到了3.4%。同时，有学者表明，2019年的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也已推迟至约25-26岁，达到历史新高，另外，全国单身人数早在2018年就已经高达2.49亿，而在江苏、上海等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结婚率更低、单身人数更多。婚姻不仅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大事，而且也被认为是保持人类种族延续、维持社会结构的生育制度体系中的必要活动之一，制度化的婚姻保障了家庭内生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劳动力再生产，促进社会新陈代谢。在传统以家本位为主的社会中，个人的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与生育是孝敬长辈，传宗接代的第一要义，对于人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阶段，而在多元文化碰撞的现代社会中，年轻人的生活行为方式逐渐呈现个性化、自由化、理性化的特征，其婚恋观念、方式也在社会发展中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断挑战传统的婚姻观念，同时面对快节奏且高负荷的城市生活、传统婚姻文化规则、婚姻中的负面事件频繁报道等种种社会现实，处于恋爱婚姻十字路口的青年也愈加迷茫。年轻人根据自己的婚恋观念而主动选择的不同婚恋实践模式，例如试婚、不婚、闪婚、懒婚，这些模式的未来发展对国家具有深远影响，有关年轻人的婚恋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不得不关注的现实问题。

近日，“恐婚”又再度成为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热点话题，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婚姻意义和实质的热烈讨论。关于“恐婚”，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大部分的观点认为“恐婚”指的是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对结婚感到恐惧而不敢或者不愿结婚的一种婚恋态度，有的学者将“恐婚”定义为了一种青年之间的亚文化，是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挑战，还有心理学家认为“恐婚”是一种需要专业人士来治疗的心理疾病，也有人对这一群人贴上标签，称之为“恐婚族”。同时，现实社交媒体上充斥的“日常恐婚”“不婚不育保平安”等流行话语成为年轻人对恋爱婚姻的一种调侃，还有许多女性青年甚至“日常恐男”，



认为女性的个人权益会在婚姻中受到损害，表示自己不仅对婚姻表示恐惧而且也不愿意接触男性。众多新兴网络平台上也有相关讨论小组、社区聚集了一批对结婚感到害怕的年轻人，彼此分享自己的故事，他们中有的信奉独身主义，追求自由快乐，有的迫于现实无奈，没有能力没有勇气面对婚姻。从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的青年有关婚姻的种种发言看来，不难发现网络上许多的年轻一代对于恋爱婚姻普遍表现出一种恐惧感以及焦虑感，“想结婚的人越来越少”，“恐婚”已经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后带给的每个家庭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婚姻表现出了看似消极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否被污名化？“恐婚”是真实存在的吗？那些讨论自己“恐婚”的年轻人到底在“恐”什么？

## 二、研究方法

“95后”大学生代表着富有活力的年轻一代，是社会进步创造的主力军，普遍处于18-25周岁，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正处在恋爱和婚姻的过渡期，其婚恋态度明显受到多元社会文化的影响。通过对“95后”大学生的“恐婚”情况进行调查，来透视当代青年的婚恋焦虑、恐惧状态同时也可以从婚恋侧面反映时代和社会文化特征。在研究过程中，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尝试结合定性和定量两种调查方式，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获得相关资料。

### （一）文献法

文献阅读是展开调查研究的基础，本文文献法的运用主要包括阅读婚恋观相关的学术文献以及对社交媒体社区上的相关文章和发言，来获得对学术界中的“恐婚”看法和社交网络中所发表的“恐婚”相关内容的初步了解。

### （二）访谈法

访谈是实践调查的必要途径，通过访谈能够更好的深入了解事实，逐渐确定研究主题。本次调研过程中的访谈，以“恐婚”为切入点，简单列举访谈提纲，对分别处于适婚年龄阶段、在不同地区的七位“95后”大学生，其中包括三名男生和四名女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询问他们对于婚姻和恋爱的实际态度、看法以及他们不同婚恋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现实生活中年轻人的婚恋态度情况作进一步了解，来帮助更好地设计问卷问题以及确认问卷所包含的维度，并对问卷统计分析结果加以丰富、补充。

### （三）问卷调查法

在文献阅读和访谈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开展问卷调查。利用网络问卷调查系统问卷星，通过滚雪球的方式线上发放、收集问卷，以自愿填答的方式为原则，同时以不记名的方式展开，保护了回答者的隐私同时避免了尴尬作答情况的出现。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婚恋态度观念、“恐婚”看法、以及外在影响四个部分。

## 三、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共回收到231份问卷，覆盖剔除乱答、信息不符等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取问卷样本224份，有效回收率为96.97%。

### （一）受访者整体基本特征概况

本次问卷调查的224位受访者中，从年龄上来看，平均年龄为22.07岁；从性别来看，受访者中女性居多，包含137名女性（61.16%）以及87名男性（38.84%）。根据回答者所在地区来看，覆盖地区包括河北、北京、江苏等27个省市，按照城市等级划分，位于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及新一线城市（根据2020年城市最新排名）有56人（25%），其中在二线城市的人数最多，有64人（28.57%）；三线城市

市有 50 人（22.32%）；四线城市有 21 人（9.38%）；五线城市及以下地区有 33 人（14.73%）。从受教育程度看，专科学历、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及以上的受访者比例分别是 4.02%、68.3%、27.68%，其中，本科学历人数最多。从目前所处的恋爱状况来看，受访者中有过恋爱经历的占 63.84%，目前正在恋爱中的占 36.16%，从未恋爱过的人，占 36.16%。详情见表 1。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统计表

	人数（人）	比例（%）
<b>性别</b>		
男性	87	38.84
女性	137	61.16
<b>地区</b>		
一线城市及新一线城市	56	25
二线城市	64	28.57
三线城市	50	22.32
四线城市	21	9.38
五线城市及以下	33	14.73
<b>受教育程度</b>		
专科	9	4.02
本科	153	68.3
研究生及以上	62	27.68
<b>目前恋爱状况</b>		
恋爱中	81	36.16
曾有过恋爱经历，期待下一段恋爱		
曾有过恋爱经历，不想恋爱了	30	13.39
从未恋爱过，处于观望阶段	32	14.29
从未恋爱过，短时间内也不想恋爱	40	17.86
	41	18.3

## （二）“95 后”大学生恋爱、婚姻的观念

对“95 后”大学生恋爱、婚姻观的调查主要包括择偶认知、择偶方式、婚姻价值和结婚年龄等相关内容。

在未来择偶认知方面，有 12.5% 的大学生非常清楚、45.09% 的大学生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伴侣，而有 32.14% 表示不清楚，5.8% 的人表示无所谓，总的来说，大学生对于未来对象的选择是偏向理性成熟的。详细结果见表 2。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b>是否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伴侣</b>	完全不清楚	10	4.46
	不清楚	72	32.14
	无所谓	13	5.8
	清楚	101	45.09
	非常清楚	28	12.5

表 2 未来择偶认知统计表

在择偶方式方面，绝大部分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慢慢交往（92.41%），也有一部分希望通过家人、朋友介绍认识（41.07%），其次 34.82%的人想通过偶遇来认识交往对象，有 11.61%和 5.8%的受访者认为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婚介公司或相亲节目也是一种认识配偶或伴侣的理想方式，可以看出，大学生群体所选择的择偶方式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且有明显的自主性。详情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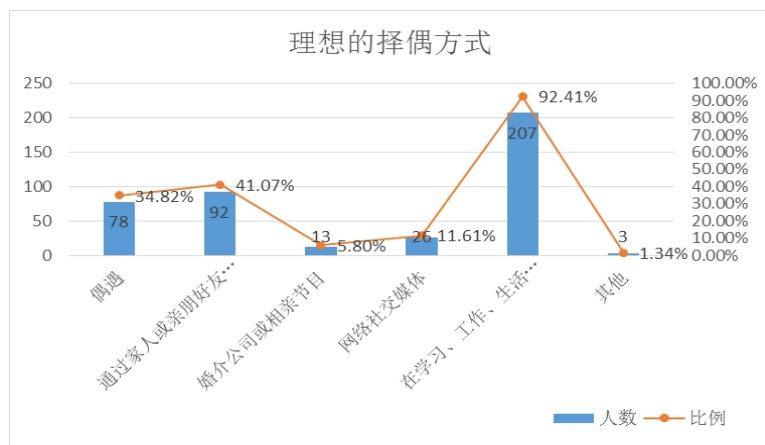


图1 择偶方式情况统计图

对于婚姻意义和实质的看法，选择“家庭的温暖”（83.93%）、“抚育新生命”（51.79%）和“合法的夫妻关系”（37.95%）位列前三，说明婚姻中的家庭因素更为青年所看重；对“婚姻是一场利益的交换”，大多数受访者不同意（47.77%）和非常不同意（8.04%），另有 21.43%、16.96%、5.8%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同意和非常同意；对于“婚姻一定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表示认可，其中非常同意的占 33.48%、同意的占 44.64%，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确定（13.84%），少数受访者并不同意（6.7%）和非常不同意（1.34%）该说法。具体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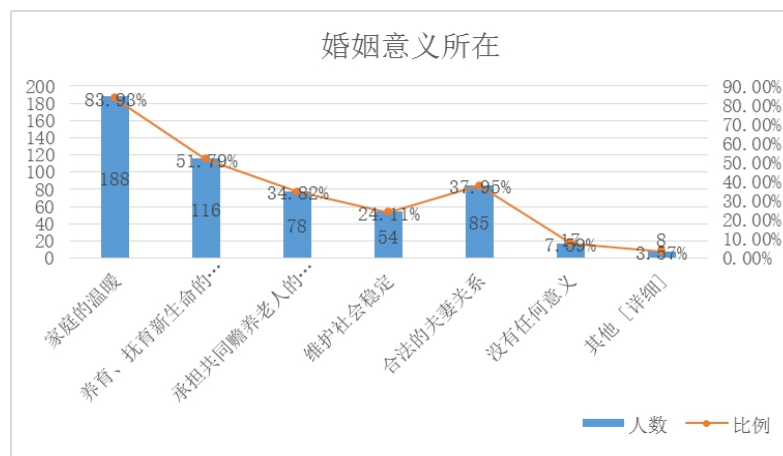


图2 婚姻意义认知情况统计图

涉及理想的结婚年龄时，大多数的人选择都倾向于 24 周岁之后，其中 34.82%的人选择在 24~27 周岁，45.98%的人选择在 27~30 周岁，选择在 24 周岁之前和 30 周以后结婚的分别为 0.89%和 8.04%，也有 10.27%的人选择不考虑结婚。具体情况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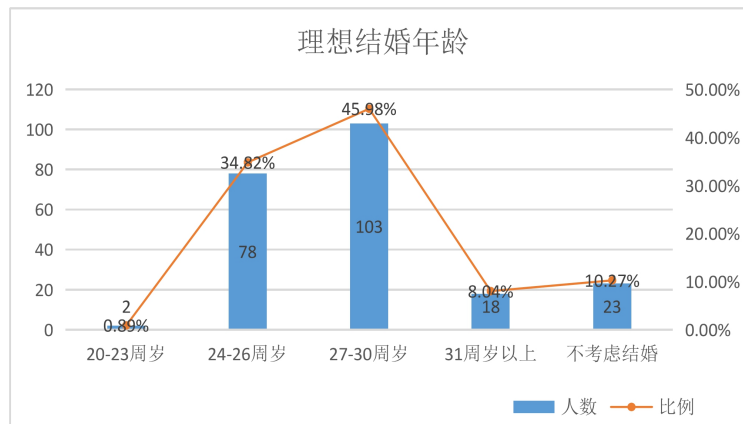


图3 理想结婚年龄统计情况图

在结婚意愿行为分析方面，对“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逃避结婚（例如，拒绝相亲或者拒绝回家被催婚）”问题结果各有不同，52.23%的人表示偶尔会这样做，29.91%的人则完全不会，17.86%的人肯定会做出决策去逃避婚姻；对“如果在周围家人或朋友的催促压力下，是否会考虑在适婚年龄顺其自然结婚”，有37.95%的人表示会，32.14%认为自己不会，其余的29.91%则表示无法确定。详情见表3。

表3 结婚意愿行为分析统计表

	人数（人）	比例（%）
<b>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逃避结婚</b>		
完全不会	67	29.91
偶尔会	117	52.23
肯定会	40	17.86
<b>是否会在外界压力下顺其自然结婚</b>		
不会	72	32.14
不确定	67	29.91
会	85	37.95

### （三）“95后”大学生对“恐婚”的认知

“95后”大学生对“恐婚”的认知看可以从侧面反映其的“恐婚”态度，主要内容包括对“恐婚”的关注度、理解程度和自身“恐婚”程度判定三个方面，详情见表4。

表4 “恐婚”态度状况统计表

	人数（人）	比例（%）
<b>社交媒体“恐婚”话题关注度</b>		
从未关注	79	35.27
有时浏览一下	138	61.61
非常关注	7	3.13
<b>身边好友“恐婚”看法</b>		

完全理解	78	34.82
比较理解	108	48.21
没有特定态度	32	14.29
难以理解	4	1.79
完全不理解	2	0.89
<b>对“恐婚”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认同程度</b>		
非常认同	18	8.04
认同	54	24.11
不确定	52	23.21
不认同	85	37.95
完全不认同	15	6.7
<b>“恐婚”程度自我判定</b>		
非常害怕，根本不想拥有婚姻生活	14	6.25
害怕，想谈恋爱但不想结婚	45	20.09
一般，想有婚姻生活，但怕遇见错的人	85	37.95
不害怕，只是懒得谈恋爱、结婚	31	13.84
根本不害怕，觉得结婚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49	21.88

对于社交媒体上的“恐婚”话题的关注情况，多数受访者（61.61%）表示有时会浏览一下相关内容，仅有 3.13%的受访者非常关注，也有 35.27%的人从未进行关注。

在身边好友表达其“恐婚”看法时，多数人却表示比较理解（48.21%）和完全理解（34.82%），少部分人表示没有特定态度（14.29%），仅有少数人（2.68%）感觉难以理解和完全不能理解。对“恐婚”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说法，受访者中有 37.95%和 6.7%表示“不认同”和“非常不认同”，而有 23.21%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还有 24.1%表示认同，8.04%表示非常认同。

而有关“恐婚”程度的自我判定，在调查的受访者中，感到非常害怕根本不想拥有婚姻生活的占 6.25%，觉得害怕只想谈恋爱却不想结婚的人占 20.09%，想要结婚却害怕遇见错的人占多数（37.95%），另外，并不害怕结婚只是懒得结婚的人占 13.84%，而根本不害怕，认为“结婚是顺其自然的事”占 21.88%。此外，性别在“恐婚”程度自我判定中有显著差异，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 25.891， $P < 0.001$ ，总体上来说，“恐婚”中的男性相比女性较少。

#### （四）大学生婚恋态度的外在影响

“95后”大学生自身婚恋态度与外在环境紧密相关，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映。问卷从传统社会性别分工观念、工作环境、社交媒体以及身边朋友感情经历四个维度来分析大学生婚恋态度所受到外在社会影响的情况。

传统社会性别分工观念。调查中，认为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对自己婚姻态度有影响的占 41.07%，非常有影响的占 8.04%，而认为自己并没有和完全没有受到这种性别分工观念影响的占 20.98%和 6.25%，对此没有特定立场的占 23.66%。

工作环境因素。调查数据表明，42.86%觉得婚姻会给未来工作带来负面影响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的婚姻态度有和非常有受到工作原因影响的，占 59.38%和 3.13%，觉得没有和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占

12.5%和4.17%，还有20.83%的受访者表示“一般”。

社交媒体新闻相关报道。调查结果显示，35.71%的受访者认为各大社交平台上的报道对于其婚姻态度有一定影响，少数人（3.13%）觉得非常有影响，20.09%和12.95%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和完全没对自己产生任何影响，表示“一般”的有28.13%。

身边朋友感情经历。绝大多数（92.41%）的受访者身边有谈恋爱或结婚的朋友，其中，有29.47%的人认为身边朋友的情感经历对自己的婚姻态度存在负面影响，0.97%非常有影响，有29.47%的人表示一般，32.85%的人觉得没有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7.25%认为完全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 四、何为“恐”——“恐婚”特征分析

##### （一）“恐”不代表逃

“恐婚”往往被定义为由于害怕对婚姻有较强的排斥或逃避感的一种婚恋态度，这种恐惧和担忧会对处于适婚年龄阶段的年轻人造成心理和生活上的负担以及促使逃避行为出现。而在实际调查结果中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所表现出来的恐惧感并没有很严重，在表示“恐婚”的144人里，对于自我判定所处的“恐婚”程度问题，有23.61%的受访者表示“轻微，只是想早点结婚”，48.61%的受访者感觉“一般，偶尔会想结婚”，表示“比较恐，内心还是害怕的”占18.06%，而认为“严重，排斥婚姻”和“非常严重，排斥异性”的仅分别占7.64%和2.08%。与我们所定义的“恐婚”不同，当代年轻人所表现的“恐婚”状态是多样化的，对婚姻感到害怕的程度并没有很强烈，而且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异性以及婚姻的绝对排斥，“我觉得现在结婚太早了，我还想享受几年青春”（23岁，KMM，女）、“我只想现阶段谈恋爱，享受恋爱的过程但不想结婚”（22岁，LYT，女）是多数人的内心写照，“恐婚”的背后有一部分表现为“懒婚”，即对婚姻持一种懒得深究的佛系心态<sup>[1]</sup>，但并不是完全相同，许多年轻人其实是在对婚姻生活有所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愿意结婚，所做出的决定是结合了自身情况分析和实际生活等各方面的较为理性的判断。“结婚又不是儿戏呀，结了婚肯定会有许多责任，比如说要照顾老婆、孝敬老人、养小孩，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还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些”（22岁，CSX，男）。

“恐婚”中许多人实际上也是“言行不一”的，即表达了自己“恐婚”的人也不一定会采取行动来逃避。现阶段认为自己“对婚姻感到害怕”的这一类人，有62.5%的偶尔会采取实际行动去回避与结婚相关的安排，相比其他表示不会（17.36%）的人，认为自己肯定会的人占20.13%。而且在下一阶段的生活里多数人也不会肯定地选择放弃婚姻、一直坚持单身生活，而会在周围的催促下，选择会“随大流”走进婚姻殿堂的占36.11%，33.33%的人表示不确定，30.55%的人表示不会。虽然他们表现出了对婚姻的恐惧，但是在面对现实生活各方面的压力下，并不对婚姻保持绝对的排斥和畏惧，而是选择顺其自然，享受当下，将烦恼留给明天，在觉得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考虑寻求合适的伴侣结婚。“那到时候30岁了，感觉就算自己不想结，身边人有可能孩子都三四岁了，家里也会催吧，也许到时候我不结婚反而挺奇怪的，如果别人都可以忍耐，那我也想试一试，希望我到时候可以遇见理想的对象吧”（23岁，MYM，女）。

##### （二）“恐”中有向往

情感是婚恋的核心，决定了婚恋的开始、走向和结束。现代物欲横流、利益至上的社会，情感显得更加珍贵，爱情一直被称为可遇不可求，而多数“恐婚”的人内心同样表示向往美好的爱情和幸福婚姻<sup>[2]</sup>。在表示“恐婚”的这一类大学生中，对于“美好、纯洁的爱情在这个社会是存在的”这一看法，多

数人表示同意（54.91%），也有一部分人表示非常同意（23.21%）。而且在有关“婚姻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一观点，有19.16%和45.14%的人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仅有少数人表示不同意（8.33%）和非常不同意（2.08%），其他人则表示不确定。“95后”大学生对于恋爱和婚姻看法还是偏向于浪漫化的，依然相信、渴望爱情，并且认为相识-恋爱-结婚是走进婚姻的理想化的过程，爱情是结婚的前提，“我觉得没有感情基础就在一起，太扯了，我不会选择和一个不爱我或者我不爱的人结婚的，那样不如不结”（24岁，XWB，男），并且多数人认为婚姻并不会使爱情消失，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不会排斥婚姻，两人相爱的话是需要考虑结婚的，调查中对“只要相爱可以不结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说法，表示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人分别占8.33%和36.11%，可见许多人在心中还是排斥这种将爱情和婚姻相对立的消极的婚恋观念。

在向往爱情和婚姻的同时，多数对婚姻保持恐惧心态的大学生，也同样认为婚姻依旧是有积极意义的。“家庭的温暖”、“养育、抚育新生命的快乐”以及“合法的夫妻关系”在“你认为婚姻能够给你带来什么”的问题的答案中，位列前三，分别占80.56%、47.9%、36.81%。“95后”大学生对于婚后生活意义的评价是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相互交织的表现，基于传统而又相对理性，一方面大家普遍认同家庭传统的生育功能，即生养孩子、传宗接代、保持种族延续依旧是婚姻价值的一部分，对于社会文化所宣扬的维持传承子嗣的婚姻传统表示支持。“结婚之后肯定要生孩子呀，我说不出来为什么，觉得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吧，一种需要传递下去的责任，虽然可能照顾孩子是有各方面压力的。”（23岁，LJZ，男），而且个人也希望在参与一个新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认为婚姻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婚后组建家庭后所带来的两性间的互相照料、心理慰藉以及精神陪伴，“我很向往那种一日两人三餐的生活，有个固定的依靠可以给我很多安全感。”（22岁，LYT，女），更多的是个人基于对爱情的向往，进而对两个人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求，此外，在提倡法制化的现代文明熏陶下，《婚姻法》的出台，追求受到法律保护的两性关系也被认为是婚姻的意义所在。“婚后双方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彼此的权益都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24岁，LYY，女）

### （三）“恐婚”向晚婚发展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却使青年想要步入婚姻殿堂的脚步逐渐放缓，“恐婚”的大学生人群中的所期望的初婚年龄普遍推后。虽然结婚年龄和实际的结婚年龄有差距，但是青年在婚恋年龄上的意愿和期望仍然对其初婚年龄产生着重要影响。处于不同“恐婚”程度的受访者中<sup>[3]</sup>，理想的结婚年龄选择在27-30周岁最多（48.61%），31周岁以上的占9.02%，其他选择24-26周岁占29.86%，20-23周岁的占1.38%，不考虑结婚的占11.11%。调查中几乎有一半的人的意愿初婚年龄与国家所规定的法定婚龄（女，20周岁；男，22周岁）相比推迟了至少三年及以上，已经属于晚婚范围。一般情况下，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年龄在22岁左右，完成学业一方面也是推迟初婚年龄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大学生自身也偏向于将结婚时间安排在了毕业之后的三到五年以后，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学历者在选择27-30周岁结婚的比例（53.86%）还要多于本科生（47.42%），从中看出，不同的学历水平下的多数“恐婚”大学生都不会考虑在完成学业后的短时间内结婚。

推迟结婚年龄是“恐婚”大学生的在面对婚姻时的一种意向，但是推迟不等于逃避，也不等于拒绝。调查中在有关对于“婚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的看法上，处于“恐婚”状态的大学生选择同意的有27.08%、非常同意的有6.25%，不同意的占28.47%。而对“遇不到心仪对象绝对不会结婚”的说法，“恐婚”的

受访者中表示非常同意（14.59%）和同意（33.33%）的也占大多数，有38.19%的人表示不确定。多数的年轻人认为结婚是有必要的，只不过不想在现阶段步入婚姻，留出时间来更多得享受自己的生活或者选择将结婚放在工作或其他事情之后去考虑。“我觉得说毕业两三年结婚就有些早了，我才26就要结婚吗？婚后生活都是一地鸡毛，再过几年单身生活或者谈恋爱不更自在吗，我也多想陪陪我爸妈。”（24岁，LYY，女）。向往高质量婚姻的“恐婚”年轻人，更加追求自由和浪漫的现代爱情，面对社会现实中的多种不确定因素，有的是留恋不被束缚的生活，有的是想留出时间增加自己经济实力，在多种选择下，晚婚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下一站归宿。

## 五、“恐”来自哪——“恐婚”深层次原因分析

调查中所显示的“恐婚”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意味着对婚姻绝对的害怕和恐惧，而多数人所表现出来的是在向往和追求舒服和谐的一种恋爱关系和高质量的婚姻生活的同时，又保持对现阶段个人自由生活的留恋，虽然最终不会选择逃避婚姻和拒绝婚姻，但是还会“提婚色变”，谈到婚姻时会表示自己有一些焦虑和不安，并且主动单身，主动推迟结婚时间，而这样一种多元且矛盾的态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又是什么？换言之，这种“恐婚”的背后大家到底在“恐”什么？

### （一）经济压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消费文化的盛行、物价上涨以及房价居高不下，准备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大城市匆忙的“朝六晚九”，高薪但疲惫，小城市安逸的“朝九晚五”，低工资也有烦恼。许多“95后”大学生认为进入婚姻殿堂的前提就是要有较为充足的经济基础，对于“物质条件满足是婚姻的必要前提”的说法，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认同，其中多数人表示同意（49.55%）和非常同意（37.5%），所以“恐婚”的年轻人，普遍认为经济压力是其害怕结婚的首要原因。

“95后”大学生认为婚姻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是一种综合性的，包含多个维度，且不同维度之间相互交织给其带来双重压力。问卷收集结果显示，在“恐婚”的年轻人中，所害怕的现实经济因素中，抚养、教育子女费用支出（例如奶粉钱）、车房压力和赡养双方老人的经济负担位列前三，比例分别为80.56%、75%和43.06%，排在其后的结婚成本支出（例如彩礼钱和婚宴费），占40.97%，其他还包括婚后生活成本增加、已婚后工资降低、自身养老金的储备等等。许多年轻人是在结合自身经验的基础上，理性地认识到了结婚以及婚后的所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对婚姻望而却步。“贫贱夫妻百事哀呀，结婚的话肯定要得有钱呀，而且又想给她最好的，结婚养小孩也要钱呀，挣钱就是一种压力，我觉得有钱人肯定不会害怕结婚的。”（23岁，LJZ，男）

分性别来看，男性和女性害怕婚姻的现实经济因素也有所不同。首先，两性都面临着车房的压力，调查数据显示，“恐婚”中的男性和女性认为车房压力是其害怕的经济因素中分别占比都是75%。男性所面对的车房压力，是社会环境下的择偶中对男性的不成文的规定，受到传统“从夫居”制度的影响，婚姻中男方往往被要求提供婚后住所，并且人们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车子也逐渐被列为男方向女方求婚的条件之一，而女性所面临的车房压力，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房价过高，男方条件只能承担的起首付的情况下，婚后由夫妻双方共同还贷，另一方面是男方家里可以提供一套房子，但是出于现实考虑，比如为了孩子教育购买“学区房”或者为了孩子的未来而购买房子作为一种投资，或者女性出于对自己婚内权益的维护，购置婚后共同财产，即夫妻双方共同购买另一套房子作为离婚后的保障，还有是女性为了



追求经济独立，想要在婚前购买自己的房子。其次，处于不同“恐婚”程度的男性认为“彩礼、婚宴这类的结婚成本过高是其害怕的经济因素”的数量占比相比女性多 22.88%，在许多地方，彩礼和举办婚宴作为婚姻中必不可少的传统礼节，不乏许多地方要高额彩礼，至少万元起步，有的多达十几万，例如，江西省一般当地的彩礼起步价格都是 15 万起步，而河北省内的四线城市彩礼也在十万左右，举办婚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往往都需要男方来承担，对于许多男方家庭来说，不难说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支出。

## （二）生育压力

“恐婚”和“恐育”往往是形影相随的，受到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许多年轻人的婚姻观念中，生育不仅是婚姻的部分价值所在，同时出于同伴群体认同、家长的催促以及自身养老的考虑等等原因，生育是婚姻的一部分。所以在进入婚姻后时，生育成为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于“生孩子比结婚更恐怖”的看法，超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29.17%）和同意（30.55%），生育带来的未知压力也是年轻人害怕婚姻的因素之一。

生育压力和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之间相互重叠，看似单纯的生育压力中实际掺杂着金钱支出、情感付出和心理健康成本。首先，最为直接的是生育所带来的金钱付出，例如生育本身所需医疗照顾费用、抚育孩子日常花销以及教育投资，城市的高成本生活已经让年轻人自身面对了不小的生存压力，比如要偿还房贷和车贷，再要承受生育所带来的金钱负担，更加增添了婚姻的经济压力，使人越来越想逃离婚姻。“我害怕结婚的原因就是‘恐育’，如果结婚不生孩子我是不会害怕结婚的，有了孩子之后肯定要花好多钱呀，想想就头疼。”（24 岁，XWB，男）

除了金钱负担之外，许多年轻人还表示害怕婚后生育所面对的精神压力，其中，“恐婚”的女性认为“生育面对的未知精神压力”的数量占比相比男性多 21.92%，具体来说，男性和女性都对生育所带来的精神负担表示害怕，根据访谈了解，两性之间所害怕的内容有所差别，并且，女性的“恐育”情绪更为强烈。对于男性来说，所面对的生育的精神压力来自于家庭内对于理想化父亲职责的履行，传统性别刻板印象中，男性作为家中的“顶梁柱”更多承担着抚养孩子的主要经济基本供给，塑造严父的角色，而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年轻男性认为自己一方面依旧扮演赚钱养家的角色另外还要考虑如何做一个新时代的好爸爸。而对于女性来说，生育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中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生育本身带来的生理及心理的创痛，包括对“产后焦虑症”的担心、生孩子过程内和产后身体健康的受损以及产后身体的恢复等等，其次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影响，女性承担了更多照看孩子的家务劳动，不仅是单纯的体力支出还包括心理成本付出，“我害怕生孩子，我觉得那个过程很痛苦，我更害怕生了孩子以后自己像个单亲妈妈”（22 岁，LYT，女）。另外，许多女性受访者认为生孩子这件事会自己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角色冲突，生孩子、照看孩子必然会占用工作精力，而且许多工作岗位不愿意招刚结婚或者刚生完孩子的女性，这种工作环境约束也给女性带来了精神负担，影响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

## （三）家庭情感压力

结婚后的各种情感关系会更加复杂，由恋爱中单纯的两性关系逐渐涉及到双方的家庭关系，这些家庭情感关系也成为“95 后”大学生害怕婚姻的因素之一。许多年轻人表示对于婚后的两性关系的担忧，是他们“恐婚”的家庭情感方面的主要因素。调查中，“恐婚”的受访者认为“婚后伴侣关系变差”是

其害怕的家庭情感原因占 77.08%，害怕“婚姻失败带来的情感伤害”占 50%，害怕遭受“家庭暴力”占 44.44%，害怕婆媳关系的占 59.72%。在家庭暴力方面，女性数量占比相比男性多 37.31%。维持和谐的两性关系是家庭提供精神功能的重要条件，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虽然个人主义有所兴起，但更多的年轻人仍然把家庭当作自己感情的寄托，追求有爱情的夫妻生活，认为维持家庭内的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必要的，但又是困难的，有压力的。

而大学生认为婚姻要承受的这些情感压力来自于社会和个人家庭双方面的共同作用。首先是社会层面上，结婚的普遍高成本、离婚率的不断上升以及离婚带来的各种高风险，有的年轻人还没结婚就已经害怕离婚，“两个人的感情不合走到离婚这一步就挺可怕的，离婚后再婚也难，情感也会受到打击”（23 岁，KMM，女），另外还包括部分社交媒体以及影视剧对于婚内负面的过分渲染，例如明星婚内出轨、女子不堪家暴而跳楼、婆媳大战，这些小概率的事件被过度解读，夸大了婚姻的阴暗面，忽视了婚内相关科普信息的传递，助长了年轻人对结婚的焦虑，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中多数人认为社交媒体中的网友发言和报道对自己的情感压力有影响（40.28%）和非常有影响（4.86%）。其次，在个人的家庭层面上，有些年轻人出于对自身能力的判断，认为自己难以承担婚姻所赋予的责任。调查中，认为“身心不够成熟到承担责任”的占 74.31%， “对经营婚姻没有信心”的占 45.14%，多数大学生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好面对婚姻的心理准备。除此之外，“父母爱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的婚恋观念的形成，对其后来的婚恋行为意愿起到重要作用。在调查的受访者中，认为“受到原生家庭父母关系影响”的占 58.53%，部分大学生认为父母的婚姻关系、相处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婚姻态度，“我的爸妈就总是吵架，有的时候还会打架，我特别害怕我结婚后会不会也这样，那样还不如自己孤独一生更快乐。”（23 岁，MYM，女）

“恐婚”害怕的不是结婚本身，而是婚姻背后带来的各种压力，而这些压力来自于许多方面，维持个人生存成本的压力增加、婚后生活的日常琐事、婚姻传统文化的约束、教育的高支出、养老的责任等等，许多大学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婚姻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婚后生活的各种成本付出，而这些所达到的程度实际上又是未知的，正是这些未知的压力相互重叠，逐渐建起大学生心中对婚姻看法的高墙。

## 六、结语与讨论

当“恐婚”一词进入大众视野，在社交媒体上日益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而现实生活中“恐婚”也不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是普遍存在于年轻一代当中，“恐婚”成为许多年轻人对婚姻态度的一种无奈表示。但是调查发现，我们在网络上所定义的“恐婚”中那种强烈害怕的态度是相对少见的，很少有年轻人考虑真的不结婚，并且排斥异性，相反，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对婚姻的恐惧程度是较为一般的，他们能够理性分析婚姻所付出的成本和婚后需要承担的责任，虽然对婚姻表示害怕但并不意味着对婚姻的绝对排斥，而是出于对美好爱情、高质量婚姻以及理想化的亲密关系的追求，却又迫于各种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选择主动单身、推迟结婚时间或者迫不得已选择在“大龄阶段”结婚。

对于婚姻表达了恐惧态度的年轻人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压力主要包括经济压力、生育压力和家庭情感压力，个人的经验观念与社会密切相关，这些源自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使年轻人越来越害怕走进婚姻。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本身就增加了年轻人的生存压力，而结婚需要较为充足的物质基础，同时传统的婚礼礼节显而易见地增加了结婚成本。而婚后的生育不仅意味着经济压力的累积，还带来了抚育、教育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成本的更多付出，而且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下，男性承担更多的

家庭经济收入的提供以及新型父亲角色的挑战，而女性则承受着生育本身带来的身心的劳累与疲惫，还有自身工作职责和家庭内照料责任的冲突下个人的牺牲。除此之外，家庭情感压力更多表现为在离婚率逐渐上涨、社交媒体和影视剧中夸大宣传婚姻消极面以及个人自身经历的影响下，对维持婚内两性亲密关系的担忧和对经营婚姻失败所带来的风险的害怕。

当我们把焦点集中于婚姻时，认为年轻人所表现的恐惧是对婚姻的害怕，而实际上更多是他们对未知压力感到害怕和焦虑，从某种程度上说，“恐婚”更多表现为一种对婚姻的拖延，即大家意识到了婚姻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是需要谨慎去完成的一项有意义的任务，不过在现阶段的压力作用下，会感到焦虑，从而选择将婚姻推迟稍后时间，去追求其他对于人生中同样有价值的事情，作为应对婚姻的一种方式。过度解读和渲染年轻人这种所谓“恐婚”状态，甚至将其当作一种心理疾病，反而可能会对年轻人的婚姻态度产生负面影响，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宽容的婚姻文化环境和多元的婚姻标准可能是减轻青年对婚姻的拖延态度的有效对策。

#### **参考文献：**

- [1]曾远力，2019，《当代中国青年的婚姻实践》，《青年探索》第6期。
- [2]马妍，2012，《传统观念与个人理性的碰撞：80后知识精英婚恋观研究》，《青年研究》第5期。
- [3]贾志科、风笑天，2018，《城市青年的婚恋年龄期望及影响因素——以南京、保定调查为例》，《人口学刊》第2期。

☆ 作者简介： 张佳，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刘静雯

# 养老设施何以邻避？

——S市H社区康养中心的困局

孙舒然

---

**摘要:**近年来,以社区为依托,为家庭日间暂时无人或无力照护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的养老设施开始出现。社区城市社区康养中心是社区养老的一种高质量服务方式,是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通过调研发现,S市部分社区在建设社区康养中心的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邻避效应”,并最终导致项目停工。通过分析此次邻避冲突的过程可以发现,居民的心理不适感、不平衡感下的权利意识强化以及公众参与缺位是导致“邻避效应”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邻避效应” 社区康养中心 养老服务供给

---

## 一、导言

### (一)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各地区都在加快推进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S市也于2018年出台了《S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办法》,其中明确指出要抓好社区康养中心建设,通过社会化运营以及强化政策扶持的方式充分发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居家养老的支持作用。

2020年3月S市在推进社区康养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邻避效应”,有多个康养中心的建设引发了大规模的居民抗议活动,并最终导致项目建设停工。

“邻避效应”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20世纪美国居民对居住区周边的化工垃圾产生的抗议活动。“邻避效应”是指居民或在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不利后果,而采取的强烈的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在研究“邻避效应”的过程中,界定邻避设施很重要,林茂成指出,所谓邻避设施是指地方上所不愿意接受的设施,但是却是达成社会公共福利所不可或缺的。陶鹏、童星根据“预期损失—不确定性”维度,将邻避设施分为四类:污染类(垃圾焚烧场、磁悬浮、飞机场等);风险聚集类(核电厂、化工厂、加油站等);污名化类(戒毒中心、监狱、传染病医院等);心理不悦类(殡仪馆、火葬场、墓地等)。目前学术界关于“邻避效应”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主要以污染类和风险聚集类设施为研究对象,例如PX项目、垃圾焚烧厂、核电项目等,以污名化类以及心理不悦类的项目为研究对象的则较少,这也是此类邻避冲突较少发生的缘故。然而近几年,养老设施遭受“邻避效应”的现象却开始逐渐在各地出现。养老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国家对养老服务的公共投入也逐日增多,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被提倡走入社区、走入家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新的矛盾暴露出来,如新建成的康养中心无人入住,建设中的康养中心遭到抵制等。纵观已有文献,学术界目前对养老设施“邻避效应”的研究还很少,养老设施的“邻避效应”也尚未引起公共部门的重视。

### (二) 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种方法,本文主要是通过定性的研究

获得调查资料。主要采取非结构访谈法来开展调查。非结构访谈法是本次调查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 S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H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及 J 小区的居民的访谈，对此次 H 社区康养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邻避效应”的演变过程、影响以及原因进行探究。

### （三）S 市社区康养中心的建设情况

S 市社区康养中心采取的是公办民营的方式，由政府解决社区养老场地建设并交由社会化运营。截至 2019 年 10 月，S 市已经建设完成多所社区康养中心的建设，并且预计在 2020 年继续建设 19 所社区康养中心。

S 市社区康养中心作为养老服务设施的一种，主要具备以下多种功能：第一，生活服务功能。社区康养中心设立了老年食堂、助浴室、洗衣房等设施设备，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洗衣洗被等服务。第二，托养服务功能。社区康养中心为“街道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嵌入式机构”二合一养老新模式，中心设立了养老床位，提供长期住养、日间照料、中短期全托家庭喘息服务。第三，康复护理服务功能。社区康养中心配置各类康复理疗器材、护理设施和生活设备，配备专业医护团队，针对老慢病开展专科中西医门诊服务。第四，上门居家服务功能。社区康养中心针对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人家庭提供上门居家照料服务。第五，社会工作、心理疏导服务功能。社区康养中心设立了心理咨询室、不定期安排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坐诊，对辖区老年家庭提供心理疏导服务。第六，老年人能力智慧评估功能。社区康养中心引进了老年人行动能力智慧评估系统，配备专业评估从业人员为可需求的老年人进行行动能力智慧评估。由此可见社区康养中心能够为社区老人提供长期住养、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医、文化娱乐等养老服务内容，是完善养老服务，推进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在前期运行过程中，已有的康养中心都运行良好，所以 S 市预计于 2020 年按照已有社区康养中心的模式继续扩大社区康养中心的覆盖规模并打造出示范点。然而，2020 年 3 月在推进社区康养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有多个康养中心的建立引起了大规模的居民抗议活动，并最终导致项目建设停工。

## 二、“邻避效应”演变过程

基于笔者 2020 年 8 月通过对 S 市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居民深入访谈发现，2020 年 3 月至 4 月 S 市部分社区康养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受到了居民的集体抗议。其中 H 社区的 J 小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体上访、拉横幅以及封门的群体抗议活动，最终导致项目停工。本次报告以 J 小区为主要调研对象，根据调研所得资料，将此次“邻避效应”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 （一）康养中心示范点的选择

2018 年，S 市出台《S 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办法》，提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率须达到 80%以上，县级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道（乡镇）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覆盖率达到 20%。建设 19 个社区康养中心，年底前实现社会化运营，社区康养中心可以加挂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牌子。在已有社区康养中心已经顺利运行的基础上，S 市于 2019 年开始新建一批社区康养中心。康养中心的建设首先面临的便是选址的问题，S 市的康养中心采用的是公办民营的方式，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便是选址和用房的问题。H 社区的办公用房是门面房，但是这块地却并不是开放商预留的社区用房，当初 J 小区建设时，开发商预留的社区用房处于小区内部，是一幢居民楼的 1-4 层，这是不符合社区用房条件的，于是 J 社区又重新选择了一处面积较小的门面房作为办公用地，但是开发商预留的这部分场所没有产权而且已经成型，所以社区也就将它一直空置着。2018 年，S 市要进行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社区康养中心成为重点项目，政府要首先打造一批试点社区，而社区用房的紧张使选择试点的前提就是社区是否有闲置用房。J小区10栋居民楼第一单元空置的4层楼房便被选中为试点地。

“民政部门说我们要找社区搞试点，然后就说找我们社区，我们当时这个社区的房子正好闲置，领导们看来也比较适合，我们正常人也觉得比较适合，但是我们当时的顾虑是会扰民，因为毕竟在小区内。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好了，就在正准备启动的时候呢，居民反应比较大，居民认为‘既然是民生工程，那这个工程应该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感受，你这个工程应该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福利，你现在让一部分人感到开心了，让我们这两栋楼的居民难受了’。”（2020年8月15日H社区主任访谈录）

由此可见，动工之前政府并不是没有顾虑，而这份顾虑仅仅在于可能会带来扰民情况，施工前期政府部门已经与施工单位进行了交涉并做了预案，明确施工期间不能影响居民生活，所有工人也必须有健康证明。力图将施工带来的环境影响降低到最小。

### （二）抗议情绪的产生

H社区的J小区于2014年建成，属于S市的高档小区，原来是菜地，之前的菜农已经移到旁边的另一个小区里，目前一共有3100多户，小区居民都是从其他的区或者乡镇搬过来的。老年人口大概占到总人口的1/5。

H社区康养中心动工之前，居民并不清楚项目具体细节，社区只是和居民“打了个招呼”，告诉居民小区内要建设养老设施，而没有告诉居民“康养中心”这个具体名称，也没有告知居民康养中心会进行社会化运营、设置床位以及收纳社会上的“失能失智”老人等具体信息。10栋楼第一单元的1-4层的外部在开工之前以及动工前期，并没有挂上“康养中心”的牌子，居民工作生活忙碌，也并没有对这块处于居民楼的施工地进行过多关注，只以为是正常的装修。

但是随着施工的进度不断加快，康养中心正式挂牌后，居民开始出现反抗情绪，起初表现为居民看到康养中心挂牌后，直接进入施工场所进行询问，在了解到具体情况后立刻表达了反对意见并且与施工单位发生了语言上的冲突。居民表示自己花了一辈子心血买的高档小区，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在小区内建设康养中心。

“我们当时也没有注意这边是在干什么，因为这边一直说弄的是社区用房，后来那天下午，就看到有施工队过来，就有人过去问这在干嘛，是不是社区要搬过来了，后来一问不是的，是要搞什么康养中心，那你怎么说干就干呢？我们这边也没有老人要住进去，你搞好了是给谁住呢？后来他们就讲是公司过来搞，那怎么行呢，你把我这边搞成养老的，那我上面住着人怎么办呢？你干嘛非要在居民楼里搞这个东西呢？”（2020年8月15日J小区居民访谈录）

起初只有10栋楼的居民发现了这件事情，而由于现在居民传达信息的方式早已从面对面的交流变成了通过业主微信群的线上交流，很快“要在小区内建设康养中心”的消息就在小区内迅速传播，反对者也从少数居民快速扩大到绝大部分居民。强烈反对者甚至会通过上门的方式说服持有相左意见的居民转变意见。紧接着小区内居民在部分意见领袖的带领下迅速组织投诉与上访，其中不乏有居民通过手机录像的方式要将上访投诉过程公之于众以获得媒体效应。

### （三）邻避冲突的爆发与平复

居民刚开始表达反抗意见时，街道和社区立刻进行了入户访谈，开始向居民详细介绍康养中心的运营规划和对居民带来的利益，但是居民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

“刚开始居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下去调研了，前期在物业也讲了，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就找居民代表了，当时提出了四条诉求。这几位居民代表是因为这个抗议活动选出来的，全是男性年龄大概在30-70岁，老人的反对更强烈，你可以建，居民也知道是好事情，但是你不能在小区里建，门面那么多为什么在小区里建设。我知道你这个康养中心建设的好，但是你不要在我小区建好不好。”（2020年8月15日H社区主任访谈录）

并且由于居民已经掌握了政府占用公共区域的证据，居民也更加有理由进行反抗。

社区在入户访谈无果后向上级部门进行反应，但当时政府的意见还是以安抚为主，要求社区把政策宣传透彻。但是居民并没有给社区这个时间，当场就要求政府必须立刻明确停工时间，社区将居民意见反馈给政府后，政府仍旧想通过后期安抚的方式将康养中心留下来，所以也并没有明确说明继续开工还是停工。

于是居民第二天便开始封门，紧接着就开始聚集拉横幅，规模达到300人左右，社区、街道以及派出所等其它部门都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并进行安抚劝说，但是居民仍反抗情绪强烈，当场要求政府给出准确停工时间点，不要拖延。由于冲突爆发时正是新冠疫情严重的3月份，且J小区已查出两例确诊病例，政府很担心发生聚集性活动造成疫情传播以及其它社会影响，于是当场答应居民立即停止社区康养中心的施工。

“当时向上面反应了，但是政府的意见还是以安抚为主，政府要求我们把政策宣传透彻，但是当时居民根本不给我们时间，当场就要求我们定下来。我觉得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在家里闲着没事，天天耍手机，如果像平时正常上班的话，谁还会来管你这个‘康养中心’建不建的问题。大家的抗议真的太快了，第二天就要我们做出反应。社区也很快做出反应，把情况都向上级反应了，但是居民速度更快，第二天就开始封门，政府当时也没有说开工也没有说要停工。紧接着就开始聚集拉横幅，居民当场就要领导给个准确意见，干还是不干。如果不是疫情原因的话这个项目很有可能完成。当时社区开居民会议的时候，社区已经明确和居民说了，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们肯定不会开工，但是居民还是不行，不给干，说政府必须给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不要拖。社区认为应该给一点研究的时间，但是居民不同意，要求必须给一个不干的回复时间。当时政府的意见还是很想把项目留下来，后期充分征求意见，但是居民根本不给你时间。于是政府当场就答应下来，因为不能发生聚集时间，所以当时马上就停了。这中间也不排除对我有意见的对政府有意见的，比如这里面也有下岗工人，那下岗工人对政府的意见很大。”（2020年8月15日H社区主任访谈录）

后期在居民的监督下，康养中心的挂牌被撤下，施工单位撤出，并贴上宣布项目停工的公示，这场冲突才得以平复。

“我们现在街道都不愿意搞这个事情，基本放弃，现在居民让我们失望。当时社区很焦虑的，小区里面已经有聚集性病例了，你现在还搞一个聚集性活动，我们都很焦虑的，万一出现聚集性感染那就不得了了。大家在家里呆的都很无聊，而且当时管理得特别严，我们这个小区还查出来两例，现在有这么个事情，大家都当做一个发泄口，现在回头看看，好多人都是打酱油的，他们(指居民)从来没有想过当初疫情发生时，社区工作人员是怎么站岗服务的，居民都认为你们社区做好这些事应该的，如果你们不做好，反而是不应该的。政府现在做好多时间都是一头热，现在都是党员群众在那干，群众在旁边指指点点，干不好还说你。”（2020年8月15日H社区主任访谈录）

在 S 市这次多个社区出现“邻避效应”的过程中，不仅使社区康养中心停工，也使政府、社区和居民之间产生了矛盾，居民对政府及社区产生了信任危机，而社区也因为居民如此“不留情面”的抗议而感到寒心。

### 三、康养中心“邻避效应”何以发生

社区养老设施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为何会出现“邻避效应”？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对此次“邻避效应”的主要参与者进行了深入访谈，首先笔者进入社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 J 小区社区康养中心的原址，小区内部环境优美，娱乐设施较多，活动人群多为老人和小孩。社区康养中心的选址位于一栋居民楼的 1-4 层，此时，距离“邻避效应”爆发已经时隔 4 个月，这四层楼仍旧空空放置在此处，大门紧锁，康养中心的挂牌已被撤下，墙上贴着的是停工公示。看到我们来之后，有几位带着孙子孙女正在散步的老人不时望向我们这边，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再次回访感到警惕和敏感，笔者上前与她们进行交流，得到了居民关于社区康养中心的一些真实看法。

#### （一）居民的心理不适感

社区养老设施“邻避效应”的产生具有独特性，与污染类以及风险聚集类设施不同的是，养老设施的整体福利性与外部负效应都较小，例如社区康养中心并不如垃圾中转站、核电站等能够给社会带来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康养中心受工作人员及场地限制，服务人群有限。此外康养中心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并不严重，不同于环境污染项目可能带来的健康威胁，养老设施的负外部性主要在于给居民带来的心理不适感。

J 小区的居民大多是于 2015 年左右由于工作的需要从周边乡镇搬来居住的。日常工作的忙碌以及高昂的房价使居民十分重视自身小区形象，希望自己在下班时能够有一个舒适安静的小区环境，而康养中心的建设将会给小区带来许多外来的失能失智老人，容易使小区居民产生压抑心理，居民尤其担心老人在康养中心去世，让人感到“不吉利”。

J 社区刘女士说：“我平常上班下班累了一天，辛辛苦苦买的好小区，结果一回到家就看到看到老人瘫着躺着，影响我心情，看老人看到就不快活。而且你说这老人如果生病了还得送医院，那救护车又要过来，说我好好的一个小区救护车天天过来像什么样子，回头搞得小区房子还卖不出去。万一有老人在这去世了怎么办，那家属还不天天在下面哭啊，又不是我们小区的，太不吉利了。”（2020 年 8 月 16 日 J 小区居民访谈录）

康养中心不同于其他社区养老设施的重要一点在于康养中心会收住社会上的失能失智老人，而对于居民来说，一旦让生病的老人住进小区，就意味着医疗垃圾的产生以及传染病的传播，2020 年 3 月正值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居民对传染病更为敏感。此外，J 小区有很多儿童，居民认为孩子经常会在小区内玩耍打闹，如果有身体不便的老人搬进来的话，外出走动时难免会被小孩子撞到，万一出现意外事故，事后追责又会给居民带来不小的麻烦。

J 小区居民说：“我们这全部人都不同意，人家车来车去，有老人出来万一碰到老人家里人还要来找，现在不是一个两个老人不同意现在所有居民都不同意。你看外面那么多房子，你们为什么要在小区里面建。你想这个小区那么车来车往的，如果到时候撞到了或者你看我这带孙子万一小孩把老人撞到了，真是吃不了兜着走。”（2020 年 8 月 16 日 J 小区居民访谈录）

最后，康养中心的建设可能分割社区原有的公共空间。居民认为如果有外来老人搬进来，那么原有



的一些公共物品难免要被分割，例如外来老人占据原有公共娱乐设施以及来看望老人的子女使用小区内原有的停车场等。

综上所述，社区康养中心的建设虽然不会给居民带来生命安全的威胁，但是居民对养老设施的固有印象仍使居民通过想象或者类比的方式对康养中心进行了评估，并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心理不适感。

### （二）不平衡感下的权利意识强化

居民反对邻避设施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与居住地点与此类设施距离远近息息相关，“你建可以，但是为什么建在我的小区，为什么不是每个小区都建？”是居民对邻避设施的态度。对 J 小区居民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认同社区康养中心具备的优势，但社区康养中心的选址使 J 小区的居民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

对于政府来说，康养中心的建设首要考虑的便是解决社区养老服务用房的问题。社区养老服务用房由各县区政府统一解决。但是社区用房一直较为紧张，一般都是由房地产公司在建设小区时预留一部分无产权房给社区，按要求来说预留给社区的用房应该是门面房，但是由于门面房少且价格昂贵，所以仍有部分社区的用房被设置在小区的居民楼里。在 S 市 H 社区中，原本的社区用房就是安置在 J 小区的居民楼 1-4 层，由于社区居委会的搬迁，这块用地一直被闲置。而随着这次 S 市对社区康养中心建设的推进，各社区的养老用房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于是示范点的选择就放在这些仍有闲置用房的社区。

政府的选址方式造成了居民极大的不平衡，社区用房为何会被改成养老用房？为何选在我们小区建设？这种不平衡感让本来就对康养中心心存顾虑的居民产生了更强的抵触。同样是高价买的房子，10 栋楼的其他住户感到了与其它单元住户之间的不公平，而 J 小区内居民感受到了与其它小区之间的不公平。在这种不平衡感下，居民的维权意识快速强化。

首先是 10 栋楼的住户发现了康养中心的建设，当场表达了反对意见，在发现口头争辩无果的情况下，将自己了解到的相关信息传到业主微信群里，于是短短几天内，J 小区以及周边小区都参与了进来。有部分强烈反对者不停在群里表达不满，通过转发其他城市的案例号召大家进行抗争，当遇见意见相左的居民时，甚至直接到他的家里进行说服。此外 10 栋楼的几名业主的职业是律师，在此次抗争活动中运用专业知识以及号召力，带领着其他居民进行有组织的投诉。

除此之外，选址争议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在最初预留社区用房时，开发商给社区的房子是一个架空层，这个架空层是居民的公共区域，这个区域原本是留给居民停车、给老人活动的地方，开发商擅自改变了这块地，把这块地给了街道，而当时街道并没有对这块预留地做到严格审查，并在后期直接交给社区使用，结果在这次邻避冲突中，居民在维权的过程中进行追溯核查发现了这一问题，而正是这一点，使居民的不平衡感进一步加深，更加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在居民对政府产生了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居民的维权意识进一步加强。

后单位时期以来，政治民主化不断发展，当居民在街区中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已经能快速形成高度的动员力，采取集体抗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小集团更具有凝聚力和效应、行动更加果断。康养中心给居民带来的顾虑以及因选址而产生的不平衡感使附近居民在权衡利弊后快速形成“小集团”，产生集体性的反抗活动。

### （三）公众参与缺位

对于垃圾场以及核电站等可能给居民带来明显环境顾虑的项目来说，长期以来的经验使政府在此类

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一套处理社会风险的机制。但是在养老设施的配置过程中，政府并没有预想到此类设施会受到居民如此强烈的反对。

H 社区主任说：“当初刚打算建设的时候政府和社区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社区和政府都认为这是求之而来的好事情啊，我们去外地考察的时候，人家现在高档小区里面配置幼儿园和康养中心是标配，说明这是城市社区的标配，这个收益也不是我们社区和政府，是你们居民，等你老了以后，没有人来顾及你，你在这边有邻居还可以回家，如果我们这边项目停了，人家社区都有，你回头后悔都来不及。”（2020 年 8 月 15 日 H 社区主任访谈录）

政府对风险的忽视使项目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严重缺位。政府对康养中心的宣传仅仅在于向居民“打个招呼”，而没有通过居民代表会议、入户调查等方式收集居民意见。政府没有了解 H 社区居民对养老服务的真实需求，在大力推进社区康养中心建设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进行示范点的选择另一方面要采取统一标准，而忽视了这种供给方式是否与 H 社区居民的实际养老需求相匹配。

对于 H 社区的 J 小区来说，现住居民大多为原乡镇居民由于工作或者上学的需要而搬来居住，老人跟随子女而来，主要为了照顾孙子孙女，大多都是身体健康且自理能力较强的老人，对康养中心的需求并不大。在此次抗议活动中也是老人群体居多。

J 小区老人说：“我们搬来这边住就是为了带带孙子，我们自己也有家住，谁会跑到你这边（指康养中心）住呢？我们这全部人都不同意，人家车来车去，有老人出来万一碰到老人家里人还要来找，现在不是一个两个老人不同意现在是在所有居民都不同意。我自己有房子，也不在这个康养中心住，我在这就带带孩子。还有这是居民楼，你这是搞康养中心，你这是经营性的，政府搞补贴，让商家来赚钱，你这边消防设施过不过关，我这是居民楼不是经营楼。”（2020 年 8 月 17 日 J 小区居民访谈录）

由此可见，公众参与的缺位使政府与居民对养老服务的观点中存在明显矛盾，政府认为康养中心是高质量的社区养老方式，能够为居民提供一体化的养老服务，是利民且应该得到居民欢迎的服务。但是在小区老人看来，自己目前最关注的并不是高质量养老服务，而是对家庭的照顾，H 社区老年人的需求仅在于有可以日常活动的地方，能够时时照看孙子孙女，而康养中心的建设反而会使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被占据。所以虽然 H 社区的康养中心在政府看来是示范点项目，但是并没有真正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这种供需不匹配导致居民忽视了康养中心的福利性，而是不断放大康养中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公众参与的缺位使居民对康养中心的选址原因、建设情况以及运营方式都不了解，信息赤字背景下使康养中心进一步被“妖魔化”。

“这个小区里多有居民都不满意，有的居民在疫情期间，大家都闷了那么长时间了，突然有一个爆发点，大家突然都沸腾了，居民内部也不说这个是康养中心，都说这个是养老院，那就影响我的利益了，我的房子是高档小区，怎么能把养老院建在里面呢？还有里面在里面窜托，唯恐天下不乱。我们前期来调研的时候讲什么都不行，就是不能干。施工方准备进场的时候，有居民发现，就发生语言上的冲突，然后居民就开始在群里“起哄”。（2020 年 8 月 15 日 H 社区主任访谈录）

在后期的抗议活动中，有诸多不实的消息在居民间流传，反对者们并不称呼其为“康养中心”，而是称为养老院，甚至传出了要在小区内设置“太平间”“设灵堂”的消息。官方信息的缺少以及不实信息的快速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居民对康养中心的抵触心理。

#### 四、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区居民权利意识的增长，社区养老设施等非污染设施的邻避效应逐步显现。社区养老设施的邻避效应是政治、经济、心理、文化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社区康养中心作为社区养老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内部高质量的服务水平能够为老人提供优质服务，是我国老龄产业快速发展的表现之一，在全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在不断推广。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新时期，我国的养老产业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在政府和市场大力推进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养老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邻避效应”。通过本次调研可以发现社区养老设施相对于环境污染类项目而言，它的“邻避效应”更为隐性，公共部门对这类设施的“邻避效应”认识还不足，其中居民的心里不适、不平衡感下的高度动员以及公众参与的缺位是造成这类设施“邻避效应”出现的重要原因。但是在 S 市此次的“邻避效应”中可以发现，时隔四个月过去，H 社区的养老设施建设似乎陷入了僵局，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进行新的养老项目的建设，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去规避社区养老设施的“邻避效应”值得进一步探究。

#### 参考文献：

- [1] 汤汇浩，2011，《邻避效应：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中国行政管理》第 7 期。
- [2] 林茂成，2001，《邻避型设施区位选择与处理模式之探讨：以都会捷运系统为例》，《现代运营》第 7 期。
- [3] 陶鹏、童星，2010，《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南京社会科学》第 8 期。
- [4] 陈俊宏，1999，《邻避症候群、专家政治与民主商议》，《东吴政治学报》第 9 期。
- [5] 李小敏、胡象明，2015，《邻避现象原因新析：风险认知与公众信任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第 3 期。
- [6] 陈涛、杨悦，2016，《邻避效应的中国困局 ——以居民抗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7] 田鹏、陈绍军，2015，《邻避风险的运作机制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 作者简介：孙舒然，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童 欣

# 陪读妈妈群体调查报告

——以江苏省 J 县高级中学西门外陪读社区 X 村为例

周 蕾

---

**摘要:**随着教育的普及与不断发展,对于教育资源落后的乡镇及农村家庭来说,教育却依然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最有效的途径,出于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这些家庭中逐渐形成了陪读之风,随之产生了陪读的主力群体——陪读妈妈。本次调查通过专门访谈陪读妈妈,探究陪读的形成原因以及为何选择由妈妈来陪读,并了解陪读妈妈离开原有生活环境,在转向陪读过程中,所发生的改变,陪读期间的真实状态,分析陪读给她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调查发现,陪读使妈妈们做出了牺牲,但在家庭分工与理性选择来看,妈妈是目前最合适的陪读人选。妈妈们放弃了原有的生活,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在此过程中必然遭受了职业中断、收入来源丧失、生活方式单一、年龄资本流失等问题,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但妈妈们普遍接受陪读的职责,并以乐观的态度接受陪读生活。因此对于陪读妈妈们在家庭中的女性地位也需要再重新考虑。

**关键词:**教育 陪读妈妈 形成机制 家庭分工 妇女地位

---

## 一、导言

### (一) 背景

#### 1. 研究背景

国家经济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对教育也越来越重视。教育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普通人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有效途径,是目前个人谋求发展的敲门砖,也是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方式。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人们的观念也开始改变,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学区房”、“摇号上学”、“家长入学面试”等现象均体现了现代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极度重视。

然而这些极具热度的现象仅仅展示了城市人的苦恼,教育的不公平更加明显地体现在乡镇与农村。自 2001 年,政府提出“撤点并校”,对各地区内学校进行重新规划,主要是把农村小学向乡镇合并,乡镇的初高中向县市合并,教育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却给乡镇、农村的家庭和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农村人没有能力买学区房但不得不进入城市上初高中,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因而催生了“陪读”这一现象,随之形成了各种陪读社区、陪读村和陪读群体。

在陪读大军中,母亲成为了陪读的主力,衍生了新的群体——陪读妈妈。在学校就近租房、主要承担照顾孩子生活起居的职责。妈妈们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习惯,重新适应新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问题:职业中断和经济来源丧失、生活方式单一、年龄资本流失、两性不平等加剧、生活意义丧失等等。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家庭中是妈妈来陪读，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参与进了陪读，陪读妈妈在陪读过程中在职业、社会网络、生活方式、情感与态度方面发生了哪些改变，陪读对妈妈们产生了哪些积极与消极影响，陪读妈妈今后如何发展，本次调查主要集中于这些问题对“陪读妈妈”群体展开调查。

## 2.研究综述

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陪读”这一现象并开始关注研究，但对“陪读”的界定还未定型。王江（2006）首次从专业化的角度将陪读定义为：农村家庭从原住地搬迁到城镇中，在孩子就读的学校附近租房安家，细心照顾孩子的生活。郑燕娜（2007）从形式上将陪读划分为临陪、半陪、暗陪、全陪。王晓慧（2011）从陪读原因角度将陪读分为因父母进城务工而致的随迁型陪读、因中小学布局调整而致的被迫型陪读和祈求获得更高教育质量的主动型陪读。王莉（2013）针对张掖市甘州区农村陪读现象调查，给出随迁型陪读的定义为父母或其他亲人随学生离开原居住地，进入乡镇或城市，在当地中小学附近租房居住，长期照顾学生生活，陪伴学生读书的一种社会现象。总之，“陪读”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离开原居住地到学校附近、为获得更好的教育、家长陪同（母亲占大多数）、长期性、以照顾子女生活起居为主。

关于“陪读”研究的视角有：社会性别、社会阶层、家庭等等。这一现象还未受到较广泛关注，现有的研究存在许多局限，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范围有待扩展，研究深度需要进一步加深、现状研究居多，实践干预较少、需要系统地看待和研究陪读现象（汤倩、彭苏浩，2014）；还有既有的研究较为集中的从教育学的视角关注陪读孩子的教育问题，却对庞大的陪读家长群体遭遇的各种问题缺乏关注（陈锋、梁伟，2015）。并且大部分人对这一现象大多持批判态度，解决方法也是希望减少这一现象。

目前，社会学对于“陪读”研究较少关注“陪读家长”，而作者认为对他们的关注必不可少，“陪读”影响最大的是家长，尤其是陪读群体的主力军——妈妈。已有研究发现，随迁型陪读并没有强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功能，反而把她们进一步禁锢在较为狭窄的空间里，从而限制了她们创造价值与自我价值（罗曼，2015）。在家庭和女性角色方面，有理论说明了女性的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这两种角色一旦发生冲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家庭角色，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的机会，致使女性做事业的动力降低（李银河，2005）。显而易见，女性在陪读行为中必然是主力军，她们最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原有的生活，接受家庭分工的安排，加入“陪读”大军。必然的，“当陪读成为妈妈的一种职业时，妈妈的人生价值就和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捆绑在一起了”（唐佳，2017），这看起来极其可悲。

但是妈妈作为陪读者也会给她们带来许多积极影响，选择妈妈也有理性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积极作用，例如：孩子的改变、教育经验的积累、获得亲友的赞赏、周围人的羡慕等等（刘澄、乔国银，2014）。任何环境都不能阻止一个人的发展，生命中每一历程都对其社会化有重要影响，即使“陪读”会限制自身发展，也要在其中找寻机会，把不利因素化为有利因素。比如新闻报道《“中国第一陪读母亲”刘强：“陪”养了女儿，成就了自己》，就讲述了一位陪读妈妈将自己陪读的经验、教育孩子的经历写成书，取得巨大成功的故事（新年，2010）。

## （二）研究方法

### 1. 访谈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法，首先接触了认识的陪读妈妈，对她们进行初步访谈，了解大致的陪读情况；接着，通过她们的介绍与引导，进入陪读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同时利用滚雪球的方法，

共对 10 位陪读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她们陪读的原因、陪读生活、陪读感受等；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也通过偶遇抽样，随机访谈了 2 位村民，向他们了解了本社区的基本情况以及周围陪读妈妈群体的基本情况。

## 2. 观察法

观察法通过自身的感官，来感受陪读社区的情况，并且在访谈过程中发现陪读群体所表现出的感情状态，对有研究意义的事情通过工具进行记录。比如说，通过访谈对象的穿着打扮、家里布置感受陪读家庭的经济情况，或者通过观察社区内的商店、菜摊、小厂等发现本地生活的日常状态等。

## 3. 文献收集法

主要是通过收集学术文献、政府网站发布的信息与地区社会经济统计公报等，了解本地区经济、教育等基本情况，该中学的情况，当前学界与陪读有关的研究等。

## 二、调查地点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 （一）J 县基本情况

J 县是江苏省 Z 市代管的县级市，地处苏南，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带，是长江三角洲一座集港口、工业、商贸、旅游为一体的新兴城市。距上海 200 公里，全市总面积 1387 平方公里。J 市属于中国百强县（市），处于中国城市全面小康指数前 100 名。

截至 2018 年，年末常住人口 62.7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11 万人；户籍总人口 58.9 万人；人口出生率 8.1‰，人口死亡率 7.31‰。全年 J 县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35907 元，同比增长 9.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2313 元，同比增长 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7431 元，同比增长 7.8%。

J 县辖 3 个街道办事处，8 个镇，3 个开发区管委会，20 个重点乡镇工业园区，15 个国有农林场圃。

J 县现有 47 所学校（包括 3 所普通高中，1 所中专院校，13 所初中，1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 所特殊教育学校，27 所完全小学，1 所学前到高中的民办学校），49 所注册幼儿园。在校中小學生 4.81 万人（其中普通高中生 5800 人，全日制中专生 3665 人，初中生 11801 人，小学生 26677 人，特殊教育学生 119 人），在园幼儿 1.54 万人。2014 年末，拥有文化馆（站）11 个，博物馆 1 个，电影院 4 个，图书馆 1 个，体育场馆 11 个，各种娱乐设施 95 个。广播覆盖率和电视覆盖率均达 100%。

### （二）调查地点基本情况

#### 1. J 县高级中学

J 县高级中学，创办于 1926 年，属于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中。是 J 县目前最好的高中（共 3 所普通高中）。本校面向全县所有中学招生，通过给各乡镇和各中学划分名额以及中考考试成绩招收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其中学生主要来源于本县的第二中学，第二中学招生原来也是以成绩招生，但随着教育区划改革，其优势逐渐被削弱。总的来说，此高级中学主要生源是市内几所初中，其余乡镇中学按比例，每个中学只收成绩排前十几名的学生。

乡镇中学与市内中学差距还是较大，即使是乡镇中学拔尖学生也大部分感觉自己比市内中学普通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差。

2020 高考成绩情况：进入省前 100 名 1 人，前 500 名 8 人；本一达线人数 452 人，本一达线率 77%；420 分以上 2 人，415 以上 6 人，400 以上 28 人；最高分，文科 407 双 A+，理科 424 双 A+。

#### 2. 陪读社区

调查地点：江苏省 J 县高级中学西门外 x 村。

中学西门口原是之前 x 村村民聚居之处，由于陪读的兴起，村民逐渐开始发展租房产业，只有少数几家富有人家不出租，其他基本都将房屋修葺租给几户陪读家庭。周边因为陪读家庭的带动，小超市、蔬菜摊、理发店、文具店、澡堂等小产业兴起。这些所有产业既促进了该村经济发展，也为所有陪读群体提供服务。较大型的超市距此处 1.3 公里，市中心距此处 3 公里，地理位置较偏僻，消费水平并不能算太高，有一班公交车经过，出租车较少见，但目前滴滴打车等也较方便。本社区内房租每年 2000+，房租会根据空间大小，配备的空调、太阳能等设备增长，并且随着社会消费的不断提高，房租也在逐年增长。

### （三）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在此地租房子陪伴子女读书的妈妈群体。本次调查详细访谈了 10 位陪读妈妈，以及 2 为当地居民，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及其基本信息

编号	姓名	乡镇	陪读工作情况	孩子年级	孩子性别
1	ZGF	ES 镇	无	高三	男
2	LLH	BC 镇	无	高三	女
3	WLJ	HB 镇	有，缝纫机厂	高二	女
4	LZH	GC 镇	无	高三	男
5	SSX	GZ 镇	有，超市	高二	女
6	CMJ	MS 镇	有，缝纫机厂	高一	女
7	LH	YX 镇	无	高三	一男一女
8	WZF	TW 镇	有，学校食堂	高二	女
9	WQ	TW 镇	无	已毕业	男
10	CZF	TW 镇	无（会做些散活）	已毕业	女
11	HSG	HY 镇	当地村民		
12	LZC	HY 镇	当地村民		

陪读妈妈群体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40 岁到 50 岁阶段，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以初中为主。目前无工作的人占大多数，有工作的人主要在社区内缝纫机厂、附近酒店、学校、附近超市等地方工作，工作时间灵活，以孩子时间安排为主。陪读家庭都来自本县内各乡镇，自认家庭经济情况都处在中等及以下，但各家情况并不一致，经济情况有高有低。

## 三、陪读妈妈群体的形成原因与形成机制

### （一）陪读原因

### 1.撤点并校与教育发展

自2001年开始，我国采取“撤点并校”，即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城镇，农村中小学转乡镇或城市转移，而乡镇原有的高中向城市转移。“撤点并校”虽然是对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但现实中却给乡镇及农村学生带来很多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学校与家的距离远。学校也尝试过一些方法以方便农村学生上学，例如组织校车接送、住宿等，但在真正实行过程中会发现非常耽误时间，孩子学习时间不充裕，睡眠时间不足。尤其是到了高中，学业压力紧张，生活无法自理，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因此，随着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教育的重要性被普及，为了孩子学习方便，家长发现可以在学校附近租房子，照顾孩子，极大地减轻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压力。尤其在孩子能够考上高中，有很大希望可以上大学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时，家长陪读的行为更为普遍。

### 2.教育与代际流动

社会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农村家庭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家庭发展决策倾向已经向“以教育为核心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取向转变（蒋宇阳，2020），因为教育的普及与相对公平性，大家已经普遍意识到教育程度高才是当今时代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有效途径，加上中国传统“望子成龙”的思想，农村人也普遍开始重视教育。对没有能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家庭来说，如果孩子能够考上高中，那么家里更需要一切以孩子的教育为重，毕竟距离实现向上流动只差最后一步了。

同时，社会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此时，教育的投资和当前的经济效益权衡下，教育的重要性凸显，即使是“因教育致贫”也是此阶段可以接受的，如果子女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所获得的收益将远远重要与此事的经济困难。

### 3.跟风陪读

看着周围孩子进城上学，家长陪读的现象越来越多，家长们也意识到需要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在调查过程发现，许多家长来陪读，往往就是为寻求心里安慰，看到周围的家庭都在孩子上高中时陪读，自己也要去陪读，一是担心孩子考不上大学埋怨父母，二是看到别的家庭都陪读内心焦虑并且怕自己以后后悔，三是担心周围的舆论压力。当一出现家庭开始陪读，并且有了效果，大家纷纷仿效，让家长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行为再被大部分人认可后就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同一社区内人们普遍认为“高中陪读”是每个家庭都要做到的行为准则。因而家长如果不去执行或者对这一行为嗤之以鼻，就会遭受到周围群体的舆论压力，心理并不强大的家长就会认为确实是这样，“我不陪读，孩子考不好怎么办”，“孩子压力大，我应该去照顾他”，等等，遭受到周围舆论的影响，家长开始纷纷进城陪读，即使经济或者工作等方面较困难，也会暂时克服，选择以孩子为主。

### 4.要求子女陪读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孩子向父母提出了要求。孩子因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不强不愿住校，或者在体验过住校生活后，住校体验差，就会主动要求父母陪读。

大多数住校高中生，会面临学业压力大、学校熄灯早、作业写不完、生活难自理等一系列困难，最终直接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压力更大，因而在一学期或一学年住校生活后都纷纷后悔选择住校，最终学校宿舍无人住，学生家长都会来陪读。访谈到一位陪读妈妈（编号2），她的女儿情况正是如此。

我目前是第二年，高二来的，高一还在外面上班上了一年，正好她成绩下降了，我就来在这边找的房子，就来陪读。学校让住校啊，高一她是住的，高二就来租房子了。高一的时候学校是提倡住校的，



住校的多，租房子的人少。一般的高二都要搬出来了，因为小孩子作业做不好，它（学校）老早就把灯关了，作业做不好，而且有的小孩他是因为吵晓得吧，学生讲话吵吵闹闹的影响她学习，然后就出来租房子。有的父母为了省钱嘛就是要她就住校。根据小孩的要求来，高二一般都没有住校的了。（LLH）

因此，无论是家长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主动陪读，还是孩子要求陪读，最终都导致乡镇学生家庭陪读情况愈演愈烈，目前还大部分处在学校周边租房陪读阶段，孩子能考上什么样的初中，什么样的高中还不能确定，且本县城房价颇高，买房压力较大，学校周围租房陪读将仍然是大多数乡镇家庭的唯一选择。成因分析图详见图 1。

## （二）选择妈妈的原因

### 1. 母亲与父亲

在大多数现代家庭中，女性与男性至今仍沿着传统的家庭分工，男性主要负责外出工作，获得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女性更多从事较不稳定、工资低的工作且兼顾家庭照料的职责或者全职负责家庭照料。母亲在子女教育与家庭照料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地位的比较劣势（田北海、黄政，2018），使得陪读人选在父亲与母亲的比较中，毫不犹豫会选择母亲，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衡量，直接选择了母亲。

在本地区，男性大多从事木工、水泥、铺砖等建筑行业，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在本地务工，都从事此类体力劳动，同时收入也较高。而女性大多从事纺织业，以缝纫机为主的主要工作，集中于服装厂、玩具厂等，这类工作工资低，通常按件计费，因而女性可以照顾家里，但是相应地收入也会很少。这是本地区的一个常见现象，并不包含所有家庭的男女职业状况。因而男性的工作在家庭中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收入来源，女性的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

其次在照顾能力和情感依赖上，母亲有明显的优势，孩子从出生到成人大部分依赖母亲的照顾，且因血缘关系与性别优势，孩子在情感上更容易依赖母亲。

因此，女性的照料能力和情感的优势，在经济地位上的比较劣势，造成了母亲与父亲之间，必然选择母亲陪读。当然在一个家庭中，一直都是父亲照顾孩子而母亲工作，陪读者就是父亲，这种情况必然有，但确实少之又少。

### 2. 母亲与祖父母

不少家庭也开始流行让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陪读，但母亲陪读仍然占很大优势，主要体现在母亲在生存能力、孩子照料、文化水平上的比较优势，与祖辈的比较劣势。

从时间和经济上考虑，老人似乎很适合参与到陪读群体中，但很多家庭并没有让家中老人来陪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一阶段家庭中的老人都是扎根于农村，没有农村以外生活的体验，难以适应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年龄较大也无法接受再社会化。

老人没带过孩子，他们也适应不了，从来没有出来过，他们连字都不认识，而且也不放心让家里老的管孩子。（SSX）

家里老人身体也不好也没出来过，不让他们陪读。（LH）

在孩子照料上，主要与家庭中孩子主要照料人有关，母亲照顾孩子很常见，但是在农村中父母外出打工，由爷爷奶奶照顾孙子孙女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因此孩子日常生活照顾上，母亲与爷爷奶奶相比可能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母亲的照料优势体现在孩子对母亲的情感依赖上，母亲可以给孩子提供很好地倾诉渠道，并且给予了强烈的情感支持。

而在孩子教育上，母亲的明显优势就被体现出来，爷爷奶奶相对母亲来说更加溺爱孩子，所谓“隔代亲”等现象都是十分普遍的，爷爷奶奶们不会严肃教育孩子，并且在学习上主要以孩子说的为准，他们无法辨别孙子女是否认真学习，而不是在看课外书。祖辈的不懂管与不愿管，导致孩子们没有约束力而随心所欲，祖辈的陪读起不到真正作用。

### 3.母亲与其他家庭成员

目前来说，由其他家庭成员陪读的情况较少见，甚至是没有。

兄弟姐妹陪读情况，一是对孩子的不公平，孩子长大需要谋求自身事业的发展，不方便陪读，父母尚有应该自己抚养第二个孩子，且当前“重男轻女”观念已经开始受到现代文化冲击，女孩不愿意为家里的男孩牺牲过多，并且父母对男女孩的观念也在改变；二是家庭更需要一位青年劳动力，目前陪读父母的年龄大多处在 40 以上，且家里的二孩处在高中阶段的话，父母年龄则更大了，因此与刚成年的青年相比，明显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大的优势，也能为家庭带来更多利益。正是如此，家庭中兄弟姐妹陪读的情况极少。

其他亲戚或朋友陪读情况可以忽略，只是一些极个别的家庭特殊原因造成的。

形成原因分析图详见图 2。

#### （三）陪读妈妈群体形成机制

背景与条件（图 1，介绍详见第二章第一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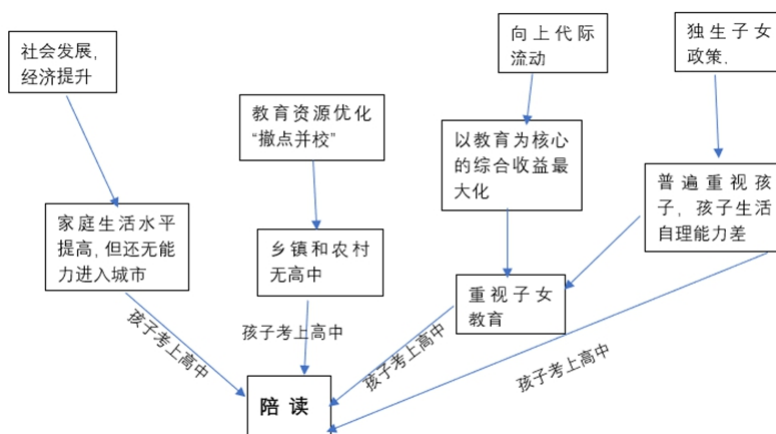


图 1 陪读行为形成原因图

起因：孩子成绩能上高中或者达到择校水平。

陪读妈妈群体形成机制（图 2, 介绍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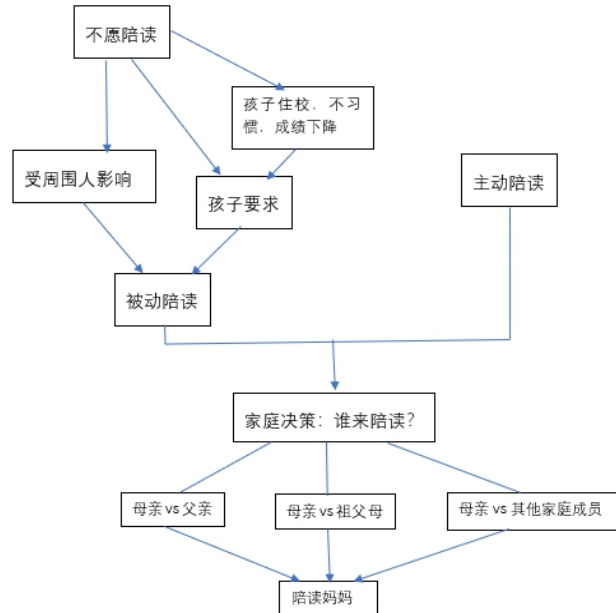


图2 陪读妈妈群体形成机制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乡镇农村社区环境、家庭情况可行的背景下，陪读妈妈群体形成是有其价值合理性的，是一个家庭中，家庭分工地体现，母亲在家庭中的照料相对优势、经济地位相对弱势与自身能力相对优势，导致了最终选择母亲陪读。

#### 四、陪读妈妈陪读期间的变化与现状

##### （一）态度与情感

##### 1.生活态度

在所访谈的所有陪读群体中，陪读妈妈普遍表现出积极接受的态度，面对经济压力与生活困难，陪读妈妈都表示，一切为了孩子，在这一阶段照顾好孩子是家庭商议决定好的暂时目标，孩子的教育是目前家中最重要的重中之重。陪读妈妈对转变后的生活环境与生活遭遇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接受。

陪读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知道每天吃什么，烧饭是最难的了，哈哈。（CZF）

大家都是这样的，一切为了孩子。（WLJ）

有钱也就是这样子，没钱也要这样子，不开心还不是要过的，对吧。心态要好。（ZGF）

##### 2.亲密关系

（1）亲子关系，在这一阶段，孩子正处于青春期，不可避免会有叛逆心理，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主要还是因为青春期孩子叛逆等原因，而受陪读、母亲与孩子近距离相处等的影响可能并不大。同时，妈妈陪读以及对孩子教育的支持，更能加深孩子对母亲的感情。

（2）夫妻关系，面对夫妻关系，大部分陪读妈妈都不愿说清楚，但也明确表示，陪读是家庭中商议决定的，家庭分工确定的，所以夫妻双方对此都表示接受，夫妻双方关系并不会变化，且夫妻双方关系好坏，尤其是关系不好了肯定会被孩子发现，影响到孩子的学习。

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各乡镇距离市里有一小时左右的车程，甚至更短，所以陪读妈妈和孩子每周末都会回家，甚至有时间的陪读妈妈周内都会回家几次，帮助收拾家里，给辛苦工作的丈夫做一些饭菜。夫妻之间联系虽然减少，但也会使夫妻珍惜共同相处的时间，夫妻关系并不一定会因陪读距离远而有太大变化，甚至可能更加亲密。

不，没有关系，不影响，小孩大了，对吧，主要是以为小孩为主。没外心夫妻都没有关系，心要一致，心不一致小孩子会受影响的，要是吵架了小孩子也没得心思读书了，她就瞎想了，对吧，你不关心她她就会胡思乱想，她心思就不放到学习上去了。（CMJ）

## （二）家庭经济情况

陪读家庭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不相似，处于中上及以下的水平。首先，选择在学校周围租房只能代表家庭情况并不是非常富裕的家庭，有条件的家庭会选择在附近买房子，或者更多的是直接去花钱去选择更好的学校。其次，租房的家庭普遍都是从周边乡镇过来，丈夫在乡镇工作，或外出打工，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且在消费等方面依然保持着农村的节省的淳朴观念。

而对于陪读后的家庭经济情况，大家纷纷表示，陪读后生活消费情况骤然上升且缺少了自己的收入来源，家庭经济压力大。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我在食堂上班挣的不多但也还能补贴点，来这边陪读花销大了，确实有压力了。（WZF）

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本来我家两个，就比人家压力大，现在都在上高中，开销也更大了，人家家里买东西就一个孩子不要想的说买就买了，我们家还要看半天，再犹豫犹豫，有时候孩子都说羡慕人家。（LH）

大家都这样的嘛，消费高，周围都差不多的。（LCH）

有时候是的啊，这个钱都给小孩上学用的了，租房子，在外面的生活费，压力是有的，他爸爸在外面药厂上班，工资也不怎么高，4000多块钱左右一个月。（LLH）

家庭情况有好有差的，并不相似，真正有钱的人也就不会在这里读书了（CZF）

但这些消费在目前阶段是该花的钱，主要是以孩子为主，以孩子学业为重。与陪读妈妈的交谈过程中发现，大多数人会认为家庭条件差，日常花销也大，但是周围都是这个情况，且这是一笔该花的钱，面对不能改变的无奈，转换成了积极接受，大多数妈妈都可以接受这一事实。

有钱也就是这样子，没钱也要这样子，不开心还不是要过的，对吧。心态要好。（ZGF）

在陪读过程，各家有各家的不同，但总体上，大家都一样的生活模式，为了孩子从乡镇、农村过来租房陪读，陪读后日常消费变多，主要只依赖丈夫的个人收入来支撑家里，家庭经济收紧，但是为了孩子上学，事情也分主次，可以接受这三年的家庭经济情况紧缩。

## （三）生活方式

### 1.日常生活

陪读的日常生活与陪读之前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陪读需要只需要专注于孩子一个人，照顾人员减少，因而相对来说，陪读妈妈的闲暇时间增多。从早上开始，为孩子准备早饭、午饭与晚饭，还包括洗衣服、打扫房间、买菜等，剩余时间可以自由活动，并且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每周内需要抽出至少一天时间回家，在家里忙碌一天照顾好家里，晚上赶回陪读村里。

## 2. 邻里互动

因为陪读社区内陪读群体的聚集，大家生活距离变近，一户家里至少主两户及以上的陪读家庭，陪读妈妈的社会交往圈子也由此而逐渐发展、扩大、成型。邻里之间的互动更加方便且频繁，陪读妈妈日常休闲活动有由此而展开。

## 3. 休闲方式

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平时的日常休闲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且要维持三年。但陪读妈妈群体中，日常休闲活动形式还是有所限制，主要的种类是聊天、逛街、玩手机，而打牌、跳广场舞等只集中在一小部分群体中，社区内没有其他的休闲活动场所，或者组织的休闲活动。但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发展，一些陪读妈妈也表示能有自己的时间更自在一些，更愿意自己一个人享受闲暇时间。

陪读妈妈群体日常闲暇时间活动形式单一，乏味，缺少多样的活动形式与活动场所。调查中发现陪读妈妈日常生活作息如下表 2：

表 2 陪读妈妈及孩子的日常生活作息表

时间	陪读妈妈日常	孩子日常
5:00	起床洗漱，做早饭做家务	
6:00	吃早饭	起床，洗漱，吃早饭
<b>6:45-10:30</b>	买菜，收拾家务	到校早自习，上课
10:30	准备午饭	上课
11:30	吃午饭	回家吃午饭
<b>12:30-16:30</b>	洗碗，收拾家务，闲暇时间	到校午休，上课
16:30	准备晚饭	上课
17:30	吃晚饭	回家吃晚饭
18:00	洗碗，收拾家务	到校上晚自习
<b>18:30-21:00</b>	闲暇时间	晚自习
21:00	准备夜宵	晚自习
21:45	准备睡觉	下晚自习回家，吃夜宵，写作业
23:00-24:00		洗漱睡觉

如此循环往复，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不工作的陪读妈妈日常作息表，而工作的妈妈也是按照表中孩子的上学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主要利用孩子上学这段闲暇时间去工作。

### （四）社会网络

陪读妈妈们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主要是以非正式网络为主，此时社会网络集中在：亲子、家人、陪读群体、村庄居民、学校教师等还包括之前的社会网络，但还是家人与陪读群体关系会更亲密。而较少会有正式网络。

从互动层次来看，主要是水平层次，因为基本上都是不工作或低层次工作的陪读妈妈，相互之间没有等级的压制。当然也会有人因人格魅力、消息灵通等在陪读妈妈圈子中受欢迎或拥有广泛的朋友圈，或者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本地人，但在非正式交往圈中这仍然是平等层次交往，不涉及权力、利益的争夺等。大家也主要是按自己的心意来交往的。

陪读妈妈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小，比较密集，以情感性为主，存在工具性目的，社会网络成员单一，情感程度低。就单从陪读妈妈角度来看，因为算是聚居在一起，地理范围小，人员密集，所以互相之间认识的人较多，但真正能经常性交往、聊天、一起活动的人较少，都是点头之交，大部分人之间亲密程度低。

社会网络值得关注是因为，陪读妈妈正处于个人发展转型期，生活环境、个人收入、职业上都有较大变化，同时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为了陪读期间的生活和陪读之后的再次转换。影响了之后生活方式、是否就业、怎样发展。从此角度看来，社会网络对陪读妈妈又深远持久的影响。其次，陪读妈妈群体不仅聚集在一起居住，她们有相似的生活际遇，同质性较高，也能获得较高的认同感，所以也会容易获得比较珍贵难得的亲密情感，或将成为之后一生的朋友。再次，因为一个市高中汇集了底下几个镇各村之间的所有学生，其地理范围并不算很大，有很大的可能性在其中遇到同村老乡，这些人也比较容易建立亲密关系，次社会关系也容易维持到陪读结束之后，这在陪读之后个人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最后，陪读妈妈网络大多数关注的是情感交流、消息互通、互相帮助等，不会有利益冲突、资源争夺等情况。

#### （五）就业情况

陪读期间没有职业的陪读妈妈占大多数，一是专心照顾孩子日常生活并抽空回家照顾家里的丈夫和老人，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工作；二是找不到时间灵活的工作且工资太低，这样的工作没有意义且会耽误照顾孩子；三是自身年龄、体力、智力的限制，不愿意出去工作。

但在陪读村内，不少陪读妈妈仍然选择去工作，一般选择附近缝纫机小厂、学校里面、周围酒店等时间、地点都方便的工作。在有工作的情况下，一般会选择让孩子中午、甚至晚上在学校吃饭，正好高中吃饭时间也较紧，孩子吃完可以在班上好好休息一下。工作还是会占用陪读妈妈很多时间，生活节奏也加快，白天需要上班，其余时间需要忙活家务事等，闲暇空余时间较少。

一位在超市上班的陪读妈妈表示：基本与周围人交流少，有点空闲的时间更愿意一个人呆着。（SSX）上班也挺累的，平时有时间就抓紧把家里收拾一下。（CMJ）

#### （六）孩子影响

##### 1.孩子叛逆

高中时期，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阶段，不少家长表示，陪读之后的亲子关系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孩子正处于叛逆期，不愿与家里人交流，但因年龄差距等原因，大人有大人的考虑而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想法，因而家长也会克制自己去掌控孩子，管束孩子。

我女儿，管得多就恨了，其实我也想通了，不怎么管了，都是叛逆心理，还有呢她们是她们的看法，我们是我们的看法，想法都不同，所以有时候经常发生矛盾，经常吵架，哈哈哈哈哈。（WLJ）

本身小孩都会叛逆的，多少会有点（吵架的时候）。（SSX）

##### 2.孩子成绩

陪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能有所提升，最终考上一所好的大学。陪读妈妈面孩子成绩的问题，表现的较为看得开，一是陪读妈妈们来陪读，认真照顾孩子，已经是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孩子的成绩需要靠孩子自己努力去获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够了；二是陪读妈妈们的文化水平有限，学习上的东西她们完全不懂，在学习方面她们没有能力给孩子帮助，因此不了解成绩上的事情；三是成

绩也依赖一定的学习能力，陪读妈妈对孩子的要求大多是以“尽力就行”为主，她们主要负责监督孩子的学习状态，而对于孩子考得不好，更多的是给予安慰与鼓励，维护孩子们的良好心理状态。

影响不太大，双方都尽力就好了，成绩差当然会影响心情。孩子成绩一直和初中比进度挺大的，我没有压力，我主要就是鼓励她，但是要是孩子成绩一直在末尾会比较着急吧。（LZH）

这种压力肯定有，假如你要不来吧，考不好你心里也难过，假如你来陪读了，不管怎么样，你尽力尽到了。（WQ）

不是照不照顾到的原因，这要看她自己努不努力，我们陪读，家长陪读是尽到了我们的心了，对吧，她考不考的好是她的事情了，对吧，她努不努力那就是她的事啦。（LLH）

## 五、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陪读生活

### （一）挑战与对策

#### 1. 职业中断和经济来源丧失

对于职业的中断，首先有一点是明确的，在目前阶段，职业中断并不会对陪读妈妈在职场上的晋升或者薪资提升有较大影响，对于许多普通农村或普通家庭的陪读妈妈来说，她们是比较廉价的劳动力，从事按件计酬的轻工业，即使职业中断，也并不会影响工资的标准。这也是妈妈们在经济上的相对弱势的体现，她们所从事的这类工作也使得她们更容易放弃工作来陪读。

职业中断真正带来的是原有的经济来源的丧失，与家庭经济收入的锐减，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家庭来说，就是失去了一个有经济收入的劳动力。经济来源的丧失既给家庭的经济情况带来打击，同时也对陪读本人带来了巨大压力，有经济收入的独立的人往往更有底气，其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也是由其为基础的。经济来源丧失的同时又伴随着自身消费的骤升，再加上总是需要向丈夫要生活费，陪读妈妈在陪读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接受当前的状态，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无奈。

职业中断和经济能力丧失带来的失落和不适应需要获得更多的社会与家庭支持，尤其是周围社会交往圈子的支持。第一，陪读妈妈可以在这个同质性较高的陪读群体中找到归属感，从而认为自己目前就应该是这个状态；第二，失落和不适应可以在群体的情感支持下获得缓解，一些小的困难可以在群体的行动支持下解决，甚至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第三，朋友圈子可以提供当前或者今后职业的选择或者职业的相关信息，帮助解决职业中断后找工作的问题。

#### 2. 生活方式单一

陪读妈妈的生活主要以照顾孩子生活为主，孩子在校期间往往一个人，如果一直无人接触，可能她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封闭，从而对自己身心都有害。

有些妈妈们会选择临时接一些散活拿到家里做或者绣十字绣等没有约束又可以打发时间的活动，但这些本质上也是体现出陪读妈妈日常生活方式单一、无聊的状态。

#### 3. 年龄资本流失

相对于短期的陪读（高中三年）来说，较长期的陪读带来的伤害更大，年龄资本就是其中一种。尤其是对于中年妇女来说，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了一些列的身体问题：脑筋不灵活，视力听力下降，手不灵活（对于做缝纫机的这一妇女群体来说非常重要）等，更严重的是带来了各种疾病：腰腿痛，关节炎、偏头痛、抑郁症等等。

以上是伴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自身身体问题，同时在社会环境下，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更难融入社会的发展，职业要求普遍要求女性的年龄在40岁以下。往往陪读结束后，妈妈们还是只能回到乡镇找工作，做一些超市货物整理、打扫卫生、服装厂、玩具厂的工作。尤其是按件计费的，对长时间没有碰过机器的陪读妈妈们来说，还需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并且因身体等原因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

这就首先需要陪读妈妈自己保持良好的积极乐观的心态，正确看待陪读这一人生经历，利用暂时停留的时间认真思考今后的人生规划。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家庭成员、周围朋友、社会的关注与接受，家庭成员的认可与支持，朋友的陪伴包括社会对中年妇女的理解，都是对陪读群体陪读意义的最大体现。

#### 4. 缺少个人时间，忽视个人发展

陪读妈妈专注于照顾孩子，缺少个人时间，平时照顾孩子，有空闲还要抽出时间每周回老家至少一次，做家务，打扫卫生，做饭，可能还要从事农活。她们在陪读后反而将更多的时间与经历集中于家庭与孩子的学业，而导致完全忽视了个人。当问到“您是否会觉得陪读影响到您的个人发展”时，多数人表示，一切为了孩子，孩子的教育重要，对自己的发展问题并没有什么可说的。可能是因为，她们本身觉得没什么技能，收入不高，陪读对其影响不大；也可能因为默认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照料付出功能，而没有个人还需要发展的意识。总之，个人的发展在当前的陪读群体中并没有收到普遍认同。

### （二）个人发展机遇

#### 1. 性别平等意识觉醒、视野开阔

随着现在性别平等意识的广泛传播，陪读妈妈们也会意识到两性需要平等，在朋友圈的交往中，因为都是具有同质性的“姐妹”，她们更多的是交流怎样让自己获得地位，这不仅使自我有了平等意识，在对待丈夫的观念上也会有改变。她们可以意识到陪读是一种社会分工，丈夫应该承担起提供资金的义务，而不会默认自身的弱势地位，感到无可奈何。不仅是在性别意识上，在多方面的消息与知识上，陪读妈妈们利用周围社交圈子都可以获得。

#### 2. 个人学习、自我提升

陪读中断陪读妈妈的职业，但同时也可以给她们提高深入学习、自我提升的机会。陪读妈妈可以在子女学习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或者知识，为以后的职业选择创造机会。与子女共同学习也可以为子女提高更好的学习氛围，并且这一阶段是可以静下心来学习的阶段。目前中年人失业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陪读这一阶段可以让陪读妈妈冷静思考，做出选择，提升自己。

调查到一位本来在药店工作的陪读妈妈，利用陪读空余时间考了相关资格证书，准备陪读之后在镇上药店找工作，有了证书也可以提高工资收入。

我本来是在药店上班，站药店的，陪读之后不工作了，就专心带小孩。后来快毕业的时候，我就考了个证，每天背每天背，年龄到了，总记不住，有时候小孩在旁边都笑，他说“妈妈我都记住了，你还没背下来啊”，哈哈，后来考上了，好歹一个月还能多拿点钱。回家之后我在我们镇上找的药店工作的，也没赚很多，但还能有个事做做，补贴点家里。（WQ）

#### 3. 社会网络转变与扩大、职业转型

进入新社区后，社会圈子发生了改变，结识更多的本陪读社区内的人，陪读妈妈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展，她们可以积极利用新的网络所带来的优势，促进自身发展。一是分担压力，二是获得社会资本。



社区中，就有一位陪读妈妈作为中介，厂家把货送到她这里（衣服玩具等后期加工），她先是带动周围熟人再到陪读社区的其他人帮她做，形成了一个小产业。

## 六、陪读与妇女意识，妇女地位

面对家庭中女性的付出，我们很容易考虑到，陪读是否对陪读妈妈们带来更多的女性地位上的压制，在对陪读妈妈的调查过程中，笔者也特意询问了她们这一方面的看法。

首先，在家庭中，女性对自己的地位并没有感觉，也认为自己地位没有变化，陪读妈妈普遍接受目前自己的家庭分工，并且承认确实是丈夫的家庭经济地位与自己经济上的相对弱势。

其次，更多体现在社会对女性职业的限制，乡镇妇女本身没有掌握一些专业技能，以纺织业为主，然而到了一定年龄，脑子不灵活、眼睛看不清、手脚不灵活等身体问题纷纷出现，并且也没有耐心再学习新的技能，所以在职业选择上有很大的阻碍，社会职业也将女性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因此妇女只能从事打扫卫生等工资低、无技能的工作。陪读妈妈虽然表示陪读都会去工作，但她们能从事哪些工作，她们也不知道。

最后，女性普遍接受现状，无法真正认识到女性地位低，仅仅是感受到了自己没有受到压制，而且认为自身确实能力不够，年龄也较大。这一代女性仍然默认自己从事家庭照顾的职责，虽然时有抱怨，但最终这些职责还是由自己承担。目前，抖音等短视频和新闻平台火爆，大家确实会受到现代平等环境的影响，但是在真正的生活中其作用还有局限，如前所述，妇女受到年龄、身体素质、自身能力的限制，最终也只能安于现状，没有办法去改变。

因此，在当下，妇女意识确实觉醒，但妇女地位的变化并没有很明显的进展。况且妇女地位要看从哪一角度分析，在家庭分工与社会大环境中均不同。在家庭分工中，不能单纯得就认为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就是妇女地位低的表现，否认女性家庭工作的重要性，男女地位平等需要的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不从事家庭照料就代表地位高。在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改变也是需要尊重，需要更多同等的权利以及在各种提案中的女性话语权，需要在更多的方面从女性的角度考虑，比如说公共厕所的设立、怀孕女性的职业等等。妈妈们专门负责陪读确实是家庭分工的理性考虑的结果，但不能把这些职责当作理所当然，而忽视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与平等的地位。

## 七、结语

本文重点说明了陪读的成因以及陪读妈妈群体的形成机制，在社会发展，教育改革发展以及家庭自身发展的共同推动作用下，这个新兴的陪读妈妈群体形成。陪读发展到现在，已经不仅仅只能认为它是一个跟风或者畸形的现象，伴随着进一步的发展，陪读现象不可能消失，并且其形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陪读妈妈群体也呈现出年龄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多的状态。

陪读开始后伴随着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社区环境、邻里环境、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陪读妈妈在态度与情感、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就业与经济情况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改变。面对各中新的环境与困难，陪读妈妈普遍乐观接受陪读这一过程，陪读也应该被认为是妈妈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阶段。

原有生活的断裂与全新生活环境的来临，必然给陪读妈妈带来了各方面的不适应与困难，与此同时，任何事都要从不同角度去观察，陪读行为选择难以避免，更需要以积极的态度找寻正确的个人生活与发展道路。面对职业中断、经济来源丧失、生活方式单一、年龄资本流失、不利于个人发展等困境，陪读

妈妈们首先要保持好自己的良好心态，正视自己的付出的同时，肯定自己的所有付出的意义，确认自己陪读阶段的价值。其次家庭要给予充分的认可，并对妈妈的付出表示感谢，尤其是丈夫，应该重视妻子为家庭的付出，并提供足够的经济与情感上的支持，由妻子陪读是家庭分工的结果，那么作为家庭中的经济来源应该做好支持工作。还有，陪读妈妈可以利用陪读机会扩大社会网络，为自己积累社会资本，既给自己提供情感支持，也可以从中获得信息资源、知识技能等，促进个人发展。最后，社区与学校应该重视这一群体，为陪读群体提供基本生活支持、职业支持、甚至是精神文化支持，这也是促进社区、学校、陪读群体共同发展的机遇。

陪读妈妈面对陪读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确实表示压力很大，但同时，大家也都表现出能够接受目前这一阶段，在她们之中，有些人确实是积极乐观的自我认可的态度，然而也有部分人表现出无可奈何下的接受态度。她们所共同表现出的都是家庭中有自己来陪读是家庭商议好的结果，并也确实承认自身在经济上的弱势与丈夫在工作能力以及经济上的优势。因此，不能直接断言陪读妈妈牺牲自己陪读就是妇女地位处于弱势的表现，妇女权益受到了侵害。妈妈陪读是家庭决策后的结果，完全有其合理性，妇女地位不能仅从这一件事就被断言，同时妈妈们对孩子的教育支持，妈妈对孩子的支持有其强大的精神情感动力。目前来看，只能发现，大多数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还未能形成足够的认识，意识不到自己应该要独立，要重视个人发展，普遍的观点就是个人能力已经定型，年龄、知识技能等又受到限制，还能如何发展。网络环境下女权意识崛起，但对大多数农村中年妇女来说，只要得到了足够的尊重，现实生活中并不会去强求自己地位的提升或者没有相关意识。

本次调查主要是对陪读妈妈群体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群体形成机制，陪读妈妈陪读生活情况，陪读过程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对于陪读的调查目前很少人只关注该群体。当然对于陪读妈妈群体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探讨，包括陪读前、陪读中、陪读结束后三个阶段，尤其是陪读结束后陪读妈妈们更长远的发展情况。

### 参考文献：

- [1]陈锋、梁伟，2015，《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家长陪读经历及其影响研究 ——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2]蒋宇阳，《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城市规划》第1期。
- [3]李银河，2005，《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4]刘澄、乔国银，2014，《陪读妈妈的困扰与诉求》，《中国妇女报》。
- [5]罗曼，2015，《强化抑或禁锢——随迁型陪读现象的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6]汤倩、彭苏浩，2014，《陪读研究综述》，《社会科学研究》第7期。
- [7]唐佳、梁谨恋、穆莉萍，2017，《社会性别视角下陪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以四川省泸州市B镇为例》，《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5期。
- [8]田北海、黄政，2018，《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 ——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9]王江, 2006, 《陪读性迁移, 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表现: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T 县第二中学为例》,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论文.
- [10]王莉、代晔、张彩琴, 2013, 《农村中小学生家长随迁型陪读的影响分析》,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 2 期.
- [11]王晓慧, 2011, 《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类型、成因及解决对策》, 《教育理论与实践》第 3 期.
- [12]新年, 2010, 《“中国第一陪读母亲”刘强: “陪”养了女儿, 成就了自己》, 《黄河. 黄土. 黄种人》第 8 期.
- [13]郑燕娜, 2007, 《农村母亲“陪读”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法制与社会》第 8 期.

☆ 作者简介: 周 蕾,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童 欣

※ ※

### 我院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在第十二届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苏皖片区年会荣获佳绩

2020 年 7 月 24 日-26 日,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苏皖片区第十二届年会顺利举行,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坚守与创新: 后疫情时代”。会议吸引了全国各地近百名社会工作研究者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参与, 共同交流探讨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的前沿问题。

在本届苏皖片区年会中, 我院社会工作专业师生表现出极大的学术热忱, 共有 19 名师生参会。我院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既受邀进行大会主题发言, 又分别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助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研究”、“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前沿研究”、“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等五个分论坛发言。

我院参会师生所提交的会议论文, 经过大会组委会的评选, 共有六篇论文获奖, 是本次所有参会单位中论文获奖总数最多的单位。其中武艳华副教授(合作者牛子孺、陶大忠)、亓迪副教授(合作者沈佳飞)所提交的论文分别获得教师组一等奖和二等奖, 郭欣、曹慧萍(合作者亓迪)、何经纬所提交的论文获得学生组一等奖, 陈宇星所提交的论文获得学生组二等奖。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 我院师生既拓展了学术研究视野, 又展示了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勃勃生机。未来, 我院社会工作专业将进一步努力, 争取更好地推进社会工作教育的扎实发展。

# Vlog 视频制作同质化现象研究

——以 B 站为例

李芊趣

---

**摘要:**随着近年来技术的发展,小影、一闪等视频剪辑软件的出现,使得视频博客(vlog)日渐走红,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其内容的同质化现象引起关注。本文以 B 站中最新上传的视频播客作品为研究对象,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与分析。并得出视频播客制作者以女性为主,视频播客风格以文艺、细腻、清新为主等结论。其中出现的以粉丝数为分界线的断层现象引人注目。由此针对同质化现象的改善和鼓励高质量作品产生,提出政策建议与意见。

**关键词:** 视频博客(vlog) 同质化 内容生产 治理

---

## 一、导论

### (一) 背景与问题

#### 1、Vlog 研究的背景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4G、5G 的出现,手机、平板等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视觉传播为主的微视频时代,社交平台短视频迅速兴起。Vlog 起源于 YouTube, Vlog 之父 Casey Neis 他/她 t 上 Youtube 上拥有 900 万粉丝,累积播放量达到 10 亿。它的产生受到了许许多多年轻人的热捧和跟随。

各大社交媒体软件的 UP 主也收入越来越高,他们从普通大学生成为职业 UP 主,再成为各大知名品牌的形象代言人。成功人士的一条新道路便在大众面前展现,这是一条不需要高学历、高智商和家庭背景、人际关系,仅仅有一台 DV 便有可能成功的道路。2018 年 1 月 14 日,短视频剪辑 APP 小影在北京召开发布会,标志着 Vlog 这一长期寄生在视频网站的短视频有了专属移动终端<sup>[1]</sup>(吴洪莉、刘梦娇,2018)。与此同时,除“小影”外各类短视频应用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包括“VUE”、“一闪”等专注于开发移动端视频剪辑和社交功能的平台陆续出现,它们允许用户直接导入手机中拍摄的视频片段,通过应用的剪辑、背景音乐、字幕等简单的操作便可以制作出一部 Vlog。由于不需要学习专业的剪辑视频知识,大大的简化和降低了 Vlog 的制作条件。

如此的低门槛对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笔者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制作 Vlog,成为一名 UP 主。在 YouTube 上以“Vlog”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便能搜索出 9000 万条;在国内爱奇艺门户网站上可以搜索出 55.8 万条<sup>[2]</sup>(谭璇璇,2017)。在 B 站上,已增长到日更千条,单条视频点击阅读量甚至可达到 139.5 万。社交媒体软件越来越对 Vlog 视频产生重视,微信、微博也逐渐意识到 Vlog 的发展潜力,开始建立专属的 Vlog 平台。微信开发了“票圈 Vlog”小程序<sup>[3]</sup>(隋岩、刘梦琪,2018)。

#### 2、Vlog 同质化的问题

在笔者平日观看 Vlog 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 UP 主上传的同一时期视频内容十分相似。除了在视

频风格主要以小清新、文艺风为主的同时，滤镜、场景布置、字幕字体、背景音乐也很雷同，甚至于所做的饭菜、养的宠物品种和花色，分享、安利给观众的美妆、护肤产品也很相似。让笔者意识到 Vlog 内容的同质化，甚至是抄袭问题日趋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真正好的 Vlog 视频的诞生和其生产力、竞争力的提升。

从内容上划分，Vlog 常见的“主题性”Vlog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题：旅游、聊天、时尚、美妆、美食、恶搞挑战、GRWM、学习、A day with me 等。由于 Vlog 主要以拍摄者的日常生活为素材，本身大部分人在生活中所做之事就很相似，因此若想创作出与众不同的 Vlog 作品，对创作者自身的视频剪辑方式、视频制作能力和审美能力要求很高。然而大部分 Vlogger 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能力需求，仅仅使用大众流行的影片剪辑软件，剪辑出来的视频也十分相似。

### 3、问题的提出

Vlog 视频作为近年来短视频中的主力大军，在短视频观看人数和创作数量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对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对于学术界、政界、社会公众来说，Vlog 的发展和影响也是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但目前该话题并未在学术界引起重视，对 Vlog 的现状和发展问题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描绘和解释。本文力求在以 B 站的 Vlog 现象为基础，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对 Vlog 的现状进行清楚的描绘和梳理。

#### （二）目标与内容

##### 1、研究目标

为满足国内外社会各界对我国短视频发展的现状深入解析的期待。本文尝试对 Vlog 的视频制作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本文研究目标如下：

##### （1）系统梳理 Vlog 的发展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 Vlog 的发展现状整理的相对模糊。首先，对 B 站 Vlog 的视频进行统计分析，整理总结目前社交平台上 Vlog 的现状模式，尽可能的做到准确全面。从理论层面审视 Vlog 的创作模式、方式和现状，与 Vlog 发布、制作平台的营销手段和联系。多角度、多维度的对 Vlog 的产生和发展路径、现状进行展示和梳理。

##### （2）分析阐释产生 Vlog 现状的动因

通过本研究的调查与论证，将对传统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当下互联网环境中的适用性问题进行考察和深入思考，以期获得在新语境下对该经典理论的新认识，并根据这种新的理性认识对其进行符合现实语境的修正与补充。着重对 Vlog 创作内容的同质化现象进行整理和阐释，并通过数据收集分析、调研、文献研究等研究方式找寻该现象产生的原因。

##### 2、研究内容

##### （1）基本研究思路

本文以 B 站 APP 中近期上传的 Vlog 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与理论基础，对 B 站的 Vlog 进行观察表、数据分析表的统计与收集，运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该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了解各变量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描述性分析，了解 B 站 Vlog 的基本现状及其特征，了解 Vlog 的受众人群、观看程度；通过相关性分析，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相关。

在对 B 站 Vlog 的现状和发展历程有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对我国 Vlog 的制作发展问题进行思考，并

结合网络民族志的调查方法、结合数据分析，对 Vlog 的发展现状进行详细的原因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和建议，以促进 Vlog 的丰富性、全面性的发展，有益 Vlogger 的自身发展和观看者的个人素养提升，进一步促进我国短视频软件的发展。

## （2）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创作者和观看者的角度出发，以 B 站 APP 里的 Vlog 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首先采用文献分析，对 Vlog 的研究现状进行总体的了解，对同质化现象细致的理清，并总结归纳学术界目前对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与此同时，参考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理论与量表，采用问卷调查法，有针对性的对 Vlog 的创作者提出有关研究的假设问题，充分了解 Vlogger 的创作情况和心理状态。并采用个案研究法，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详细的调查分析，深入了解该现象产生的各方面原因。最后进行数据的收集与回收，利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最终检验本研究的假设，提出相关结论与建议。

## 3、文献综述

Vlog（Video Blog）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型视频形式，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视频形式、内容，视频管理和盈利模式上产生众多问题，管理形式和机制也仍未统一和规范。为此，近年来学界对 Vlog 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多项研究，尤其对以 B 站平台发布的 Vlog 展开了诸多分析与讨论，并形成以下主要观点：

### （1）学界对 Vlog 的初步解读

丁璐、周明认为，Vlog 最初主要指的是用网络照相机和数码摄像机或照相机录制下来的影音文件代替文本的一种新的网络日志形式；维基百科于 2008 年将 Vlog 界定为一种主要的媒介是视频，同时包括与视频相关的视频与相关文本的一个链接，加上图片以及其他的一些信息构成的一种媒体形式；徐敏则认为，Vlog 在指的是发布者以记录生活的方式拍摄自己生活中的碎片化内容，通过剪辑、配乐、添加字幕等方式而形成的一种视频形式；罗钧文指出，Vlog 是创作者运用文字、声音、画面多种媒介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并借由互联网视频平台进行传播；詹绪武、李珂将 Vlog 定义将镜头对准自己及周边，以第一人视角记录分享生活，个性化特征明显的视频。

### （2）Vlog 的传播及进入过程

姚蓉、张伟豪指出 Vlog 起源于 2012 年视频博客之父 Casey 为了记录并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其平台上发布第一条 Vlog；2016 年，住在加拿大的华人孙东山打开了国内拍摄视频博客的大门。洪长晖、尤砺锋指出相比国外的火热，国内 Vlog 还处于摸索起步阶段。2018 年，Bilibili 首席运营官李旎表示，2018 年 Vlog 投稿量和播放量比上年分别增长了 16 倍和 18 倍，说明 Vlog 在 bilibili 中已经成为重要的内容载体（庞艳怡、姚志明，2020）。B 站并于 2019 年举办大量活动以鼓励用户拍摄 Vlog 进行上传，邀请数码摄影频道知名 up 主在线上和线下开设“up 主学院”，对有潜力的新人进行专业能力培训。

### （3）Vlog 迅速发展的多视角原因分析

从互动仪式链理论角度出发，斯丹迪奇在《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 2000 年》一书中指出社交对人类的重要性。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指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获得情感能量。人们的注意力在互动仪式过程中集中在对象或活动上，从而分享产生的共同情绪、情感体验等，最终产生个体情感的能量释放。在这样的互动中，魏梦雪认为粉丝对于偶像的选择是主动性的，并且是热烈的、狂热的参与者。

从消费文化角度出发，该概念最早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 T.Veblen 在其 1899 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英国学者麦克·费瑟斯通也指出消费社会就是指消费社会中的文化。而在网络时代是注意力经济时代，指在最大程度上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进而获得最大利益的一种商业行为（高德哈伯），它是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来标记自己所属的阶级（让·鲍德里亚）。从而 Vlogger 通过视频体现出个人独特的消费行为，以标明自身阶级形成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内容价值正是引得众人追随的主要原因（赵静，2019）。

从镜中我理论角度出发，美国学者库利认为个体是通过他者的镜像确认“自我”的，“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对方”。一个人对自我的明确想象是由别人对自身态度取决。姚蓉、张伟豪认为视频博主通过观看及回复观看者的评论，形成两者的互动机制，往往成为了反映视频博主自我的一面“镜子”，从而改造自身与粉丝形成互动机制，打造两者间平等的“朋友关系”。

从符号互动论角度出发，其核心观点是指人类互动是一个基于有意义符号的行动过程。张数锋指出视频博主与观看者不仅通过语言符号，更通过非语言符号的交流使得其之间更加发挥了表达和传递信号的功能，从而增加了用户体验感，更加促进了用户与观看者之间的互动。

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出发，提出的前台与后台的理论框架，洪长晖、尤砺锋认为 Vlog 的创作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核心展开，大部分视频博主为打破前台与后台的界限，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家庭情况转变为前台。芮必峰指出表演者虽展示后台，但将掩盖或部分掩盖与他自己的理想形象不符的活动、事实和动机，以集中展示理想化的形象。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认识 Vlog 的产生、发展、进入和兴起都有许多相关性结论和方法论的启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从不同的理论视野、理论关怀得出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宽泛的 Vlog 视频特点和盈利方式，并没有深入分析 Vlog 初期进入产生的主要问题，缺乏在其制作上更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分析。

## 二、研究设计

本文旨在从 Vlogger 和观看者角度出发，对 Vlog 这种特殊的短视频形态的创作现状和观看者的接受与喜好情况，以及 Vlogger 的创作方式、情感态度和观看者的行为意向、使用行为、情感态度的影响进行详细的考察，并最终为 Vlogger 的创作和短视频创作的媒体平台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在本章中，笔者对各相关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并设计相关观察表，最终完成观察表的数据回收和统计。

### （一）各变量操作化定义

本次研究主要研究问题如下：一是对 B 站 APP 的 Vlog 创作内容、观看数、盈利方式和内容的数据收集；二是对 Vlog 的创作者的创作内容、创作动机的调研；三是对 Vlog 的观看者对 Vlog 的喜好程度、观看感受和建议想法的调研。

#### 1、制作观察表

参照前人文献、笔者个人 Vlog 的观看情况以及 B 站 APP 的观看设置和功能设置，将 Vlog 分为三个层面的变量。Vlog 的受欢迎层面——粉丝数、播放量、弹幕数；Vlogger 的个人信息层面——UP 名、性别；Vlog 的内容创作层面——片头设置、时长、主要环节、背景音乐、信息曝光度及广告合作、粉丝福利。

一、个人信息

UP 名: \_\_\_\_\_ 性别: \_\_\_\_\_ 年龄: \_\_\_\_\_

二、受欢迎度

粉丝数: \_\_\_\_\_ 播放量: \_\_\_\_\_ 弹幕数: \_\_\_\_\_

三、内容创作

1、时长: \_\_\_\_\_

2、片头设置（无片头/各部分剪辑/特殊）: \_\_\_\_\_

3、背景音乐: 无  轻音乐  英文  日文  中文  其他 \_\_\_\_\_

4、信息曝光度: 讲话  露脸  朋友  家人  伴侣  宠物

5、广告合作: 无  具体内容 \_\_\_\_\_

6、粉丝福利: 无  抽奖  具体内容 \_\_\_\_\_

7、主要环节:

① 美妆: 无  有  牌子  使用感受  其他 \_\_\_\_\_

② 护肤: 无  有  牌子  使用感受  其他 \_\_\_\_\_

③ 拍照: 无  有  其他 \_\_\_\_\_

④ 穿搭: 无  有  牌子  使用感受  其他 \_\_\_\_\_

⑤ 歌单分享: 无  有  其他 \_\_\_\_\_

⑥ 追剧: 无  电视剧  综艺  电影  其他 \_\_\_\_\_

⑦ 吃饭: 无  有  背景墙  桌布  香薰  花  其他 \_\_\_\_\_

⑧ 做饭: 无  有  口头介绍  制作配方

⑨ 学习: 无  有

⑩ 手账: 无  有

⑪ 健身: 无  家  健身房  其他 \_\_\_\_\_

⑫ 外景: 超市  餐厅  时装店  奶茶店  咖啡馆  景点   
公司  学校  机场  高铁站  汽车站   
其他 \_\_\_\_\_

8、自身特点: \_\_\_\_\_

**表 2-1 B 站 APP Vlog 情况观察表**

(二) 研究模型及研究假设

1、研究模型建构

根据对以上各变量的分析，笔者对以上变量关系模型进行了假设与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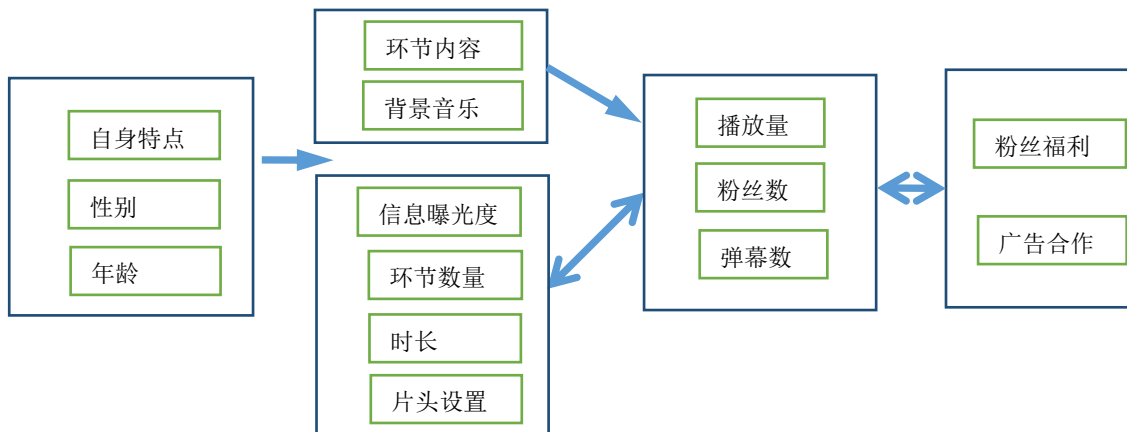


图 2-1 B 站 Vlog 制作现状研究模型

如上图所示，本研究认为 B 站 Vlog 的制作现状可以概括为：在自身特点、性别、年龄不同的因素影响下，产生了不同的 Vlog 内容。由于不同的制作内容吸引不同的观众群体和观众数量、观看数量，从而反向影响 Vlogger 的制作动机和热情。粉丝数的多少进一步影响广告合作和粉丝福利的投放。最终从四个方面形成 Vlog 的现状。

## 2、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描述和本文主要研究目标——制作者本身对 Vlog 制作的影响、Vlog 的内容对粉丝数、广告的影响与 Vlog 同质化的程度和原因的探索。笔者对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第一组假设：H1 性别、年龄与环节内容、背景音乐、信息曝光程度、环节数量、时长、片头显著相关。

假设 H1 分解：

表 2-2 Vlog 制作现状假设 H1 分解表

总假设	分假设
H1	H1-1 个人特征与环节内容显著相关。
	H1-2 个人特征与背景音乐设置显著相关。
	H1-3 个人特征与信息曝光程度显著相关。
	H1-4 个人特征与环节数量显著相关。
	H1-5 个人特征与时长显著相关。
	H1-6 个人特征与片头设置显著相关。

第二组假设：H2 Vlog 内容正向影响播放量、粉丝数、弹幕数。

假设 H2 分解：

表 2-3 Vlog 制作现状假设 H2 分解表

总假设	分假设
H2	H2-1Vlog 制作内容与播放量显著相关。
	H2-2Vlog 制作内容与粉丝数显著相关。
	H2-3Vlog 制作内容与弹幕数显著相关。

H3Vlog 影响力与粉丝福利和广告合作正向影响。

假设 H3 分解：

表 2-4 Vlog 制作现状 H3 分解表

总假设	分假设
H3	H3-1Vlog 影响力与抽奖活动显著相关。
	H3-2Vlog 影响力与广告合作显著相关。

选择

B 站 APP 自 2009 年 6 月 26 日发布以来，已经成为在美国纽约的上市公司，累计了上亿用户和创作者。本研究选择进行线上数据收集和电子问卷的结合方式，目标受众为 Vlogger 和 Vlog 的观看者。收集 Vlog 信息共 40 份样本。

###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 (一) 频数分析

##### 1、Vlogger 自身特征的同质化程度

1 为“女”，2 为“男”，3 为“情侣”。可以看到 Vlogger 基本上集中于女性，男性和情侣作为 Vlogger 少之甚少。在性别上自身特征的同质化程度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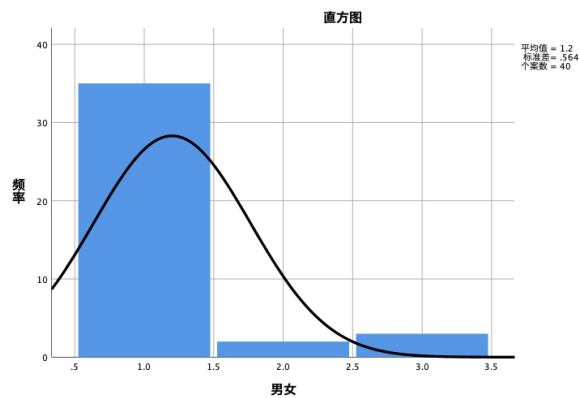


图 3-1 Vlogger 自身特征的同质化程度

##### 2、Vlog 制作的同质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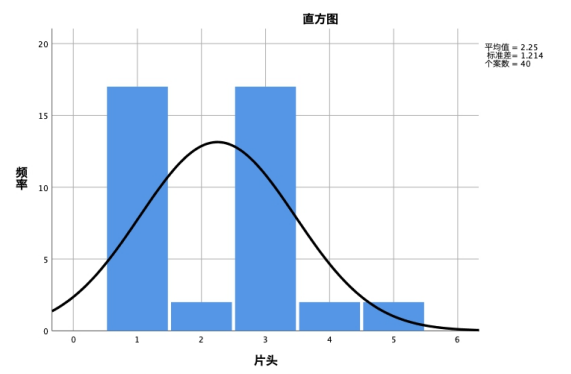


图 3-2 片头设置

为便于 SPSS 统计，将收集到的片头样式由简单到复杂分为五个等级，将“无”定义为 1，“简单”定义为 2。“各部分剪辑”定义为 3，“新颖片头”定义为 4，“专门设计片头”定义为 5。可见分布与正态分布之间有一定距离，总体集中在无片头和各部分剪辑形成的片头两种类型中。可见片头类型的同质化程度很高，大部分处于没有片头和各部分剪辑形成的片头之中。

笔者猜测由于制作精美的片头需要高水准的视频剪辑能力，因此没有一定剪辑能力的 Vlogger 选择放弃片头直接进入正题。在收集资料中出现的新颖片头，有两位 Vlogger，其中一位采用了打字机的方式作为开头。可见，各部分剪辑形成的片头与专业制作和一定新颖能力的片头相比，所需的技术和财力都较小，大部分对 Vlog 要求更高的制作者采用了这样的片头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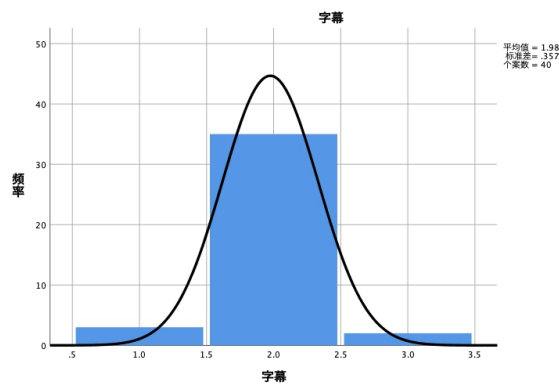


图 3-3 字幕制作的同质化程度

在字幕统计中，笔者将其分为三类，“没有字幕”为 1，“有字幕”为 2，“有字幕和音效”为 3。在频数分析统计图中可见，其分布近似正态分布。大部分的制作者都选择了制作字幕，但是也仅限于字幕，并不会在字幕上花太多的心思。大部分的 Vlogger 都是用了白色的相同字体作为字幕。由于其为视频剪辑软件的自带字体，不需要再下载其他的字体包。并且白色在大部分的场景中都简洁清晰明了，因此大部分的 Vlogger 都选择的这样的字幕。

在背景音乐的设置中，将“无背景音乐”定义为 1，“轻音乐”定义为 2，“英文音乐”定义为 3，“中文音乐”定义为 4，“日文音乐”定义为 5，“日文和轻音乐”一起作为背景音乐定义为 6，“轻音乐和英文”作为背

景音乐定义为 7，“英文和日文”作为背景音乐定义为 8。主要的 Vlog 都选择了“轻音乐”、“英文”这两类作为 Vlog 的背景音乐。由于在 Vlog 中使用音乐可能会产生版权上的纠纷，轻音乐较少会有版权问题并且不影响 Vlogger 在视频中讲话的声音。大部分的 Vlogger 会选择使用轻音乐作为视频制作的背景音乐。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会发现，有很多的 Vlog 的背景音乐不仅仅是风格相似，甚至连曲目都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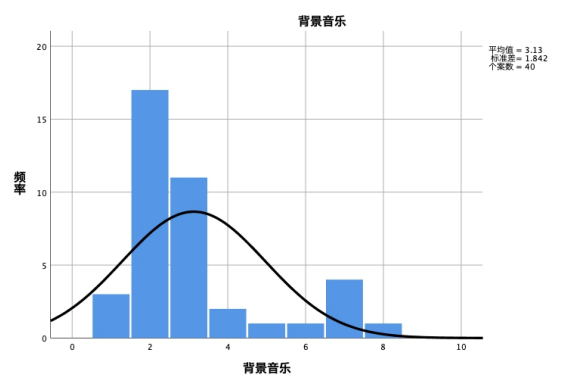


图 3-4 背景音乐设置的同质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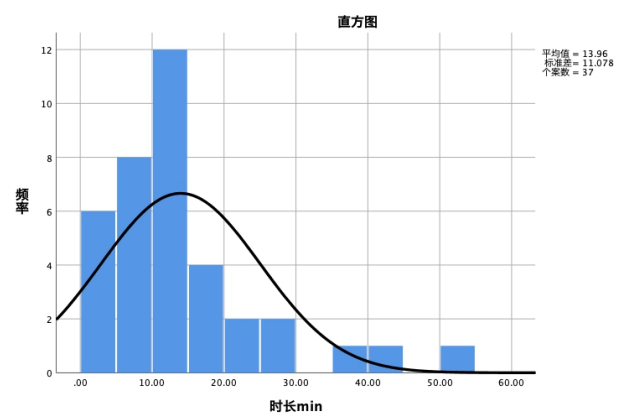


图 3-5 时长设置的同质化程度

该统计图中，曲线向左侧偏斜，数据集中在 10-15 分钟一栏，15 分钟以上的 Vlog 数量显著减少。在时长方面，可以见到同质化程度较高，集中在 15min 以下的 Vlog 数量很多。

### 3、Vlog 内容的同质化程度

Vlog 内容方面笔者发现主要有以下十二个环节：护肤、美妆、拍照、穿搭、出门、购物分享、吃饭、做饭、学习、手账、画画、健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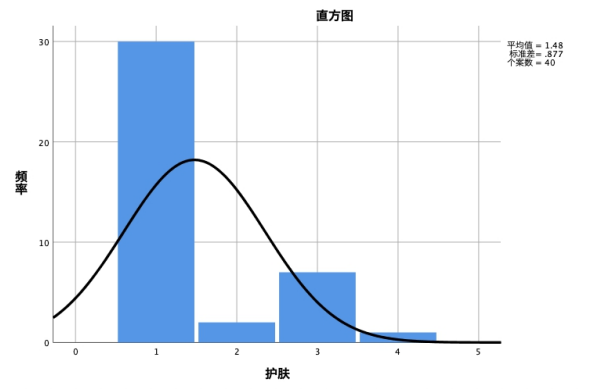


图 3-6 护肤环节的同质化程度

笔者在该环节调查中将“无”定义为 1，“介绍牌子”定义为 2，“介绍牌子和感受”定义为 3，“介绍牌子、感受和教程”定义为 4。在该部分中大部分的 Vlog 没有这样的环节，因为护肤需要 Vlogger 素颜，很多 Vlogger 不会在自己的 Vlog 中露脸，并且一些露脸的 Vlogger 也不愿意在镜头面前素颜。护肤环节对 Vlogger 除了要有勇气和承担自身隐私暴露问题的条件以外，还需要钱财上的支持。这些钱财可以来自于广告商，也可以因为是家世背景。

在有护肤环节中，可以看到大部分 Vlogger 在介绍牌子和感受这一类中，这个环节也是十分便于自然的加入广告。因此赞扬广告商的商品仅仅介绍牌子是不够的。

在做饭环节中将“无”定义为 1，“有”定义为 2，“简单介绍”定义为 3，“有配方和教程”定义为 4。大部分的 Vlogger 并没有做饭的环节，这对 Vlogger 有一些要求。大部分的 Vlogger 是上班族，他们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录制做饭视频，这同样体现在有该环节的 Vlog 中。可以看到在仅仅是有录制到做饭画面的 Vlog 占比较重。而有配方和教程也占比很重。许多职业 Vlogger 在做饭环节，通过美食配方和教程和干净的厨房、昂贵的餐具厨具等吸引大量的粉丝，以及在 Vlog 中出现的吃饭环节吸引观众的胃口，最后成功出版食谱。

其他的环节由于本次调查样本数量较小，不能充分体现出 Vlog 中存在的同质化现象。并且有该环节的 Vlog 数量较小。在大部分的 Vlog 中环节数量都不够充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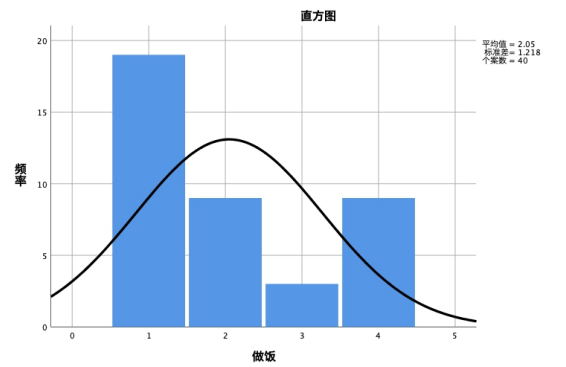


图 3-7 做饭环节的同质化程度

内容丰富程度定义为以上十二个环节——护肤、美妆、拍照、穿搭、出门、购物分享、吃饭、做饭、学习、手账、画画、健身中，根据每个环节的丰富程度的不同，分别定义了不同的数值，并进行加总最终得到内容丰富度数值。数值范围从 12-26，数值集中于 17-19，相对集中在平均值处，但于 18 处出现较为明显的断层。可以猜想 Vlogger 在 Vlog 的制作方面可能有较大的断层出现。实际上从粉丝数上看也能感受到明显的断层。



图 3-8 Vlog 内容丰富程度

#### 4、Vlogger 自身隐私曝光程度

该部分笔者将由是否露脸、讲话和周围其他人参与作为自身隐私曝光程度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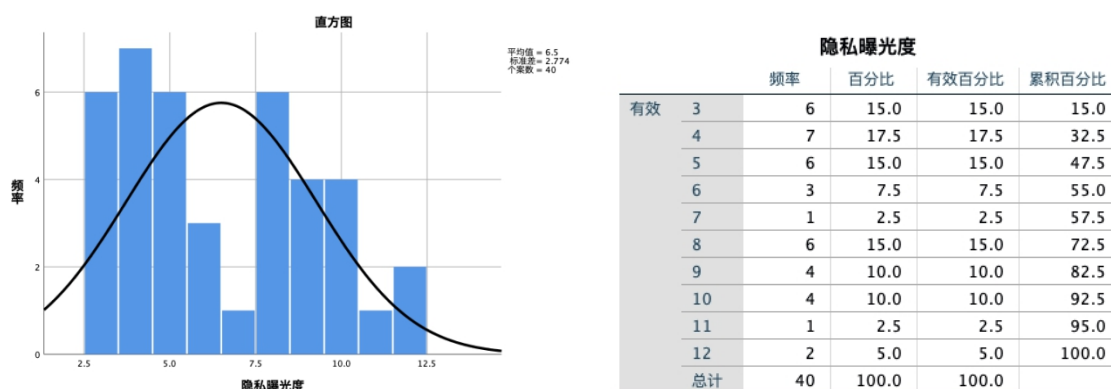


图 4-1 Vlogger 隐私曝光度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主要集中于 3-5 和 8-10，中间有比较明显的断层现象出现。即 47.5% 的 Vlogger 比较在意自身的隐私曝光，很少在镜头前面讲话、露脸等。而又有 35% 的 Vlogger 选择露脸、讲话甚至带上亲朋好友一起出境 Vlog，也有极少部分未在统计中的 Home tour 和自曝身份证号码的情况。

#### 四、结论与建议

本次调研共收集数据 40 份，经过对有效数据的频数分析后，现在对本项研究进行总结和作出结论，

并根据结论对 Vlog 制作者和 B 站平台 Vlog 的发展方向提出相应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1、频数分析结论概述

根据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人口特征包含性别，在 Vlogger 的人群中，女性远远大于男性，高达 87.5% 的占比。目前在本研究项目中可以确定 Vlogger 主要为女性。由于 Vlog 需要对生活、色彩、艺术方面有兴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关知识基础。女性对该领域的喜好大于男性。然而同样是由于在该群体中主要以女性群体为主，制作的风格也都十分女性化，以文艺、细腻、清新等风格为主，从画面、背景音乐、所做的事情来看都十分相似。为了减少 Vlog 的同质化现象发生，应当鼓励男性群体也加入 Vlog 的制作中。在本次数据集中的两位男性 Vlog 制作者，他们在制作的风格上与女性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比起女生的细腻，他们的 Vlog 在制作上和内容上更加干净简洁，在 Vlog 中所表达的对生活的感悟也和女性不同，能帮助观看者获得更多不同群体的生活日常信息。

在 Vlog 制作方面的同质化程度来看，总体同质化程度比较明显。从片头来看，主要分为两类，无片头和各部分剪辑形成的片头；从字幕来看，主要为以白色的宋体为主；从背景音乐来看，主要以一首从头至尾的轻音乐为主；从时长来看，主要以 10-15 分钟为主，15 分钟以下的 Vlog 占绝大多数。总体来看，Vlog 在制作方面给观看者比较明显的同质化感受，以干净的字幕和风格清新的背景音乐，以及时间较短的视频为主。

在 Vlog 内容同质化程度来看，笔者将其分为十二个环节但在统计中发现大部分环节都缺失“有”的数据。在这之中，“吃饭”和“做饭”两个环节是比较明显的占据了绝大部分的 Vlog 的内容之一，甚至有许多 Vlog 当中仅有这两个环节。考虑到当前为疫情期间，Vlogger 不能出门的情况下，这样的占比可能略高于平时。在内容丰富度的统计中，发现 Vlog 制作中间有比较明显的断层现象，有一部分 Vlogger 制作内容少且简短，另一部分 Vlogger 内容则十分丰富，分享了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事情。

在 Vlog 自身隐私曝光程度上看，除了同质化现象也同样展现出断层现象。即一部分 Vlogger 不会分享生活中很多关于隐私的事情，包括自己的长相、声音，而另一部分 Vlogger 很大方的分享自己的全部。这里数据统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 Vlog 内容丰富度的结果相互印证。由于 Vlog 主要内容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那么分享的越多内容则越丰富，暴露的隐私也越多；反之亦然。

根据笔者总结数据，问题反馈部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Vlog 制作方面的同质化程度高，风格相似，无自身特点；二是内容丰富度和自身隐私曝光度上的断层现象明显，在 Vlog 的制作中有比较明显的优劣生差别，可能导致几个知名 Vlogger 对该视频制作行业的垄断。

## （二）建议

根据本项目研究得出的上述认识和结论，笔者将 B 站 Vlog 现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将在 Vlog 制作和 Vlogger 培养方面提出如下针对性的建议：

第一，完善媒介拍摄、编辑视频功能。

在现在的 Vlog 视频制作中，许多“傻瓜软件”所带有的功能、风格都十分相似，给不同的 Vlogger 很少的选择项，因此即使个人想要表达出自身与其他人不同的独特风格、想法，由于大部分 Vlogger 并不是专业的视频制作人士，在技术条件上无法达到，从而最终导致趋同。在视频的剪辑、音乐的选择、字幕的设置等各个方面都增加选项，会更好的改善 Vlog 的趋同现状。

第二，开展线上、线下视频制作等的培训。

为许多的新手 Vlogger 打开视频制作的视野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有专业人士的指导，大部分的 Vlogger 虽然抱着想要分享自身生活的美好想法，但却由于没有更好的思路而只能模仿学习知名 Vlogger 的视频，最终导致视频制作效果十分雷同。开展视频制作的培训，有助于打开 Vlogger 的思路和视野，帮助更多不同的人表达出自己生活的不同之处。

第三，鼓励更多不同的群体加入 Vlog 制作的行列之中。

目前 Vlogger 的制作群体十分集中于女性，在世界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也拥有更加包容的视野。在 B 站平台上除了能看到女性、男性分享自己的视频以外，也有许多以留学生、情侣、异国情侣、同性情侣为主题的 Vlog 出现，包括极少部分的一些变性群体的 Vlog。不同的群体加入 Vlog 的制作行业，势必会有崭新的风格和内容出现，有助于改变 Vlog 目前的同质化现象。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不必讳言，本项研究还是存在一些局限性与不足之处。本项研究最初除了在数据收集方面，也希望能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与 Vlogger 进行深度的交流和数据的收集，希望能在未来进一步完善本次项目的调查。同时，在数据收集方面，虽本人认为已经十分努力，但最终在处理时发现还是稍有不足，将会在未来进一步深化 Vlog 相关研究。在视频中其实可以看到，在相近的一段时间里，许多 Vlog 中除了背景音乐相似以外，甚至做的饭、铺的桌布、背景墙的照片、手账的使用物品、香薰的品牌、厨具餐具等都是是一样的，笔者自身在看时十分惊讶，但是如何从数据中表达出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1] 宾振宇，2019，《Vlog 中国发展现状与前景浅析》，《新媒体聚焦》第 3 期。
- [2] 查尔斯·霍顿·库利著，1999，《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3] 陈剑，2018，《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网络直播研究》，《新闻采编》第 6 期。
- [4] 丁璐、周明，2007，《Vlog 引领学习方式的革命》，《中国现代教育装备》第 1 期。
- [5] 凡勃伦，2007，《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6] 洪长晖、尤砺锋，2019，《Vlog 短视频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戈夫曼拟剧理论分析》，《现代视听》第 10 期。
- [7] 贾春增，2008，《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8] 贾雯霞，2019，《视频博客 Vlog 女性作者的叙事特色和文化分析》，《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9] 柯林斯，2012，《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10] 罗钧文，2019，《VLOG ‘推广视频’：‘认同’创造双重视频价值——基于博主井越及其 VLOG 视频的个案分析》，《今传媒》第 8 期。
- [11] 麦克·费瑟斯通，2000，《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南京：译林出版社。
- [12] 庞艳怡、姚志明，2020，《粉丝经济视阈下视频博客(Vlog)广告价值探析》，《现代营销(下旬刊)》第 1 期。



- [13]让·鲍德里亚著，2014，《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14]芮必峰，2004，《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15]隋岩、刘梦琪，2018，《视频博客(Vlog)的内容特点及其治理》，《学习与实践》第11期。
- [16]汤姆·斯丹迪奇，2015，《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17]谭璇璇，2017，《新媒体语境下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关系再审视——以弹幕视频“局座B站直播首秀”为例》，《新媒体与社会》第3期。
- [18]王添帅，2019，《探究短视频发展下一个风口——vlog发展现状及趋势》，《东南传播》第4期。
- [19]魏梦雪，2017，《打破现实与幻想的壁垒——浅析二次元粉丝文化》，《今传媒》第9期。
- [20]吴洪莉、刘梦娇，2018，《VLOG:短视频下一个爆发点——基于B站的热门Vlog视频内容生产策略分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
- [21]夏胜男，2011，《论‘广告即拟剧’——社会拟剧视角下广告元理论的新构建》，华中科技大学广告与公共关系专业硕士论文。
- [22]徐敏，2019，《注意力经济视角下解读Vlog发布者的盈利方式——以Bilibili弹幕网站为例》，《东南传播》第2期。
- [23]姚蓉、张伟豪，2019，《符号互动论下的‘视频博客’研究分析》，《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24]张数锋，2018，《非语言符号在电视新闻现场报道中应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
- [25]赵静，2019，《基于Vlog的视觉消费转向与发展困境探讨》，《传媒观察》第10期。
- [26]詹绪武，李珂，2020，《Vlog+新闻：主流话语的传播创新路径——以‘康辉vlog’为例》，《新闻与写作》第3期。

☆作者简介：李芊趣，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8级本科生

☆责任编辑：胡麟

# 并非弱者

## ——一项有关地摊经济与从业者刻板印象的实地研究

米艺涵

---

**摘要:**长期以来,由于新闻媒介的偏好,大众可能对地摊经济及从业者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对比从新闻报道中获得的媒介形象之后发现,“占道经营”“污染环境”“食品不安全”“弱势群体”“收入低”“破坏市场”“生活困难”“城管暴力”是出现在新闻媒介中的主要印象词,而现实案例却表明,这种形象存在着偏差和误导。这种结果表明,地摊经济与从业者存在着多元化和多样性,相关研究应该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才能获得有效认知。

**关键词:** 地摊经济 地摊从业者 刻板印象

---

### 一、导言

本小组选择的课题是:地摊从业者的生存境遇。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主题,一个原因是:近期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地摊经济发展,地摊经济成为火热话题。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不仅从古代就有诸如“草市”这样的类似地摊经济形式存在;到了现在,地摊经济更是一种独立存在的、零散微小却不可缺少的经济形式。地摊不仅解决了部分中低收入者与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也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更是城市里的一抹烟火气息。在疫情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打击。而地摊经济正是迎合了国家复工复产的需求,为国家的经济复苏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选择这一课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地摊从业者群体,在媒体报道中大多处于弱者地位,且城管与地摊从业者之间的纠纷也屡见不鲜。因此,我们打算通过这次暑期调查活动,真正了解地摊从业者的生存境遇,了解地摊经济的必要性与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促成地摊与城市环境融为一体、和谐发展。

关于本次实践的大课题,我们组的每个人都围绕生存境遇这一课题有着自己的小主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小主题,全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对地摊从业者进行研究。为了确定各自的主题,我们先开始了一段时间的无结构式访谈,希望从无结构式访谈里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起初我是将地摊从业者放在弱势群体、困难群体上去看待的,可经过一两次交谈后,才发现地摊从业者并不都是我想象的那样弱小贫穷和无助。进行过几次无结构访谈,我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了:好像他们并不像我想象得那样生活困苦,城管和他们的关系也并没有那样剑拔弩张。与老师讨论过后,我确定了自己的小主题:并非弱者——打破地摊及地摊从业者刻板印象。

关于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把这种观点看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对于地摊及地摊从业者群体的刻板印象,除了一开始想要以此为研究内容的“弱势群体”,还有比如“占道经营”“污染环境”“食品不安全”“弱势群体”“收入低”“破坏市场”“生活困难”“城管暴力”等其他印象词。这些印象的产生自然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原因,其存在也具有合理性。之所以将它们归为刻板印象,是因

为这些印象词在本身所囊括的范围内得到了不合理的扩大，换言之，是这类印象的外延被扩大化，而内涵并没有改变。这就使得人们使用这类印象词对地摊及地摊从业者进行定义，比如提起地摊从业者便认为其弱小与收入低，或提起城管管理地摊便认为是暴力执法。虽然地摊从业者收入低、城管暴力执法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不能推而广之，认为所有的地摊及地摊从业者都处于这种境地。

关于人们对于地摊及地摊从业者的刻板印象由来，大致归为自己亲身经历和体会到的，以及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其中新闻媒体报道应当是人们形成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原因有二：首先，若人们对地摊及地摊从业者的刻板印象来自亲身经历，那么一个人会在生活中接触大量形形色色的地摊从业者，其中也许有助长其刻板印象的，也有能打破其刻板印象的。如此一来便很难对一个群体产生始终如一的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的产生正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地摊及地摊从业者的了解不够深入和熟悉。因此，个人的亲身经历很难成为形成对于地摊及地摊从业者刻板印象的来源。其次，随着互联网以及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传统社会结构趋向于瓦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渐渐取代，人与人再不像过去那般互相了解和熟悉，取而代之的是虽然住在隔壁却几年也未曾和邻居打一声招呼的防备与疏离，对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改变的原因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而重要的一点在于，人很难再从现实生活中仅仅通过普通的交换关系建立紧密的纽带，例如人们不会与便利店店员有着除了结账找零以外的更多交流。而城市中的人们与地摊从业者也是如此。在此特指城市是因为城市才是地摊经济生存发展的基础，关于农村集市，其与本文所指的地摊并不是同一类型。城市里的人们即使在地摊上购买物品，也很难通过简单的交易行为对地摊从业者形成具体印象，从这一点上看，消费者与地摊从业者、便利店店员的关系是一种类型，可能不同的一点是地摊从业者在与消费者结算的途中可能会出于人情或口碑考虑，抹去支付的零头或多赠与商品，而便利店店员不会。即便如此人们也很难通过这一行为得出地摊从业者是弱者的印象。

那么，人们对于地摊及地摊从业者的刻板印象从何而来？答案只能从新闻媒体报道中寻求。置身于城市生活的人们，信息来源的获取主要依靠媒体，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报纸广播电视，媒体一直在人们信息获取的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由于媒体的主要任务除了报道新闻事实，还要根据观看者喜好筛选和挖掘内容，从而获得关注度；这就导致媒体很难客观、完整、全面地收集和报道信息，从而让人们很难了解事情的全貌，在缺乏思考和研究下盲目判断，以偏概全。关于地摊的媒体报道，最典型的例子在于城管与摊贩的关系问题。我们经常在电视或网络中看到有关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城管由于掌握权力，在执法过程中不能做到文明执法，对于小摊小贩大打出手，从没收称及车辆到掀翻摊位动手打人，摊贩依靠摆摊养家糊口的生活被粗暴打破陷入窘境，看到报道的人无不义愤填膺加以指责。而通常这样的报道更能炒热话题，引起人们激烈讨论，因此媒体更多偏爱这样的话题，选择性报道地摊该方面的新闻，导致人们与媒体之间形成一种双向的信息索取与反馈路径，两者在这种路径上越走越偏，真正的事实却很难被发现。人们依靠媒体的偏向报道，获得不完整的信息，从而导致了对于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除了地摊从业者是弱者以外，类似的刻板印象还有女司机开车技术差、同性恋群体都有艾滋病等等，诸如此类。媒体报道对于大众刻板印象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笔者对于大众刻板印象的收集主要来自媒体的新闻报道。

本文题目中使用的“弱者”一词，与一般意义上的弱者定义有所不同，不仅是指存在于地摊从业者在大众刻板印象中的弱者形象，也是对于地摊从业者刻板印象的话引，因为其作为地摊从业者最容易被

定义的刻板印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诚然，大多数地摊从业者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上或多或少处于不利位置，但这并不能代表地摊从业者就是弱者，弱者是通过与强者的比较得来的。笔者关于“并非弱者”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反对地摊从业者属于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事实，而是在事实与刻板印象之间试图找寻一个平衡，使得人们对于地摊及地摊从业者的认识能够更加客观全面。

## 二、基本情况

### （一）调查时间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2020年7月15日到2020年7月31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5日到7月18日，此阶段主要是观察与无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发现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阶段从7月19日到7月28日，此阶段主要制订访谈提纲，正式进行访谈，进一步收集材料；第三阶段从7月29日到7月31日，这一阶段主要为整理资料，撰写调查报告，分析和整理在本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总体而言调查的全过程时间并不充裕，对于研究深度以及研究结论的得出都存在一定的影响。

### （二）调查地点

本次调查的地点位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汉中市地处中国版图地理几何中心，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中市北界秦岭主脊，与陕西省宝鸡市、西安市为邻，南界大巴山主脊，与四川省广元市、巴中市毗连，东与陕西省安康市相接，西与甘肃省陇南市接壤。2019年末户籍总人口380.9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42.64万人。年末常住人口343.70万人，出生率为9.30%，死亡率为6.68%，自然增长率为2.6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96%。城镇新增就业4.22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5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0.77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6亿元。劳务输出86.5万人，职业技能培训2.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1%。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83元，增长9.4%；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28元，增长8.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98元，增长10.0%。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38.77万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44.10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58.2万人、23.53万人、31.75万人和23.44万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03.2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93.49万人，参保率99.81%。城市低保人数2.30万人，发放保障金1.52亿元；农村低保人数9.58万人，发放保障金3.66亿元。优抚补助3.12万人，发放抚恤金2.24亿元。各类养老服务设施（机构）1400个，提供床位30820张，年末养老服务机构在院人数9163人。全年接受社会捐赠款1553万元（含物资捐赠折价）。

汉台区位于陕西省汉中盆地中心，是汉中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汉台区是陕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购物中心之一，辐射面可及周边各县及陕、川、甘毗邻地区。作为汉中市市区所在地，汉台区交通便利，人流量大，经济相对发达，地摊大量聚集，成为本次调查的重点区域。

本次调查主要选择了五个地点，分别位于汉台区的中学巷、前进东路、丰辉广场、陕西理工大学（南校区）、吾悦广场。这些地点多为学校、小区、购物娱乐中心，地摊聚集数量多，活跃时间、消费者年龄、地摊类型都有所区别。以此五个地点进行调查，力图得到较为完整全面的调查结果。

## 三、调查过程

### （一）第一阶段

观察与无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发现所要研究的问题。这一阶段我的调查小主题尚未明确，抱着地摊从业者是弱势群体的态度与摊主进行交谈，企图获得可供研究的内容。我在丰辉广场一水果摊旁与

摊主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逐渐发现谈话结果与我预想的有所差别。

前些年做粮食生意。那时候赚钱跟捡钱似的，挣了一小笔，买了个房。

(访谈记录 1)

这令我感到有点不解。在我的印象里，地摊从业者既然是收入低的弱势群体，应当是没有买房这样的能力，但水果摊摊主不仅买了房，还在往年生意好的时候能挣很多钱。另外，城管似乎没有在此进行过暴力执法，只是普通依照规定办事，而摊主对此也没有怨言。

于是我与小组老师进行交流，决定从观念与实际的差异入手，确定主题，开始研究地摊从业者的刻板印象。

## (二) 第二阶段

首先是明确人们对于地摊从业者的刻板印象都有哪些。在导言里我已经提到过，人们对于地摊及地摊从业者的刻板印象多来自于媒体报道。此外鉴于时间较不充裕，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定通过网络媒体关于地摊及地摊经济的报道来归纳印象词。由于媒体数量繁多，且内容多搬运照抄，因此筛选时选择了中国知网上刊登的媒体报纸报道。通过搜索“地摊”“流动摊贩”“摆摊”等关键词，得到关于地摊的报纸报导，提取印象词并制成该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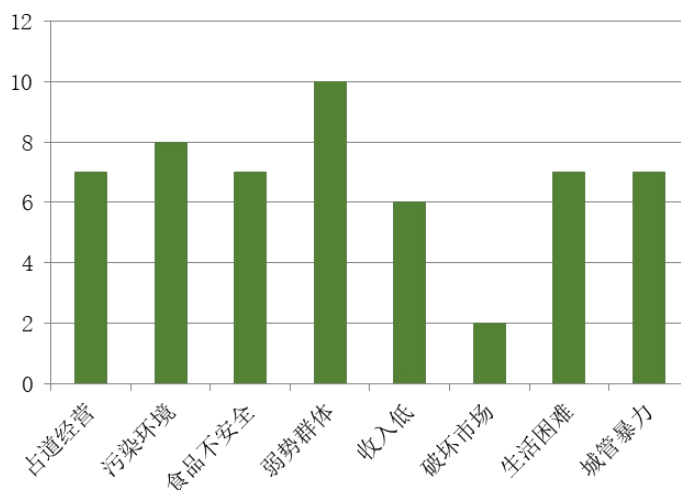


图 1： 报纸报道地摊印象词统计图

其中，“占道经营”“污染环境”“食品安全”“弱势群体”“收入低”“破坏市场”“生活困难”“城管暴力”都是提到次数较多的印象词。（此处并没有收录中性词，如“城市烟火气”）为打破刻板印象，我根据每条印象词逐一对应，制定新的访谈提纲进行访谈。

在制订访谈提纲后，我来到选定的调查地点，寻找摊主进行访谈。我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来到中学巷一带。中学巷是一条长而窄的街道，由名字便可知，中学巷附近集中着几所初中与小学，此外还有课外辅导机构。因此，在中学巷多小摊贩聚集，而摊位主要兜售价格不高的小吃，主要消费人群是上课的学生。我找到了一位卖章鱼小丸子的摊主，在经过同意后，进行了访谈并录音。

章鱼小丸子的摊主是一名三十来岁的男性，家中有父母和孩子，孩子还是吃奶的年纪。曾经从事过

摆摊生意（主要是卖小吃），后来也去深圳、广州、浙江打过工。由于父母年龄大了，长期在外无法及时照看，于是选择回到汉中继续摆摊卖章鱼小丸子。所卖的章鱼小丸子五元一份，是较为平价也很受欢迎的小吃。关于城管的问题，可以看出，城管对于摆摊是有地点和时间段规定的，违规摆摊，即使是在国家鼓励地摊的新政策下，也是会被处罚的。但摊主能够理解城管执法的不容易，城管也并没有媒体报道的那样暴力。

有些地方和时段，城管是不让摆的。不能说有那个政策哪个地方都可以摆。他有限制的，比如说你几点钟以后去。他给你划分的有区域，摆在不占道经营的地方。

（城管）现在挺好的。以前凶得很。

城管这个职位也很尴尬的，他不管吧，这个城市环境各方面的也不行；你管了吧，但是摆摊的这些人也不行。这些人要生存，靠这个吃饭，假如没这个来源，他也没法在城市里生活。

（访谈记录 2）

2. 同日，在中学巷与一位二十八岁的女性摊主做了访谈。该摊主售卖手抓饼，与丈夫共开两摊，家中有两个孩子。与章鱼小丸子摊主不同的是，这位摊主在收入方面有着很大的信心。访谈得知，从事地摊的收入并不算很低，且该摊主对于自己目前的地摊生意有着强烈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本市的城管也并不像媒体报导中那般执法暴力，且摊主能很好地理解城管。

一个是国家不是号召地摊经济嘛，还有一个是你不摆地摊，这个城不就没那个烟火气嘛。不过说实话汉中城管可以。毕竟这是人家一份工作。他们要是不管，那么大街上到处摆的都是，车过不去人过不去，还不得出事情。再一个是，汉中城管最起码来了他给你说，这个地方不许摆。

（城管）说明天领导检查呢，你们几天几天不要来。我们都不来。这是人家一份工作。最主要是城管要理解我们，我们也要理解城管。

往年生意都好，不止我一家好。反正学生开学了每天都是八九百一千块钱这个样子，反正比打工挣得多嘛。

（访谈记录 3）

3. 关于食物售卖的卫生问题，由于不方便询问，只能从侧面简单提到，可以得知摊主所用食材新鲜，从访谈现场看，摊位卫生环境干净整洁。

中午一点钟我回去一趟准备菜，再吃顿饭，下午又过来摆，现在夏天菜容易坏，我这都很新鲜的。

（访谈记录 4）



图 2 进行访谈的摊位所在街道

### （三）第三阶段

进行一系列访谈，收集到资料以后，进行整理和研究，得出了一下结论。

#### 1. 关于占道经营

收集到的资料中显示，媒体对于地摊占道经营的担忧主要在占道阻塞交通，特别是上下班、上下学高峰时期。实际上，通过访谈得知，现在占道经营的摊贩几乎很少，多摆在划定不占道的街道，而较热闹生意较好的街道，在可能影响交通的时间段，规定不许摆摊；摊贩也能较好地遵守这样的规定。

#### 2. 关于污染环境

并不是所有摊位都有污染环境的问题。大多为贩卖小吃的摊位。像我访谈的售卖章鱼小丸子的摊位，旁边就有专门的垃圾桶。垃圾丢进垃圾桶便很少出现卫生问题。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还是食客素质问题。乱扔垃圾是个人素质的体现，并不能通过杜绝摊贩来解决这个问题。

#### 3. 关于食品不安全

主要只存在于售卖食品的摊贩中。鉴于该问题较为敏感，访谈时只是隐晦地提到。而卖手抓饼的摊主告诉我，她进的货如肉松小料，都和一般蛋糕店一个质量。

存在摊主隐瞒和不愿作答的部分；但也存在开了很多年的老摊子，食客并没有出现健康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 4. 关于弱势群体、生活困难

地摊从业者在权利和义务上与一般公民有着同等待遇，与贫困户、低保户相比不是绝对的弱势；也很少受到社会歧视，居民更多是将其看做便利生活的朋友；新政策下城管的管理文明，并不存在欺压。生活困难多来自家庭问题，如照顾老人和孩子。卖手抓饼的摊主因为年轻，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而认为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困难。

#### 5. 关于收入低

摊贩之间收入也有差距。但能长期做下去的大多都能维持生活需要。自称生意较差的摊主告诉我，自己的每月收入和工地做工一月差不多；而地摊时间自由更适合他。生意较好的摊主，有时一天便能挣上百元。

另外还有响应新政策而出现的体验生活型地摊从业者，自己还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算低。

#### 6. 关于城管暴力

根据访谈，摊主表示本地的城管并没有媒体报道的暴力执法行为，多为劝导和提前告知，几乎不发生肢体冲突。新政策出现以后，两者关系更加缓和，摊贩也能理解城管工作的困难之处，双方都明白互相都要工作和生存。

#### 7. 关于破坏市场

该问题也较为敏感。因此询问了低价的原因。水果摊主说，自己在正规水果市场进货，但都是自己运输自己售卖，成本和利润较低，因此也比超市等地方的价格更低。地摊也是市场的一部分，不能算作破坏市场。

## 四、结语

地摊在中国社会已经存在和延续已久，是一种不可取缔的经济形式。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形式，不仅需要吸引眼球的内容博得大众关注，也需要迎合国家政策进行宣传；因此，在地摊从业者及地摊经济的

问题上，媒体的报道多偏重于占道经营、污染环境、食品不安全、破坏市场、城管暴力等印象，这就使得大众对于地摊从业者以及地摊经济的了解侧重于这些方面，反过来促进了媒体对于这些影响的加深刻画。而实际上地摊从业者以及地摊经济并没有媒体以及大众所预想的那样标签化，其中不仅有与实际不太相符的地方，也有个体差异存在，不能一概而论。而在新政策出台以后，媒体对于地摊的报道也开始侧重于“城市烟火气”等方面，而作为地摊从业者，对于现状并没有过分的不满，最大的担忧则是新政策能否持续进行下去。打破大众对于地摊的刻板印象，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地摊从业者积极配合，探索地摊与城市的良性协调发展。

由于缺乏经验和时间仓促，本次调查实际上并不能做到面面俱到，进行访谈的被访者数量有所不足，时间段也多集中在同一时间，没能很好地进行跟踪访谈。但作为进入社会学专业刚满一年的本科生，我受益颇多。在由于疫情而耽误的大半年后，毫无实践经验的我终于走上街头，进行了访谈。我不仅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用于实践，还锻炼了自己的心理素质和与陌生人交流的能力。同时，我与小组成员互帮互助、相互鼓励，增长了团队合作的能力，也增进了感情。感触最深的便是在访谈的过程里，我与许多素不相识的地摊从业者交谈许多，了解到那些不属于我的故事，那些在我的认知以外的生活，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每个人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我们正是要去主动了解这一切，在看到主流的同时更关注支流，关注容易被大众所忽视的人和事，而不是只会在教室背背理论。地摊经济的确是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居民和从业者都一样。新的政策对于地摊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实际影响，不仅是在政策方面，也体现在城管执法与摊主生活质量、居民对于地摊看法上。刻板印象一旦形成，想要扭转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希望能通过本次调查，让人们对于地摊及地摊从业者的刻板印象扭转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

☆ 作者简介：米艺涵，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王岚茜



# 农村女工对自身境遇 的解释及工人子女教育状况研究

蔡颖冷

---

**摘要:**通过参与农村食品工厂的外包生产，笔者得以了解农村年长女工和在假期作为「童工」参与劳动的初中生的境遇。年长女工和初中生又构成农村家庭教育的长幼格局，展现出农村工人再生产的图式。但在工业生产的环境下，传统的农村教育提倡的「劳动精神」也许成为了规训工人子女的方式，以致阻碍了工人子女接受现代教育以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同时，浸淫于现代媒介和技术发达的环境，年轻人具有年长者所不能把握的机会，提供了关于未来别样的可能。

**关键词:** 农村女工 农村教育 现代童工 劳动精神

---

## 一、地区情况介绍

工厂所在的海澄镇隶属福建省的县级市龙海市。城市的定义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因为没有聚集起来形成的功能分明的人口聚集区，龙海市范围内被称作乡镇更为合适。龙海市隶属同时也是距离最近的大城市是漳州，再者便是厦门。龙海处于二者中间。

福建属于人口流入相对较多的省份，人口流出则较少。龙海市发展有较多的小食品生产和加工工业。就我所在的埭新村（隶属海澄镇）来说，大多劳动力都是在附近作为工人就业，耕地多数承包给他人，不再自己种植。村内的建筑多为2、3层的独栋建筑，在十多年来逐渐覆盖掉旧房。较少的旧式瓦房大多是老人在居住。埭新村位于海澄镇和东园镇的交接，两镇都发展有工业区。我所研究的工厂是位于海澄工业区西小区的一家私营企业，制作饼干。我的大伯是里面的执行董事。企业规模不大，我接触的大都是是位于包装车间的女性工人。

在包装车间显得高而大的空间里，空气却很炎热。通过堆得高过头顶的包装材料形成的过道，里面是以小机台为中心形成的工作小组，不同机台生产不同包装的饼干。临时工往往会做外包，也就是将一小包一小包的饼干装到大大小小的纸箱里，整齐“堆砌”到木板上，再由一两名穿梭于各小组用推车运送饼干的男工运走。固定工需要面对几乎不会停止的机器，上面正不断流下已由机器内包好的饼干，要将它们尽量一个不落地快速抓起放入纸箱。纸箱需要先进行胶带封底，装好饼干后称重，合适后再封顶。这样实际上也是外包，区别在于外包饼干是已经内包好还是正在被机器内包——即包装的速度不同。跟随机器内包的同时不断进行外包，就要适应机器的快节奏，相比起临时工常做的外包，这样的节奏显得紧张。

## 二、女工在农村

潘毅在《中国女工》中，提到户籍制度实际上转嫁了无产阶级再生产的成本到农村，譬如住房、教育等。在国家权力、跨国资本、父权制三者作用下，进城打工的临时工没有正规雇用的劳动合同的保障，

如果没有长时间没有工作就不得不回乡，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工也必须回乡。这实际上造成了女性临时工成为被动的弱势群体。而我的研究对象处于农村，虽然也是临时工，同样没有劳动雇用的合同，但她们往往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住房，一段时日不做工在家也没有什么，她们更有选择要不要做的权力。如果这家工厂太苛刻，给的钱少，那么就选择别的工厂，这类的小工厂在这里遍地都是。在实地，我也发现，当要做的是机台的外包时，临时女工们会抱怨这样的工作，而且会跟主任说如果下次是机台就不要叫她们来了，可见她们面对工厂还是较为独立自主的。

这里也并不像泰罗制的生产流水线，特别在临时工的小组，工人是自发地对工作进行简单的分工，在工作内外都可以闲聊。包装车间的两个主任会对每种饼干的进度进行督促检查，同时也担任招人和工资分发的任务。我所访谈的这个主任，相比和董事，实际上和女工们更为亲近，观念利益相近。相互熟悉的临时工人往往自己成为一个工作小组，形成非正式的群体。她们作为农村的成年妇女，有着相似的经历。她们在做工的时候，进行的闲聊往往关乎家长里短，以及相似的生命历程带来的类似经验。

### 三、人伦关系决定命运

在农业社会，农人生活的核心是成家立业，抚育子女，年老再由子女赡养。农村人的生命历程，很大部分就是围绕着这些重要的关系展开的。正如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所说的“过日子”，在农村人看来，命运不是像现代的说法有一种决定论的意味，而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逐渐展露出来的，需要人主动地去把日子过好，才能逐渐改变命运。然而日子过得好坏主要取决于家庭，毕竟日子正是围绕家庭关系来过的。在工厂里，我也听到了很多次工人用“命”来形容发生的事情和自身的境遇。工人们往往用的是“好命”和“坏命”，二者是对立的。在年长者的闲聊中，经常会提及家庭邻里的事情，譬如谁的婆婆很好，帮忙照顾家里，真好命；谁的婆婆很老顽固，老是给人添堵，真坏命……这就是命的体现。在年长教育年幼的情景中，长者往往会用“好命”、“坏命”与“继续就学”、“做工”分别对应。这意味着，好命坏命在工人口中还用来形容个人的境遇之间的差异，即在面对阶级、贫富差异时，用来解释这样的差别。



图1 作为小组工作的女工

年长者（50岁左右）的身体开始适应不了工厂较为繁重的劳作，身体的疼痛是她们的日常体验。在吃饭时，阿姨们就会尽量坐着，站一会就会感到脚酸。提出不要做机台的正是年长的阿姨们，她们说自己已经老了，已经做不来这样累的工了。对于她们的年纪，睡眠时间已经开始普遍减少，大约5、6个小时的时间，这是身体衰老的征兆。我询问两位更年轻的临时工阿姨A、B（孩子初中毕业左右），问睡眠如何，说睡得很好。问是否会在做完工觉得腿脚酸痛？也道不会。我想这是由于正处于壮年时期，正是精力充沛的时期，相比年长的阿姨和锻炼不足的我，她们的身体已经习惯并且能够接受工厂的劳作。

工厂机械的劳动让人心生乏味，伴随着肌肉的酸疼和疲惫感，让人怀疑如何度过这时时刻刻，而无需复杂思考的重复动作又让时间平滑地度过。对我来说，工厂内做工的时间是需要“熬”的，即使头脑放空也并不轻松。那时我正在练车，每日在下午四点就会离开，相当于只做了8小时而不是12小时，而这已经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都感到疲乏，回家觉得没有精力学习。我作为仍在就学，依赖父母而无需自行出卖劳力赚钱的大学生，被阿姨们视为“好命”，而对比起来她们做工的命运就是“坏命”。我询问这两个词意味着什么时。阿姨解释道：“做工很苦很累，就是很坏命。像你有书读，还可以学车，就是很好命。”我得知阿姨们很早就不再上学而去做工。她们的青春正是在工厂一日日度过的。大多阿姨都只读过或者没读完小学就出来了。

在和两位更年轻一些的阿姨（孩子初中毕业左右的年纪）交谈，我发现两种对自身做工的“命运”的看法。阿姨C对自己不得不做工的命运感到不甘，她说自己已经老了，错过了奋斗的时机。我意识到，对她来说，读书确实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方式。她说如果能做办公室的工作——不需要待在炎热的厂房，可以吹空调，工作时间也更短——那就会轻松、自由许多。然而这样的工作要求具备相应的能力：比如阅读账本、操作电脑，作为人事处的员工和各方人群交流等等。学校教育本身，能够带来这些能力吗？如果只需要学习这些技能，似乎什么时候都不“晚”。但对于农村的妇女来说，她既没有资源为她提供技能培训，用人单位对年长妇女的刻板印象也不利于她的就业。我的伯父就更愿意用年轻人，他认为年长者不愿意干活，年轻的反而更勤快一些。然而，我在与年长阿姨们闲聊时，她们提到有的年轻人和她们在同一小组做工的时候经常偷懒（公平的分工需要时时协调一下，年轻人往往不会主动做好很多细节）。阿姨们会抱怨，拿的是一样的钱，凭什么？还有阿姨提到有个孩子做工很懒，但是要叫他/她做，他/她又做得其实很好，什么都会，比我们这些老人做得还好。

在我爸妈的网店工作室里有一位27岁的客服女性，之前一次到工作室还有看到，第二次去就得知她回家照顾孩子了。她已经育有两个孩子。同样身为客服的30岁的D，孩子正要升小学，也表达出对于照顾孩子时间不够的担忧。在询问临时工阿姨为什么不愿做固定工的时候，她们有的提到“比较自由”，有时候要回家做饭、照顾家人什么的。也就是这自由是指相对于工厂对工人控制的自由，是回归家庭生活的自由。在工厂外，最年长的阿姨们是妻子也是母亲，还是媳妇，相对于儿女、公婆、丈夫，阿姨们往往是付出、照顾的一方，家庭在农村为妇女提供了归宿，但同样无形加重了妇女身上的劳动。这是传统家庭人伦使然（即使在城市，处于家庭的女性也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在询问D和一位年长阿姨为何丈夫、成年儿子不帮助分担妻子（照顾孩子）或者母亲（做饭）的家务（反而是被照顾）时，她们都会笑笑说，怎么会让男人去做那些嘛。

#### 四、劳作精神与现代童工

在现代观念里，儿童的身体和心理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生长。让孩子做繁重的体力劳动被视为阻碍儿童正常的生长过程的不当行为，导致儿童不能健康成人。然而在中古社会，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却不那么明确。小孩一旦能够自理日常的生活，就被视为“小大人”了。在西方需要作为学徒很早地开始帮助和学习大人做的工作。在中国也一样，农忙时节学校放假让孩子回家帮助家庭，女孩也很早就开始帮助家里的家务。初中生们的家长在小时候也有帮助家里农忙和家务的经历，在当时这显得自然、必要，劳动也被视为一种好的品质。在农村人已经加入工业环境的当下，勤俭持家、踏踏实实劳作仍然是被赞扬的，至少是不能“什么都不做”，即使是孩子，也理应自食其力。我所见到的初中生都是在假期出来打工挣钱的。他/她们作为临时工，拿的是和别的临时工一样的10元/小时。实际上，对比较拮据的家庭来说，孩子能够参与工厂劳动获得报酬，对于他/她继续就学也有帮助，无形中就为家庭分担了一些负担。

在中国的农村，人的作息是符合日升日落、四季轮换的。农村的人从来没有“缺觉”这种说法，在现代却很常见。工业社会的时间线打破了自然农耕社会的作息，把时间变成由钟表时刻显示的均质的时间。无论春夏秋冬，工厂的生产都不会停止。出卖劳力的工人，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时间安排，花覆盖白天或者黑夜、长达12小时的工作总长，不停劳作。对于未成年的身体和心理来说，工厂劳动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结合自身经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对孩子时间和精力的占用。这对于孩子接受教育是不利的。



图2 一位正在机台下独自工作的初中生

车间主任的两个孩子都在工厂打工，她们是小学刚毕业的A，和初中刚毕业的B。主任显示出那种自立自强的性格特征，对孩子也比较严格。A和B都没有自己的零花钱，需要自己在工厂打工才能赚到。B在初一、二的时候就在假期于厂里做工了，甚至比她的母亲还要先到这个工厂。A和B都显示出对工

厂工作的熟稔和自信，和工厂里的其他人交谈自如。B的成绩并不好，她显然对此感到沮丧，因为这不符她对自己比较高的期望。

在我访谈主任A时，她表达出了一种对于初中生打工的肯定。在表达出对工人身份的认同的同时，也划下了我与她们之间的区别。我询问是否所有的初中生都是跟随长辈前来的，她说不是，有一些是自己来的，有工的时候就会叫她。有很多初中生正在自己打工赚学费，为家里分担。“像你可能体会不到……”“因为你家境比较好”，阿姨这样说到。实际上，母亲是工厂主任的A、B，不需要自己负担学费。A、B之所以到厂里做工，正是因为母亲对劳作这一品质的赞扬和对孩子零花钱的控制（反映出不希望孩子“无所事事”的倾向）。而我在询问主任A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孩子来做工，主任说希望孩子能体验一下做工的苦，从而在学校好好学习。但事实上，刚小学毕业的A成绩确实很好，但初中毕业的B却成绩不好，不知是否能上高中。而B很早就开始做工了。我提出这一点后，主任笑着说确实没错，因为做家长的她没有像我的家长那样为孩子找一个好的学校。现在的“好学校”确实可以通过家长的资源来争取，但家长资源作用更多是隐性的，最重要是要能体现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因为能不能进好的初、高中大部分学生还是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成绩。所以，主任对于孩子如何能有好的教育，顺利向上进行社会流动，其实并不清楚，也没有明显的动力。

### 五、工人子女教育现状

对于工人说，学校教育是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好的学历意味着可能有更好的工作，意味着不用像父母一样辛苦做工。从我见到的初中生来说，也许学习本身是一个挫败的过程，让他/她们觉得无处使力。我的表妹也刚刚中考完，她在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上到初中之后就开不行，因为开始听不懂，意味着无法打下“基础”——一个很常听到的说法，伴随着“一开始没学好之后就很难学好”这样的论述，作为许许多多家长和孩子理解在学习上遭遇的困难的叙事语言。B说在上课的时候总想睡觉，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我提问有没有尝试报补习班，她说也听不进去，不爱学。

一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往往和阅读能力有很大的关联。现在的小学课程也对阅读有很大的要求。这些对于工人父母来说是陌生的，尽管父母们可能是初中毕业，但对于现在学校的各种课程学习的具体要求，他/她们没有能力去把握。这导致家长除了了监督孩子“好好坐在书桌前”，口头命令或者劝告孩子好好努力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帮助孩子学习。补习班也许是一个办法，但不总是行得通。再加上父母往往都是工人，一天在外做工，甚至有些是半月夜班半月白班的，回到家也是倍感疲惫，没有精力再投入孩子的教育。阿姨B就向我表示了这样的忧虑，她虽然担心孩子的学习，但没时间去管。

“年长教导年幼”的情景，展示了微妙的文化图式。阿姨E对一个坐在旁边的初中生C说，让你的爸妈给你设定一下目标，达到了目标就有奖励。比如前进50名就可以去哪里玩，中考考上哪个高中就可以奖励多少钱作为旅游的费用，等等。阿姨E说，来体验一下工厂的辛苦，回去就好好学习，在周末也别来工厂了，休息一下，为了学习而专心。也有阿姨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来这里就能体会到做工的辛苦了吧？”她们也确实把我当作正在“体验生活”的学生，她们认为孩子的归宿最好不要在做工。结合阿姨C的不甘，可以体现工人对于学校教育的认可。不过，像这样的物质激励的作用是些微的，只能体现出父母的关切，初中生C感到开心。她和母亲的感情很好。但真正学习的过程没有改变，初中生们还是一样的困惑。

“做工好命还是上学好命？”我站在食堂的走道吃饭，听到阿姨 F 对初中生 D 这样问。D 答道：“做工。”他面容年轻的、像姐姐一样的母亲也在工厂做工，做的是仓库的管理员。她为儿子打好了饭菜，在工作途中也屡次过来关心、送水。D 真的喜欢做工？我想只是不喜欢学习。在做工的途中，D 并不十分认真，有时还会拿手机出来看。我在他旁边比较认真的做工，还尝试和他聊天，他的反应却有些冷淡，也许是明白我和他并不相似。

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提到“反学校的文化”，指工人阶级的子弟在学校不愿听从老师，把那些老老实实坐在课桌上的学生称为“书呆子”，他们开玩笑、打闹，尝试在规则边缘反复横跳，做大大小小反抗老师权威的事。他们把书本学习称为书呆子的事，重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空谈理论，他们认为书呆子们正是屈从于这些无用的理论，才获得了那份工作。这样的“反智主义”背后是工人阶级再生产的真相，正是他们的反学校文化为自己关上了向上流动的门。

## 六、技术改变命运？

这是在学校文化上受挫后的一种进路。实际上，在 D 身上出现的即使不是反学校的文化、不是中国农村女性工人的文化（勤劳做工挣钱），也是一种不属于学校的文化。做工的父母有许多实际上不需要孩子再帮忙持家，“你只要管好自己的学习就好”，孩子实际上确实有了更多自己的空间。相比父母，手机更是他/她们生活的一部分，玩游戏、进行网络社交、上各类视频播放平台是他/她们的日常。农村到城镇有一定的距离，可供娱乐的场所也不多，所以娱乐方式更多是玩手机。他/她们或许并不像父母那样认为自己如果不好好学习，只有做工的份儿。他/她们对未来有更多的展望，初中生 C 就希望自己以后能画画，她在周末会去上画画课。

上文 30 岁的女性 D，中毕业即离开学校，出去做工。但她现在做的是客服，一天只需要工作 7 个小时，工资相当于每小时 18 块，比起临时工的 10 元要高出许多。客服需要懂得如何与顾客交流、和工作室的其他人协调，要懂得操作电脑。年轻的 D 初为人母，家里的饭食都是婆婆在负责，她的妆容显示出一种年轻人的喜好。她不觉得初中结束就辍学是不好的事，还询问我为什么继续读书，我说感觉读书比较轻松，她说可是迟早要出来工作啊，不如早点出来。可见，读书对她来说并不意味着一种对未来的改变，她觉得“反正都是要工作”。不过她的工作确实相对工厂做 12 小时包装的临时工要轻松许多，时薪也更好。我问她是怎么学习做客服的，她对我的问题感到有些意外，“自己学的啊。”年轻人比起年长的更多接触了现代媒体传播和信息技术，这对于工作来说是很大的优势。相比年长者以高下的方式看待“就学”和“做工”的境遇，年轻人认为自己有更多的可能，并不认为就学就是最好的发展方式。

## 七、总结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试图描绘女工们的境遇：她们很早辍学，开始做工，到一定年龄成家，养儿育女，赡养公婆，她们在懵懂未成年时就离开了学校教育，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自己的教育经历或者家庭背景让自己只能做工（“坏命啊”），她们的身体承受着身为农村女性和工人带来的压力，带来身体的劳累疼痛和过早的衰老。但在面向工厂时，她们总可以比较理直气壮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她们更属于家庭。她们对自己的境遇即使有不甘，她早年的家庭也早已决定了她的命运。现在，人妻、人母、儿媳的身份认同已经深深地刻入了她们的内心，也反映着她们与周围人的关系，限制了她们再教育的可能。

年轻人们密切接触现代的信息技术。30 岁的女工 D 作为客服就有着更好的待遇，尽管她也许没有受到更多的学校教育（初中毕业）。对于初中生们来说，尽管父母由于做工导致精力、时间有限，以及

自身教育经历有限，很难指导孩子的学习，但有在做工的父母的收入大多足够支持孩子的学习。工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学而不是做工，希望他/她们能够更轻松一些。不过这样的轻松是现在的刻苦换来的，“先苦后甜”，先有劳作才会有收获，这就是在提倡一种朴实的劳动精神。在学习不佳的情况下，父母往往会认为是孩子不够努力，也会对孩子学不会的情况感到担忧。这种对劳动的赞扬还体现在初中生出现在工厂这一现象本身上。因为父母不会给予孩子悠闲的生长环境，他/她们要赚取自己的学费或至少是零花钱，早早地为自己的消费考虑。初中生学业上的挫折也使他/她不认为继续就学是很有可能和必要的。这有工人家庭收入情况本身的影响。但也有赞扬劳动本身的家长的影响，认为做工是勤劳的体现，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做工获得独立自主的能力和精力。这对于孩子继续就学提供的也许是一种阻碍。就像上文所说，孩子需要足够的时间投入学习，需要有除了学校以外的教育环境，这都是工人父母难以较好地提供的。可以看到，工人子女在继续接受教育上相比城市中产阶级有着许多具体的困难。

**参考文献：**

- [1]潘毅，2011，《中国女工》，.北京:九州出版社.
- [2]吴飞，2009，《浮生取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保罗·威利斯，2013，《学做工》，南京:译林出版社.

☆ 作者简介：蔡颖冷，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汝 艺



**我校四名教授当选中国社会学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和理事**

10月30日下午，中国社会学学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暨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当选为会长。我院施国庆教授、陈阿江教授当选为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陈绍军教授、王毅杰教授当选为理事。我校兼职教授、南京社科联主席叶南客博导当选常务理事。

10月31日，举行了中国社会学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陈光金会长在致辞中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核心内容，学会将“社会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年会主题，旨在体现中国社会学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

受新冠疫情影响，年会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新的交流方式，让更多学者、学生通过网络参与和分享学术交流。年会进行了优秀论坛和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其中“时空社会学论坛”获年会优秀论坛，邵占鹏老师的“全视监控情况下网商竞争的价格战困局”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 环境 研究

---

# 污染企业的“漂绿”实践及其逻辑\*

——基于 M 牧场沼液污染的经验研究

汪璇

---

**摘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以企业为主体,关注环境治理过程中决定污染问题走向的关键维度,对于理解当前环境治理困境至关重要。企业在与政府、媒体、当地群众互动中采取的漂绿策略,是决定污染走向“隐形”的关键环节。漂绿策略的直接靶向是公众污染感知。为降低公众污染感知度,企业采取了合理化环境指标、形象整饰、分化利益群体的漂绿策略。环境整治背景下的新型“政经同盟”关系、市场驱动下的印象管理倾向、受益圈受害圈边界模糊是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一方面遮蔽问题、一方面一味寄希望于技术变革,环境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期限。企业污染问题的“去蔽”需要政府、企业、群众以及其他主体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 环境污染 环境治理 漂绿 去问题化

---

“漂绿”(Greenwash),作为舶来语,自2009年《南方周末》首次公布中国企业漂绿行为排行榜,开始进入公众和学界视野,然而一直没有获得较高的关注度。“漂绿”这一概念伴随西方绿色消费潮流而生,起初是指企业为了迎合市场和消费者<sup>[1]</sup>、提升竞争力<sup>[2]</sup>、获得绿色“溢价”或政府政策倾斜,在绿色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以“绿色”为卖点,采取的表面性或象征性绿色宣传<sup>[3]</sup>、有选择地披露有关组织或产品的环境绩效等正面信息、隐瞒潜在的负面信息<sup>[4]</sup>的企业行为。2008年,国内一篇发表在《工业设计》的名为《对工程师们有用的环保新闻》的文章首次提及“漂绿”一词。当时国内对“漂绿”的理解还是主要遵循市场逻辑,将漂绿定义为“公司为了经济效益,扭曲或夸大其产品的环境效益的行为。”<sup>[5]</sup>从2009到2017年,《南方周末》公布年度企业漂绿行为排行榜9次,所涉企业均触及到法律底线。随着《南方周末》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内“漂绿”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漂绿”不再只是一种市场行为,更是在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极低的漂绿代价驱使下的企业越轨行为。有学者注意到信息披露的滞后性

---

\*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XXXXXX”(06CSH008)的资助。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耿车模式的绿色转型”(19SHA002)。

[作者简介]汪璇(1994-),女,安徽马鞍山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与企业收益的关联<sup>[6]</sup>，即企业可利用信息披露的时间空隙获利；还有学者注意到了“绿色”与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的关联<sup>[7]</sup>。除此之外，“漂绿”尚没有得到学界更加深入的关注。

在中国本土语境下，“漂绿”作为一种虚假宣传，不仅容易误导消费者、影响市场秩序，还与环境破坏、健康威胁、社会不公平挂钩。在《南方周末》年度企业漂绿行为排行榜中，此类案例不胜枚举。例如以 GL 电器为首的八家知名企业为骗取国家节能惠民政策补贴，多报、虚报节能销量；又如 WLM 公司一直宣传节能环保、绿色供应链，却在 2009 年监测的 40 个样品中被发现含有 50 余种农药残留；再如 SH 集团，自称要打造中国的“绿色煤都”，却在内蒙古草原开采煤矿和兴建化工企业，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下降。随着政府的持续介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部分企业有所收敛，但仍有企业寻找政策模糊地带、采取更为隐蔽的“漂绿”策略。吊诡的是，在环境立法不断严苛、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企业“漂绿”行为仍然得以存续。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漂绿”不仅是单个企业行为而且还是在国家——市场框架下，与政府、民众、媒体之间互动、博弈、甚至合谋的社会过程，不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某个动作，而是在不断的互动之中不断调适的整个过程。其中各主体的行为选择与逻辑值得社会学界关注。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基于华东地区丹村 M 牧场的“漂绿”行为展开研究。M 牧场曾上榜《南方周末》企业漂绿排行榜候选名单，至今仍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其漂绿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2006 年 M 牧场入驻丹村，使丹村成功脱贫，却也给丹村带来了沼液污染的环境风险。2008 年的一场特大暴雨使隐蔽的沼液乱排行为暴露于人前。随着村民的一系列努力，丹村沼液污染的事实一方面借助媒体为外界所知，另一方面随着牧场被勒令整改而有所缓解。此后，从政府文件上看，M 牧场在沼液处理技术升级、周边环境改善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官方检测数据基本达标，丹村村民的相关反映事件数量趋近于零。从新闻报道上来看，M 牧场积极改进沼液处理设备，不断提升沼液处理效率，积极促进沼液还田。可以说环境整治较为成功，污染问题也已得到解决。然而，经过追踪调查，发现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存在且继续严峻。为何文本事实与实际事实截然相反？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如何？探寻以上问题背后的社会机理，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目的。

##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思路

由于“漂绿”研究有限，所以从社会学经典研究中汲取营养。环境社会学研究倾向于从建构论的角度，在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隐形机制研究之中探寻其中的影响因子和深层蕴含。

### 1. 环境问题的呈现与“问题化”

环境问题的呈现，即环境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呈现在公众眼前的过程，也即环境问题的“问题化”结果，是国内外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尤其强调环境问题呈现过程中的互构性，例如佩罗等将环境不公平问题的形成过程视为“多方行动者在一定政治经济框架中，为争夺有价值的环境资源而互动的动态演变过程”<sup>[8]</sup>；陈涛、吴丽在分析蓬莱 19-3 溢油事件的问题化机制时，也着重阐述了政府、科学家、大众传媒、社会公众和渔民等多种社会力量的角逐过程。<sup>[9]</sup>此外，从某一主体角度出发探讨环境问题呈现的关键因素亦是研究主流。伯格和卢克曼<sup>[10]</sup>关注主体对世界的理解、解释与日常知识、生活经验的动态关联以及主体之间关系的极高灵活度。我国学界对环境问题呈现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陈阿江认为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环境治理的前提条件，而技术是清晰呈现污染问题的有效工具。<sup>[11]</sup><sup>[143]</sup>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更多将“问题化”视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武器和抗争“造势”的工具。<sup>[12]</sup>韦长伟将“问

问题化”逻辑的目标呈现划分为三级：合法化建构、获取社会支持、试探性施压，总结了“问题化”的三种策略：说、闹、缠。<sup>[13]</sup>

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明确界定了利益相关者的边界，尤其关注各行动主体的互动策略对环境问题走向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正向建构”的色彩。目前关于漂绿的研究多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采取企业—其他主体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因此多主体视角的分析方法对于企业“漂绿”实践研究具有启发性。

## 2. 环境问题的“隐形”与“去问题化”

环境问题的“隐形”机制，作为呈现机制的另一面阐述，意在探寻环境问题得以“去问题化”背后的社会机理。在理想状态下，当环境污染发生时，环境问题遵循“环境污染—社会影响—社会反应—社会问题”的逻辑成为社会问题。但在现实过程中，环境问题所涉主体间的竞争、冲突、顺应与合作的不断演化决定了环境问题的最终走向。环境问题为何走向“隐形”？“受益圈/受苦圈”理论较早地关注到污染所涉群体的受益、受害程度对其针对污染问题的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动力的影响。<sup>[14]</sup>陈燕从汉尼根环境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将影响因子归结为：缺乏科学权威的支持、媒体的舆论宣传、可见的经济刺激、科学普及者、制度化赞助者等因素<sup>[15]</sup>。

“去问题化”是使环境问题走向隐形的工具。包士康等人在2011年首次提及“去问题化”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当某种社会现象虽然具备了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社会现象没有被公众，尤其是没有被政府或权威机构认定为社会问题，而试图采用政治的或经济的手段来应对的过程”。<sup>[16]</sup>崔凤、秦佳荔关注技术、政策之外的社会不同层面的联结对污染问题隐形化的影响，归纳了隐形环境问题的特点：污染源头是不值钱的小企业、影响效果有限、没有大规模的群众事件发生等。<sup>[17]</sup>陈阿江关注“显性问题隐性化”的现象，以联席会议机制为代表的环境治理策略，使显性环境问题变为隐性环境问题，即使污染看似得到解决，但实质上仍然存在。<sup>[18]</sup>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去问题化”这一概念使用率不高，但在许多研究中已经有所涉及。例如在农村环境整治过程中，为完成上级政府的检查任务，基层倾向于有针对性地选择易于体现目标效益的非技术性治理模式，例如刷墙、办宣传栏等。<sup>[19]</sup>张继焦在老字号研究中提及了我国政府与企业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sup>[20]</sup>，对于理解在环保督察政治背景中，地方政府在完成整治指标与保护地方支柱企业之间斡旋、承担“保护伞”角色、掩盖支柱企业污染事实的行为具有启发意义。李彩虹、程鹏立在北坝村调查中发现村干部在积极问题化、获得抗争胜利后，因为地方政府施压、本村青年婚姻问题等原因，转而有意识地为村庄“去污名化”<sup>[21]</sup>以抵消“问题化”了的环境污染给村庄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说，“去问题化”策略研究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缺乏以企业为主体、讨论企业与其他主体互动逻辑的动态研究理路。

## 3. 企业“漂绿”与公众污染感知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问题化”是普通群众利益表达的工具，“去问题化”则多涉及政府层面。“去问题化”作为一种处理策略，不仅适用于政府，同样适用于企业，且极具社会学意味，可以解释企业漂绿行为与污染隐形之间的关联。且企业作为建构主义视角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一直没有被作为研究重点，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观察污染的“去问题化”逻辑与过程具有创新性。

陈阿江提出了环境问题呈现的三个维度：（1）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2）技术测量所呈现的状态；（3）社会感知的状态。<sup>[11][142]</sup>公众的污染感知是判定污染问题走向“呈现”还是“隐形”的主要指标，将其划分为两个维度：技术感知和社会感知。首先，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无法完全体现，而科学的技术

测量可以最大程度地反映物质世界的客观状态。在技术壁垒下，公众只能依靠官方数据感知污染程度。在官方数据显示污染程度低的时候，在无法身临其境或难以直接感知受污染环境的前提下，公众易直接相信该污染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次，社会感知即公众对于污染问题的关注和认识，是污染问题是否能成为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可以细分为社会影响（包括范围和程度）、当地群众反应两个指标。在环境抗争研究中，“把事情闹大”的行动策略是受污染群体利益表达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是提升公众对污染问题的感知程度、将环境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层面，以期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公众的污染感知是企业“漂绿”策略的直接靶向。而企业的漂绿策略如何作用于公众污染感知，从目前来看，仍处于黑箱之中。企业种类多样，业务类别繁多，只能尝试借助于建构论，通过剖析某一典型案例，来一窥企业漂绿的实践策略及其逻辑。本文运用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对 M 牧场漂绿行为分析，探寻背后各主体行为的运作逻辑，揭示企业漂绿行为何以被选择、何以能够存续的社会机理。

## 二、“依附”政府：“政经一体化”下的环境指标合理化策略

### 1. M 牧场及其沼液污染

2006 年，M 牧场作为某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配套牧场落户 AS 市贫困村丹村，是我国第一个万头规模的奶牛养殖基地。M 牧场虽然作为原奶供应基地，不需缴纳任何税款，但其配套的大型乳企却是马市财政收入的支柱型产业。为配合 M 牧场落地，市政府提供了投资补贴、免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无偿提供千亩建设用地等优惠政策，最终 M 牧场仅直接投资 4000 万元。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前，我国“散户养殖+奶站收购”的模式较为普遍，事件爆发后，我国鼓励乳企自建牧场、挤压散户养殖生存空间。M 牧场的规模化养殖模式虽然自成立伊始就因为其本身可能带来的防疫风险和污染风险而为专家、媒体诟病，但在当时似乎成为保证乳品安全的最佳选择。因而其他乳企纷纷效仿，开始自建牧场。此外，M 牧场给丹村提供了一百多个就业岗位，帮助丹村完善基础设施、很快实现脱贫。

巨量沼液的处理问题是以 M 牧场为代表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基地的痛点所在。首先，沼液生产速度极快、“产量”极大。2006 年，M 牧场的存栏量为 7500 头左右，平均每日排泄牛尿 180 吨、牛粪 375 吨。其次，沼液的消费速度极低。原因有三，第一，沼渣沼液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进行稀释才可以使用；第二，沼液作为肥料的施用量极低，且使用具有季节性；第三，沼液在丹村没有市场，村民没有将沼液作为肥料的习惯、也不愿意出钱购买，更倾向于使用农家肥。最后，在土地配比不够的情况下，无法单纯依靠还田的方式消纳沼液。根据 2018 年 1 月 22 日农业部公布的《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10000 头存栏奶牛牧场的粪肥全部就地利用所需水稻田（亩）面积多达 11363.63 亩。M 牧场占地仅仅 1000 亩。为此，牧场采取了扩建露天化粪池的措施。专业技术壁垒使村民即使察觉、意识到巨量沼液给村庄带来的环境风险，也没有证据，只是反映“牛粪太臭了、影响生活”。在 2008 年，一场暴雨暴露了 M 牧场偷建化粪池以存储沼液的污染行为，使污染显露。在当地村民的利益表达行动下，地方政府约谈 M 牧场负责人，要求牧场做出整改。

### 2. 合理化环保指标遮蔽污染实情

从相关政府文件中似乎可以得出 M 牧场沼液污染问题正在得到积极解决，且效果良好。首先，从已有文件通知上，可以获得的信息是，当地政府一直在规范企业污染行为。近年来，区人民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切实履行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整改措施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快沼液环境污染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同时区农业部门也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循环农业项目实

施进度的函》、《关于落实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专家指导意见的函》，市农业部门也下发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M 牧场沼液还田有关事项的通知》。在 2017 年，区农委负责牵头划定该区的禁养区、可养区、限养区。对禁养区内所有的禽畜养殖户和限养区内的部分禽畜养殖户依法限期关闭、搬迁、取缔或转产，并对养殖专业户的养殖规模进行了严格规定。在此背景下，M 牧场所在地被划为整个区内唯一的可养区。其次，基层环保部门设立了对 M 牧场的专用检测台账、聘请专家做环境评估。从台账上看，M 牧场周边地区各项指标均达标，也即 M 牧场周边环境指标均达到了规定标准。

图 1 显示的是市生态环境局自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 月对 M 牧场周边某雨水排出口水质的监测数据。官方公布的指标有二：氨氮和化学需氧量。从图中可以看出，除 2017 年 4 月检测出的化学需氧量高于标准线，在其他时间段监测出的数据均远在标准线以下，而 2016 年 10 月以前、2019 年 8 月以后数据未公布。数据尚存其他疑点。首先，每次测量的雨水排出口的位置未显示，且测量时间均为午夜 12 点，测出的数据是否可以代表当地的沼液污染情况？其次，氨氮和化学需氧量两个指标是否足够呈现？此外，也尚无对 2017 年 4 月化学需氧量超标的情况做出解释。在 2018 年环保督察小组巡查时发现，M 牧场用暗管将约 1 万立方米沼液排入废弃沟塘贮存，仍然存在严重的偷排行为。2019 年 5 月，官方聘请专家现场勘察、对存在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但一直没有公布评估结果。未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无法对官方检测数据做出判断，强调官方行动、忽略行动后果事实的行为，降低了公众的技术感知度，极易遮蔽污染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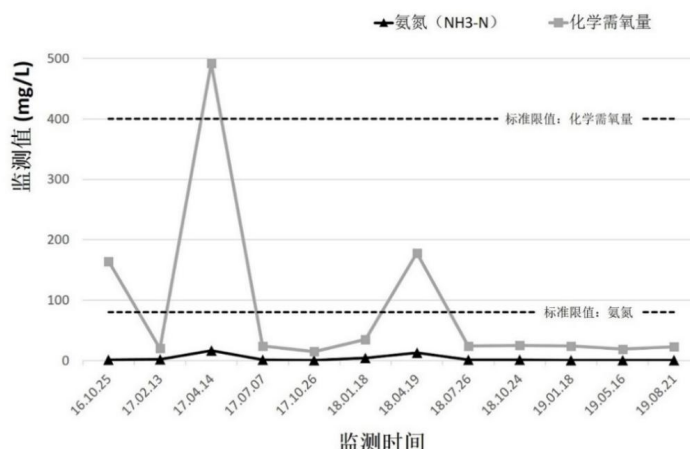


图 1 2016-2019 市环保局对 M 牧场监测数据

### 3. 环境整治背景下的“政经同盟”

政府—企业的同盟关系是企业“合理化环保指标”漂绿策略得以成功的内在逻辑。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权力授权于上级政府，上级的战略定位对基层政府的行为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基层政府在业绩考核、升迁的发展压力下，与当地企业达成同盟关系。张玉林在 2006 年就发现，在整个体制开始重视环境维度的时候，基层政府环境治理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并总结了基层政府行为的第二层压力——生存压力。<sup>[22]</sup>即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剩余的支撑消失，政府得以维持和运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主要来自于工商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对于基层政府来说，环保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sup>[23]</sup>，在环境压力不甚明显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

保经济。目前我国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将其作为政府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环境”与官员的业绩、升迁直接达成正向关系。按照“政绩跑步机”<sup>[24]</sup>理论,在政绩考核的激励作用下,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对污染企业进行严格管理、解决污染企业常年积累的环境负债。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仍然为污染企业提供“伞式保护”。

为何在环境维度提升到战略地位的过程中,部分污染企业的“漂绿”行为不仅持续存在,还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首先,在业绩、税收、就业等正向刺激以外,笔者发现,污染企业的性质也是一大因素。类似于M牧场的大型污染企业,带来的污染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在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考核的压力下、在公众要求尽快看到治理效果、在还没有找到解决污染问题的有效办法时,地方政府倾向于暂时遮蔽污染问题。在人为操作之下,地方官员的环境责任考核逐渐流于形式。官方的遮蔽倾向给予污染企业自我绿色宣传的“底气”。

在技术壁垒下,上级政府和民众无法自己检测环境质量,因此,将官方的环保监测数据作为衡量企业污染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合理的监测数据不仅显示出政府良好的环境治理效果还印证企业“绿色生产”的“真实性”。留痕化、数字化的治理技术普遍应于政府管理过程中,在官方暂时没有找到治理的最佳路径、给污染企业定性“绿色企业”以后,会产生反向适配效应,即要求基层工作脱离实际、满足技术要求、沦为形式主义。污染企业在公关过程中较多使用政府监测数据,增加自身的可信服力。因此,政经同盟下的监测数据合理化策略不仅是政府的暂时遮蔽策略,更是污染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内容。

### 三、“巧用”媒体:市场驱动下的绿色宣传策略

在市场逻辑驱动下,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塑造符合公众期待的社会形象。污染事件距离公众生活世界较远,因此,完全不在场的公众一方面其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下,倾向于相信接收频率较高的信息;此外,公众尚缺乏足够的环境关心。利用媒体宣传企业形象、规避企业污染责任,是企业印象管理的重要策略。M牧场积极宣传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尽量避开沼液污染的问题,并将“主动污染者”形象巧妙地转化为“被动污染者”。传播学将这种为了操纵受众对特定事物认知,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又有有意忽视其他内容的行为称为“洗牌作弊法”<sup>[25]</sup>。

首先,采取积极的正面宣传策略。目前在搜狐等媒体上可以搜到的标题有《央视聚焦M牧场,实地探索牧场废弃资源循环利用奥秘》、《M牧场洪雅牧场养殖业反哺种植业树循环经济典范》《奶业脊梁、引领未来》等正面报道的文章。其中,对扩建“全国最先进的沼液处理和循环利用系统”的报道尤为突出。沼液处理和循环利用系统具体处理方式如下:自动清粪系统刮粪机将生粪清入沼气池,经稀释,投入反应罐,加入菌种发酵,产生沼气、沼液及沼渣。其中,沼气经管道运输供厂内发电机房发电、锅炉房供暖及焚烧炉焚烧死牛。牧场统计,沼气池每日产气量在14000-15000m<sup>3</sup>之间,基本可供厂内正常运作。沼液脱渣后,部分进入回冲池供清理牛舍使用,部分由外包车装载运出灌溉农田。沼渣继续发酵,达标后用于卧床。从宣传来看,这是一个绿色、无污染的处理系统,如果沼液的处理率和成果利用率均达100%,是不可能对周边产生污染的。而在实际运作中,M牧场在多地随意倾倒废液,被指严重污染环境和危及取水安全。M牧场的在公众面前宣传严格的环保处理措施、暗地里大大放松沼液处理力度的行为,被《南方周末》总结为“前松后紧”。

其次,转移污染责任。具体分为三个部分:(1)强调在降低污染方面所作的努力,将无污染操作化为“相对无污染”:“这么大的牧场,产生巨量牛粪是很正常的……我们牧场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沼

液处理设备……沼液处理对于任何一个大型的乳品企业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所说的无污染是相对的概念，我们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沼液污染，不断扩建沼气循环处理设备，也成立了环保中心，招聘研究生、本科生专门负责难题攻关。”（访谈编号：MC20151102, 牧场公关人员）（2）把污染责任推卸给当地民众。一是由于村民一直拒绝流转土地以种植牧草，导致沼液无法及时消纳。M 牧场自建立伊始就设计了“牧草种植—奶牛养殖—原奶加工”的绿色经营模式。牧场周边气候温暖湿润，土质疏松、排水良好、肥沃湿润，非常适合种植麦冬、苜蓿等牧草，缺点是多为梯田，土地零散。二是将沼液任务外包给村民。“自 2016 年起，我们就将沼液处理的任务全权交给合作社了。我们给他们承包费用，他们帮我们处理……签订合同时把沼液的处理方式都沟通清楚了，如果沼液处理方式不当，村民举报的话，我们会对合作社提出罚款。”（访谈编号：MC20151102, 牧场公关人员）（3）把污染责任推卸给政府。“05 年到现在 12 年了，牧场也急啊，几个老总找镇政府、区政府，政府说好，我们来流转，光喊口号不行动。老百姓就不把地给你，你能打他骂他嘛？牧场也没信心了。”（访谈编号：DC20151102, 丹村村主任）总之，牧场塑造了致力于升级沼液处理设备，但囿于一些客观因素不得不制造污染的“无辜”形象。

#### 四、分化群众：经济利益诱惑下的安抚策略

##### 1. 逐步分化利益表达群体

经过实地调查，发现牧场采取的分化村庄群体的策略直接导致丹村沼液污染消失于公众眼前。具体分为三个策略。具体框架见图 2。

首先，通过经济诱惑模糊村民环保目标。丹村赌博风气严重，尤其流行“炸金花”。从事农业获得的收入微薄，无法支撑赌博所需。在镇上工作工资相对较高，且工作地点离家近，因此村民逐渐放弃传统的农耕，闲置了大片的良田和池塘。“家里的田荒在这个地方没用……然后他打个热线，讲我家需要几车子牛粪……一车子牛粪是给 30 块钱。”（访谈编号：DC20151102, 丹村村主任）对村民来说，顺应天时施肥浇水本应是最普通的常识。为了换取赌资，村民甚至仿照种植庄稼的轮作制，采取了沼液排放轮作制，即将田地划分成几小块，轮流装载沼液。数不清的小块良田因为直接装载沼液而失去培育能力、成为废田。村民最后干脆将废田完全视为天然化粪池，放弃传统的环境伦理规范，变保护者为污染者，在环境污染中获益。

其次，通过外包沼液让村民参与进来。如前所述，牧场改变了沼液处理方式，不再采用露天沼液池堆放的方式，而是将沼液处理任务外包给当地村民组成的合作社，将污染的责任转移到村民内部。合作社成员长期背负村民指摘，加上村民对沼液是否倾倒在自家门前的特别关注，沼液处理越来越困难。于是 2017 年合作社将沼液处理任务二次承包给村民。“来保是我家远房亲戚，他和几个人把村子后面大坝里的水抽干，腾地方装沼液，不信你去看看……原来是无业游民，没有工作，天天闲在家里，田也懒得种，现在把这个当作职业来做……应该没有人举报，是亲戚，不好说，我们就在背后讲讲。”（访谈编号：DC20170216, 普通村民）村庄内纵横交错的熟人网络削弱了村民的抗争意愿。

最后，鼓励附近村民搬迁。为了减少受污染影响的村民数量，牧场积极鼓励周边村民搬迁。“按人口计算，一个人头补贴四十平方……安置房（两个多亿），环境、质量都很好的……一家五口人总共补贴 200 个平方，如果拿两个中套还可以赚一点。牧场在里面也给了钱。”（访谈编号：DC20151102, 丹村村主任）生态环境保护局在官网上公布了截至目前，M 牧场对周边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全部实施

搬迁的消息。搬迁一方面使村民远离之前的生活环境，自身污染感知度下降，另一方面从根本上瓦解了抗争力量，削弱了公众污染感知的可能性。加上在村庄空心化趋势下，农村精英流出，激进的利益表达者进入城市，村庄利益表达群体力量失衡。从村庄出警记录来看，村民与牧场的环境冲突基本没有，大大减弱了企业污染的社会影响度。村庄目前常住人口大约占全体村民的 5%，其中以 60 岁以上老人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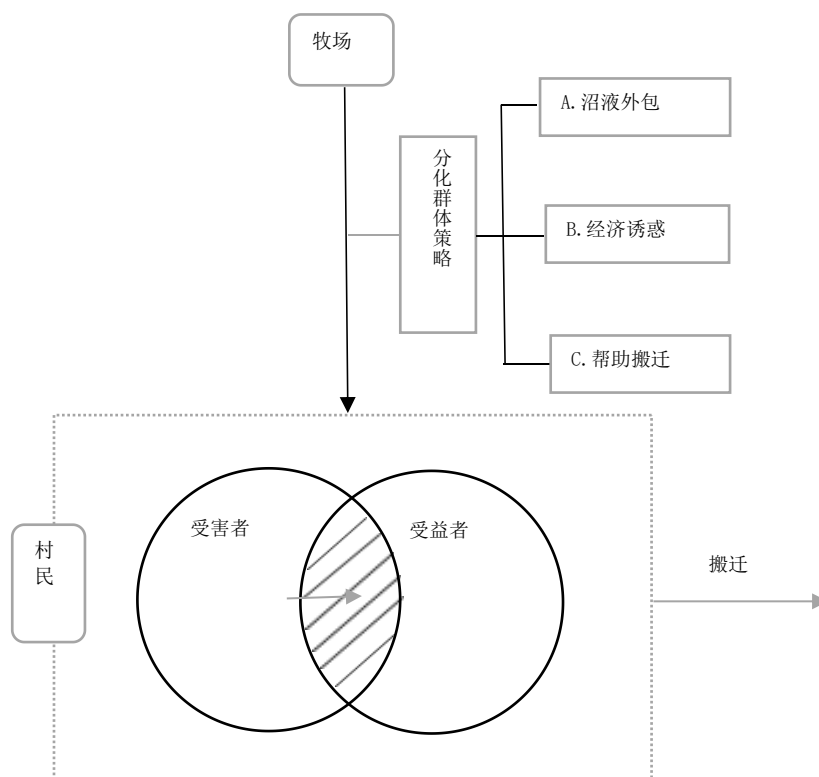


图 2 M 牧场分化当地村民群体的实践框架

## 2. 受益、受害圈边界的模糊削弱利益表达的力度

以往的环境抗争研究多将地方政府与企业视为利益共同体、将当地民众归纳为环境决策的局外人和污染受害者。以上将所涉群体完全割裂开来的互动论倾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环境抗争的主体是受害者，从道德视角来观察这种群体性事件，极易单一地将污染地的居民视为被动的受害者。然而，当地民众一定是被动的环境受害者吗？此外，很多学者观察到了环境抗争目标的短视性。从长远视角来看，当地民众抗争的最终归宿只是获得经济补偿，将污染企业搬离污染地的概率极低。为何环境抗争具有不彻底性？从受害群体的角度出发，环境社会学界对环境抗争的动力因素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例如冯仕政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网络疏通能力因素<sup>[26]</sup>、黄家亮的社会文化因素<sup>[27]</sup>等等。张玉林明确提出在环境冲突中，农民与“企业+政府”力量具有强烈的非对称性<sup>[28]</sup>。其实，受害群体内部并不完全一致。且这种不一致性和内部小群体之间的非对称性是造成环境抗争不彻底性的重要因素，值得关注。船桥晴俊的“受益圈/受苦圈”理论看到了受害与受益群体重叠下，抗争目标模糊的可能性。笔者认为，通过利益诱惑最大程度地扩大受害与受益群体的重叠度，使利益群体力量失衡，是“漂绿”策略中最重要的一环。

村民环境伦理规范对其环境行为具有指导性意义。在世代口口相传下来的环境伦理规范指导下，村民不仅自觉采取环境友好行为，还具有保卫村庄环境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此外，村庄环境的变化可对当地村民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虽然污染有时候不会立马被察觉，但村民利用生活常识可以对污染行为的可能后果做出预设，并在污染显露后，及时做出反应、采取保卫措施。农村的本土知识逐渐让位于外来知识、外界力量在农村取得越来越强的支配权力，使农民最终失去抵御污染转移的能力，是污染从城市转移至农村的根源。<sup>[29]</sup>让村民抛弃传统的环境伦理规范，甚至主动参与到污染过程中来，是瓦解村民环境保护行为的重要步骤。

## 五、结论与讨论

国内环境社会学界一般将“问题化”视为污染群体层面利益表达的工具、“去问题化”视为政府层面的环境治理逻辑。其实，“去问题化”同样适用于企业，且企业污染的“去问题化”研究是环境问题“去问题化”的重要补充，关注企业的漂绿策略及其背后的社会逻辑，有助于理解在环境整治背景下，企业污染走向隐性化、仍然得以存续之原因。

污染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并不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从互动论的角度出发，M牧场的漂绿策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合理化环保指标，即与当地政府达成“同盟关系”，在政府的“伞式保护”下，将环保指标操作化达标；（2）整饰形象，即通过媒体正面报道，塑造绿色企业形象；（3）分化利益群体，即通过利益诱惑，分化利益表达群体、模糊受益者与受害者群体界线与表达目标，缩小企业污染的社会影响度。具体实践路径框架见图3。技术壁垒下的公众了解污染解决程度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二：政府公开的信息和媒体公开的信息。首先，在生存压力、发展压力以及环境督察直接施加的压力下，在任期短和污染解决长效性的对比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不完全公布官方检测数据等信息，达到遮蔽污染问题的效果。其次，媒体信息对公众环境评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企业一方面购买媒体服务积极宣传正面信息、隐瞒/否认负面信息，另一方面利用绿色公关，采用转移污染责任、开“空头支票”等策略挽回企业声誉。此外，群体内部不对称性和内部利益不完全一致性对抗争目标产生影响。通过利益诱惑分化受害群体，化敌为友，化保护者为污染者，是企业“去问题化”的重要步骤。利益群体力量的失衡直接导致该事件社会影响力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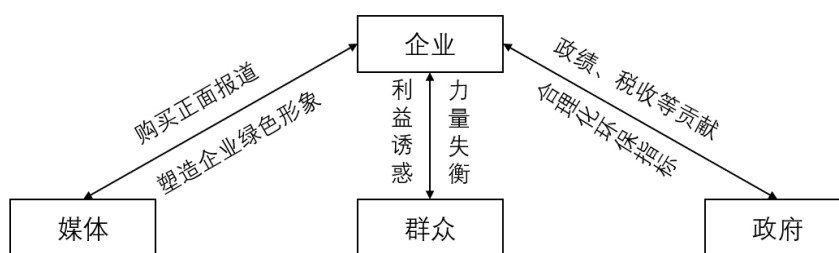


图3 企业污染“去问题化”的实践路径框架

乡村企业污染问题能够成功“去问题化”的原因有三。首先，在村庄空心化趋势下，留守村庄均为老年人、身体有缺陷者和幼龄孩童，丹村留守人口不到村庄总人口5%，将污染“问题化”的村庄精英的流出已成必然。其次是污染企业产品的特殊性。以M牧场为例，牛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商品，不仅关系国民健康，还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规模化养殖是时代趋势，加上原奶容易变质，牧场必须建在加工



厂附近，因此不可能因为存在沼液污染就将其关停。最后，是技术的限制性带来了社会包容。技术的突破与漂绿行为之间具有负相关性。<sup>[30]</sup>技术一般被认为是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技术的升级具有滞后性，因此社会对技术性解决污染问题的手段持有一定的宽容度。牧场利用了这一社会心理，积极宣传内部处理设施的绿色化，获得了公众的好感。

环境治理宜疏不宜堵。相对于解决问题，掩盖问题似乎更加容易，但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污染企业“漂绿”具有系统性特征，环境治理也必须秉持系统性思维，即不能仅仅依靠或者拔除某一角色的力量，而是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的共同努力。了解企业的漂绿逻辑有助于寻找企业污染问题的解决路径。以下以M牧场为例。首先是政府层面。上级政府要根据污染性质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因地制宜、分时间段设立整治目标。地方政府要克服环境治理形式主义化给工作上带来的便捷感，从源头解决问题。例如，对于计算科学的配给土地亩数并积极流转以及及时消纳沼液；根据目前还田亩数控制牧场存栏量；公开、公正地监测牧场周边环境动态；严惩村庄内乱排沼液的污染行为。其次是企业层面。企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增加技术升级力度，提升沼液的自处理度；安抚村民敌对情绪，帮助受影响村民搬迁；积极流转土地，种植消纳沼液率高的牧草。最后是村民层面。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雇佣村民监督沼液处理行为、鼓励运用长期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积累的贴合实际的生态知识。企业污染的“遮蔽”是在政府、企业、村民等主体多方互动的结果，环境问题的“去蔽”同样需要多方主体的合作与努力。

#### 参考文献：

- [1]包先康,朱士群,2011,《非社会问题化与社会政策遮蔽》,《晋阳学刊》第4期。
- [2]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15,《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陈阿江,2019,《环境污染如何转化为社会问题》,《探索与争鸣》第8期。
- [4]陈阿江,2015,《技术手段如何拓展环境社会学研究》,《探索与争鸣》第11期。
- [5]陈涛,李素霞,2015,《“造势”与“控势”: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6]陈涛,吴丽,2014,《蓬莱19-3溢油事件的“问题化”机制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7]陈燕,2010,《有限的环境抗争——从环境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法制与社会》第31期。
- [8] Chen, Y., Chang, C. *Greenwash and Green Trust: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Green Consumer Confusion and Green Perceived Risk*. *J Bus Ethics* 114, 2013 ,pp.489-500.
- [9]船橋晴俊,長谷川公一,畠中宗一,勝田晴美,1985,《新幹線公害——高速文明の社會問題》,東京:有斐閣株式会社。
- [10] Parguel, B., Benoît-Moreau, F., & Larceneux, F. *How sustainability ratings might deter 'greenwashing': A closer look at ethical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102(1), pp.15-28.
- [11]David N. Pellow, Adam Weinberg, Allan Schnaiberg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Equitable Allocati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utcomes*.*Social Justice Research*,

vol.14,no.3,2001, pp.423-439.

- [12]冯仕政, 2007, 《沉默的大多数: 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 [13] Laufer, W. S. *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corporate greenwash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43(3),pp.253-261.
- [14]黄溶冰, 陈伟, 王凯慧, 2019, 《外部融资需求、印象管理与企业漂绿》,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 [15]黄家亮, 2008,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 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南P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 《中国乡村研究》第10期。
- [16]刘传红, 2015, 《“漂绿广告”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与认定标准》, 《宜宾学院学报》第9期。
- [17]陈阿江, 程鹏立, 罗亚娟等, 2013, 《“癌症村”调查》,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8]罗亚娟, 2016, 《乡村工业污染的演绎与阐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Lyon, T. P., & Maxwell, J. *Greenwash: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under threat of audit.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1(3), pp. 3-41.
- [20] Parguel, B., Benoit-Moreau, F., & Larceneux, F. *How sustainability ratings might deter 'greenwashing': A closer look at ethical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102(1), pp.15-28.
- [21]秦旭画, 2009, 《食品也要够“友好”》, 《环境》第9期。
- [22]任克强, 2017, 《政绩跑步机: 关于环境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
- [23]唐国建, 王辰光, 2019, 《回归生活: 农村环境整治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实现路径——以陕西Z镇5个村庄为例》,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24]王晓毅, 2010, 《沦为附庸的乡村与环境恶化》, 《学海》第2期。
- [25]王积龙, 刘传红, 2013, 《环保类虚假广告的破解与治理研究》, 《新闻大学》第1期。
- [26]韦长伟, 2011, 《“问题化”逻辑: 弱势群体抗争行动的一种解释》, 《理论与改革》第5期。
- [27]杨波, 2012, 《环境承诺为什么演变为漂绿: 基于企业绿色过程模型的解释》, 《管理现代化》第4期。
- [28]张玉林, 2006,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 《探索与争鸣》第5期。
- [29]张继焦, 2014, 《“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 《思想战线》第4期。

☆ 作者简介: 汪璇,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9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吴晓彤

# 垃圾分类试点的社区参与分化与政府主导定位\*

——基于BN市的实证分析

秦祥瑞 沈毅

---

**摘要:** 作为一种激发居民自主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基本目标,社区参与已被广泛运用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当下的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为分析社区参与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联提供了较好的切入点。本文选取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BN市为考察对象,提出社区参与分化的4种“理想类型”:弱邻里网络—弱社会组织型、强邻里网络—弱社会组织型、弱邻里网络—强社会组织型和强邻里网络—强社会组织型,并对其中的政府主导性强度及垃圾分类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相较于居委会和环保组织,邻里网络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始终有限,以社区参与分化为基础的“自愿激励”模式在贯彻环保政策之中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从而解释了何以上海等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开始向“政府主导”模式转变。

**关键词:**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 高意愿低行为 利益相关者理论 影响因素

---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矛盾在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重要转变。当前,全体人民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朱力,2019)。城市化进程促使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环保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过1.5亿吨,并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全国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垃圾分类效率低及其治理难题始终存在着社会、经济及体制方面的原因(杨雪峰等,2019)。目前,以垃圾分类的社区参与作为环境治理实践的“去问题化”策略,旨在于解决社会显现度较高的环境问题时,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陈阿江,2016)。由于垃圾分类实施效果已成为衡量政府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且垃圾分类过程将基层政府、居委会、环保组织、居民等利益相关方置于统一的互动框架内,故深入剖析社区参与及政府定位议题兼具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 一、生活垃圾分类:社区参与中环境议题的凸显

社区参与是指居民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过程,作为一种积极的实践形态,现已被广泛运用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实际上长期困扰着我国的理论和实务界(沈毅,2009;周亚越等,2019),新世纪涌现的研究大多将社区参与置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框架内,往往认为社区参与虽然不是个体的非组织行为,其实际运行离不开地方政府、街道、居委会、环保组织的协调,但居民参与意愿的高低始终是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由此,既有研究主要运用定量分析工具,考察性别、收入、文化程度等要素对于社区参与的影响,或考察老年人、青年务工人员、农业转移人口等特定群体的参与意愿。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个体化’进程研究”(项目号:15BSH001)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拆迁政策变迁中的基层社区治理研究”(项目号:KYCX20\_041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已刊发于《学海》2020年第6期。

环境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成为社区治理及社区参与关注的话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各类环境风险事件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已进入高发期，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体变质等最终都转化为社会风险(王芳，2016)。尽管有些环境问题发端于科学领域，但是，大多数环境问题的发现离不开普通公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深入体验与细致观察(约翰·汉尼根，2009:72)。纵观环境社会学发展，其呈现从“问题论”向“综合论”、从认识问题向解决问题演进的态势(陈阿江，2015)，城市居民垃圾治理面对数量庞大的民众(陈蒙，2018)，是消费嵌入个体和大众日常生活的必然结果(杨筑慧，2020)。将全面绩效管理思维引入垃圾分类治理，有助于改善垃圾分类的低绩效问题(尚虎平等，2020)，政社合作构成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路径(谭爽，2019)。同时，在某些单位改制小区，单位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也越高，单位与社区两者之间常常并非构成相互替代的关系(李黎明等，2016)。由此，“单位人”能够主动服从单位提出的垃圾分类目标并积极参与分类行动(王泗通，2020)。总之，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就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已达成共识并“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为进一步考察垃圾分类的社区参与状况奠定了实证基础。社区参与虽被视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环节，但其内在运作机制有待挖掘，垃圾分类问题为分析环保政策执行中的政府与社区的关联议题提供了较好的切入点。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刘能，2019)。由此，为呈现社区参与分化的内在机制，本研究选取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BN市为考察对象。BN市作为东南沿海经济迅速发展的港口城市，生活垃圾已成为困扰其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任务非常繁重。鉴于此，BN市于2013年7月启动了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旨在逐步建立生活废弃物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从而实现源头减量及资源循环利用。根据BN市发布的实施方案，2014年至2017年是生活垃圾在全市的分类推广阶段，方案提出，“在全市范围内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基本完成分类设施体系建设，基本建立分类管理的组织领导与社会参与体系……”。自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笔者曾多次以调研者身份去实地走访，对市/区分类管理中心、街道、居委会、环保组织、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及社区居民等开展了多次访谈，其内在理路有助于理解当前垃圾分类治理趋于政府主导定位的基本依据。

## 二、社区参与分化的内在机制

从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出发，有研究将社区参与划分为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并指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问题而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杨敏，2007)。但是，按照社区参与内容分类属于描述性范畴，往往难以呈现居民自主性及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总结调研资料后发现，BN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框架以科层结构为基础，不同类型社区的社区参与分化则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 (一) 实施框架与科层结构

项目运作按纵向结构执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负责项目的统筹、协调；各街道办位于上传下达的中轴，承接区级分类管理中心分配的工作任务；社区居委会处于科层结构的基层，负责社区参与的

具体实施(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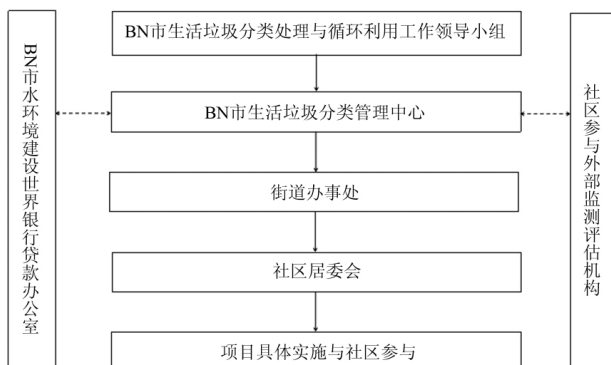


图1 BN市城镇生活废弃物“循环收集利用”项目的实施主体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文本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科层结构主要完成目标确立、职责划分和指标的传达与考核，BN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对各区政府和市级各部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考核工作(区分类管理中心职能以此类推)。街道对居委会各方面工作负有指导责任，负责下述人员的统一管理:(1)街道垃圾分类督导员、社区垃圾分类督导员、居委会负责人、网格长(兼职督导员);(2)小区物业经理、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3)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个人、家庭、社会组织。总之，上级政府或部门通过考核任务的层层分解，将参与空间释放至各居委会，实施主体主要包括以下各方(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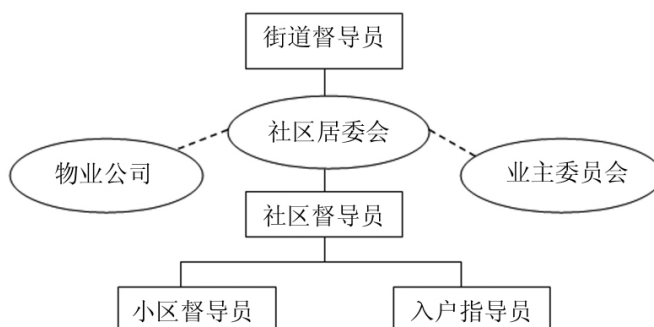


图2 垃圾分类的社区参与主体

由图 2 可见，居民委员会承担组织者角色，是垃圾分类社区参与的枢纽机构，也是负责协调各行动主体的基层自治组织。与之相对照，潜在社会资本特别是邻里网络往往影响了社区参与的进程与效果，各类型小区在垃圾分类实践中呈现出参与分化的状态。

### (二) 社区参与分化——以四类典型小区为例

伴随深刻的社会转型，城市社区参与及社区融合程度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有着重要影响(廖茂林，2020)。一方面，受社会网络特征影响，邻里网络构成了个体或家庭社会行动的主要背景；另一方面，自治性的居委会始终处于科层制行政末梢，其实际运行有赖于其组织基础和吸纳环保组织等社会组织资源的能力。据此，以“邻里网络”和“社会组织”的强弱作为两个分析维度，可以对各住宅小区进行“理想类型”划分：

### 1. 弱邻里网络—弱社会组织型

A 拆迁安置小区位于城郊边缘地带，辖区面积广大，所辖附近村庄集体拆迁约 900 户，40—50 岁年龄段居民较多，居民文化程度总体偏低，生活垃圾分类的社区参与形势较为严峻。青壮年日常忙于工作及家庭生活，社会网络虽仍具有“熟人社会”形态，但主要在家族、宗亲等事务上发挥作用，邻里网络在社区公共事务方面呈现为弱连带特征。另外，居委会组织结构单一，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面临人手不够、资金不足、居民难以协调等困难。当物业经理被问及垃圾分类工作时，他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0.68 元/袋这个政策实施后就没什么人愿意扫码了。之前都是每个月固定的 800 元，现在扫码三个月只有 100 元，之后天气热，很少能翻到可以扫码的垃圾袋了。小区督导员辞职后，当时面临街道检查的压力，就喊我老婆来做了一段时间。（物业经理访谈记录：20170712）

在“弱邻里网络—弱社会组织型”小区，居委会可资运用的组织资源有限，又欠缺环保组织的介入，勉强才能完成街道分配的基本任务，扫码工作甚至可能被迫停止。社区居民中大部分劳动力忙于家庭生计，多数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参与动力明显不足。

### 2. 强邻里网络—弱社会组织型

城市化步伐通常并不会呈现为单一、线性的发展进程，历史遗留因素，导致城市范围内仍旧保留了以单位改制小区为代表的老旧居民区。

B 小区位于老城区，2015 年 9 月开展垃圾分类，户数大概有 260 户，以军队离休干部和在职人员为主，住了很多老支部党员，都是熟人，以前在部队里熟人较多。基本上每幢楼的投放点都是固定的，退休阿姨一般下来散步也会劝导大家的，她们平时担任志愿者，不定时检查，发现不合适的会去劝导，在家里面也会引导家人一起分类。居民使用厨余垃圾袋在 B 小区还是可以的；（房屋）租出去的也没那么多，老住户还是比较好的。（居委会负责人访谈记录：20170706）

城市居民对环境治理成效的归因模式与其地方认同之间存在着交叉关系(李巽平等, 2019)。B 住宅小区较老旧，基础设施不佳，实践表明单位制虽已解体多年，但住户大部分仍可维持之前部队组织的单位化熟人关系，保持着较高的社区认同与关系联结。小区已退休且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口占多数，他们有充足闲暇时间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志愿意识较强。即使暂未引入环保组织进行系统性引导，居委会也仅是做了宣传动员的基本工作，强邻里网络特征仍促使生活垃圾分类的社区参与获得了些许成效。

### 3. 弱邻里网络—强社会组织型

C 小区房价高于市均价 40%，属新式住宅小区，绿化率较高。小区 2008 年交付使用，住户共有 485 户，年轻上班族占大部分，中老年人比例较低，居民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小区内部安保措施严格，一梯一户，人车分流，居民之间互动频率低。事实上，原先该小区居民的高文化素质与其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关联性不大，居民们及物业保洁员并未将垃圾分类纳入日常生活中，弱邻里网络也使得其动员能力明显不足。为保持整体绿化环境，内部物业管理模式也选择绕过垃圾分类直接完成垃圾收运。为配合政策执行中街道辖区的宣传、推广任务，居委会引进“社会组织+”模式，由 MRK 社会组织微行公益进驻 C 小区，全面托管垃圾分类工作。

是区城管局签的合作协议，是 BN 大学的义工团队，主要负责宣传推广、扫楼入户指导和开袋扫码

考核，2016年入驻C小区。之前主要进行氛围营造，差不多已完成，现在主要开展大型活动。社会组织要持续下去，(要求)他们的工作人员有一定专业素质，(这样)可以更有效率地指导这项工作，为社区和物业减轻管理压力，但是目前人员配备较少，想全部推行下去可能有点难度。(小区居民访谈记录:20170713)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如何切实发挥作用，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取决于情境性因素(邓燕华，2019)。弱邻里网络特征为政府推动环保社会组织的介入提供了合法空间，经过阶段性实践，C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氛围得以提升，使用分类垃圾袋的住户明显增多，小区督导员每天开袋数量保持在50袋左右，居委会和环保组织合力推动了分类效果的提升。由此，该住宅小区自2014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后，两次被评为生活垃圾分类“市级优秀小区”。

#### 4. 强邻里网络—强社会组织型

D小区属于商品房小区，共有1168户住户，其中购买商品房的住户大约占50%，包括部分拆迁安置住户。

前期培训做得挺多，居民骨干和党员做了很多培训。“垃圾去哪儿”的活动一共举办过三次，以往居委会的经验还在继续传承，一环紧扣一环，宣传、监督和劝导在不停地做。每个月的8号会有支部书记的例会，每个月15号有党员的会议，每个月10号有居民骨干的会议，一般有20多个居民参加。年底集中开会，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大家把日常问题反映上来，每个月20号还会有“为民服务”的活动。(社区负责人访谈记录:20170711)

D小区大部分住户家庭成员为正式上班族，人员相互间日常互动频率较低，因自身承担的社会角色与时间分配限制，其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行为表现为“强意愿”“弱行动”特征。但所在社区曾于2004年被授予省级示范居委会，相对其他类型的社区，此社区具有牢靠的组织基础和较强基层凝聚力。新上任的书记更具“个人权威”，带领居民开展一系列社区自治活动，发展出以骨干党员为强纽带的邻里督导队伍。另外，为弥补退休党员个人精力、软件操作等方面的劣势，2017年初引进了环保科技公司入驻环保驿站，组成集互联网+、智能化、自动化为一体的专业服务团队，重点解决源头分类问题，通过积分奖励等激励性举措，大范围促成居民从“强意愿”到“强行动”的转变，提升了示范效应，体现了“强邻里网络—强社会组织”型特征：

现在二次分拣工作比之前轻松了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在源头做好了分类工作。从黑色和绿色垃圾桶里的垃圾数量也可看出现现在的分类工作做得比较好，之前两种桶里的垃圾都是一样多的，环保组织介入后，绿色垃圾桶里的餐厨垃圾明显多了。(保洁员访谈记录:20160622)

按照“邻里网络”“社会组织”两个分析维度可将各类型小区划分为四个理想类型(参见表1)。具体到实际运作中，各利益相关者面临公共事务压力时的行动付出有较大差异，居委会常常依据具体情境自主选择可运用的社会组织条件及邻里网络状况开展基层创新实践。

表1 社区参与分化的理想类型

	弱社会组织	强社会组织
弱邻里网络	拆迁安置小区	新式住宅小区
强邻里网络	单位改制小区	推广示范小区

### （三）社区参与的整合与政府主导性比较

社区参与的整合包括自主整合和非自主整合，自主整合主要体现于基层社区相互间的模仿、沟通与借鉴学习，非自主整合主要通过科层体系中上层部门的监督和激励展开，通过督察机制的运作，行政资源被重组而能够相互协调，进而成为实现科层组织运动化的基础(陈家建，2015)。市分类管理中心运用后台监控技术实时读取各小区开袋数量和质量，作为社区考核、年度奖励发放的参考依据；另外，为限制并杜绝“扫空码”现象，定期配备人员现场抽查。其实，随着居民自治的推进，社区自组织居民参与方式已呈现出发展的生机(杨贵华，2009)，但在垃圾分类治理中，居民更多还是成为被治理的对象，科层体系的政府主导性常常发挥着关键作用(王诗宗等，2020)。依据居委会能力与环保组织是否介入这两个核心要素，可呈现出上述理想类型小区在政府主导性及其垃圾分类效果层面上的差异(参见表 2)。

表 2 各类型住宅小区社会组织及政府主导性之比较

住宅小区类型	居委会能力	环保组织	政府主导性	垃圾分类效果
拆迁安置小区 (A)	弱	未介入	↓ 弱  ↓ 强	↓ 较差  ↓ 较好
单位改制小区 (B)	中	未介入		
新式住宅小区 (C)	中	介入		
推广示范小区 (D)	强	介入		

在拆迁安置小区，邻里网络合作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居委会也呈现为弱组织状态，欠缺环保组织的介入，其政府主导性处于最低水平；单位改制小区的邻里网络具有特殊性，虽缺乏环保组织的介入，但居委会开展了基本的知识宣传等辅助工作，政府主导性较弱；在新式住宅小区，居民的教育水平与收入都较高，虽然其社会网络呈现出高流动性的“原子化”特征，但居委会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协作促进了社区参与水平的提升，体现了较强的政府主导性，促进了垃圾分类从“强意愿”向“强行为”的转变；在推广示范小区，依靠政府介入和居委会的组织领导，构建起了以退休党员为骨干的邻里监督网络和社会组织运营体系，证明社会组织完善程度及政府主导性水平越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效果越好。

### 三、“自愿激励”模式的局限

相对于邻里网络特征，居委会的较高能力和环保组织的介入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事实上居委会和环保组织等社会组织又是由于地方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而得以强化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示范效应最佳的 D 住宅小区，其较强的邻里网络也是得益于社区书记的领导及骨干党员干部的网络联结作用，这也揭示了社区参与“自愿激励”模式的局限：

#### （一）基本国情与松散的组织结构

“自愿激励”模式奠基于一基本国情的考量，而发展不平衡则是当前我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我国地域面积广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自然生态、经济基础、人口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导致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各层级面临着不同的治理环境。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体制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改革开放后虽加快了探索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进程，但在面临环保类公共议题或提供公共产品时，政府治理仍奉行“保守主义”原则。在政策执行初期，中央政府常常选取某些地区先行试点，借以规避社会风险、检验政策可行性或降低政策调整成本。有序推进社区参与是 BN 市执行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内在要求，根据实施方案，最初即以试点的方式逐步选取部分小区或纳入自主申



报的社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最终实现社区参与的全面推广。但是与较规范的制度体系化运作不同，试点工作一般由各责任部门临时抽调工作人员成立运行管理中心，逐步试点的环保政策面对着的是较松散的组织结构。

### （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

“政府推动”一度是计划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市场逐步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但在处理民生、社会保障、卫生环境等公共事务时，政府仍然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城市空间的塑造是在“科层等级”空间中进行的，科层结构与有限的财政支出决定了政府投入上的非均衡状态(何艳玲等，2019)。对于试点进程中的不同类型社区，政府能够提供的组织条件及资源供给不同。在一些推广示范的组织能力突出、环保宣传较充分的社区，政府往往集中安排专项资金购买社会服务，引入环保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而在相对被动纳入垃圾分类的社区，因居委会组织能力及宣传能力有限，加之环保社会组织当前难以覆盖所有住宅小区，其垃圾分类效果则相对较差。此外，促进生活垃圾的再利用是社区参与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但转运站、处理厂的垃圾处理过程处于公众视线之外，且建设进度往往与资金、土地征收、工程技术等不可控因素关联，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与社区参与推进不同步，降低了“自愿激励”模式运作的时效性。

### （三）居委会兜底的限制

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各类正式组织、社会团体的多样化。虽然不同的社区居委会在历史沿革、组织能力、人员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基本保留着科层体制中的基本建制。为保持整体社会结构的稳定，居委会往往在民政、维稳、环保等社会公共事务方面负责兜底，包括政策解释、矛盾调解等。生活垃圾分类这一环境议题具有特殊性和模糊性。一方面，居委会兜底虽便利了垃圾分类事务的统一管理，但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对居民社会行为始终欠缺约束力，欠缺制定强制性规则的合法性基础，个体相当程度上处于游离状态。另一方面，在项目“嵌入”基层组织后，居委会面临街道督导员的考核压力，常常以居委会为主，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为辅，配备小区督导员和入户指导员开展具体的垃圾分类指导工作，但物业公司市场化的经营属性、业委会欠缺监督效力、督导员工作环境差等问题构成了政策执行的障碍。从现有垃圾分类体系来看，物业公司由住建委负责开展行业管理，行业签订的各小区物业管理规定也未包含垃圾分类这一职责。居委会在承担其他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情形下，还要兜底上述矛盾的调解。当压力超出居委会承受阈值时，易产生组织推卸及居民不满等问题。

### （四）个体意识及行为的困境

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个体利益意识及行为的合法化，但社区居民公共事务意识的相对缺乏导致“自愿激励”模式常常面临动员困境。从居民个体角度而言，生活垃圾分类过于依赖居民的自觉意识；社区工作人员也面临宣传动员、知识普及、入户指导的行动困境。一方面，虽然居民同质性越高，更易产生相互督促的义务感，提升参与环保实践的社会意识，但邻里网络只能在家庭外部发挥作用，欠缺对个体产生可持续激励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居民环保意识并不必然转化为环保行为，如果缺乏环保社会组织及时介入，社区兜底更加依赖于小区督导员、入户指导员的实际督促与激励，工作职责大部分由物业公司保洁员或老年居民承担。物业兼任易导致责任重叠与组织推卸，造成日常监督效力下降。夏季炎热、冬天酷寒的工作环境也易给老年人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小区督导员、入户指导员等难以完成开袋检查、扫码等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劳动强度与待遇的失衡最终影响了“自愿激励”模式的成效。

#### 四、结论与讨论

作为一种激发居民自主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基本目标,社区参与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居民的参与类型、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相对忽略社区参与及组织环境间的关联分析,特别是对于可能存在的社区参与分化议题欠缺关注。在共同体内部,社区参与实际上体现了居民自主协商处理公共事务的基本形态,一般化的环保实践将更广泛的居民群体纳入社区治理结构中。为进一步从社区层面呈现垃圾分类基层实践的基本特征,本文以我国东南沿海 BN 市的垃圾分类试点项目为例,以“邻里网络”“社会组织”作为两个分析维度,归纳出 4 类“理想类型”社区参与的基本形态,并对其政府主导性水平和垃圾分类效果进行比较。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推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之中,居委会能力和社会组织介入相较于邻里网络,对规范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更为显著的约束力,总体上垃圾分类效果与基层社会组织状况及政府主导水平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

在政府主导作用下,各基层社区通过自主整合和非自主整合等措施保持了环保政策的有序推行,当然,不同社区垃圾分类成效始终体现了社区参与及其治理结构的类型分化。这说明在基本国情背景下,以“自愿激励”模式执行环保政策在组织结构、资源分配、居委会兜底、个体意识及行为等方面存在局限。历次生活垃圾分类收效甚微的原因在于多数个体始终缺乏自觉的环保意识,同时缺乏与负向激励相对应的策略工具,从而难以在碎片化的个体行动与有效的社会整合间形成合力。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正由“自愿激励”向“政府主导”模式转变。46 个重点城市已明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上海市垃圾分类新政的实施标志着其已进入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时代,对于个人违反条例规定,将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整改和予以处罚,并同步开展面向单位的执法工作。

我国某些强制性环保条例、政策、法规实施前,需经历一段时间的试点或推广,该过程揭示了怎样的现实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首先,改革开放后,我国处于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首要目标的阶段,环保政策的执行需经历一定的探索期,以降低政策风险。其次,经济发展需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舆论环境,通过“自愿激励”模式推行环保政策虽有局限,但可带动政府职能优化、基层社区发展与社会组织培育。最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居民目前总体科学文化水平较低,对促进生活环境改善行为的认知有限。社会政策的实施及制度性建构只有赢得社会成员的真正认同才能得以长期持续(彼得·伯格等,2019),生活垃圾分类理念最终必将逐步获得民众的“集体认同”,为更有效的环保实践奠定扎实基础。

#### 参考文献:

- [1]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19,《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2]陈阿江,2015,《环境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3]陈阿江,2016,《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社会建构与治理转向》,《社会学评论》第 4 期。
- [4]陈家建,2015,《督查机制:科层运动化的实践渠道》,《公共行政评论》第 2 期。
- [5]陈蒙,2018,《保甲制度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治理路径和机制的借鉴价值》,《人文杂志》第 12 期。

- [6] 邓燕华, 2016, 《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 《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7] 何艳玲、赵俊源, 2019, 《差序空间:政府塑造的中国城市空间及其属性》, 《学海》第5期。
- [8] 李黎明、王惠, 2016, 《社会资本、制度供给与居民社区参与》,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9] 李巽平、曾曼薇, 2019, 《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中国环境管理》第5期。
- [10] 廖茂林, 2020, 《社区融合对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5期。
- [11] 刘能, 2019,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学海》第3期。
- [12] 尚虎平、刘红梅, 2020,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测评——一个全面绩效管理视角下的非干涉研究》,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 [13] 沈毅, 2009, 《社区建设的组织化困境》, 《城市问题》第11期。
- [14] 谭爽, 2019,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社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15] 王芳, 2016, 《合作与制衡:环境风险的复合型治理初论》, 《学习与实践》第5期。
- [16] 王诗宗、徐畅, 2020, 《社会机制在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的作用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 [17] 王泗通, 2020, 《垃圾分类何以能在单位社区持续推行——以“单位人”为研究视角》, 《求索》第4期。
- [18] 杨贵华, 2009, 《转换居民的社区参与方式,提升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能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19] 杨敏, 2007,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 杨雪锋、王淼峰、胡群, 2019, 《垃圾分类,行动困境、治理逻辑与政策路径》, 《治理研究》第6期。
- [21] 杨筑慧, 2020,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垃圾分类与反思》, 《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 [22] 约翰·汉尼根, 2009, 《环境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3] 周亚越、吴凌芳, 2019, 《诉求激发公共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基于H市老旧小区电梯加装案例的调查》, 《浙江社会科学》第9期。
- [24] 朱力, 2019, 《中国社会矛盾70年演变与化解》, 《学海》第6期。

☆ 作者简介: 秦祥瑞,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沈毅,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责任编辑: 相妍



## 丧偶式育儿： 城市新生代母亲的母职困境及形成机制\*

——基于儿童照顾性别框架的研究

徐依婷

**摘要：**本研究以网络空间中的“丧偶式育儿”现象讨论为切入点，基于儿童照顾性别分析框架，在勾勒城市新生代母亲的群体画像基础之上，阐述其母职困境中“丧偶式育儿”面相并探讨塑造城市家庭“丧偶式育儿”现象的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研究发现，在人口家庭结构与社会经济变迁下，儿童照顾者的群体特征发生改变，儿童照顾女性化现象受到质疑与挑战，城市新生代母亲“丧偶式育儿”母职困境的形成受经济、社会与性别文化机制共同作用的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母亲 儿童照顾 母职困境 “丧偶式育儿”

“丧偶式育儿”是指儿童照顾中一方显著缺失，尤其是父职缺失的现象。这一批判性话语的兴起与近年来大热的亲子节目有关，这些节目中父亲带娃笑料百出，母亲扮演“超人”救场，“爸爸去哪儿”“妈妈是超人”的节目名契合了当下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儿童照顾困境：低父亲参与率与密集母职。2017年5月一则题为《铁岭一女子家中猝死，4岁儿伴尸2天3宿》的新闻报道，更是引起网友在微博、知乎等网络空间中对“丧偶式育儿”现象进行铺天盖地的讨论。网友纷纷晒出自家“同款老公”进行吐槽，甚至总结出中国女性一生经历的四大悲剧：“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丧偶式育儿”讨论从最初集中在亲子关系扩展到两性关系，逐渐成为集表述母职困境、反思两性关系为一体的综合性话题<sup>①</sup>，讨论的参与者多为城市新生代母亲及未婚育女性。这一儿童照顾女性化的模式在加重新生代母亲育儿焦虑，降低其婚姻与家庭幸福感的同时，增加了未婚育女性的恐婚恐育倾向，使得儿童照顾的性别效应问题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值得密切关注。本研究拟以网络空间中“丧偶式育儿”话题讨论为切入点，在勾勒城市新生代母亲群体画像的基础之上，阐述儿童照顾性别框架下新生代母亲的“丧偶式育儿”体验及对此的诠释与质疑，并探讨塑造城市家庭“丧偶式育儿”现象的社会机制。

\*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互联网新型消极情感的形成机制与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9CSH038）  
本文已刊发于《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妈妈生，妈妈养，爸爸回家只欣赏。”这则网络段子生动展现了当下中国城市家庭儿童照顾中普遍存在的“丧偶式育儿”现象。“丧偶式育儿”并非新鲜事物，在传统中国社会，儿童照顾是以父系家庭为中心，地域社会共同参与的育儿模式<sup>[3]</sup>，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秩序下，父亲通常缺席子女日常照料。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女性在妇女解放话语以及初步公共托幼体系的支撑下普遍实现就业<sup>[4]</sup>，但儿童照顾的性别框架并未得到改变。肩负社会再生产与家庭人口再生产双重任务的工作母亲在集体主义话语下以工作为重，来自国家层面价值观的支持弥补了工作母亲无法履行母职所带来的负疚感<sup>[5]</sup>。单位制解体与市场转型后，儿童照顾责任呈现家庭“内卷化”与“女性化”的特征，失去公共托幼体系的支持，工作母亲面临市场化对其双重身份的挤压。社会变迁中的家庭人口结构转变，使得独立意识强烈的城市新生代母亲迫于工作与家庭压力，倾向于选择儿童照顾的“代际转包”和“市场转包”，然而她们仍旧是“育儿总管”<sup>[6]</sup>。虽然当下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sup>[7]</sup>已经出现，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sup>[8]</sup>，短期内呈现的仍是儿童照顾女性化情境下“丧偶式育儿”的社会常态。

“丧偶式育儿”是家庭儿童照顾女性化的表现。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儿童照顾的性别效应研究。儿童照顾工作具有高度性别分工的特征，且往往被视为家庭内部的安排，因而儿童照顾的家庭化往往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依附因素的作用下演变成儿童照顾的女性化。儿童照顾的性别框架强调照顾者的群体特征与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具体处境，指出家庭儿童照顾安排受到社会文化和外在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从依附理论、关怀理论、性别角色理论等出发，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探讨照顾工作内容、责任归属、照顾压力等与性别不平等间的关联<sup>[9]</sup>。二是家庭育儿与母职研究。社会转型下的抚育模式与母职变迁是其研究重点，研究指出儿童抚育模式从“以成年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抚育方式从“粗放式”转变为“精细化”<sup>[10]</sup>，在此过程中受消费主义、家长主义与教育竞争的影响，母职实践呈现密集化特征，普遍弥漫着母职焦虑<sup>[10][11]</sup>。宏观层面主要关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家庭面临的抚育困境<sup>[12][13]</sup>，强调通过制定社会制度、完善社会政策、建设性别友好环境以支持家庭抚育工作。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儿童照顾研究缺乏对具体情境中的个体经验与主体表达的关注，而家庭育儿与母职研究多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但鲜有研究从性别框架的角度探讨母职体验。二是在研究对象上，既有研究未系统地、深入地考察儿童照顾主体的群体特征，笼统地以母亲这一社会角色作为研究主体，缺乏对不同世代母亲群体特征的系统描述。外在社会环境变迁的同时，儿童照顾者群体的观念也在逐渐改变，这一改变势必使得传统社会中稳固存在惯习受到挑战。既往文献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两者交叉的领域提供了研究灵感。结合以往研究的优势与不足，本文采取质性研究方法考察儿童照顾性别框架下城市新生代母亲的“丧偶式育儿”母职体验，在阐述新生代母亲的群体特征的基础之上，指出儿童照顾工作中两性之间在时间、精力与责任归属之间的差异，关注社会经济与家庭人口变迁下儿童照顾女性化现象受到的质疑与挑战，进而探讨导致“丧偶式育儿”现象的外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机制。

研究拟采用网络民族志这一新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当下信息社会，个体主动将自己的行动、思想与观点发布在网络空间，互联网成为学术界亟需重视的“田野”。本研究的案例材料来自于2016-2019年新浪微博中“丧偶式育儿”话题，选取了其中点赞量、转发量靠前的微博评论、微博原文，同时侧重案例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由于身份匿名，相比于线下，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更能自由地、充分地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真实意见。

## 二、“丧偶式育儿”中的城市新生代母亲群体画像

本文研究对象是城市“85”“90后”新生代母亲，她们是网络空间中“丧偶式育儿”话题讨论的主要参与者。成长、生活在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儿童照顾者在育儿理念、内容、方式方面有其时代特征，她们既是当下育儿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同时也是新育儿模式的积极建构者。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城市新生代母亲，其个体生命历程中交织着高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sup>[14]</sup>。随着这批新生代青年相继步入婚姻，她们对待工作与家庭、婚姻与生育的价值观念与其母辈存在显著差异，加之独立意识的增强，社会角色的多元化、使得儿童照顾问题不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个人困扰，而是成为社会问题受到公众关注。

城市新生代母亲童年时期生活在少子女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充裕。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造成中国城市家庭普遍趋向于小型化和少子化，家庭资源高度集中。城市新生代母亲是原生家庭唯一的投资目标和养老希望，无兄弟争夺家庭资源，在教育、就业、成婚等事务中往往能得到父母大力的关怀和支持，甚至能利用前所未有的权力来反抗不利的性别规范<sup>[15]</sup>。她们的父母既希望女儿能超越传统性别规范但又不敢彻底脱离传统性别模式，在子女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出“传统”与“独立”并存的双重标准，表现在既希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取较好的工作，又担忧子女过于独立以致偏离主流的、传统的女性身份角色定位。

城市新生代母亲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是有知识、文化和技能的新时代女性。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90后”青年比例为47%，考虑到城乡教育不均衡发展状况，城市社会中新生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高。通过接受现代教育，城市新生代母亲得以提升自身文化资本，加强了在劳动市场的竞争能力，拥有一定的独立经济来源。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改善了城市新生代母亲在家庭分工事务中的议价能力，赋予她们与丈夫平等协商家庭事务的经济资本。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她们往往是积极主动利用互联网资源学习“科学育儿”理念与知识的“学习型妈妈”。以母婴亲子微信公众号排名第一的“丁香妈妈”为例，其粉丝数量达到1000万+，其中82%为城市新生代母亲，具有高学历与高收入的特征。

在价值观念层面，新生代母亲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普遍接受的是性别平等话语。她们往往自诩为“已婚少女”，即使婚后在人格上也保持相对独立自主，拒绝成为丈夫和子女的附属物，对自身事业发展和家庭角色有特定的期待。在工作中，新生代母亲遵循利己主义的处事原则，追求“为自己而活”，强调通过职业、兴趣实现自我价值。在家庭中，大部分城市新生代母亲向往夫妻之间民主、平等融洽的相处关系，拒绝单一的“母亲”身份认同，即使在阶段性全职的过程中仍以兼职的方式来逃避家庭主妇的负面标签<sup>[16]</sup>。在育儿方面，城市新生代母亲高度认可以西方中产阶级家庭为蓝本，代表科学性和现代性的“科学育儿”话语，注重育儿质量。与母辈不同的是，她们无上一代育儿模板可以仿效，而是通过网络、书籍等以后喻文化为主的平台习得“科学育儿”知识<sup>[17]</sup>，因而她们常常在网络空间中交流、分享育儿相关话题以获得身份认同、精神慰藉与群体归属感。在代际合作育儿过程中，城市新生代母亲一方面要向祖辈传递现代的“科学育儿”知识，一方面要劝导祖辈接受现代家庭民主平等相处的理念，两代人之间易因经验育儿与科学育儿、代际与性别分工观念差异发生冲突。

综上，与母辈不同的是，城市新生代母亲出生在少子女家庭，具有高学历与高收入的特征，追求事业成功与经济独立。对待家庭与婚姻，她们积极学习与贯彻“科学育儿”理念，提倡现代民主、平等的家庭文化。城市新生代母亲认同的不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观念，即使在密集母职的压力下，她们也希望能兼顾家庭与事业。这些不同于以往世代女性的特征使得她们对于以往父辈、母辈习以为常的“丧偶

式育儿”现象尤为敏感，并勇于挑战与质疑儿童照顾女性化问题。在她们的积极讨论、参与下，以“丧偶式育儿”现象为表征的儿童照顾责任女性化问题逐渐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引发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重视，开启了一轮关于儿童照顾与性别平等的社会公共议题讨论。

### 三、“丧偶式育儿”：城市新生代母亲的母职困境

#### （一）“丧偶式育儿”的表现：超负荷运转的母亲与低存在感的父亲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在当下中国家庭日常生活中仍然具有支配地位，儿童照顾这一具有情感与道德双重属性的无酬劳动仍然被视为母亲（女性）的职责。在儿童照顾中一方是承担密集母职压力、超负荷运转的城市新生代母亲，一方是受制于主观或客观因素存在感较弱的父亲，儿童照顾的女性化问题显著。

##### 1. 时间投入的差异

以往研究认为，在时间有限的前提下，单位时间男性参与社会劳动所获得的收益比女性高，女性在儿童照顾上投入更多时间符合家庭经济理性的分工原则。而对于现今城市双薪家庭来说，时间成为稀缺资源，家庭与工作、劳动与休闲的时间分配反映出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与地位，而业余时间的利用状况则显示出传统性别文化结构对两性行为的制约。数据显示，女性每天投入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6分钟，是男性的2.8倍。在“丧偶式育儿”的话题讨论中，新生代母亲普遍反映自身在儿童照顾工作中投入的时间远多于丈夫，而且即使业余时间充裕，另一半仍不愿意投身到这一女性被视为天然具有优势的领域。当城市新生代母亲大量时间被抚育子女占用，其在职业发展上面临“母职惩罚”，导致新生代母亲的时间价值降低，在家庭经济理性的原则下被家庭成员期待承担无酬的儿童照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没有人要求作为父亲的天天陪宝宝，关键是工作之后的时间。到底去了哪里？是参加了无数喝酒、打牌、吹牛逼、打游戏、无任何意义的聚会了？还是真正的陪在小孩身边了。拿着工作忙和压力大作为不带小孩的理由，我觉得应该是上个世纪的借口了。——网友“毛豆豆”

##### 2. 精力分配的差异

随着抚育模式的变迁，儿童照顾不再是顺其自然的事，而是一项要求精心筹划与协调的系统性工程，因而常常消耗儿童照顾者大量时间、精力与体力。同样作为职场中的劳动者，城市新生代母亲的照顾者身份更为显著，她们被社会以及家庭其他成员期望以家庭为重，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倾向于家庭而非事业，因而被社会建构为事业发展有限的、无足轻重的次级劳动力。而男性在职场中被塑造造成“无家”的劳动者，他们在儿童照顾事务中扮演提供经济来源的工具性角色。这种支配性的社会性别结构决定了两性在儿童照顾中的精力分配差异，为保持男性气质，部分男性即使有时间和精力，也不愿主动投入到儿童照顾事务中。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新生代母亲参与儿童照顾的全过程，而他们的另一半常常只是回家陪子女玩耍、游戏。如前所述，接受工作至上伦理的新生代母亲们也同样强调事业发展与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但社会性别角色规范以及亲子间天然的依附关系迫使她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儿童照顾事务中，这反而造成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加之，现有相关法律对已婚女性提供的保障有限，城市新生代母亲们开始担忧牺牲职业发展来履行儿童照顾责任可能面临的种种未知风险。

##### 3. 育儿责任的差异

生理的天然构造，促使女性承担分娩婴儿的责任，然而将儿童照顾的责任分配给女性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首先，工业社会以前，家庭是社会生产与人口生产单位的统一体，后男性加入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女性留在家里相夫教子。工业革命以后，女性也被纳入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来，但她们并未卸下家庭领域人口再生产的职责，儿童照顾仍然被视为母亲的天职。这种责任分配机制在母职层层加码的情境

下对城市新生代母亲施加了较大的压力，新生代母亲下班后不得不值“第二轮班”，“耗尽所有且不能有半点疏忽才勉强被认为合格”（网友“高欣 12122”），而男性只要偶尔协助育儿就获得称赞一片。其次，儿童照顾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常常被视为城市新生代母亲的失职。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导致城市家庭少子化，“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焦虑围绕着城市家庭，从而直接转嫁给儿童照顾的责任主体——城市新生代母亲，密集且高压的母职实践致使新生代母亲承受着较强的精神负载<sup>[18]</sup>。如阿德里安·瑞奇所述，现代社会一个理想的母亲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目标，才能给小孩“无条件的”爱和注意力，以符合社会对好母亲的期待<sup>[19]</sup>。生儿育女后，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城市新生代母亲如仍将重心放在事业上的话，不可避免地面临外在负面评价以及内心的挣扎。通过儿童照顾以获得自我实现这一建立在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全职主妇的性别规范话语逐渐转化成对全球女性的要求，使得城市新生代母亲往往陷入“爱”与“责任”的迷思。

世人真是好搞笑，当爸的带一天两天孩子就夸得上天，当妈的 24 小时不停照顾小孩就觉得理所当然。小孩有一丁点小病小痛就只指责妈妈。爸爸是拿来干嘛的？现代当父母的，工作大家都要做，家务和照顾小孩却还是妈妈做的。——网友“乐乐陶陶长安里”

### （三）城市新生代母亲对“丧偶式育儿”现象的质疑

城市新生代母亲所具有的不同于以往世代女性的特征使得她们无法与其母辈一样沉默应对儿童照顾中两性在时间、精力和责任分配上的差异。借助于特定新闻事件的契机，“丧偶式育儿”现象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发城市新生代母亲对儿童照顾女性化问题的激烈讨论。纵览这些碎片化、无中心的讨论，可以发现城市新生代母亲主要从两性社会角色转换、经济能力、育儿技能三个方面质疑并挑战“丧偶式育儿”现象的合理性。

#### 1. 社会角色：谁结婚前不是“小公主”？

如前所述，城市新生代母亲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子女数量少，受到父母全方位的关注和照顾。尤其是城市独生女，往往享受着原生家庭的最佳资源，她们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得以脱离传统社会性别结构的制约，父母期望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后走向事业成功与经济独立而非传统社会中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结婚生育后，作为女性，城市新生代母亲不再是家庭结构中可以享受最佳资源和机会的“小公主”，而是在传统性别结构制约下转变成需要承担家务、照料子女的免费“保姆”。家庭照顾资源的紧缺与儿童照顾的精细化间的矛盾迫使部分城市新生代母亲选择在子女 0-3 岁时做全职主妇，而现今劳动力市场激烈的竞争使得短暂的全职主妇阶段也会增加城市新生代母亲自身及其父母的焦虑，不少城市父母宁愿选择提前退休来支持子女也不愿城市新生代母亲因此而中断事业发展。相比而言，他们的丈夫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结构保护下，童年时期缺少家务劳作训练的机会，婚后承担养家者角色而得以免除照顾子女的责任与义务，他们的职业发展受生儿育女的影响极小。婚前同样都是原生家庭的“小公主”“小王子”，婚后在传统性别结构的支配作用下，男女两性在儿童照顾中承担的责任、因生儿育女付出的代价存在显著差异。

谁结婚之前不是家里的小公主，现在我是这个家庭的保姆，老妈子。心态炸了，一个人带孩子，一天到晚家里没人，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会闹人，我筋疲力尽，要说多忙吧，好像也没有，就是撒不开手，什么事都得等孩子睡了，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再难，一起扛都没关系，但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一手孩子，一手家务，他在敲键盘，也太过分了吧。——网友“阿狸是老鼠”

#### 2. 经济能力：谁没有能力挣钱？

相对资源的视角指出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与权力，拥有经济资本的多寡决定着个体在家务劳动上



的协商能力，因而现有家庭分工、儿童照顾责任分配状况与家庭成员拥有的经济资源有关。理论上，受教育程度提高、收入增加、职业地位的提升能改善新生代母亲在家庭中家务议价能力。第三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女性的在业率达到60.9%，城市新生代母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依靠男性养活的附属品，而是在高额房贷以及高昂抚育成本下与男性共同养家的劳动者。然而现实情境中，经济基础的增强并未显著减轻城市新生代母亲在儿童照顾工作中的体力劳动与精神负担，同样作为养家者，城市新生代母亲囿于传统性别观念中设定的“主内”角色不得不在下班后值“第二轮班”。当城市新生代母亲大规模进入劳动市场，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sup>[20]</sup>，这对于高学历、高收入的城市新生代母亲来说难以接受。

我是真的郁闷了，自从生了孩子，我有哪天睡好过，我是没上班还是没有收入？凭什么大家都是要上班的人，都是孩子爹妈，妈妈就活该这么累，爸爸就是个甩手掌柜，最多高兴的时候哄一哄。麻烦自己自觉早上给孩子一点亲子时间，谁上班不辛苦，成年人的世界能有多容易，麻烦你端正自己的态度，你是个爸爸。——网友“橙汁遇上胡萝卜”

### 3. 育儿技能：谁天生就会带孩子？

在传统社会，女性往往被期望成为贤妻良母，加之家庭中子女众多，伦理规范以及家庭现实需求迫使女性年幼时就必须承担起料理家务和照顾年幼弟妹的部分责任，从而有机会积累家务劳作以及照顾幼儿的经验。而且熟人社会中，亲属间居住距离较近，互相可协助育儿，青年男女有机会观察儿童照顾的过程。现代中国社会单位制改革及人口大规模自由流动后，陌生人聚集的居住形态造成新生代父母缺少习得儿童照顾经验的机会。同时，现代青年接受学校文化教育的时间远多于从家庭、亲属网络习得家庭生活经验的时间，从场域来看，他们的生命历程被显著地区分为在家庭、在学校和在单位。在后喻文化流行的现代社会，传统的育儿知识话语被淘汰，新生代父母主要依靠网络、书籍以及培训班来习得“科学育儿”知识、解决儿童照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同样缺乏儿童照顾经验，因新生代母亲为儿童照顾的主要负责人，她们在学习育儿知识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相比之下新生代父亲因时间、兴趣而表现出积极性缺乏。加之在传统性别结构的支配下，社会整体环境缺乏鼓励男性培训育儿技能的途径。两性育儿技能的发展差异显著影响着后续投入儿童照顾的热情，男性只得被动退出儿童照顾事务。

男人不是帮忙带孩子，而是应该彼此去分担这份美好的责任。可有的人带十分钟就说自己真的做不来这样的事，试问有谁天生能做的来？不都是耐心去陪伴去养育吗？！puppy是你的亲女儿，可你却这么不愿意用心去陪伴她，好说歹说都做不到，我又该怎么办？——网友“puppy妈妈”

从网络空间中“丧偶式育儿”的话题讨论中，可以发现当下城市家庭中两性在育儿事务上的时间、精力和责任分配上存在分工不平衡的社会事实。通过自我吐槽以及围观他人，城市新生代母亲试图用“丧偶式育儿”话语引起社会关注这一隐蔽的家庭性别分工秩序，引发社会对儿童照顾女性化问题的重视与关注。对比两性社会角色、经济能力、育儿技能的差异，城市新生代母亲对“丧偶式育儿”现象的合理性进行质疑与挑战，彰显出这一新生代母亲群体对于自身、两性与婚姻家庭的独特观点。但她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导致“丧偶式育儿”现象形成的社会机制，在“丧偶式育儿”话题讨论中，除了表述负面体验之外，城市新生代母亲也在理性地反思“丧偶式育儿”现象背后的家庭与社会机制，进而使得该话题讨论呈现出积极的一面。

## 四、“丧偶式育儿”母职困境形成的社会机制

“丧偶式育儿”这一社会现象问题化的背后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前述不同以往世代女性的特征使得城市新生代母亲这一群体对“丧偶式育儿”现象敏感并勇于表达自身对这一现象的质疑。而“丧偶式

育儿”现象本身是根植于当下中国社会儿童照顾所关联的外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情境。在这些社会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儿童照顾女性化与父亲缺席成为城市家庭的普遍状态。

### （一）双薪家庭与传统性别分工持续

从社会交换的视角看来，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格局的形成是因为两性间经济与服务交换，丈夫在外工作赚钱养家，换取妻子在家庭内部的无酬劳动。与子女一样，妻子也是高度依赖丈夫的“被供养者”的角色，在家庭中地位低下，无法与丈夫平等协商家庭事务。而在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从过去“主内”转变为承担“内-外”即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双重责任。在房贷、车贷以及高昂育儿成本的经济压力下，城市新生代母亲不再是仅仅依赖丈夫的“被供养者”，而是与其丈夫一样，都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主流性别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私人领域的事务仍然被视为低价值的，属于女人的工作。在家庭内部，家庭规模逐渐趋向小型化、城市新生代母亲劳动参与率高、工作时间长而传统的性别分工格局持续，即使采取代际合作育儿的方式，仍改变不了儿童照料资源普遍缺乏的客观事实。在此背景下，要求父亲突破传统养家者角色，改变儿童照顾女性化的“丧偶式育儿”现状成为客观的现实需求。

### （二）“科学育儿”理念与能力缺乏的父亲

传统社会，人们一般按照自然成就的方式来培养儿童。而在当下，儿童照顾成为一项专业、复杂与耗费精力、金钱的事务，当妈越来越难<sup>[21]</sup>。城市新生代母亲中间普遍流行的是“科学育儿”理念，这一理念是以西方中产阶级为蓝本，以科学、权威的现代心理学为指导的一套育儿话语体系与规则。从备孕、孕期到育儿整个阶段，在“科学”的名义下，男性应积极主动参与，比如说在备孕期间戒烟戒酒、健康饮食、健康作息、运动健身等方式调理身体。在儿童照顾过程中，父亲应与子女进行经常性的互动与情感交流。大量研究证实父亲缺席子女抚育将对子女心理、性别认同、社会能力、学业及就业表现方面造成负面影响，其作用力还会扩展至夫妻关系、母亲心理健康等方面。“科学育儿”理念借助消费市场力量与专家话语共同对儿童照顾的内容、方式进行指导，不断扩充育儿工作内容，提高育儿精细化程度，这对于城市新生代父母来说，胜任难度较大。由于女性生理优势以及儿童照顾实践经验更为丰富，城市新生代母亲往往拥有相对权威的发言权和评判权，当丈夫的所作作为未达到妻子认可的标准时，城市新生代母亲会以权威地位要求男性退出，阻断了丈夫进一步提升儿童照顾技能，进而呈现出“不会带——不给机会带——更不会带”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出现因能力缺乏而导致父亲参与不足的“丧偶式育儿”现象。

我老公其实很棒，很爱宝宝，也很乐意照顾宝宝。但因为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照顾宝宝的事很多都是父母帮忙做了，导致老公没有足够的机会学习如何带宝宝。宝宝哭闹不休时，闹瞌睡需要哄睡时，他一般招架不了，再加上他还要上班，可以跟宝宝相处的机会就更少了，宝宝对他也有些陌生。而我因为刚生完宝宝，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处于极大的疲惫状态，所以宝宝哭闹时，我会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能安抚好她。而显然，我老公不具备这种技能，所以我一般都是亲自上，或者丢给我妈安抚，哪怕他经常主动要帮我，我也没有让他帮忙，所以陷入了不会带-不给机会带-更不会带的怪圈。——网友“小昊昊的大壮”

### （三）祖辈替代与育儿责任转移

城市新生代青年婚后通常实行新居制，夫妻两人的核心家庭结构有助于形成两性间民主协商处理家庭事务的模式。当城市新生代母亲怀孕、生育后，一方父母加入，组成临时主干家庭。祖辈的加入是一种激活家庭微观支持系统的行动，减轻了城市新生代母亲的育儿负担，缓解了城市新生代母亲面临“工

作——家庭”双重挤压的角色紧张。但祖辈，尤其是男方父母常常有意、无意间妨碍城市新生代父亲履行父职，使得男性理所当然地推掉照料义务。祖辈替代导致城市新生代父母在家庭分工上得以维持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打破城市新生代母亲关于两性民主、平等的合作解决家庭事务的期待，无法践行“科学育儿”理念所要求的父亲参与育儿、与子女进行情感互动的要求，因而常引发夫妻、代际间的矛盾。因祖辈替代照料而出现的“丧偶式育儿”使得儿童照顾责任转移到祖辈身上，原本应由城市新生代父亲分担的育儿工作往往由祖辈中的女性替代。

我婆婆来了之后，杨先生开始对我采取旁观态度，不再事事以我为先的照顾，他并不是不会，也不是看不见，他就是觉得他妈来了，他可以当甩手掌柜了，我婆婆才是来帮忙的好嘛？他才是主力军啊！搞不清楚自己的责任和立场，想要让我丧偶式怀孕育儿？门儿都没有，做完月子就让我婆婆回家，男人必须参与进来！网友——“就酱 8866”

#### （四）劳动制度与“工作——家庭”冲突

随着两性受教育水平、经济收入水平、劳动参与率的差异逐渐缩小，部分年轻男性对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重新解构，从“养家者”角色主动转变为子女成长的参与者。除了在“科学”的名义下积极参与备孕外，部分城市新生代父亲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参与子女日常生活如喂奶、换尿布到讲绘本、唱儿歌等儿童早教活动，但在现有劳动制度下，有照顾自觉的城市新生代父亲只能被迫缺席儿童照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普通劳动者高强度、低福利地工作，这种竭泽而渔的劳动制度使得男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冲突，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现代性的市场模式意味着一个没有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最终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sup>[22]</sup>以互联网行业“996”工作制为例，长时间劳作使得男性难以参与儿童照顾，承担家庭抚养义务，其背后是市场资本力量与“男主外、女主内”隐蔽性别秩序的合谋。

996意味着一个男性要把所有的时间贡献给工作，还意味着背后的一个家庭都要为此牺牲。他所有承担的夫妻扶助义务、子女抚养义务、父母赡养义务由谁去承担呢？大概率是他的妻子。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庭有一个人必须放弃工作的发展，那么这个妻子的保障呢？现实的说，所有的保障全在于这个男性的良心，国家层面或者社会层面上的保障几乎没有。——网友“湖边看鸳鸯”

#### （五）社会福利制度与抚育困境

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过程，儿童照顾责任理应由家庭、企业、政府三者共同承担。在北欧国家，政府承担了部分儿童照顾责任，出台系列家庭友好政策，通过发放育儿津贴、减免税收，发放食品券等方式减轻家庭儿童照顾成本，并且提供质优价廉的公立托幼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政府逐渐从儿童照顾责任中退出，政府和单位不再提供公益性质的医疗、教育、托幼等公共产品，儿童照顾劳动的私人属性凸显，抚育子女开始成为个体家庭的责任。普通城市家庭需要采取市场化或调节家庭内部资源的手段去解决相应的儿童照顾问题，增加了普通城市家庭的育儿成本和压力。在家庭外部，托幼机构数量少、价格不菲，普通家庭在房贷、车贷的压力下难以喘息，更奢谈支付托幼费用。同时社会上频繁发生的保姆虐待幼儿、幼儿园教师性侵儿童等事件更是刺激着城市新生代父母敏感的神经，儿童照顾开始成为一项不敢假手于人、事必躬亲的重大事务，增加了城市家庭的儿童照顾赤字。可以说“丧偶式育儿”成为普通城市家庭在社会结构制约下无奈的选择。

没有看到基础教育的扩容，没有看到少儿医疗的完善，甚至没有看到几家愿意收三岁以下幼儿的托儿所。农村是留守儿童，城市是丧偶式育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号召人民生男生女……生下来谁养啊？——网友“寒尽不知年”

## 五、小结与讨论

作为当下城市社会的抚育主体，城市新生代母亲群体特征、母职体验及其面临的复杂儿童照顾环境值得婚姻家庭研究领域重视。研究以网络空间中“丧偶式育儿”话题讨论为切入点，勾勒出城市新生代母亲的群体画像，与母辈明显不同的是，这一群体出生在少子女家庭、受教育程度较高、强调经济独立与事业发展，认同现代民主、平等的家庭文化与“科学育儿”观念。应该说，在“丧偶式育儿”讨论中体现的是城市新生代母亲希望两性平等合理分担儿童照顾工作的主观诉求，但客观现实境下两性在育儿工作的时间、精力和责任分配不平衡，在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的双重叠加影响下城市新生代母亲生发“丧偶”之感。城市新生代母亲从社会角色、经济能力、育儿能力三个层面出发质疑“丧偶式育儿”现象，挑战儿童照顾女性化在现代中国家庭中存在的合理性。“丧偶式育儿”现象的形成与外在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机制相关联，在双薪家庭与传统性别分工持续、“科学育儿”的高要求与父亲能力缺乏、祖辈替代与育儿责任转移、社会福利制度与劳动制度对家庭人口再生产的不友好等作用机制环环相扣之下，“丧偶式育儿”现象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改善。长期“丧偶式育儿”的儿童照顾模式将加重城市新生代母亲心理压力、降低青年家庭幸福感以及影响儿童健康成长。

本文对城市新生代母亲这一群体进行系统考察，采取微观视角关注儿童照顾中的城市新生代母亲的主体经验，并从性别框架的角度探讨母职体验，将母职实践体验研究扩展到两性关系的面相，充实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儿童照顾中的两性分工是一种不断建构的变动历程，这一过程中夫妻之间既有“争斗”，也有“协商”<sup>[23]</sup>，同时也受个体原生家庭、性别观念、生命历程与夫妻关系的影响，未来如能做详细的田野调查，应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灵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谐家庭建设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建共享，每个家庭成员都应是家庭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享有者。在育儿精细化与专业化的背景下，城市双薪家庭仅从家庭内部着手重新分配儿童照顾责任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未来应该倡导建立平等与差异统一的家庭性别劳动分工，两性共同承担经济供养和家务劳动的责任，强调两性合理、平等与实质性参与；探索、完善相关家庭、生育、工作友好政策，承认父亲有照顾子女的权利、需求和责任并从制度层面进行保障，使得父亲有能力、有时间、有意愿履行父职。目前，上海、江苏、宁夏等地已开始探索父母共同育儿假。类似“丧偶式育儿”的相关讨论必将推动儿童照顾责任的重新分配，推动社会政策的变革以达成儿童照顾中的“性别正义”。

### 参考文献：

- [1]郭戈，2019，《“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北京社会科学》第10期。
- [2]费孝通，1998：116-124，《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翟菁，2017，《集体化下的童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4]金一虹，2013，《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作母亲》，《学海》第2期。
- [5]肖索未，2014，《“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社会学研究》第6期。
- [6]佟新、刘爱玉，2015，《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2010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7]方英，2011，《家务劳动分工：女性的“生活实验”与“性别政治”》，《广东社会科学》第4期。
- [8]梁丽霞，2011，《“照顾责任女性化”及其理论探讨》，《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9]郑杨，2019，《社会变迁中的育儿模式变化与“母职”重构——对微信育儿群的观察》，《贵州社

会科学》第7期。

[10]杨可, 2018,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 《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11]金一虹、杨笛, 2015, 《教育“拼妈”: “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 《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12]洪秀敏、孙林红, 2019, 《聆听“她们”的声音——二孩妈妈的抚育困境及社会支持研究》, 《河北学刊》第5期。

[13]陈雯, 2017, 《职抚育困境: 二孩国策下的青年脆弱性与社会支持重构》, 《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14]李春玲, 2019,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 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 《社会学研究》第3期。

[15]冯文、余华, 2009,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都市独生子女的赋权》,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16]唐文慧, 2011, 《为何职业妇女决定离职——结构限制下的母职认同与实践》,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85期。

[17]李兴睿、冯剑侠, 2019, 《后喻文化语境下代际合作育儿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基于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分析》,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18]李芳英, 2019, 《精神负载: 母职实践过程中的性别关系再生产》, 《人口与社会》第1期。

[19] A. Rich, 1976,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吴帆, 2007, 《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社会》第3期。

[21]施芸卿, 2018, 《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 《文化纵横》第5期。

[22]乌尔里希·贝克, 2004: 142,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3]瑞文·康奈尔, 2003: 56-57, 《男性气质》, 柳莉、张文霞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徐依婷,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白静艳

# 从“外嫁女”回归看传统土地观念的变迁？

——以北方Z村为例

董 伟

---

**摘要：**传统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人们对于传统的推崇经过历史与时间的检验。在传统观念当中，“外嫁女”无法享受土地的权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与土地价值的变化，许多“外嫁女”开始争取属于自己的土地权益。同时也反映着传统观念的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

**关键词：**土地 观念 “外嫁女” 征地拆迁

---

## 一、调研背景

土地，在传统观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传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当中，只要有土地就可以完成绝大多数的与生存发展相关的事务，因为在许多的时候，土地的作用要远远胜于“天”的作用。土地就这样实实在在的踩在每个人的脚下，但是天空却是那样的高远，飘忽不定。很多时候越是熟悉的东西，就越是有着一种强烈的亲切感。在这种亲切感之下，我们可以感受到脉脉温情的流动，但在感受亲切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感情的流露也让我们少了几分敬畏之心。

土地一直以来就在人们的观念当中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传统的观念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北方Z村，“沉默”是绝大多数“外嫁女”的基本态度，但是因为地区不同也会存在差异，比如珠三角地区的“外嫁女”就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sup>[1]</sup>可以说传统力量在人们思想观念当中的束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松动，人们更加理性的看待自己的权益，当然这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除了单一的想法之外，更多的是具体的行动，也有许多从法律上为自己的权益寻找证据的行为。<sup>[2]</sup>

土地就一直在那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变化的是人们对于土地的看法与态度，就算是土地增值等情况本质上都是人作为主体所赋予土地的重要属性。这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行为方式的变化，而这背后无疑显示出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在社会发展演进的过程当中，作为传统文化核心和基础的村落家族文化受到冲击，农村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受到影响，形成呈双层特色的乡村文化。<sup>[3]</sup>在对于土地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价值处于一种冲突与融合的状态，尤其是我国传统文化与市场价值追求之间的冲突表现的最为明显（郑晓坡，2008）。因为就当前的发展情况而言，土地的价值已经不仅限于农作物生产了，过去看似不值钱的土地在征地补偿的过程中成为了绝对的明星。

## 二、人与土地

### （一）天地之分

蓝天就在这“苍穹”之上，每个人的头顶之上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片蓝天，随着位置的移动又好像整片天空都是属于自己的。但是“距离”在人们仰望天空的过程当中发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陌生的感觉随着人们观看的距离而逐渐加深。天是在人的头顶之上的，而地则是被人踩在脚下的，这种空间上的位置排布也让人们不自觉的用“天地”的这种先天后地的顺序来安排两者之间的位置。天的重要性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个是实质性的，而第二个则是意义性的。

天空可以为我们带来庇护，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雨水，水可以说是农业生产当中的必备要素，在传统农业生产当中最忌讳的莫过于旱灾了，从历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自然

灾害是农业减产的重要原因，也是人口数量的“波谷”期。除了旱灾之外，水灾也是造成农业生产问题的重要原因，只不过与旱灾相比，水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规避，但是人们在旱灾的面前更多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无计可施”的无奈。因此“天”的脾气在许多时候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最终结果，换句话说“天象”也是事关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们对于天的敬畏随着在传统社会当中很难改变的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而得到了加强。

物质决定意识的定理在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在最一开始人们对于天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大家抬头仰望天空，满眼望去都是那样的湛蓝，但是突然之间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天”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捉摸不定，因为“天”的活动规律是很难掌握的，而且天的活动态度又对人们的生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必须对上天抱有足够的崇敬之情，而这也衍生出了天的象征性意义。

天象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但是因为天气的捉摸不定就像是人的脾气一般，因此人们习惯借用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天”的活动规律。“推己及人”与“感同身受”在此处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为人们并不清楚上天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只能从自我需求的最高标准出发来采取一些措施。从自我满足的角度出发带有强烈的投机性，虽说不能达到面面俱到的效果，但是却可以实现自我的“心安理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行为标准，这个标准是与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相辅相成的，是一种社会要求的内化，并且对个体的行动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是这种自我内化的规范。每个个体对于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共识也并不能达到百分百的完全认同，因为不同个体的特殊的经历，在对于同一件事物的认识上也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对于个体具有相同束缚作用的规则其实并不能像纸面上规定的一样发挥全部的效用。在规则经过个体的不同内化过程之后，其在个体当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其实就已经开始按照不同的方向发展演变了。

对自然界中所发生的现象，不同的个体同样会抱有不同的看法。为了来年丰收的企盼，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上天的敬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不同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套本地区所独有的表达方式。共性与个性的特征在其中显现出来，共性的东西在小范围内产生，一般以群体为主要界限，能够划分开来的群体之间必然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在群体内部因为地缘等原因，内部成员的关系必然也是比较密切的。因此成员的互动过程当中也必然遵循着群体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在行为处事方面存在着统一性的要求，所以作为事关整个群体的重要事宜，向上天表达敬意的活动必然要保持庄重。

个体的想法多种多样，但是在关系到生存发展的仪式面前容不得有半点的嬉笑怒骂。既然提到了仪式，就有必要对其源头进行追溯，从字面上进行分析的话，“仪式”可以理解为进行典礼过程中的仪态与形式，也就是在进行一项典礼过程当中所应保持的一言一行<sup>1</sup>。一项仪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产生一些改变，但是任何仪式的“庄重”的内核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仪式形成之初，每个细节都是经过仔细的推敲与考量的，一项小小的改变对于仪式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震荡”。人类社会的发展至今，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一些行为规范是具有着一定的“科学性”。

## （二）传统思想的科学性

在研究村庄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许多的共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都有“神灵”作为保护神对

---

<sup>1</sup> 百度百科. 仪式[EB/OL]. [2017-01-20]. <http://baike.baidu.com>

于村庄进行庇护。自然界的许多规则似乎在人类的生存发展面前是不值一提的，从我们当前全球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与危机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如果冷静地思考就会发现许多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类自己的不恰当的行为造成的，可以说在无限的欲望驱使下，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是永无止境的。如果只是任由人类的欲望无限的膨胀，那么再多的资源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资源总会有消耗殆尽的一天，特别是对于小范围的群体而言。虽然群体规模可大可小，但是群体规模一定是建立在与其相适应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大群体占有大资源，而小群体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当中活动。

对于一个村庄而言，虽然低人口数量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不会消耗太多的资源，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村庄资源消耗也不可能与大聚居点的资源储备量相提并论。无论大聚落或是小聚落，其可以使用的资源都是相对而言的，大聚落并不能因为所持资源多而任意的挥霍，因为其消耗也是成数量级的增加的。为了更加长远的发展，必须对于有限资源的开发与使用进行限制。每个“理性”的个体在本质上都是利己的，如果在生计尚且宽松的富裕年景，一些长远发展的大道理还是可以获得个体理解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没有必要对于资源进行过度的开发，当前的状况完全可以满足个体的生存需求。但是如果遇到灾荒年景，当个体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时，此时的理智就只能让位了生存的本能了，心底里所残存的对于有限资源的顾忌也随着饥饿的增加而灰飞烟灭。

当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受到威胁时，资源与环境保护被摆在了从属位置。防患于未然的工作不能等到问题爆发的那一刻做，既然是“未然”就必须要求在问题产生危害之前就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就具体的生计问题来说，如果可以按照一个合理的方式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有限的资源就可以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使得其供给能力可以更加长久的发挥下去。但是如果过度使用资源，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预防针”只能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在生计与建设方面来讲，资源保护的意识必须要在民众的生活状态还比较良好，可以满足基本温饱的情况下开展，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资源保护的意识才有“深入人心”的可能。

考虑到后代的生存与从现实的实践环境当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的祖先在资源使用的方面提出了一些限制性的要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前人的经验得到了证明。但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真理”往往是十分模糊的，并且在当时情况下所拥有的技术与工具也并不利于寻找真相。在追寻知识真谛的道路上，人类一直都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面对困难与挫折也是尽全力克服，因为这种对于知识的执着精神，许多宝贵的知识成果才得以留存下来并造福后世，在这当中除了纯粹的理论性的知识之外，当然也包括在生活实践过程当中所积累的经验。在过去生产力落后的大背景下，人类的求知欲望一直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但是在现实面前急需一个答案来填平内心的困惑，当人类自身的力量不能对眼前的问题进行解答时就要借助自身之外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自然力量”。

所谓的“迷信”也拥有着一定的“科学”内涵的。而这种类型的“科学”其实就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之所以通过“玄幻”的方式来表达知识与经验，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因为当时的条件不足以将问题解释透彻，所以就只能搬出一个具有相当说服力并且又难以推翻的事物来对这种论证进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力量往往就是“义不容辞”的。因此可以说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进行解释也是一种在生产力有限条件下的无奈之举。

一个村庄有砍伐森林维持生计的传统，但是有一块林子却无人敢动，因为村里人都相信在那片林子当中住着一位保护村庄的“神”。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会发现留存森林并不是因为有“神仙”，而是出于涵养水源的需要。但是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从科学的角度来阐释涵养水源的道理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就算村庄主导者对于这种行为方式有着足够的认识与体会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的，因



为行动的最终效果还需要依靠绝大多数人的努力。

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下，要求广大的民众理解这些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贯彻一种保护的准则会对长远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但是贯彻又无从下手，说教在没有知识基础的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此时就只能通过“神”的力量来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源保护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平衡。因为之前提到的对于陌生事物所怀有的强烈的敬畏感，因此可以通过这种“未知”的力量对于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欲望进行限制。

### 三、征地拆迁“众生相”

“外嫁女”之所以能够回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对于土地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用“视地如命”来形容现在农民对土地的态度也并不为过。之前提到了不动产登记的问题，而该村庄正处于开发的前沿，所以征地盖楼是当前土地使用的主旋律，当地的盖楼比较有趣，因为在一块土地上要盖两次楼。第一次是村民自己盖楼，第二次则是开发商主持盖楼。

因为有消息说征地是按建筑面积进行补偿，于是村民们都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家的建筑面积，而由于地基一般是固定的，于是最直接的扩大建筑面积的途径就是向上发展，也就是盖楼。因此村民们都积极的在自家的空地上修筑楼房，有些甚至是通过拆除现有住房来修筑楼房。当地修筑的一般都是二层的小楼，也叫“小二楼”，当然也有修筑三层小楼的，不过这仅限于家庭情况较好的人家。在当地修筑一栋“小二楼”的费用大概在6至10万元之间，这在当地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许多村民就算是通过借贷的方式也要把楼盖起来，因为拆迁补偿的利润是巨大的，一栋几万元的小楼在拆迁时往往能值几十万，有些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甚至能得到上百万的补贴。经济的利益无疑是促进村民“疯狂”盖楼的最主要动因。

由于气候的原因，本地的作物都是一年一熟，作物基本上是玉米和一些蔬菜，十户人家只有一户会将作物拿到集市上去售卖，村里的年轻人也如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选择外出打工，村里的大片土地都由年纪较长的人在简单的耕种，土地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开发商的楼盘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涉及到村庄征地开发的具体事宜，一般是村长牵头，每户出一名代表与开发商进行谈判。大多数情况下谈判是不顺利的，开发商都是“财大气粗”，如果单户去谈判显然是不明智的，于是村民都选择商量好统一的时间组成集体来和开发商谈判，而人数的增多直接影响就是“众口难调”，这也加大了谈判的难度。其实双方的心中都很清楚，拆迁盖楼是必然的，不断的争取只是为了给自身谋得更多的利益。而在这其中也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那就是儿子多的家庭比女儿多的家庭的需求更强烈，“斗争”也更加激烈。

就所调研的村庄而言，他们在这次征地补偿的谈判中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每户都分到了几套房子，这对于许多中产阶级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更别提对于普通的农民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村民们也并不是很满意，说本村人不够团结，因为邻村得到的补偿标准比他们村要高。每户家庭能拿到的补偿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虽然在和开发商谈判时一个村是一个集体，但是每户人家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家庭最终能得到多少补偿款。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个比较的问题，许多时候村民都在想为何别人分到的比自己多而并不去考虑自家土地的实际价值。只要比别人少，就会和开发商争取，也就是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当然能争取到更多还是最基本的原则。与本村之间的比较而言，村与村之间的比较明显就弱得多了，本村人基本上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争取到补偿的多少有时也涉及一个面子的问题，因此村民之间的比较要强很多。

谈判也有失败的例子，一户人家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房子的面积并不算大，并且位置也不是很

好，开发商最初计划在这户人家的地上修一条小道，但是这户人家坚持向开发商要求分三套房子，当大多数村民都谈判完成，签署拆迁合同之时，这家人一直不肯妥协，开发商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村委也派人做过协调，但最终都没有谈成，就这样一直僵持着。现在开发商已经绕过那座房子修了路，而那座房子仍然孤零零的立在那里。

在征地补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群体，可以说是“失地户”，在以前他们本来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在正式征地时土地的所有权却并不属于他们，在这其中有许多情况，但大部分都是主动将土地的所有权交给他人的。因为几年前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甚微，而且还要投入巨大的精力，一些村民就将土地交予村中一些更愿意劳动的亲友进行耕种。因为处于熟人社会，因此在土地交接时也只是口头的承诺，并没有书面的字据。但是就算后来知道征地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这些“失地者”也不会和现在的土地所有者争取，许多时候只能表面和气，但心中却是后悔不已，因为除了正式的村规民约之外，“情理”也是调节村民之间人际关系的重要尺度。

#### 四、“外嫁女”的回归

传统被继承的一些思维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在之前的论述当中可见一斑。经验是无价的，其总以各种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并尽最大的可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转变形式之后的科学呈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也更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因为只有源于生活的东西才更容易被群体所广泛接受。知识的积累与传承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尊重传统的想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对传统“全盘接受”。

##### （一）传统观念的深厚

虽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总体的发展方向仍然是稳步向前的，在这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基本稳定的，也就是说在许多时候个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基本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在规则与模式的约束作用之下，个体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伦理规范。联系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土地问题上所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外嫁女的回归”。

虽然家族的规范有所放宽，但是一些传统仍然延续到了现在。“重男轻女”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了。在“外嫁女”逐渐回归之前，在所调查的村庄了解到，在不动产登记时，村委来人丈量土地时基本都是家里的儿子们在忙碌，在测量现场基本看到的都是男子的身影。村子里但凡有些能力的子女都已在城里定居，但在得知不动产登记的消息时，回村子里帮忙的也一定是家中的儿子们，因为他们拥有对家中土地的权利，或者说潜在的权利，如果家中的老人尚在的话。全村上百户人家在测量土地时有女子参与的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家中全是女儿而没有儿子，这是很现实的情况。第二种比较特殊，那就是一户人家的父母去世得早，家中的长女“扮演”着父母的角色将家里的弟弟妹妹抚养成人，因此家里默认了一间侧房属于她，但是就其面积而言也难以与家中男子们的土地相比。

总体感觉就是土地都是“儿子”们的，虽然女儿们的地位不断提高，分享了许多原本属于儿子们的权利，但在谈到土地的问题时还是有许多忌讳的，即使有许多家庭的父母在丈量土地时明确提出儿子和女儿各分得一半土地，也极少有女儿会触碰这根“红线”。因为无论家中的儿子再不争气，就算是不孝顺父母，但传统的观念在农村人的心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村中老人们的心中。在人们的观念中儿子是家里的“顶门人”，无论他多么不肖也是家里的“栋梁”。虽然女儿在照顾年迈的父母时付出很多，但她们都不会打家中土地的“主意”。

造成这种权利划分的最重要因素还是传统观念在发挥作用，具体表现是舆论的压力。在村庄这个小群体当中，人们之间都是十分熟悉的，如果有女儿分到了土地，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别扭”的感

觉。虽说人们的观念已经开放了许多，但就女儿分地来说还是很难接受的。在村庄中一般是男子在抛头露面，如果女儿分地就好像在说家中是女儿当家做主，儿子说了不算，因为拥有土地往往意味着对一个家庭的权利与义务。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特殊情况，如果让女儿出来当家是会让全村人瞧不起的，因此家里的儿子也会通过捍卫土地的权利来维护一家人的尊严，并且这种观念从小就在男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了，相对应的女孩子也不会对此进行反驳。不过从女儿开始分享属于儿子权利的那一刻起已经预示了“外嫁女”回归的必然。

## （二）“禁锢”的松动

《江村经济》中讲到“妇女出嫁后不再是她父亲那个族的成员，她不再参加对父亲一方祖先的祭祀，死后也不受父方下辈的祭祀”。也就是说女儿出嫁之后被人为的割裂了许多关系，甚至对于血缘的亲情也在有意的回避，但是这种现象在当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已经出嫁的女儿参加祭祀仪式就可以看出一种传统约束的松动。或许时代的发展使得宗族内部的关系不再如旧时那般紧密，同时也使得禁忌变得不再那样的严苛，以致女儿可以“大张旗鼓”的参加许多重要的仪式性活动。当然这只是我所调查村庄的情况，其代表性有待商榷。家族成员的关系已经不再需要像旧时那样通过“字斟句酌”的推敲。

时间是可以改变许多东西的，包括儿子“独享”土地的情况。如果按照之前的规则来讲，“外嫁女”是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的，但是情况之所以发生改变还是因为观念的作用。儿女的想法自然要比年迈的父母“开明”许多，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一些新的问题的出现，老年人是不会愿意做出改变的，在这其中就包括赡养的问题。虽然儿子确实有一种“先天的优势”，但是享受权利一定是以履行义务为前提的。如果只是仗着自己儿子的身份而“无条件”坐拥财产，无论周围的人如何评论，就家中父母这一关是无法通过的。毕竟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父母的手中，为了能够使自己安享晚年，家中的土地有时就成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筹码”。

如果女儿承担赡养义务同样不必理会“外嫁女”的忌讳，并且就算是不从土地的角度出发，孝顺的女儿对于父母的感情也仍然强烈。时代的发展是迅速的，在短短十几年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内个体思想当中的禁锢也可能被打破。传统观念在个体心中是一回事，但是在“物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个体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理性经济人”的状态，大家仿佛形成了一种共识，女儿与儿子共同赡养父母，而父母很早就将土地分给承担义务子女。女儿也能得到土地，甚至会有多于儿子的情况，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外嫁女”回归了。

## 五、总结

虽然传统观念仍然是人们在处理事务过程当中的首要选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越发的多样化，在对于传统进行考虑之外，现实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外嫁女”的回归无疑就是一种对于传统规则的挑战，但是对于这种挑战规则的事情各方都选择了默许，包括土地利益受到挑战的儿子们在内。社会环境的变化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首要的，因为传统观念的变化也是以现实的实践情况为前提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许多文化与选择的冲突，但是冲突的存在无疑也预示着下一次融合的到来。传统的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每次变化都预示着新的希望。

## 参考文献：

- [1]樊淑敏, 2009, 《审美视阈中的土地崇拜文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刘雅馨, 2014, 《探析农村“外嫁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以外嫁女征地补偿费为视角》，《法

制与社会》，第十六期。

[3]王凤梅，2010，《1949-1978年中国农村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山东省为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期。

[4]柏兰芝，2013，《集体的重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以“外嫁女”争议为例》，《开放时代》，第三期。

[5]费孝通，2014，《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 作者简介：董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8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房子琪

※ ※

### 第七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换届会议在昆明召开

11月6日至8日，第七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换届会议在昆明召开。我校陈阿江教授、施国庆教授、吴玲编审、陈涛副教授等参会。

11月7日上午举行的大会开幕式上，陈阿江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环境社会学专委会的发展历程、第五届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以及2016年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并期待中国环境社会学取得更好的发展成绩。

开幕式结束后，陈阿江教授和中国社会学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玉林教授分别作了题为《环境社会学体系建构的新尝试——以社会问题为视角》和《人类世时代的长江：生命衰减的社会动力》的主题演讲。

8日上午举行了专委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大会。陈阿江会长作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陈涛副秘书长作关于《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修订说明、包智明副会长作新一届理事会换届工作报告。随后，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大会推选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包智明教授担任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阿江教授、包智明教授担任副主任。我校顾金土教授担任常务理事，施国庆教授、吴玲编审、陈涛副教授担任理事，陈涛副教授兼任副秘书长。

# 性观念与性行为错位状况下的个体适应性研究\*

——以中国青年的一夜情行为为例

吴迪

---

**摘要：**在现代社会，性活动被看作成一种净化欲望的解释学。性被放进了各种规范之中，人们性行为的自由空间被压缩。作者发现部分青年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他们在不接受一夜情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一夜情行为。在一夜情行为发生之后，他们产生了一系列的诸如焦虑、自责、悔恨等负面情绪。面对这些负面情绪，他们采用自我掩饰、逃避道德、反抗与重构道德、求助社会网络来缓解负面情绪带来的不适应，进而转变对一夜情行为的看法。

**关键词：**一夜情行为 社会网络 自我掩饰 反抗与重构 逃避道德

---

## 一. 研究背景

(一) 从享用快感的美学到净化欲望的解释学

福柯曾经提出：“人们的性活动不再是享用快感的美学，而是一种净化欲望的解释学。”<sup>[1]</sup>按照福柯所说，在基督教发展之前，人们进行性活动仅仅是单纯地享用性爱，以及性爱所带来的快感。性就如同饮食一般，被看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行为。古希腊人认为，性活动本身并没有对与错之分，它的各种方式也没有对与错之分。唯一有错的只在性活动的数量上。只要不过量，性活动都是正常的。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性活动被看作成一种净化欲望的解释学。人们把性放进了各种规范之下，人们在性行为上的自由空间被压缩。因此，人们不在把性看作是与饮食一样，是正常的生物行为。转而将之神圣化，用各种“教条”规范它，使其从表面上被披上了单一的标准化的形式。

(二) 中国青年的性行为特征

根据三次全国性的关于性的调查，作者发现中国青年的性行为具有阶层性、虚拟化、多元化、交易化的特征。阶层性是指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性行为：阶层越高的人，其性生活越丰富、性交往越多。虚拟化是指青年对“网上性爱”的参与程度的提高。多元化包括对象的多元化与性行为方式的多元化。对象的多元化是指多伴侣情况具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元化是指人们开始应用各种性技巧。交易化是性交易行为的增多，存在一定规模的性服务群体。

(三) 中国青年的性观念趋势

目前，青年性观念变化主要在于：对再婚的接受、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sup>[2]</sup>。以及多元化的倾向：大多数人高度认可爱情原则、自愿原则、忠诚原则、小部分人对一夜情行为表示接受等<sup>[3]</sup>。对再婚的接受是指人们逐渐接受了离婚者再婚、丧偶者再婚。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说明“贞洁”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人们不再谴责婚前性行为。爱情原则是指人们认为性与爱是结合的，性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的。忠诚原则是指恋爱或者婚姻关系之中对另一方的忠诚。自愿原则是指双方的婚姻关系、性关系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之上。

## 二、“一夜情”的概念界定

---

\* 本文已刊发于《中国性科学》2020年第7期。

刘中一提出一夜情是指在网络上认识的，双方具有一定的感情来往，但没有涉及到金钱交易的，也不是为了婚姻的基于双方自愿的性行为<sup>[4]</sup>。张楠将一夜情仅仅当作一种性行为，因为“它是偶然发生的性行为，往往只有一次，最多两三次。它是双方出于性欲的目的，往往发生在不熟悉的人之间<sup>[5]</sup>”。黄盈盈认为一夜情是不认识的两个人，在很短暂的接触之后，发生性关系。这一过程并不涉及金钱交易，同时次数往往只有一次<sup>[6]</sup>。虽然学术界没有对“一夜情”进行统一的概念界定，但是从以往学者所下的定义来看，一夜情具有短暂接触、次数很少、没有金钱交易与感情纠缠、事后分开的特点。因此，作者在本研究中，将“一夜情”界定为双方通过某种方式认识的，具有短暂接触的，自愿发生的没有涉及到金钱交易与感情纠缠的性行为，这种性行为通常只有一至三次。

### 三、问题提出

#### （一）现象描述——性观念与性行为的错位

目前，在性观念方面，持开放态度的公民与持保守态度的公民，基本形成了大体上势均力敌的局面<sup>[7]</sup>。在对于一夜情的接受程度的调查，30.82%的人表示对一夜情行为表示可接受，29.13%的人表示对一夜情行为的态度是无所谓，40.05%的人表示反对一夜情行为<sup>[8]</sup>。

在社会生活中，一夜情发生率从2000年的2.0%上升至8.7%<sup>[9]</sup>。将人们对一夜情的态度与其发生率两个数据进行比对，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对一夜情表示接受态度的人远远多于发生一夜情行为的人，因此发生一夜情行为的人都对一夜情行为表示接受。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在个案调查中，作者发现有一部分人在不接受一夜情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夜情行为。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他们即使有着较为保守的性观念，可是其性行为却较为开放。

#### （二）提出问题

在个案调查中，作者发现有一部分人在对一夜情行为表示完全不接受的情况下，出于某些原因发生了一夜情行为，并且在行为发生之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后悔、自责、焦虑等负面情绪。于是，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自己的后悔、自责、焦虑等情绪。基于这种现象，作者提出：在一夜情行为过程中，个体如何突破原有的观念，保证其行为的产生与延续？也就是说，在个体的性观念与性行为错位的情况下，个体运用了什么样的机制，应对了行为发生后的负面情绪，保证了之后一夜情行为的发生。

### 四、研究方法

#### （一）样本介绍

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的选取标准为个体应该在最初的一夜情行为后具有负面情绪，通过一定的措施应对了这些负面情绪，进而保证了一夜情行为的延续。作者从联系到的十五位研究对象中，重点筛选出三位符合本次研究标准的研究对象。关于研究对象一些基本的信息如下：

表1：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编号	化名	性别	年龄	生活城市	职业
01	小勇	男	28	西安	服务员
02	小林	男	32	太原	工厂工人
03	小敏	女	27	北京	服务员

#### （二）个案访谈与访谈内容

本次研究的方法主要为个案访谈，研究者通过一一访谈的方式获取相关的信息。访谈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基本信息、过程问题、反思与感受。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访谈对象的性别、年龄、生活城市、职业等。过程问题主要包括双方从认识接触到发生一夜情行为的整个过程。反思与感受主要包括对一夜

情行为的自我看法与感受、对爱与性的看法、如何应对一夜情行为带来的负面情绪等等。

## 五. 资料分析

### (一) 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在心理学上又被称作负性情绪，是指一种处于低落、不开心、焦虑、自责等主观体验。负面情绪往往是由日常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引起的<sup>[10]</sup>。在调查中，三位访谈对象均表示在第一次，甚至是前几次一夜情行为后产生了自责、悔恨、焦虑等负面情绪：

【小勇】我第一次做完之后，感到过难受。觉得约炮这种行为不好，我个人信佛。我觉得这样做不对，对佛不好。

【小林】当时大脑空白的，我不相信自己做出了那样的事，我为啥不在见面之前就放弃见面！当时觉得这（一夜情行为）见不得人

【小敏】完事后我觉得自己变坏了。

从小勇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他的焦虑与自责，怕自己的行为对佛不好。从小林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悔恨，后悔自己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从小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她的自责，认为自己不再是“好人”，认为自己已经变坏了。总之，三位访谈对象在一夜情行为后，均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

### (二) 处理途径

根据访谈收集到的信息，作者发现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向朋友寻求帮助、逃避或反抗主流的道德标准、自我欺骗等途径来应对他们在一夜情后产生的后悔、自责、焦虑等负面情绪。作者将不同的途径汇集在下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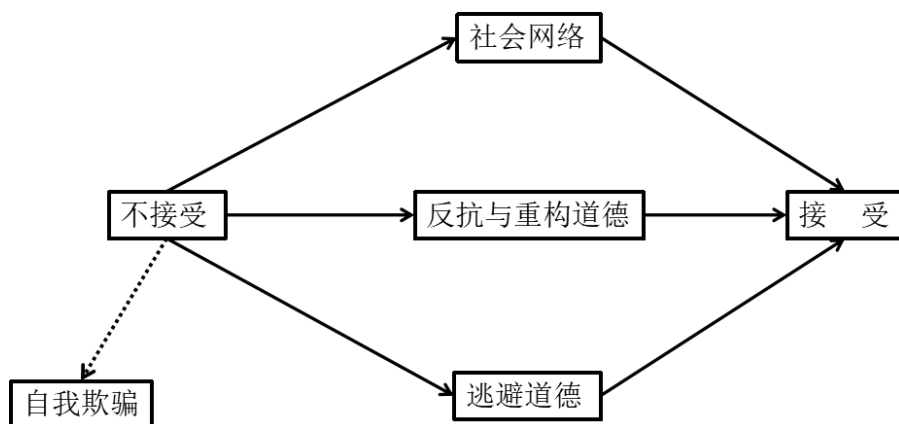


图 1：个体选择途径汇总

#### 1. 自我欺骗

小勇在访谈中表示，在一夜情行为后他产生了焦虑与自责的情绪，怕自己的行为对佛不好。因此，他在当时选择自我掩饰，假装自己并没有发生一夜情行为：

【小勇】我事后，就告诉自己，这只是梦而已。我可以把它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小勇通过自我欺骗的方式，来缓解一夜情行为发生后的自责与焦虑。他不断说服自己去相信自己并没有发生一夜情，试图使自己忘记这一回事。但是自我欺骗只暂时的缓和负面情绪的办法，并没有改变个体对一夜情行为的看法，小勇依旧对一夜情行为持一种不接受的态度。

#### 2. 社会网络

因为自我欺骗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应对方法，所以小勇在之后更多地是求助于有过同样经验的朋友：

【小勇】当时加了一些qq群，有关同城恋爱交友方面的。在里面认识了几个网友。跟他们聊的很来，他们会聊一些他们一夜情方面的事。聊的多了，我就觉得一夜情也就那样。大家都在做的事，有啥不好。

可以看出，小勇是通过社会网络对自己的影响，转变了对一夜情行为的看法。小勇通过跟具有相似经历的人聊天，发现其他人也有过一夜情行为，便觉得这是一件大家都在做的事，进而转变其对一夜情的行为，认为这并非是一件不好的事。

### 3. 逃避

小敏在访谈中流露出他在一夜情行为之后的自责，认为发生一夜情行为后的自己不再是“好人”。小敏表示，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她并不去想好与坏，关于社会上主流的性道德视而不见：

【小敏】我之后一看到微博上关于约炮的内容立马就跳走（指忽视相关内容），（一夜情行为）是好是坏，与我无关。那是我自己的事，与他们无关。

可以看出，小敏是通过对社会主流道德的逃避，而逐渐接受了一夜情行为。小敏在受到以往接受的性道德与自己的性行为出现相违背的情况下，决定放弃社会主流的性道德，不再去理会他人的看法。

### 4. 反抗与重构

从与小林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在一夜情行为后的悔恨，不敢相信自己“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当被问及他是如何应对处理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时，小林表示：

【小林】后来慢慢觉得说这不好的人有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很正常嘛。这就跟吃饭一个道理。反正，认为这不好的人就是太保守，太low（低级）。

不难看出，小林通过对社会主流的关于性的道德标准的反抗与重构来改变自己对一夜情行为的看法。小林指出社会上多数人认为“这是不好的事”，进而对其进行批判，认为这样想的人是“有病”。此外，小林重构了有关一夜情的行为的道德标准，认为这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就和吃饭一样，进而完成了对一夜情行为看法的转变。

## 六、相关探讨

### （一）被主流性道德构建的越轨行为

目前社会主流对于一夜情行为的接受程度并不高，社会主流性道德依旧会对一夜情行为进行批判，认为这是一个人不洁身自好的表现。越轨行为是指个体或者群体违反了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法律、道德的行为。因此，在个体内化了社会主流性道德的前提下，其进行的一夜情行为看作一种越轨行为。这种越轨行为是被主流性道德所构建出来的，是因为不同道德看法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越轨行为。随着社会主流的性道德的转变，一夜情行为也有可能不再是一种越轨行为。

此外，对法律的越轨，与对道德的越轨带给个体的感受是不同的。与道德相比，法律是外在强制性的，道德则是内在强制性的。对违背法律的惩罚往往是外在的。对违背性道德的惩罚往往是心理层面的。正如访谈对象在违背社会主流的性道德后产生的一系列的负面情绪。对性道德的违背往往只有当事人知晓，几乎是不会公开谈论的。所以，对于性道德的违背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不适。这种隐藏式的对性道德违背带来的不适，是可以通过个体的社会性调试来处理的。根据以上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研究对象主要通过社会网络、逃避或反抗重构主流的道德标准、自我掩饰等途径来应对一夜情行为后的负面情绪。

### （二）社会网络的社会支持与同化作用



社会网络是指有社会成员相互互动而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社会网络具有社会支持的作用<sup>[11]</sup>。社会支持是指社会成员通过物质或者精神的手段给他人提供帮助。社会支持主要分为工具性支持与情绪性支持两大类。工具性支持是指基于某一目的，而对他人提供帮助。情绪性支持是指不在意是否要达成某一目的，而主要是向他人提供情绪上的支持。在作者的访谈中，小勇表示其通过与朋友进行交流沟通，最终改变了对一夜情行为的看法，不再受焦虑、自责等负面情绪的困扰。在这里，小勇的社会网络主要向小勇提供的是情绪性支持。帮助他从负面情绪中慢慢走出来。

同时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具有同化的功能。共意的形成和转化以原有的共意作为基础，以人际网络作为个体认知传播、加工、融合的导管<sup>[12]</sup>。因此，小勇的社会网络不仅帮助他应对负面情绪，还使他转变了对一夜情行为的看法。小勇在建立的社会网络时，并不对一夜情行为持接受的态度，而是基于具有相同的经验。正是社会网络的同化作用，才转变了小勇对一夜情行为的看法。

### （三）对道德的反抗重构与逃避

道德是指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使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当下，主流的性道德对一夜情依旧持一种不接受的态度。因此，个体在选择一夜情行为的时候，必定会面对主流的性道德带来的压力。根据访谈资料，作者发现在面对性道德带来的压力时，个体可以选择反抗与重构、逃避的方式来应对。

反抗与重构是指个体放弃现有的主流的社会道德，转而去构建一套自己所认可的道德框架。比如小林通过对社会主流的关于性的道德标准的反抗，指出认为“一夜情行为不好”的人是“有病”。并且重构了有关一夜情的行为的道德标准，认为这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

逃避则是指个体在采取社会行动时，选择忽视社会道德。这使个体能够摆脱社会道德的约束，获取一定的行为自由空间。正如小敏在受到以往接受的性道德与自己的性行为出现相违背的情况后，决定放弃社会主流的性道德，不再去理会他人的看法。总之，在个体行为与社会道德出现冲突的情况时，个体可以选择反抗与重构道德、逃避等方式摆脱原有道德的约束，进而为自己的行为争取一定的自由空间。

### （四）自我欺骗的作用

在访谈中，小勇表示他通过不断说服自己去相信自己并没有发生一夜情，试图使自己忘记这一回事。“使自己相信自己并没有发生一夜情”就是在自我欺骗的一种行为，通过欺骗自己并没有做出某一行为，来缓解行为发生后的负面情绪。戈夫曼在其“拟剧论”指出，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进行“印象管理”。印象管理是指个体在他人心中塑造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印象的过程。印象管理有许多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叫做“理性化表演”。理想化表演是指个体掩饰违背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的行为，而表现出与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相一致的行为。照此看来，小勇的自我欺骗行为便是一种“理性化表演”。小勇把违背社会主流性道德的一夜情行为隐藏起来，以此来与社会主流道德保持一致。

## 七、相关结论

根据作者的调查，发现在社会生活中，有一部分人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出现了错位的现象。正如作者所访谈的对象，他们不接受一夜情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夜情行为。他们在一夜情行为发生之后，他们产生了一系列的诸如焦虑、自责等负面情绪。而之所以个体会产生这些负面情绪，并不是因为其一夜情行为伤害了他者，而是因为一夜情行为是被主流性道德构建的越轨行为。目前社会主流对于一夜情行为的接受程度并不高，社会主流性道德依旧会对一夜情行为进行批判。由此，将会使个体在一夜情行为后，产生不适的负面情绪。

面对这些负面情绪，他们采用了自我掩饰、逃避道德、反抗与重构道德、依靠社会网络来缓解负面

情绪带来的不舒适。其中对道德的逃避、反抗与重构，依靠社会网络的支持都成功使个体转变了观念，从不接受一夜情行为到接受一夜情行为。从中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具有社会支持与同化的功能，使人们快速的接受一种新的观念或道德。个体可以选择反抗与重构道德、逃避等方式摆脱道德的约束，进而为自己的行为争取一定的自由空间。自我欺骗行为便是一种“理性化表演”，能够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的要求保持一致。

### 参考文献：

- [1] 福柯，1989，《性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2] 姚爱琴、哈玉红、陈维荣，2014，《当代中国性道德主流认同新变化及其理由》，《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 [3] 陈敏燕，2015，《当代青少年的性道德认同现状调查及其教育启示》，《中国性科学》第10期。
- [4] 刘中一，2011，《过程与特征：网络一夜情的质性研究》，《典型研究》第8期。
- [5] 张楠，2014，《场域与惯习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一夜情”》，《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6] 潘绥铭、黄盈盈，2013:307，《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北京:人民出版社。
- [7] 潘绥铭、黄盈盈，2013:418，《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北京:人民出版社。
- [8] 陈敏燕，2015，《当代青少年的性道德认同现状调查及其教育启示》，《中国性科学》第10期。
- [9] 潘绥铭、黄盈盈，2013:308，《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北京:人民出版社。
- [10] Primack, B. A., Shensa, A., Escobar-Viera, C. G., Barrett, E. L., Sidani, J. E., Colditz, J. B., & James, A. E. (2017), *Use of multipl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nationally-representative study among U.S. young adul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9, 1-9.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11.013>
- [11] 王思斌, 2016:91,《社会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2] 曾鹏、罗观翠，2006，《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开放时代》。

☆ 作者简介：吴迪，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徐婧怡

# 宗教何以促进社会信仰“回归”？

——基于涂尔干人性二重性的分析视角

吴 尔

---

**摘要:**宗教其本质是由社会事实所反映出的集体意识，是一种社会产物。宗教生活亦是一种由个体所组成的集体生活，存在着社会性与个体性并存的二元结构，具有促进社会整合、加强人际交往、重建个人信念、提升道德教化以及提高个人发展等功能。当前社会，人们精神世界普遍被物质、财富、欲望等充斥着，导致显得焦虑不安、道德“滑坡”等社会信仰问题的出现。众所周知，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具有二重性特征，与宗教本身特性存有耦合性关系。基于此，本文系统分析宗教的社会本质及其功能，并从人性二重性视角探寻社会信仰缺失的理论根源，以期实现宗教二元属性与人性二重性的有机结合，为整合与重建社会道德信仰体系提供学理依据，促进社会信仰的“回归”。

**关键词:** 宗教社会学 人性二重性 神圣与凡俗事物 社会整合

---

## 一、涂尔干宗教社会学思想

涂尔干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力至今深远，尤其是关于宗教及其功能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总体来说，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社会唯实论和社会整体观<sup>[1]</sup>。从社会唯实论来看，涂尔干认为社会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超越个人的社会性质；从社会整体观来讲，涂尔干认为，社会的实质是由每个个体相结合而成的整体，而社会性质并不是由每个个体特征简单的加总而成，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所致的结果。由此，涂尔干将社会与个人之间划分出了不同的层次与维度，而每个层次和维度将受到不同的规律所影响。宗教相对于社会来说，其本质就是一大社会事实，或者可以称之为社会现象。对此，涂尔干将宗教视之为社会事实特有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相关探讨。

### （一）宗教的背景

在对宗教社会学研究方面，涂尔干认为要想去寻找我们所能观察得到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宗教，就必须首先确定宗教意味着什么<sup>[2]</sup>。涂尔干强调要从最简单的原始社会中去寻求研究的源头，特别是对原始部落做田野调查，这样更加能够便捷地收集到所需的资料来进行相关分析。相比之下，简单的原始社会要比拥有复杂社会机构的社会更容易洞察出宗教的本质。据此，为了更好说明宗教的起源及其特征，涂尔干将研究的田野调查点定在澳大利亚阿兰达部落，研究对象为该部落的图腾。通过对澳大利亚阿兰达部落图腾信仰的追溯，发现阿兰达氏族的外婚形式及其组织形式决定了他们的图腾信仰。而这种图腾信仰，在原始社会中往往是由氏族中的人民在共同劳动和生活中所形成的，特别是集体的庆祝活动所呈现出的那种集体氛围，能够衍生出氏族中强烈的集体意识。这种图腾制度并不是仅仅指的是关于动物、人和图像的宗教，而是由每种图腾所演化出的人们所敬仰的神。这些神并没有一个十分具体的名字，但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能够找到对应的对象事物。由此可见，涂尔干所阐述原始部落中的图腾信仰其实质是指这个部落的本身，只不过是具体的表现形式给演化成为了一种人们所信仰的图腾文化而已。人们具有的这种宗教意识仍然是来自于自我的现实社会环境，而所信仰的神灵只不过是社会力量的象征而已。

### （二）宗教的内涵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宗教衍生的根源来自于现实生活社会环境,而本质特征便是社会所存在的事实。从涂尔干的相关著作中可以看到,涂尔干将宗教定义为:宗教是一种与众不同、不可冒犯的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sup>[3]</sup>。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信仰和仪轨是宗教现象的两种基本形态,而这两种基本的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信仰相当于一种社会环境表现的状态总特征,而仪轨则是一种人们所表现出来行为方式。在涂尔干看来,宗教其实是将世界划分为了两种基本形式,即世俗事务和神圣事务,这两种基本形式与巫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宗教的神圣性主要在于宗教具有一定的社会信仰和一定的仪轨,虽然巫术也存在着一定信仰与仪式,但是巫术的相应追随者并没有联合成为一个群体,定期过着一种共同生活,而且巫术所存在合法性受到社会质疑。在本质上来看,巫术和宗教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宗教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是人们集体生活的基本形态及包括人们的集体意识,而巫术只是小部分社会群体组织的一种形式,其信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组织形式并不具有巫术教会等合法性。总之,宗教是来源于社会存在的事实,是集体意识的反映,有效地将世界划分为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的两种界限,与巫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区别。

### (三) 宗教的本质特征

在涂尔干看来,宗教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群体所反映出的集体意识,是一种将社会现象所神化的社会产物。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们通过参与到宗教活动仪式中将个人的情感意识纳入到共同的道德体系里,例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参与图腾时集体欢腾的场面中就含有人们的集体情感与意识。在这种集体活动中,人们往往会受到集体意识的影响,克制自己的情感私欲,受到宗教规则的归顺,由原始社会形成的机械团结向有着共同信仰信念的有机团结转变。社会中人们的自然属性,在宗教的规训之下,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等社会属性,使自然人更加具有社会人的性质,让一个个个体有机结合凝聚成为了一个强大的集体。从某种程度上看来,宗教是一种社会缩影。

### (四) 宗教的社会功能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信仰与仪轨的结合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大致分为几大类型,即社会的整合功能、个人信念重建功能、道德教化重塑功能以及发展性功能等。

#### 1、社会整合功能

宗教之所以拥有着社会整合功能,关键在于宗教中的社会信仰发生作用,宗教经验与传输中的神圣观念均是来自集体生活的产物,而各种以集体形式展现出的仪式则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从集体宗教活动中人们潜移默化地受到宗教所传达出的社会规划与价值,从而有效促进了社会整合度的提升。

#### 2、道德教化重塑功能

宗教将世界分为了凡俗事物与神圣事物,神圣价值观念深入宗教信徒心目中,让人们始终相信一定会有神灵的存在,在神圣的氛围中能够让人们无形中感受到自己心灵受到了净化与提升,甚至对于一个心怀邪念的人也能够从中受到启发,转变自己的心念,向善向美的方向发展。

#### 3、个人信念重建功能

宗教具备一定的社会信仰,引导人们对神圣事物的向往。当人们遭受苦难备受情感冲击时,在宗教中往往能够找到归属感。其宗教的一些仪式能够使人感到振奋,相信神灵在冥冥中能够帮助他度过艰苦岁月,得到神灵的支持,从而减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痛苦与无奈,帮助人们重建个人的社会信念。

## 二、人性二重性内在失衡与对立:社会信仰缺失的一个理论溯源

对于人的本质问题探讨,涂尔干受到笛卡尔以及诸多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人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存在着二重性特征。人的这种二重性根源于每

个人的身体与灵魂，且在受到不同的社会规范影响，人们的心理活动或行为方式也随之不同。关于人的二重性，涂尔干主要从自我感觉与社会道德、个体与集体、人的身体与灵魂等三大方面进行阐述。在社会规范的约束之下，人性的二重性似乎处于一个相互平衡的有机整体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发生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存有断裂现象，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多元价值观等因素导致了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等社会信仰问题的出现<sup>[4]</sup>。按理说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更能够促进人的社会信仰提升，遏制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的出现。然而，现实却并未真正出现那种良好局面。追根溯源，问题的本质还是在于人的自身特性，人的内在二重性持续对立存在，导致了人的二重性尚未真正实现有机融合于一体，部分人的“自然属性”高于“社会属性”，致使他们欲望不断扩大，利益优先、个人优先等价值观念充斥着他们的内心。

#### （一）个体与集体之间对立：社会融入度低的内在因缘

涂尔干从人心结构来探讨人性本质，认为人心的结构既有人的自我东西，又有不属于人的自我东西。从人的个体性来看，每个人的身体本能及相关的欲望需要等均属于个体的。在人的心理层面上看，每个人的本能、灵魂等属于个体，而对社会事物评价的某些概念及道德活动等又是属于社会层面。人只有通过思维与本能之间相互沟通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单纯的人体是不能构成人的基本单元，只有通过参与到社会中进入的社会的集体内才能够全面塑造完整的人，不然的话人就如同原始状态一样与自然界的动物之间毫无区别。在涂尔干看来，人在生活中存有这两种基本状态，即个体与集体状态。比如，人在睡觉、吃饭时是属于自我的个体状态，在参加宗教活动仪式时就处于社会的集体状态，而这种集体状态人不但享用到自己身体和心灵，也享用到了集体所带来的社会欢腾愉悦感。从该层面来看，本文作者理解是，如果人过于追求自我的状态，将社会集体状态的一面处于边缘地带的话，将会造成社会融入度低的问题，仅仅活于自我的世界里，感受不到社会集体所带来的那种欢腾的精神愉悦感。倘若一个社会中的人均是处于自我个体的状态化，那么这个社会整体上将会缺乏集体意识，丧失集体精神与社会信仰。

#### （二）自我感觉与社会道德之间失衡：个人主义畅行的根源

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涂尔干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我感觉倾向，例如，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头脑中对事物发展的想象以及对世界纯自然的知觉看法等，均是属于人们的真实自我的内心。这种人的“自然属性”亦是塑造每个人自我个性的内源动力。从社会中人们行为的表征上来看，人的自私自利以及对金钱权利上的欲望与贪婪，均归属于人的“自然属性”范畴。对于人的社会道德方面，与“自然属性”彼此相对立，往往是受社会制度、规则以及人们日常的行为规范所制约。从根本上讲，人身上所具有的社会道德其本质是人们希望通过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来实现自身之外的目标，与此同时，人的内在的“自然属性”又不同程度上的影响着自我行为方式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看来，“人类既是天使，也是魔鬼”，不会只成为其中的某一个。当人性“魔鬼”的一面占据着人的“天使”一面的时候，人的自我感觉与社会道德之间就产生失衡，极度容易导致个人主义的出现，将自我的感觉放于首位，而对社会道德方面有所忽视。就如现今，部分社会人为了寻求自我感觉上的满足，大肆炫耀自己的财富与社会地位，或官本位思想盛行，只考虑自我价值，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甚至以损害他人的社会利益，违背社会道德规范从事些违法活动。总之，个人主义畅行的根源在于人性二重性的失衡，自我感觉与社会道德之间相互对立，其最终导致社会信仰缺失，致使社会道德“滑坡”的出现。

#### （三）身体与灵魂之间不协调：知行难以统一的根本溯源

涂尔干认为，人的身体与灵魂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的形式，至于人的身体来说，相当于物的形式，而

人的灵魂则相当于人的心的形式。虽然身体与灵魂紧紧相连于一体，但却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从感官经验上看，身体是物质世界不可缺少部分，而灵魂的居所却在神圣界<sup>[5]</sup>。根据涂尔干的说法，笔者认为人的身体与灵魂之间一直是处于一种难以协调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之下可能心理所想的表现出灵魂的一方面与人的身体行动间难以做到统一。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着一部分人心里想的均是自私自利之事，内在灵魂并不是十分纯洁，然而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身体行为上却表现出一副文质彬彬，具有崇高修养的秉性特征。这往往就会导致人们难以做到知行统一。总体上看，身体与灵魂间需要不断进行更加熟悉对话，使内心灵魂真正与身体相协调，避免知行不一而造成的社会道德“滑坡”而引起的社会信仰缺失等问题的出现。

### 三、社会信仰“回归”：宗教与人性二重性联结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传统的社会信仰受到了冲击，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社会焦虑等问题越发突出，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社会信仰的缺失从本质上讲主要是因为人性二重性始终是对立与失衡的关系，人的“自然属性”某种程度上高于“社会属性”，导致了部分人过于追求自我利益与价值，而忽视了社会道德规范，或者过于注重自我得失，使其造成社会焦虑更为严重。社会信仰的回归，应当加强宣传与弘扬传统文化，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此之外，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其信仰回归路径作细微补充。正如上文所述，宗教具有一定的正向社会功能，而且具有个体与集体二元属性，这与人性二重性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为此，社会信仰的“回归”也可以将宗教与人性二重性相联系，发挥出宗教的社会正向功能，“情感陶养”启蒙心智、调和情感以塑造艺术化的“人心”并实现艺术转向和人生美化，进而完成生活改良和社会改造<sup>[6]</sup>。具体来看，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充分发挥宗教的社会整合性功能，缓解人的个体与集体二重性的对立矛盾。对于我国的宗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sup>[7]</sup>，宗教是一种建立在某种信仰基础上的文化体系<sup>[8]</sup>，要积极倡导社会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定期举办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宗教仪式，通过科学合理的宗教理念传授、宗教仪式的举行，使人们能够在宗教仪式中感受到集体力量，有助于强化集体意识，弱化个体的本能属性，在人们心目中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价值观念，从而缓解人的二重性中个体与集体对立矛盾，提高社会整体融入度。

其次，充分发挥宗教道德教化重塑功能，平衡个人感觉与社会道德之间关系。宗教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传达着神圣价值观念，将世间万事万物划分为了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在行会内部济贫扶弱、为生者和死者灵魂得救祈祷<sup>[9]</sup>，能够帮助人们清晰地辨别出真善美，有助于帮助人们净化心灵。在现实生活中，部分人难以平衡好个人感觉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过度追求自我感觉，从事一些违反社会道德的事情。由此，充分发挥宗教在人性道德教化重塑功能，使一些心怀邪念的人从中受以启发，转变心念，向善向美方向发展。

最后，充分发挥宗教的个人信念重建功能，促进人的身体与灵魂之间相互协调，帮助人们真正做到知行统一。人无信念则无魂，没有信念的人将会使自我随心所欲，难以克服现实中种种诱惑，导致了身体与灵魂不相协调。由此，应充分发挥宗教的个人信念重建功能，通过宗教活动，使人从中感受到修行的强大信念，并从中受以启发，改变自我的一些不良的社会行为。或通过宗教讲述一些宗教经典历史典故，引导信徒爱国守法、抑恶扬善、服务社会等社会信仰。总之，需充分发挥好宗教的个人信念重建功能，让人们心中有信念，行动有目标，使身体与灵魂同时在路上，做到知行统一。

## 参考文献:

- [1]尹广文, 2009, 《宗教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角色扮演——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研究》,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第3期。
- [2]爱弥尔·涂尔干, 1999: 27,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东、汲喆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3]张玉良, 2009, 《论涂尔干的人性与社会二重性思想》, 《求索》第9期。
- [4]陈纳, 2013, 《宗教与建构一个好社会的思考》, 《世界宗教文化》第3期。
- [5]涂尔干, 2005, 《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社会条件》, 《涂尔干文集》第六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6]李圣传, 2020, 《情感启蒙与“诗教”功能的审美重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再论》, 《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 [7]王月清、赵晓峰, 2019, 《习近平新时代宗教功能观初探》, 《理论学刊》第5期。
- [8]荆玉梅, 2017, 《宗教的心理引导功能浅析》, 《中国宗教》第2期。
- [9]陈建军, 2018, 《试论中世纪英国行会的宗教功能》, 《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

☆作者简介: 吴 尔,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白静艳

※ ※

### 施国庆教授参加上海 2020 参事国是论坛暨长三角参事专题研讨会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办, 江苏、浙江、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协办的“上海 2020 参事国是论坛暨长三角参事专题研讨会”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三省一市的百余名政府参事、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共同探讨“长三角城市如何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战略优势、体现更大作为”, 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言献策和贡献真知灼见。“参事国是论坛”自 2007 年创办, 至今已连续举办 14 届。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特聘研究员施国庆教授应邀参加论坛并作了“推动长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主题发言。他指出:“长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篇章, 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环。”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是一体化关键; 推进长三角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主要发力点是加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 推进养老服务建设、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能力、强化文化旅游合作、实现教育科研资源共享、优化人力资源市场配置六个关键点; 实现长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从构想变为现实的五大路径包括制度改革是根本、利益共享是动力、法制规范是保障、技术支持是载体、长板传递是模式。发言受到与会专家好评, 重要观点和建议被《北京西路瞭望》等权威媒体报道。



## 时空视角下疫情中的社会工作服务反思

——以参与式观察武汉线上抗疫社会工作服务为例

房子琪

**摘要:**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社会工作在推动人文关怀、危机干预、情感支持、资源链接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前提下，本文以笔者作为社会工作者参与为期近三个月的武汉线上抗疫社会工作服务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透过时空视角反思在特定情境中，社会工作服务在时间（历时性）与空间（共时性）的作用下服务对象的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会工作的方法三要素的表现差异。以此来证明在笔者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中，时间与空间形塑了特定情境下的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从而倡导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服务过程中重视时空因素。

**关键词:**参与式观察、时空视角、特定情境、社会工作服务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事件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此次新冠疫情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力、影响力远远大于以往公共事件。疫情发生后，社会工作者纷纷加入救助工作，都在追问一个问题，该做什么，怎么做？<sup>1</sup>事实上，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具有人文关怀与助人特性的专业，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以笔者参与的武汉线上抗疫社会工作服务为例，社会工作在危机情境中的人文关怀、危机干预、情感支持、资源链接等力量凸显，彰显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与发展潜力。

疫情伊始，武汉以社会工作者机构为纽带，链接民政部以及社区基层志愿组织等资源，迅速组建武汉线上志愿组织，为处于困境中的武汉居民送去服务。经历了前期的报名、培训等工作，笔者大概2020年一月末以社会工作者身份加入“武汉青山区居家隔离抗疫后援团”，与团队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心理咨询师以及社会工作者一起为青山区居民提供线上服务。在300多人的“武汉青山区居家隔离后援团”微信服务群中，担任社会工作者兼群助理一职。每天值班三小时，为居家隔离的居民提供服务：前期情况紧急时，与其他专业老师一起合作为群中有需求的居民进行有关心理疏导、科学知识宣传、情感支持、链接资源、病情线上诊断、居家保护建议等的服务；后期情况缓和，在微信群中带领居民开展线上趣味问答活动，缓解居民居家隔离的紧张心情，并同时为其宣传防疫科学知识、生活技巧等，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在近三个月的服务中，即参与式观察的整个过程中，笔者发现此次线上抗疫社会工作服

<sup>1</sup>任敏 陈政军. 专业与情境：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救助中的发展 [J]. 社会工作, 2020.



务与以往的社会工作服务在时间与空间角度有所差异。基于此,服务结束后,透过时空视角对整个线上社会工作服务过程进行反思与复盘。

一方面,从时间角度来看,即“历时性”角度看待此次线上社会工作服务,可根据疫情的轻重缓急分为前期、中期、后期阶段。笔者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从一月底到四月底。其中,一月底到二月中是疫情爆发初期,情境也最为危机,居民此阶段情绪不稳定,处于应对危机发生阶段,此阶段可以看作前期情境危机期;二月底到三月底为疫情缓和期,此时间段情况有所缓和,居民情绪逐渐开始稳定,处于应对危机的阶段,此阶段可以归纳为中期情境缓和期;四月初到四月底可归纳为疫情爆发后期,在这一阶段中居民大都接受了这个事实,积极响应国家居家隔离的政策,处于解决危机与恢复阶段,此阶段可以归纳为后期隔离与恢复期;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来看,即“共时性”角度看待此次线上社会工作服务,可以根据线下到线上的空间变化分为现实服务空间与网络服务空间。与传统的一对一、面对面的社会工作服务相比,此次危机情境下的社会工作服务多为线上服务。原因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者、医生、心理志愿者在武汉封城后,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为居民提供服务,而武汉的社会工作机构,还是由武汉本地的社区、社会工作者、网格员等服务者为社区居民提供测量体温、运送生活物资、帮忙照看未成年儿童等线下服务。笔者作为来自外地的社会工作者,只能与团队成员一起为居民提供线上服务。所以此要素主要以外地服务者参与服务的视角来论述社会工作服务中从现实服务空间到网络服务空间的变化以及二者的不同。

有关时空问题的研究,多涉及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角度。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邓万春在研究经典社会学理论中发现,经典社会学家们的社会发展理论明显具有时空二维性(二重性)特征,即在有关社会发展的论述中,既有历时性(时间维度)的阶段论分析,也有共时性(空间维度)的类型学把握。<sup>1</sup>顾金土认为社会时空分析涉及时间、空间和社会三个要素,<sup>2</sup>把握时空视角要从社会因素出发。事实上,时空视角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王思斌认为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处于具有社会意义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这一观点和视角在以实务为本的社会工作中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sup>3</sup>顾金土也认为社会时空分析的基本特点是凸显人的主体性。马凤芝利用时空视角,将其操作化为生命历程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来探讨健康老龄化与社会工作服务之间的关系。<sup>4</sup>也就是说人在时空中的主体性、能动性与独特性不容忽视。基于此,本文以疫情期间根据危机情境的不同来划分的前期情境危机期、中期情境缓和期、后期隔离与恢复期为时间主线,以现实服务空间与网络服务空间(微信群)为空间内核,<sup>5</sup>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反思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情境下,从“人在情境中”到“服务在情境中”: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服务对象的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会工作方法三个维度的时空变化过程、优势与劣势。以此来证明在笔者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中,时间与空间二者形塑了特定情境下的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从而倡导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重视时空因素。

## 二、前期:情境危机期

### (一) 服务对象的需求

首先,在前期危机期中,服务对象的需求不能得到良好的满足。即使服务对象提出“为其家人寻找

<sup>1</sup> 邓万春. 经典社会学发展理论的二重性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9.

<sup>2</sup> 顾金土. 社会时空分析的类型、范例及特点 [J]. 人文杂志, 2013.

<sup>3</sup> 王思斌. 注重社会工作中的时间和空间 [J]. 中国社会工作, 2019.

<sup>4</sup> 马凤芝 陈海萍. 基于时空视角的健康老龄化与社会工作服务 [J]. 社会建设, 2020.

<sup>5</sup> 武艳华. 时空视角下在华缅甸婚姻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以云南省德宏州米镇为例 [J]. 社会建设, 2019.

医生、床位”，表达“希望有人去陪伴老家中居家隔离老人”的需求时，在网络服务空间中，作为线上服务者并不能满足服务对象的这些需求。在疫情爆发初期这一非常时期，一切都是新情况，且时刻处于迅速变化中，服务对象的需求来得又快又急。<sup>1</sup>在网络服务空间中，这些更是无能为力；其次，需求表达因缺乏良好的专业关系的建立而显得不够真实。与现实服务空间过程中服务对象一对一、面对面地表达需求的情况不同，网络服务空间的服务更多的是以打字、电话、语音的形式且通常是多位服务者服务一位服务对象。服务对象往往因为没有在实际中见到服务者、因为服务者的多个对接而产生不信任、畏惧的心理，难以敞开心扉诉说自己最根本的需求。但是，从服务范围来看，网络服务空间有它独特的优越性。社会工作服务强调服务对象为中心，在现实服务空间中，“服务对象”往往被做个体化的理解，而疫情时期“服务对象”凸显的是“服务对象系统”。在非常时期，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边界是模糊的、弹性的、不断扩展的。<sup>2</sup>网络服务空间更容易探知与了解服务对象的整个系统与环境的重要性，为服务对象的环境作出改善，并为服务对象的各个系统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

## （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前期情境危机期，处于网络服务空间的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模糊不清。容易广泛承担各种角色，包括心理咨询师、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前期因为处于疫情爆发初期，居民的情绪处于高度紧张与恐惧的状态。网络服务空间（微信群）中，经常会出现类似“怎么会这样啊，要不是那几个吃蝙蝠的，咱们至于这样吗，真是气死了”、“我家邻居好像前几天被感染，医院来人把他拖出去了，你说为啥早不去医院，感染了我们怎么办啊，真是自私！”、“酒精口罩消毒剂买不到，我看等死算了”等的消极话语。这时的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可能会因为情境而变化。应对服务对象的消极情绪，首先要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中的平等、尊重、接纳的价值观，利用心理咨询师的同理与倾听促进其表达，安抚其情绪；其次需要掌握预防疫情的医务工作知识，来为服务对象科普新冠知识；再次需要承担志愿者的角色，链接各要素资源与主体为服务对象服务，尽可能地满足其需求。

## （三）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社会工作本身是实践取向的学科，研究也应当是实践取向。<sup>3 4</sup>此次疫情打破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规范性，更强调用一种实践性的视角去应对复杂多变的情境。在操作中，平常时期的专业服务多强调规范性，而非非常时期的专业服务更强调实践性。<sup>5</sup>相比于现实服务空间中个案、小组、社区的三大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此次网络服务空间中专业方法的“专业性”略显单薄。对于网络服务空间（微信群）中居民的需求以及问题，社会工作服务者在其中主要开展的是个案工作，即对于服务对象在疫情爆发初期的紧张、恐惧情绪提供情感支持与个案辅导。但是很遗憾，与链接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资源提供的服务相比，个案工作在心理层面的深入与支持作用显得相形见绌。同时，线上网络服务的未知性、匿名性、不信任性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工作个案方法的有效性；另外，小组工作因为现实性、场域性等因素达不到要求，网络服务空间并没有涉及此方面。而在现实服务空间中，武汉本地的社会工作者为独自在家的儿童、青少年提供的小组工作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网络服务空间中，社区工作的方法也是有所涉及的。比

<sup>1</sup> 任敏 陈政军. 专业与情境：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救助中的发展 [J]. 社会工作, 2020.

<sup>2</sup> 任敏 陈政军. 专业与情境：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救助中的发展 [J]. 社会工作, 2020.

<sup>3</sup> 古学斌. 为何做社会工作实务研究 [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5

<sup>4</sup> 何国良. 久违的实践研究：创造社会工作学的路向 [J].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2017

<sup>5</sup> 任敏 陈政军. 专业与情境：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救助中的发展 [J]. 社会工作, 2020.

如在一个约二三百人的微信群中，大概都为一个社区居民。因为微信群是按照属地原则、网格化管理原则而建立。所以同一个社区居民会在微信群中互相分享讯息、资源、感受等。但是突出的问题是只要有一个人抒发了不良、消极的情绪，其他的居民也会随声附和，造成微信群混乱的情况。

### 三、中期：情境缓和期

#### （一）服务对象的需求

随着政府以及全国上下的努力，疫情终于有所缓和。这时，一方面，之前处于应激状态下来不及考虑需求的服务对象开始涌现出来。比如情绪疏导问题，有些服务对象因为看到邻居感染了新冠而不幸离世，感觉到恐惧与难过，开始对于生与死有着强烈的羁绊。这时，来自全国各地网络服务空间中的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为其开展心理疏导与情绪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也在积极寻找并识别服务对象为其解决需求与问题，这与现实服务空间的社会工作服务不同。现实服务空间中，服务对象一般会主动找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不论是直接服务对象与潜在服务对象，他们一般会罗列其面临的问题，表达自己的需求。而此次网络服务是在微信群中开展的，服务对象也是在微信群中发掘并识别的。就像任敏教授所说，在此次疫情下的社会工作服务，服务者比服务对象要多。

#### （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在中期的情境缓和阶段，在网络服务空间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凸显出来。通过前期链接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咨询师、医生、志愿者的资源，社会工作者可以很好的与其他专业主体进行合作。其一，在其中扮演专业社会工作者。回应服务对象需求，为其提供危机介入、情感支持、资源链接、个案辅导等的专业服务；其二，扮演各个主体的联动者。链接心理咨询师、医生、志愿者等资源，通过有效的机制与方式促进多主体共同参与线上网络服务过程，回应服务对象多角度、深层次方面的问题与需求；其三，信息提供者。此次疫情下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服务空间与现实服务空间最大的不同就是网络、传媒、信息对于服务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服务提供的方式，而且对于信息的提供与筛查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工作者通过扮演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为服务对象提供官方、正规、权威、可信的疫情防控实时信息以及保护自己和家人、防护病毒的医务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服务对象焦虑紧张的心情；其四，携手共担者。到了疫情中期，虽然服务为网络服务，且服务提供方式为多对多，即多个服务者面对微信群中多个服务对象的服务，但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专业关系也在初步建立。二者共同走过了疫情最危急的时刻，社会工作者像是服务对象的老友、亲人，二者携手走过这段艰难的人生旅程。

#### （三）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由前期的情境危机到中期的缓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一直顺应服务对象的需要而不断变化。首先，由个案工作方法转化为个案管理手段。由于服务对象问题的增多且复杂，以及服务对象系统中其他主体的需要，个案管理方法因为拥有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更适合特定情境中的服务而被保留下来。值得一提的是现实服务空间与网络服务空间都重视个案管理的应用；其次，现实服务空间中受小组工作服务的群体增多。除了疫情期间孤身在家的未成年儿童、青少年群体，增加了疫情中的妇女、老人群体，为其提供小组工作服务；再次，网络服务空间中，社区工作服务开始转变为树立社区与共同体意识。社会工作积极协助凝聚社区居民力量，促进居民在微信群中分享生活与信息资源。微信群会出现“加油，会好的”、“再坚持一下，总会有见阳光的日子”等的话语，也会分享居家做饭、休闲生活。将做的饭菜、可爱的宠物分享给大家看。居民心态在慢慢变好，也变成了一个互帮互助，共同战胜疫情阻击战的共同体。

### 四、后期：隔离与恢复期

### （一）服务对象的需求

后期随着情况慢慢变好，服务对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需要缓解因为居家隔离而产生的忧郁、孤独的情绪。到现在这个阶段，服务对象已经在家隔离两个多月，忧郁、孤独感常常会影响服务对象而产生消极、不良的情绪。在居家隔离期间，网络空间服务显得更为出色。通过线上的陪伴、聊天，引导居民在微信群中分享日常宠物、做饭等日常生活方式来排解服务对象的不良情绪，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除了需要陪伴与倾听之外，发现服务对象有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于是，笔者所在的抗疫后援团推出了在网络服务空间的“线上趣味问答活动”。内容涉及防疫、安全保护知识以及吃、喝、玩、乐等娱乐知识，来缓解居民居家隔离的郁闷、孤独的心情，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 （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在后期的隔离与恢复阶段，社会工作者一方面作为陪伴者。倾听服务对象诉说、排解服务对象因为居家隔离而产生的忧郁、孤独的情绪，陪伴服务对象走过人生较为灰暗的一段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服务空间与现实空间相比，因为缺乏面对面的话语鼓励以及情感支持，效果显得差一些；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作为线上趣味活动的带领者，活跃气氛，为处于隔离期间的服务对象带来一丝乐趣；除此之外，社会工作者还作为服务的评估者，开始关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与即将结束后的服务对象的改变。其中包括积极方面的改变以及消极方面的改变，并对服务缺乏的地方进行服务设计的反思与改善工作。

### （三）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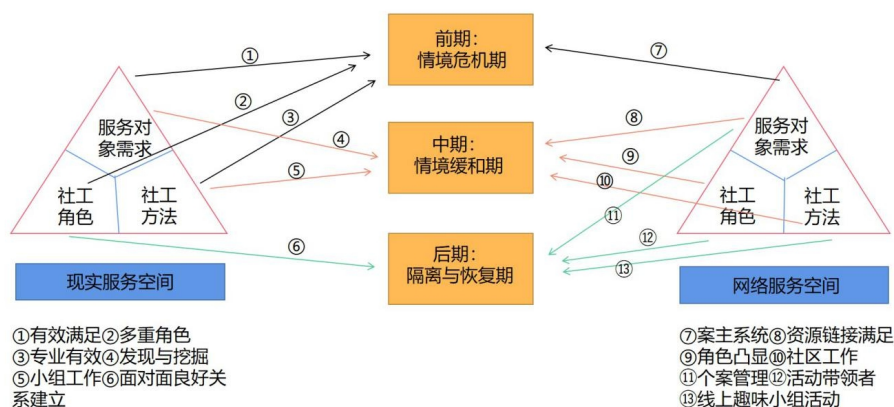
后期的隔离与恢复期中，涉及到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主要有小组工作与社区工作。其中，小组工作也可以在网络服务空间中有序进行。因为前期拥有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居民）专业关系的良好建立、居民之间的互相熟悉与信任的基础，微信群也作为网络服务空间的场域为开展线上小组活动服务提供了可能。小组活动以线上趣味问答的形式进行：每天的下午一点到三点钟，由社会工作者在微信群中出题，引导服务对象回答，通过奖品的形式促进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最终经过统计，在为期一个月的线上趣味问答活动中，参与活动近三千人次；另外，社区工作也在慢慢恢复，主要在现实服务空间内在武汉当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社区层面展开，包括为居家隔离的社区居民定期提供食物、消毒液等物资，社区内站岗，为居民测量体温并上报，对社区内有困难家庭提供帮助等服务内容。

## 五、时空视角与疫情中的社会工作服务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清晰的看出，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变化，各个时期中服务对象的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会工作方法的使用是不同的。随着特定情境变化而变化，如果说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关注“人在情境中”，那么疫情中的社会工作服务，除了关注人，还要关注情境。因为在疫情突发的非常时期，若采用常态时期在稳定的情境下基于重复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规范性行动框架，指导非常态时期的实践应该说务必伴随深度反思，警惕不适宜风险。<sup>1</sup>各个时期的社会工作服务都有其独特性与关注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社会工作者在进行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有人文关怀，还要有专业理性；<sup>2</sup>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因为服务空间的不同，社会工作在回应服务对象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扮演、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使用方面也各有不同。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都有与社会工作服务相契合以及不适应的要素。其中，下图比较了现实服务空间与网络服务空间在时间变化过程中，社会工作三个因素：服务对象的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的不同表现。如下图所示：

<sup>1</sup> 任敏 陈政军. 专业与情境：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救助中的发展 [J]. 社会工作, 2020.

<sup>2</sup> 王思斌. 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介入社会危机事件的专业情怀和专业理性 [J]. 社会工作, 2020.



图一 现实与网络服务空间中社会工作服务要素随时间变化的比较

由根据前文所述以及结合图一可以总结以下观点：

首先，在前期情境危机期。现实服务空间中的服务对象的需求因为面对面、有良好的专业关系的建立与信任，因而能够有效满足。但网络服务空间中服务对象需求表达缺乏良好的专业关系的建立，且社会工作者利用线上资源链接这种间接的需求满足方式，不利于服务对象的需求表达以及满足；现实服务空间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丰富多样的，且具有多重角色，能够利用线下的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方法开展有效的活动帮助服务对象。而网络服务空间的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模糊不清。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也显得不够“专业”而略显单薄；但是网络服务空间更容易探知服务对象系统，了解服务对象的整个系统与环境的的重要性，为服务对象的环境作出改变、各个要素的系统作出切实可行的服务。

其次，在中期情境缓和期。现实服务空间中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在服务对象表达中发现与挖掘的，即服务对象主动表达需求。而网络服务空间的服务对象是由服务者发掘并识别的，而非服务对象主动求助，服务对象的需求是被动的；现实服务空间有开展小组活动的良好机会。通过寻找服务对象相似者，开展线下小组活动，挖掘服务对象潜能，助其赋权增能。而网络服务空间缺乏开展小组工作服务的条件；但是在网络服务空间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可以为服务对象开展心理疏导与情绪支持，资源链接迅速且庞大。在网络服务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也凸显出来，包括专业社会工作者、各个主体联动者、信息提供者、携手共担者。除此之外，线上社区工作服务也开始有序进行，转变为树立网络社区与共同体意识。凝聚社区居民力量，引导居民在微信群中分享生活与信息资源，互帮互助，共同战胜这场疫情阻击战。

再次，在后期隔离与恢复期。在现实服务空间中，社会工作者能够对服务对象进行面对面的话语鼓励以及情感支持。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充当了典型的助人者角色，与服务对象携手渡过难关；但是，在居家隔离期间，网络空间服务显得更为出色。社会工作者为面临多重困境的个人和家庭提供多重资源以及个案管理服务。另外，有了前期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居民）专业关系的良好建立、居民之间的互相熟悉与信任基础，社会工作者作为线上活动带领者，在微信群这个线上场域开展线上趣味小组活动，为居家隔离的居民生活增添一抹色彩。

## 六、结论与讨论：时间与空间形塑特定情境下社会工作服务过程

本文以笔者在疫情期间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为例，试图利用时空视角，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角度

来探讨、反思在专业过程中服务对象的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三因素在疫情这一特定情境下根据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产生的差异与独特性。反思发现，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变化，各个时期中服务对象的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表现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因为服务空间的不同，社会工作在回应服务对象需求、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扮演、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使用方面也各有利弊。其中，在应对新冠疫情此类的危机情境下，随着情境的变化、时间的推移，网络服务空间的优势显现出来，这也说明社会工作的发展顺应了当今互联网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在前期情境危机时，传统的现实服务空间中社会工作的角色、方法更是不容忽视。

所以可以得出一个不成熟的结论：在笔者参与的疫情下的社会工作服务中，时间与空间二者形塑了特定情境下的社会工作服务过程。基于此，作为社会工作服务者理应思考，在社会工作服务中注重时空双重因素的重要性与意义。这顺应了王思斌老师的要求：时空问题在社会工作服务中表现得十分充分，社会工作服务不能空洞地议论服务模式和方法，要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问题。第一，要用时空视角审视面对的社会问题；第二，从时空角度分析服务对象的需要；第三，重视社会服务资源的时空特点；第四，发现社会服务实施中的时空关照；第五，注重社会工作服务的效果显现；第六，发现社会服务的影响范围。<sup>1</sup>

本文的研究发现以作者作为参与者、观察者进行时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反思与探讨。缺乏严谨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经验与感受，说服力较弱，可能难以进行经验的推广，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收集此领域的的数据资料并进行科学的分析，将科学分析数据与个人的观点、反思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科学严谨的学术结论，为此领域的学术进步做出贡献。

#### 参考文献：

- [1] 邓万春，2009，《经典社会学发展理论的二重性》，《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 [2] 古学斌，2015，《为何做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31期。
- [3] 顾金土，2013，《社会时空分析的类型、范例及特点》，《人文杂志》第7期。
- [4] 何国良，2017，《久违的实践研究：创造社会工作学的路向》，《社会工作研究》第2期。
- [5] 马凤芝、陈海萍，2020，《基于时空视角的健康老龄化与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建设》第7期。
- [6] 任敏 陈政军，2020，《专业与情境：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救助中的发展》，《社会工作》第1期。
- [7] 武艳华，2019，《时空视角下在华缅甸婚姻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以云南省德宏州米镇为例》，《社会建设》第6期。
- [8] 王思斌，2020，《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介入社会危机事件的专业情怀和专业理性》，《社会工作》第1期
- [9] 王思斌，2019，《注重社会工作中的时间和空间》，《中国社会工作》第31期。

---

<sup>1</sup> 王思斌. 注重社会工作中的时间和空间 [J]. 中国社会工作, 2019.

☆ 作者简介：房子琪，河海大学社会工作系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相 妍

※ ※

### 专著《“癌症村”调查》的英文版在欧洲出版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阿江与程鹏立、罗亚娟等人合作的专著《“癌症村”调查》英译本以 Chinese “Cancer Villages” :Rur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Public Health (国际图书号 ISBN9789089647221) 为题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出版。该书作者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通过若干“癌症村”案例的实地调查, 综合分析各个“癌症村”中癌症发病与环境污染、村民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关系, 在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中理解“癌症村”现象。该书提供了经济增长、环境变迁和公众健康之间复杂的、多元的分析视角, 是一部难得的跨学科研究著作。

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布莱恩 (Bryan Tilt) 教授推荐了此书, 认为此书是研究水、空气污染的重要社会学著作, 推动了中国农村环境健康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

该书的中文版本《“癌症村”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13 年出版, 英文版本在中文版本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修改。“环境、健康与发展论坛”负责人、荷兰莱顿大学亚洲研究国际研究所研究员 Jennifer Holdaway (贺珍怡) 博士等人历时数年完成了英文的翻译工作。

# 叙事治疗理论应用于癌病患者家属的实务研究

——基于《癌病与持续性的痛-我的叙事疗愈行动》

王 睿

---

**摘要:**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给患者和患者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痛苦和苦难,大多数人给予癌症患者关心、安慰和帮助,但很少有关注癌症患者家属的生活、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实务研究。本文通过个案案例为依据,论述了叙事治疗理论介入癌症患者家属,帮助其走出哀伤痛苦,重新建构新故事,开始新生活的实务过程。通过实务研究,引出叙事治疗理论的优势、不足和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叙事治疗理论 癌病患者家属 个案介入

---

## 一、引言

随着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以每年约3.9%的速度增长,死亡率以每年约25%的速度增长。癌病是人们心头无法言说的痛苦,给患者和患者的家庭带来了无法言说的折磨和苦难。不仅癌症患者自身要承受生理上的病痛、心理上的压力、患病的悲观绝望情绪,而且对于患者家人来说无疑也是从天而降的噩耗,他们要照顾患者的生理、情绪,要承担经济上巨大的压力,要自我排解内心的恐惧、无助和绝望。癌病不仅仅是在消耗一个人,而是在消耗全家。

文化歧视、道德隐喻、医疗服务资源匮乏、城乡二元割裂、社会救助和保障机制失灵、“病”与“人”认识上的错位、临终关怀的缺失以及对癌症本身的污名化都会引起或者加重病患家庭的痛苦体验。

叙事是探究和疗愈的过程,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是白白发生的,每件事每个人出现在生活中一定有他的意义,会让我们从中学会什么。当用新的观点、角度、去看待过去,理解过去发生的故事,过去的经验就有可能被重新赋予新的意义。所以癌病的伤痛未必只是伤痛,还可以是珍惜、爱、努力和抗争命运,它让患者家人学会坚强、忍耐、宽容和豁达。

## 二、叙事治疗理论

叙事治疗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哲学基础,是后现代结构主义的产物。现代人习惯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现实世界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建构的,个体对世界的理解以个体的言语体验为基础,语言不是反映了“现实”,而是创造了“现实”。<sup>[1]</sup>它把有问题的故事看作是问题的根源,通过倾听他人的故事、运用恰当的方法,使问题外化,帮助案主寻找独特的结果,去重写生命故事,赋予故事新的意义。所以叙事方法具有赋权和增能的作用,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过程中,让案主得到治愈。

## 三、案例情况和分析

### (一) 案主基本情况

案主钟先生30岁,大学刚刚毕业,是家中长子,从小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性格内敛隐忍,是家中兄弟姐妹的榜样。2011年,父亲确诊癌症,把他作为依靠,把他的安排、家庭和遗愿全部交给了他。案主承担了整个家庭的重担,经济上、生活中、照顾病痛中的父亲和家中弟弟妹妹。父亲后来治病无门,选择自杀,说:“能够舒舒服服的走是他最大的心愿。”后来家中所有人也劝钟先生放弃,他只能从一



开始的不理解不认同到后来做了最后的决定“只用止痛药，停止输液。”他一个人在火葬场送别了父亲，却无数次被梦魇缠绕。钟先生讨厌这样的故事，因为它是孤独、无助、焦虑、抑郁、恐惧、彷徨、黑暗、不公的，但是它却一直缠绕着他，让他情绪低落、人际疏离、心理压抑。这么久以来，钟先生只能用过记日记的方式去记录平日的日常和心中的悲痛，他迫切的希望得到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去改变这个现状。

## （二）问题与需求评估

案主亲眼看到病魔把父亲带走，而且前期饱受了病痛带给自己家庭的苦难，案主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所以案主的生理、心理、家庭和人际交往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需求：降低负面情绪和增强情绪控制的需求；增强自我效能的需求；重新看待癌病苦难的需求；树立生活信心和参与社会交往的需求。

## （三）服务目标

### 1.总目标

通过叙事治疗理论，让案主不断解读以往的故事，拾起被遗忘的片段，赋予故事新的意义和力量，让其缓解抑郁的情绪，走出悲痛，建立积极的心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 2.分目标

第一，获得案主的信任，引导案主说出困扰自己的故事，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挖掘出案主内心深处的想法，缓解其悲伤和痛苦。

第二，引导案主分析，这些苦痛的旧故事给自己的生活各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理清是这些问题给带来的还是案主看问题的方式所导致的，促进案主的自我觉醒。

第三，解构旧故事，寻找故事遗漏的片段，让故事获得新的动力，让新故事的形成获得可能性。

第四，巩固积极的叙事，让案主正确理性的看待问题，正确认识自我和他人，树立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

## 四、叙事治疗理论下的个案介入过程

### （一）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与案主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是后续助人过程顺利开展的前提，有利于了解案主的意愿并进行适当的处理，澄清案主的需要。所以这一阶段，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闲聊、拉家常的方式与案主讨论癌症的一些情况，案主父亲抗癌的一些经历，同时也像案主说明自己服务内容、目的和计划，希望案主在之后的过程中积极配合，以便于消除负面情绪，打造和谐的家庭关系，重构人生故事。

### （二）引导案主叙述有问题的故事

此阶段社会工作者需要引导案主说出过往经历，可以和案主共同完成对过往故事的绘制，耐心认真倾听案主的叙说，记下自己的想法和疑问，以便于之后用开放式提问的方式与案主沟通，寻求案主改变的可能。以下面几个故事为例：

故事一：得知检验结果的那一天，我正好和父亲在去另一家医院的车上。医院的医生打来电话，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还特意问问我父亲在不在身边。我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妙。当从医生口中得知检验结果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眼泪差点流了下来。而此时父亲就在我身边。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掐自己的大腿，不让父亲发觉。父亲问我是不是医院打电话来了，我咬咬牙说不是。（当时只是我以为父亲相信了我的谎言，其实父亲比我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只是父亲比我想象的更加坚强罢了。）这件事情一直瞒着父亲到今年的三月…

案主说：“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癌症，为什么还会谈癌色变呢？从小我们就在电视、电影和广告

中的故事里长大，这些故事里充斥着大量描写疾病的素材。由于癌病的起因不明和难以治愈，加上病痛折磨和死亡的威胁，癌症就会被有意无意的夸大，被作为一种绝症出现在银屏。这些作品让我们觉得癌症=死亡。所以，我们恐惧绝望，最终屈服于铺天盖地的卖药和卖医院服务的广告中，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故事二：2011年2月，正值春节，父亲突然提出要和我们分灶吃，要把自己的锅、筷子和碗另外堆放，并且专门提醒我们要严格消毒。尽管我们努力向父亲解释肿瘤不具有传染性，但也无法说服父亲和我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父亲看到我们在，会马上端起碗筷跑到大树下，离我们远远的…

案主说：“癌病会给病患和家庭带来耻辱感，因为被污名化，癌症像艾滋、性病一样被人排斥。所有人都开始逐渐疏远癌症病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这造成了我们的另一种痛！父亲不希望自己给家庭、亲人、朋友带来麻烦，也不希望被外人嫌弃和冷落，所以选择把自己关起来。而家人、亲友还有社会民众，由于对癌病的无知、恐惧和自我保护，也逐渐疏离了父亲。我感受到父亲的揪心之痛，自己也备受折磨！”

故事三：在医院的日子里，看到父亲受苦我非常难受，被医生催缴费用时我又彷徨无措。我曾多次打电话咨询有关部门申请大病医疗补助，但是不是电话不通，就是找不到负责人，就算找到了负责人也是草草敷衍…

案主说：“医疗服务市场化导致患者家庭承担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费用，而医疗救助制度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相对于几十万的治疗费用来说，这点钱就是犹如鸡肋，而且申请医疗救助规定的对象是困难群体，而困难群体的认定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让我越来越绝望…”

故事四：每次住院，我们絮絮叨叨地把各种疼痛症状告诉父亲。医生的回答也很简洁，听诊、开尿检、血检还有各种CT报告单，最后就叫下一位。我不知道自己表达清楚了没有，也不知道对方表达的意思。

案主说：“我承认我对癌病的机理知之甚少。但是对它的病痛体验缺失一清二楚。但是医生和护士似乎对这些一开始就不感兴趣，更别说静下来听我们诉说。不熟悉的环境、仪器、看不懂的报告单、听不懂的专业名词，最重要的是时刻保持威严的医生，足以让父亲和我们彻底失语和无力。”

故事五：在住院的时候，父亲咽喉的肿瘤疯狂生长，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那个时候父亲时常会因为呼吸困难，无力的在床上翻滚，床被抓的吱吱响。父亲绝望的问我，可不可以选择安乐死。

案主说：“父亲身体上的痛，而我心里上的痛比他疼千倍。是什么想让父亲告别，是癌病持续性的痛的摧毁。”

故事六：父亲死后，我带着父亲的骨灰从殡仪馆回老家，母亲专门打电话来告诉我，按照村里的规矩，在外面病逝的人的骨灰是不能带进村子的，要直接送去山上安葬。我十分不乐意，因为能再回老家看看是父亲最后的愿望，回到村口，却被早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阿伯截住了…

案主说：“在安葬文化中，人们对横死充满忌讳。得病而无医而亡被视为横死之首。对于父亲，人们的恐惧多过怜悯。我似乎看懂了人情世故，开始对人变得冷淡，对所谓的情谊不以为然。多了点头之交，少了真情相向的朋友。”

在与案主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了帮助癌病父亲抗癌的经历以及最后父亲的过世给他的心理上、生活上带来了几乎是毁灭式的打击。案主在这些痛苦和执念中无法走出来，无法面对自己、周围的亲友和未来。

### （三）问题外化

故事是有力量的，而故事的力量之大除了因为故事本身丰富外，更在于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习惯性把问题等同于人，在这样的价值观中，人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陷入对自己的不满和困境中。社会工作者需要用开放式问题引导案主把问题和他本身分开，外化问题，重新拾起对自我的肯定和信心。

当问题和人分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人看做主体。我们通过以下步骤让案主外化问题：

#### 1.跟案主描述的故事对话并对于该故事命名

比如：案主：父亲没有等到我的大学毕业来回报孝敬他，他癌症病发，让我们一家在阴霾和恐惧中度过。父亲的离去更让我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孤独和悲痛。每次夜深人静，我总从梦魇中惊醒。这些困扰，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我明显感觉自己情绪低落，脾气暴躁，我开始倾向孤独、恐惧和愤恨…

社工：你觉得现在生活中的困扰是由于父亲过世引起的还是自己心态的转变引起的呢？

案主：因为我自己孤僻、愤恨、不甘心、暴躁，可是我控制不自己。我想到父亲的离世和离世之前的种种，我就这样了。

社工：如果把孤僻、愤恨、不甘心这些拟人化，你能给它取个名字么？

案主：自责的自己。

#### 2.与案主探讨“问题故事”对案主的影响

当问题有“生命”并且独立于案主存在，案主也就会不自觉的思考“自责的自己”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了。

社工：你觉得这个“自责的自己”影响着你的生活、工作和人际关系对么？

案主：对，我现在看任何人都是冷冷的，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社工：你是否觉得这种影响是不好的？是不是伤害到了你周围的人？

案主：是，周围的人现在也不会跟我有热络亲密的联系。

社工：那你是否也想改变呢？你对这样的困境有什么样的看法？

案主：我也想改变。想让自己从这件事中走出来。

社工：好的。那请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自责的自己”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案主：那应该会很快快乐和睦吧。

#### （四）遗漏的故事碎片

在重新诠释故事时，个体可以回溯过往没有形成故事的不同事件，寻找被遗忘的情节中成功或例外的经验，以创作可能的替代性故事。<sup>[3]</sup>很多时候，除了主线故事和支线故事外，人们因为各种原因还会遗忘许多细节，所以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帮助案主拾起这些被遗漏的故事碎片，当遗漏的片段被重新拾起来，故事也就会变得不一样。

案主：父亲去世后，我回老家整理父亲的遗物，各种钥匙证件还有父亲撰写的家谱，都被父亲放得好好的…听母亲说，父亲在去世前就把自己的墓地找好了…每每想到这些，我心中就钻心的痛。

社工：你的爸爸是一个特别坚强、勇敢、坦然的男人，这值得你骄傲。

案主：是呀，他是我一生的榜样。住院期间，父亲的努力和坦然感动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最后走的时候，他也依然面带笑容。

社工：所以啊，他也一定希望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儿子能像他一样豁达和坦然。

案主：住院期间，因为父亲的病我们挨家挨户去借了很多钱，后来父亲走后手头宽裕下来，我又挨家挨户去还钱除了感谢外，我问他们为什么一直愿意借钱给我家。邻居亲友都说：“你父亲从不赖账，

从来言而有信，都是亲戚，谁家没有困难的时候。”

社工：这说明你父亲为人诚信忠厚，周围邻居和亲戚都无条件信任，而且在你家有难的时候，都选择了无私的帮助。这体现了多大的爱呀！

#### （五）新故事的产生

故事永远没有结束，每一次叙述和每一次倾听都是新的开始。案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于故事的阐释都会出现不同，产生“独特的结果”，正是这些独特的结果，让案主产生新故事成为可能。面对困顿的旧故事，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鼓励案主欣赏自己，解构旧故事，重建新故事。

案主：感谢我挚爱的父亲，感谢他给了我勇气，让我坚强勇敢的面对生活。感谢陪我渡过难关的亲人、老师和朋友，因为有了他们。在最阴霾的日子里我才觉得阳光永存。感谢我的母亲，她一直默默受伤痛还要顾及我后来的一系列负面情绪。我会慢慢从这件事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

案主最后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可以被苦难和自己的负面情绪打倒，学会在苦难中让自己成长成熟，放过那个“纠结自责的自己”。

## 五、总结

### （一）叙事治疗理论的优势

#### 1.解构伤痛，唤醒内心的生命力量，

叙事治疗帮助人们从细微处领悟人生道理，汲取故事中的正能量，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旧问题，使案主对原本觉得严重的问题可能会有新的理解和看法。让我们明白我们并非通过生命故事存活，而是故事塑造、组成并拥抱着我们的生活。<sup>[6]</sup>

#### 2.叙事治疗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

将问题与人分开，符合中国人要面子的心态。寻找独特的结果，发掘案主的潜能，契合中国人喜欢被肯定的需求。叙事治疗重视与案主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让案主把社工当作自己人倾诉心事，有了更多中国人在乎的“人情味”。翟双、杨莉萍便指出了叙事治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契合：问题外化与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特点及辩证的思维方式的契合；关系取向与中国人关系自我观的契合；关注差异与中医的个体化治疗模式的契合；重视来访者内在力量与中国人擅长自律和反思的特点的契合。<sup>[4]</sup>

### （二）叙事治疗理论的局限性

#### 1.效果不明显

叙事治疗过程中社工获得的信息虽然很多，但指向性不明显，治疗的目的和尺度难以把握。<sup>[5]</sup>而且虽然叙事治疗中会把问题外化，但来访者的负面情绪不会因为外化就消失，只是暂时的被掩盖和替代，而叙事治疗过程对案主负性情绪不会过多重视，认为那是可以被替代或者说是“不正确”的情绪，所以要证明叙事治疗是否真正有效，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样的人更有效，需要更多的研究。

#### 2.对社会工作者的各方面能力有高要求

叙事治疗理论的有效应用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良好的观察、表达、沟通、引导和共情能力。需要主动融入案主的语境，在治疗中尊重案主，注意观察他的情绪，引导性的与案主对话，帮助他实现自我觉察、理解、反思和对话。善于发现“问题故事”的正面影响，从而鼓励案主直面创伤。同时，社会工作者更需要关注和培养案主自我治愈的动力，而不是让案主对治疗过程和技术产生依赖。

#### 3.存在消极叙事的可能性

案主消极情绪埋藏已久，许多负面想法根深蒂固，用一段时间的干预让案主重新建构新故事是非常困难的。又或许案主在治疗的过程中学会了积极叙事，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消极的想法又会出现。

#### 4.社会工作实务中运用率低

目前国外的临床心理学家正在用叙事治疗处理和干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厌食症、家庭暴力、精神分裂症、精神创伤、种族关系、口吃的康复以及儿童与养母的关系等。<sup>[5]</sup>但在国内的社工实务中，仍是以基础理论介绍为主，缺少在实务运用的分析和探索，就是说叙事治疗理论目前国内处于研究、但不被使用的阶段。

#### （三）叙事治疗理论的展望

叙事治疗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家庭治疗领域兴起的一股力量，它深刻揭示了现代权力对人的控制，将问题和人分开，把人从问题中解放出来，发展自己喜欢的故事，开始新的人生。中国社会工作者对叙事治疗的理念较为认同，契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叙事治疗的熟悉度和接受度都在上升。同时，叙事治疗操作的过程简单容易上手，可以广泛应用于家庭、团体和个人，帮助解决情感创伤、亲子关系、自我认知危机等问题。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叙事治疗嵌入本土化实务当中，因此，叙事治疗在中国社会工作情境下宏观层面的推广大有可为。

故事永远没有结束，每一次的诉说都是一个新的故事。

#### 参考文献：

- [1]李明、杨广学,2005,《叙事心理治疗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2]李明,2016,《叙事心理治疗》，北京:商务印书馆。
- [3]李昀璿,2014《中国社会工作情境下叙事治疗的理论技术应用及其可推广性研究》，《社会工作》，第4期。
- [4]翟双、杨莉萍,2008,《叙事心理治疗的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第28期。
- [5]翟双,2008,《叙事心理治疗及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应用》，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6]Payne M,2012,《叙事疗法》，曾立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作者简介：王 睿，河海大学社会工作系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房子琪

# 综艺节目中社会工作 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实践与反思

——以“忘不了餐厅”为例

王肖

---

**摘要:**随着我国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国家对老年人群体中的失智症患者的关注也不断加强。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忘不了餐厅”作为失智老人参与社会的载体之一,通过综艺节目的形式积极展现失智老人在疾病面前的积极度,并将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服务实践引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之中。本文以综艺节目“忘不了餐厅”为案例,通过观察法、案例分析法对其进行剖析,分析社会工作在失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中的干预实践,反思在综艺节目与现实生活这两种不同的情境下,社会工作在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过程中的作用与局限。

**关键词:** 社工介入 失智老人 社会参与 综艺节目

---

失智症又称“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失智老人即患有失智症的老年群体,这一群体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日常行为能力降低及精神行为异常。数据显示,在中国,每10位老人中就有1位认知障碍患者,其中超过半数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而每隔3秒钟,世界上就会多一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平均每天有超过1000位老人会走失。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预计到2050年,患者人数将达到2700万。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失智老人这一被边缘化的特殊群体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忘不了餐厅”作为一档关注失智老人的综艺节目被搬上了综艺荧屏。它是由明星携手患有五位认知障碍症的失智老人,共同经营的一家有可能会上错菜的中餐厅。当具有不同生活背景、患病程度的失智老人被赋予餐厅服务员这一新的角色身份,他们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的方式,重新认识自我,充分发挥自我价值。已有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对中老年人认知功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up>[1]</sup>。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鼓励失智老年群体走出家门,实现与社会成员的良性互动,对于防止失智老人大脑的退化、缓解失智老人的病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该节目已经拍摄了两季,相较于第一季,第二季中的五位失智老人的患病程度更深,失智老人社会参与这一过程的实现变得更加艰难,节目拍摄的难度也大大增加。因此,在失智老人社会参与这一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忘不了餐厅作为国产综艺中第一个有社工全程介入,参与录制的节目,社会工作者作为支持者、引导者和服务提供者等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 一、实践:综艺节目中社工对失智老人社会参与过程的介入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在介入失智症患者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因为我国的社会工作起步较晚,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仍有待提高。忘不了餐厅作为失智老人社会参与实践的有益探索,将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这一特殊群体搬上了荧幕。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引入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活动的开展可以帮助失智症患者改善认知功能,延缓病情进一步

恶化，提高生命质量等。因此，社会工作专业的干预在失智老人社会参与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引入

随着国内社会工作专业快速发展，在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背景下，失智老人也逐渐走进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界的视野之中。目前，不少学者已经对失智老人的相关问题开展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其中主要的介入对象包括对失智老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照顾者群体。根据相关研究发现，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的助人活动，可以给服务对象提供有效的专业帮助，促进服务对象的成长和发展。

对于综艺节目来说，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于节目中的失智老人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忘不了餐厅作为国产综艺中第一个有社工全程介入且参与录制的节目，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作为直接服务者、间接服务者以及合并服务者为失智老人提供专业的帮助。

首先，社会工作者扮演着支持者和使能者的角色，在节目的筹备期和拍摄期负责与节目中的失智老人进行沟通，通过认知训练团体的形式锻炼老人的自信心，促进失智老人关系的融合，并不断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积极面对自己的疾病，为老人们提供支持和安抚。其次，社会工作者作为咨询者的角色，积极参与到节目餐厅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为餐厅和老年宿舍的装修布置提供了认知障碍友好化环境改造的建议。此外，社会工作者还运用自身专业的知识，一方面，为节目组提供关于失智老人认知障碍专业的技术支持，为节目工作人员讲解关于失智老人沟通障碍的原因及技巧，帮助节目组营造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另一方面，为节目中带领失智老人进行工作的明星提供专业意见，将社会工作专业技巧、专业治疗模式等运用到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各种活动过程当中。最后，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倡导者，通过节目的形式介入到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过程，不仅能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宣传，让社会大众认识到社会工作者为失智老人提供的服务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还可以有效帮助人们科普关于失智老人群体的知识，从而引起人们对失智老人这一群体的关注，提高人们对老年痴呆症的认知，消除社会大众对这一群体的歧视。通过改进社会认知来保护这些老人的利益，为失智老人群体争取尊严。

### （二）支持性环境的建构

为了更好的照顾参与节目的失智老人，确保老人在社会参与过程中的健康和安安全全，支持性环境的建构是必不可少的。根据节目中社会工作介入过程的实践案例，笔者认为对失智老人环境的建构主要包括物理环境的建构和人际环境的建构两个方面。

第一，物理环境的建构。在忘不了餐厅这档节目中主要体现为对失智老人工作的餐厅区域以及生活的宿舍区域进行“适老化”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也参与其中并给出专业的建议。此外，节目组也邀请了专业人士进行讲解并通过小贴士的方式分享，让观众意识到适老化改造的重要性以及给老人生活带来的便利性。在节目中，三位明星嘉宾也通过穿上老年人模拟体验装备，模拟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如上下楼梯、穿衣服、上厕所等，以直观的方式真实展现了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的困难，并提出老人的衣服应该放在合适的高度位置摆放、衣服建议选用大扣子或少扣子等建议。有数据统计，我国每年 65 岁以上老人造成的第一意外伤害死因和致残的就是空间障碍，而针对空间的改良，就是节目中所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对于老人来说，居家的四个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玄关处、卧室、楼梯、卫生间。与此同时，节目中详细分解了如何改造四大风险区域，例如玄关处需要增加玄关换鞋

凳，楼梯处需要做延长预警设置，台阶上增加防滑垫且增加手扶杆，卫生间马桶增加借力扶手，浴缸边增加安全信号扶手，房间需要增添床边据置扶手等。

第二，人际环境的建构。为了保证老人在忘不了餐厅的健康安全、情绪稳定。在失智老人的社会参与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不仅只聚焦失智老人本身，还要了解他们的生态系统关系，包括他们的照顾者、主治医生等。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实践前，需要对失智老人自身以及其周围环境系统做出综合的评估<sup>[2]</sup>。在节目录制前，由社会工作者为失智老人及其家属进行一对一的个案评估，通过与他们的照顾者及主治医生进行沟通，了解失智老人存在的问题和需求，通过分析和评估后制定适合的介入方案，并积极链接相关资源，帮助失智老人群体创建一个安全的人际环境。以便于在失智老人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可以找到能够依靠的对象，减少在录制节目过程中的焦虑感。相较于第一季，忘不了餐厅第二季筛选的老人嘉宾所患的失智症程度更深，因此在拍摄过程中老人更容易出现焦虑的情绪。节目中也展现了两位失智老人多次陷入时间和空间的认知错乱中，反复忘记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将要做的事情。例如，第二季的孔奶奶在接近黄昏的时候总会突然说要回家，要找儿子。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节目录制过程中有家属的陪伴，并在需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介入。

### （三）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巧的应用

根据相关研究发现，目前在老年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介入失智老人这一群体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发展。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和技巧对失智老人进行一些列的专业活动，对失智老人缓解病情具有一定的帮助。由于综艺节目的特殊性，尽管在屏幕前并没有呈现出社会工作者与失智老人的直接互动，但是也不能忽视社会工作者在幕后所做的各种专业活动。在忘不了餐厅中，带领失智老人一起工作的明星嘉宾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承担着社会工作者的部分工作。在失智老人作为餐厅服务员参与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明星嘉宾与失智老人的互动，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专业理论和技巧的应用。

#### 1. 专业理论知识的运用

第一，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只有参与，才能使老年人重新认识自我，保持生命活力。现代医学证明，勤于用脑的人比懒于用脑的人的脑力活动退化速度要缓慢的多，较少说话的老人比常有陪伴的老人更多患老年痴呆症。因此，让老年人积极保持较高的活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对老年人大脑退化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sup>[3]</sup>。而忘不了餐厅真的参与群体正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这些老人通过在忘不了餐厅中担任餐厅的服务员，积极为客人服务、与客人互动，实现有效参与社会生活。这一行为不仅有利于失智老人自身的健康，防止他们自身大脑的退化。还能帮助老人增加其社会融入感，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忘不了餐厅作为帮助失智老人参与社会的有效表达，正是对活动理论的积极回应。

第二，优势视角。优势视角作为立足于缺陷视角的颠覆性批评，其实践的核心是探索并利用受助者的优势和资源<sup>[4]</sup>。强调从突出受助者的角度出发，强化其优势，不断引导他们找回自信和希望。对于失智老人这一群体来说，优势视角可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帮助他们逐渐摆脱因疾病导致的消极态度，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sup>[5]</sup>。在节目中，明星嘉宾也将优势视角很好的运用到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实践中。一方面，主动发掘失智老人身上的资源并夸奖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另一方面，积极利用



老人身上的资源，不断给他们创造机会，让失智老人觉得被需要并可以在忘不了餐厅的工作环境中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例如，利用小敏爷爷超强的计算能力，让小敏爷爷协助餐厅算账的工作；引导具有多年英语教学经验的蒲公英阿姨在忘不了餐厅中开设英语角，同时也鼓励其他老人们积极学习外语进行认知训练；将不同来餐厅消费的客人分配给特定的老人负责。将孕妇或者带小孩的客人安排给退休的妇科主任公主奶奶，将外国客人分配给精通外语的蒲公英奶奶，将退伍军人安排给老退伍军人大桥爷爷，将同样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消极客人分配给乐观开朗、具有魔性笑声的珠珠姨等。这样精巧的安排不仅让失智老人自己在餐厅工作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而且也帮助老人实现了自身价值，提升他们的成就感和价值感。

## 2. 专业技巧的应用

社会工作的专业技巧包括同理心、专注、接纳、真诚、积极聆听、质询、总结等。但是，由于失智老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者在与失智老人互动交流过程中，除了专业技巧的应用，还需要细心、耐心地观察老人能够看到失智老人情绪的变化，并让他们的负面情绪及时得到释放和解决。例如，在节目第一季中，公主奶奶因为没有得到最佳员工的称号而感到沮丧时，明星嘉宾能够及时上前了解情况，鼓励她说出自己的想法，尊重并认真聆听老人的内心感受，及时平复老人的心情。虽然节目中的老人都具备患有失智症这个共同点，但是他们的患病程度、具体症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也并不尽相同，所以社会工作者在为他们进行服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他们的个人情况。例如，在第二季节目刚开始，患病程度较为严重的失智老人就出现了时空认知错乱的状况，这对于处在陌生环境的失智老人来说，是难以避免的情况。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给到几位明星嘉宾的建议是学会用“打岔”的方式转移老人的注意力。比如，当老朴爷爷想要立刻回家时，岔开话题问老朴爷爷能不能一会儿给大家吹个小号。这样的方式不仅让爷爷的状态立马改善很多，缓解了他当时焦躁、慌张的情绪，还能让他重新进入新的工作状态。

在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过程中，运用点名、鼓励、正强化等专业工作技巧也可以有效帮助失智老人集中注意力，让他们更有效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sup>[6]</sup>。例如，在每次餐厅营业前要求老人喊出餐厅的口号并尝试提问一些唤醒记忆的提问，每次营业结束后，也会提问老人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通过这样的形式，不仅可以有效集中失智老人的注意力，让他们认知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且还能够达到训练失智老人的思维能力的效果。此外，餐厅的明星嘉宾也会经常给予失智老人们言语上的鼓励和支持，让他们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并不断增强自信心。

## （四）社会工作专业治疗模式的应用

失智症作为一种无法被治愈的疾病，目前的治疗方式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其中，药物治疗主要是指在患者正规的医院进行诊断，并根据医嘱，通过吃药来进行控制病情恶化。此外，许多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也在积极探究各种非药物治疗模式，来有效帮助失智症群体控制病情。目前，主要的社会工作专业治疗模式包括游戏治疗模式、音乐治疗模式、绘画治疗模式、叙事治疗模式、小动物辅疗模式以及电子设备治疗模式等。在忘不了餐厅这一综艺节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专业治疗模式的应用。

### 1. 游戏治疗模式

在忘不了餐厅中，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帮助失智老人改善病情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例如，通过游戏

的方式选出小敏爷爷作为“封印”对象，要求小敏爷爷不能用语言与自己的第一位客人沟通。因为不能说话，小敏爷爷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以及写字的方式与客人进行交流，最后圆满完成了不说话挑战。通过这个游戏的设置，失智老人服务的积极性被明显调动，因为有了不能说话的设定，失智老人必须强制关闭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实现锻炼失智老人的肢体表达能力和脑力的目的，让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学会克服困难，不断成长。此外，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将忘不了餐厅的权力下放到老人手中，让老人扮演“店长”、“副店长”的角色，承担餐厅主要的运营任务，而几位明星嘉宾则在摄像机的后面观察老人的行为。通过角色扮演的游戏，给予老人独自完成事情的机会，让失智老人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自主发挥，有利于减少失智老人对其他照顾者的依赖，帮助老人提高语言沟通、问题处理及社会交往等认知功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老人收获更大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 2. 小动物辅疗模式

忘不了餐厅第二季将动物疗法引入节目，让接受过特殊训练和专业学习的治疗犬和老人相处，在几位老人和治疗犬的互动过程中，也明显能感受到老人的情绪得到了安抚，心情也明显变好。因为治疗犬的智力水平较高且攻击性较低，所以在与人接触时性格温顺，对人友善。研究发现，失智症老人在与治疗犬相处时，他们的血压会下降，他们紧张、不安的情绪也得到缓解。

### 3. 叙事治疗模式

节目中的失智老人积极地面对自己的疾病，并且用自己的行动来对抗遗忘的速度。他们主动的参加到社会活动中，无论是唱歌、学习还是教书，都是他们不向认知障碍妥协的努力。失智老人在节目中也乐观表达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的意愿。

以前我会说法语和日语，但现在基本全忘了。我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个餐厅，所有年纪大的服务员，都患有这个病。但我们都愿意参加社会活动，我们没有失去希望，接触不同的人群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们热爱生命，也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我们非常享受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来这工作的原因。这是一个尝试，展示给和我们一样的老人，我们不能只是等在家里，只是等着死亡，所以我们想要投身社会。（摘自《忘不了餐厅第一季》的视频资料）

在节目中，蒲公英奶奶用流利的英文说的这样一段话让人感到动容，她积极乐观的态度成为很多失智老人的模范，鼓励着每一位患有失智症的病人。作为一种榜样力量的存在，节目中的珠珠姨和蒲公英奶奶两位患病老人对客人中同样也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手足无措的病人家属现身说法，把自己对抗疾病的经历作为鼓励他人的教材讲述给患者和患者家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共同治疗，彼此治愈。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让自己寻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 二、反思：综艺节目与现实生活的双向赋能

忘不了餐厅聚焦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适性的社会议题——失智症患者的社会参与，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向社会大众呈现出失智老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引导老人积极面对病症，主动克服障碍。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普及居家适老化改革相关知识。引入社会工作服务，将社会工作带到社会大众的视野中。展现社会工作介入下失智老人在社会参与过程中的真实场景，努力消除社会大众对失智症患者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刻板印象，帮助失智老人这一特殊群体寻求社会的关注和理解。综艺节目和现实生活的双向赋能，是当下社会媒体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同样也给处在现实情境中的社会工

作者以及社会大众带来反思。

### （一）节目内容与国家政策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逐渐加剧，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随之产生的老年问题也亟需引起社会关注。在积极老龄化主张的倡导下，国家应该大力推进老年人宜居环境建设，保证老人在友好的生活环境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今年7月，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适老化改造的重要性。忘不了餐厅这一综艺节目的出现，让综艺节目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实现了对国家社会主流意识的传播与价值引领。

在忘不了餐厅节目中，不仅为社会大众详细展示了适老化改造后的老年公寓，还让明星嘉宾穿上“老年人模拟体验”设备，让观众能沉浸式地感受居家适老化改造对老人的重要性。在社会工作者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应该为失智老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从适老化的角度出发，对老人活动的场域进行支持性、友好化改造。坚持以失智老人的需求为导向，对失智老人的生活环境进行干预和防范，既可以帮助他们在维护自身的尊严和体面的同时，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也能在保证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减少意外伤害的可能性的同时，帮助他们减少老年人家庭不必要的医疗和护理投入，节约相关的社会福利与公共卫生开支。

总之，节目组的设置与国家政策高度契合，不仅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践行，而且也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这足见忘不了餐厅节目对当下老年人群体的深度洞察，为社会大众对老年人群生活状态的关心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 （二）线上宣传与线下发展

忘不了餐厅作为一档综艺节目，以一种真实的记录方式向社会描绘了一幅关于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群像。目前，忘不了餐厅的发展已经不囿于综艺节目的表现方式，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公益形式，将继续延续到线下，为更多的失智老人提供岗位，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虽然，像忘不了餐厅这样的致力于帮助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综艺，具有正向的价值引领作用，目前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但是，将忘不了餐厅发展延伸到线下，是否具有可行性，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 1. 线上宣传

在忘不了餐厅节目中，具有温度和细节感的适老化改造、细致贴心的专业知识科普、饱含真情的人生故事的讲述以及让人心痛又无力的反复遗忘现场，不仅场引发观众对失智症思考，也实现了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的关注。

第一，忘不了餐厅这一节目对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实践的宣传具有积极作用。忘不了餐厅作为国产综艺中第一个有社工全程介入，参与录制的节目。社会工作者在节目中的出现，让社会工作专业走进了社会大众视野，同时也在社工圈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事实证明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失智症在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延缓病情进一步恶化，提高生命质量，减轻照顾者负担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sup>[7]</sup>。但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工作的认知和关注还十分欠缺。因此，社会工作者这一角色身份往往被社会大众所忽视，有人甚至会把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直接画上等号。而忘不了餐厅中对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引入，通过媒体网络的形式宣传了社工介入失智症患者社会参与实

践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社会大众对社工介入失智患者服务认识不足的问题，扩大社会工作在社会上的知晓度。尽管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直接对接失智老人的过程并没有在综艺节目中直接呈现，但是综艺节目中呈现给观众的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作为咨询者的身份为餐厅中的明星嘉宾提供指导。其实，明星嘉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工作者这一角色身份，在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过程中，与失智老人建立专业关系以及进行专业活动。纵观节目内容的呈现以及失智老人在节目中的社会参与实践，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认知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技巧以及治疗模式的应用过程。

第二，忘不了餐厅对失智症患者社会参与的宣传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它可以帮助失智症患者本人消除“病耻感”，向节目中的失智老人学习，正确面对疾病，积极参与社会、融入社会。其次，这个节目也教会失智症的家属如何扮演好自身支持者和照顾者的角色，并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巧，积极引导患者参与社会，有效帮助失智症患者缓解病情。最后，综艺节目的线上宣传方式可以帮助社会大众从思想上正取认知、正确对待失智症这个疾病，消除社会对失智症患者的歧视和偏见，并在现实中根据症状对号入座，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 2. 线下发展

忘不了餐厅这一综艺节目不仅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对失智症患者社会参与的宣传，而且在线下，忘不了餐厅实体店即将正式落地，面向大众长久开业。此外，早在去年九月份，由天津市东丽区鹤童认知症康复中心开办的一家“忘不了餐厅”也开始营业。忘不了餐厅线下实体店的开设不仅可以给失智老人提供工作岗位，鼓励他们积极融入社会。也能够带动人了解失智症以及相关的介入方法，提高社会工作在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实践中的认可度。尽管如此，线下的发展和和电视综艺为社会大众展现的情况还是不尽相同的。很多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第一，忘不了餐厅中的失智老人具有一定典型性，无法涵盖全部失智症患者的现实境况。节目中的失智老人的患病状况、情绪状态、性格特点、自身能力以及家属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改变社会对失智症患者的刻板认知，节目选择的失智症患者对于社会参与普遍具有正向认知。实现在节目中真实表达的同时，又符合综艺节目的展现方式。但现实生活中，也必然存在患病更为严重失智老人、态度消极的失智症患者或不愿配合的患者家属。因此，参与到线下忘不了餐厅的失智老人，需要具备较好的自身状态和较高的家庭配合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搭建政府、社会组织、医院、失智症患者以及失智症患者家属的互动交流平台，创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

第二，线下忘不了餐厅的开展具有地域性限制，在全国仍未实现普及的现状下，失智老人参与的成本较高。节目中的失智老人的是导演组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中反复考察下最终确定的，他们来自我国不同的省份，因为节目才汇聚到一起。而在现实情况下，结合失智老人的自身能力和他们家庭的现实境况，如果线下忘不了餐厅的地点不在他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内，很难让失智老人配合参与。因此，线下忘不了餐厅设立的地点也需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建议将失智老人参与的成本纳入到考虑到范围，尽可能地将餐厅的地点设置在类似于失智老人日托中心这样的机构附近。

第三，明星嘉宾的陪伴在线下的忘不了餐厅就难以有效实现，取而代之的则是社会工作者以及护理人员对失智老人的陪伴和介入。没有了节目中强大的后援团队的支持，这对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专业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工作者需要在对失智老人服务的过程中，更加细心观察失智老人的情绪

和行为特点，对他们的病症进行专业评估，根据不同失智老人的需求特点，主动链接相关资源，运用不同的专业方法，设置相应的专业活动，探索更合适的治疗模式。努力发挥自身专业的优势，在照顾好失智老人的同时，帮助患者家属成为更专业的照顾者。

### 三、结语

本文是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对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实践的有益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确保老年人在老龄化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参照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有利于帮助老年人挖掘潜能，更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

忘不了餐厅作为失智症老人参与社会的载体之一，通过综艺节目的形式积极展现失智老人在疾病面前的积极态度，并将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服务引入社会视野。实践证明，忘不了餐厅综艺节目的播放，让社会大众对失智老人群体以及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服务的社会认知度有了明显改善。在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社会参与的实践中，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引入、支持性环境的建构、社会工作专业技巧及社会工作专业治疗模式的应用都对失智老人的社会参与过程具有支持性作用。随着忘不了餐厅的线上宣传以及未来在线下的普及，社会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将日益凸显。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失智老人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 参考文献：

- [1]程凡，2017，《失智老人社工多维介入服务模式构建过程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
- [2]何雪松，2017，《社会工作理论（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3]李雪，2016，《社会工作介入失智老人精神需求的实务探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 [4]黄鹏，2016，《社会工作介入老年失智问题的案例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 [5]魏瑞媛，2020，《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及其照顾者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6]薛新东，2018，《社会参与对我国中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第5期。
- [7]赵学慧. 2013，《老年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王 肖，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吴晓彤

# 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服务困境研究

——基于河北省 Y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中心帮教实践

韩廷梁

---

**摘要:**随着法律以及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完善与重视,将态度良好且案情不严重的触法未成年人置于帮教系统以教育改正而非直接起诉、监禁的帮教模式得到广泛的实践。社会工作因与该领域高度契合性,在购买服务的基础上正逐渐成为帮教活动的主要实施者。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发现面临各种问题与困境,本文基于相关实践与国内现有研究,在总结中国现行社工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现状基础上,从帮什么、怎么帮、是否有效三个主要阶段对于面临的困境进行探讨与研究,以期对帮教体系的完善贡献力量。

**关键词:** 社会工作 涉罪未成年人 帮教帮扶

---

近年调查发现,我国青少年犯罪数越来越多,占全国违法犯罪案件数 70%以上,尤其是 14-18 岁之间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增长率在持续增高<sup>[1]</sup>,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为降低未成年人违法再犯可能,体现司法人道精神与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的关怀与保护,考虑到未成年人在心智、行为、价值观等上具有的高度可塑性与重构性,在其违法后进行帮扶帮教活动以教育改正,给予其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而非直接起诉留下案底影响未来发展,就显得尤为人性化与重要。

在此背景下,给予涉罪未成年人新的弥补错误的机会,对于违法未成年人经由检察院综合评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等后进行帮教帮扶的矫正形式进入公众视野,并迅速在全国得到广泛的运用。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着眼于弱势群体与困境人群的助人型学科与职业,与该群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另一方面,2020 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审议稿明确国家鼓励、支持和指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相关工作,《未成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标准》与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社会工作的参与。在此基础上,对于社会工作介入的形式、路径、模式等引起越来越多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司法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广泛探讨,专业司法社会工作机构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帮教活动的实践也如火如荼开展。

对于社工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国内当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工介入模式的探讨与相关实践的个案研究,或是对于社会工作与此工作契合性的分析;也有学者就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对社工介入该领域进行探讨等。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尚且较少,对于该主题的研究还停留于较浅的模式与路径研究层面,而对于社工介入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讨论尚且不充分,或仅在个案研究最后简单指出开展过程中的困难,缺乏深入而具体的探讨以及分析。本文着眼于这一不足,综合实际实践、观察以及国内现有研究,在总结社工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现状基础上,围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入讨论。

## 一、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现状

2019 年,最高检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 40 个地方部署试点以建设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试图对罪错未成年人帮教工作更加精准有效,推动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等。河北省 Y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河北省唯一入选试点,承担着其所在市几乎所有帮教工作,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同年 10 月至次年 9 月期间,笔者在 Y 机构以专业社工身份,负责或参与二十多次社会调查、评估及帮教活

动。在该机构的实践经历使得对于整个帮教流程与形式都有较完整的观察与掌握，对于当下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现状形成较完整认知。

### （一）社会工作介入流程与阶段现状

对于进入帮教阶段的涉罪未成年人以及社会工作介入阶段，不同地区或者规定导致在形式或流程上有细微差别，有学者整理帮教过程中所涉及的阶段有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起诉阶段，根据实际的帮教流程，可分为逮捕阶段、捕后诉前阶段、移送审查阶段、附条件不起诉考察阶段<sup>[2]</sup>，也有学者经过实务工作后总结认为，未成年人涉案之后，案件先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后交由检察机关进行审理，根据案情的轻重确定是否进行逮捕或起诉。除批准逮捕，社工无法进行帮教服务，受到其他形式处罚的涉罪未成年人，社工根据检察院指示确定是否为合适服务对象，合适服务对象可以转介至机构开展帮教活动<sup>[3]</sup>。

总体而言，帮教主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立案侦查、起诉、审判，而社工通常从诉前提交调查及评估报告和诉后开展帮教活动介入帮教工作。河北省Y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也根据该阶段流程进行工作，具体流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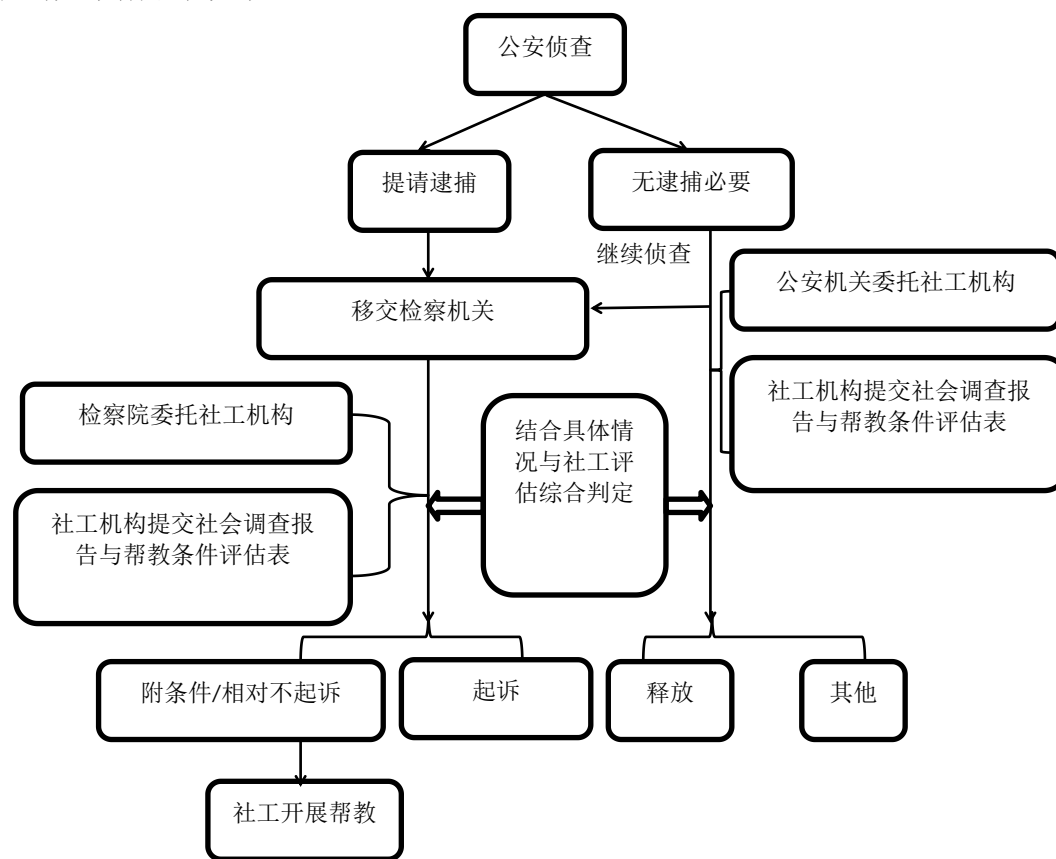


图1 Y机构介入帮教工作流程图

### （二）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与效果现状

通过一系列评估与审核而最终由社会工作者开展的帮教活动，在实践过程中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果与良好的社会反响。有实务工作者认为通过社会工作者介入，可以使帮教对象修复家庭关系、树立正确认知、对法律有深刻认识、学会感恩等<sup>[4]</sup>，笔者在实务中，通过帮教对象反馈与检察院反馈等，也发现确实起到一定降低再犯可能、提高法律意识、改变部分错误认知等较好的效果。

但是，通过对于实际负责的数个帮教个案的深入研究与实际开展过程中的反思，发现在整个社会工作介入帮教工作过程中仍面临着众多困境与不足，从开展前的评估到开展过程以及结束后的追踪服务，各阶段都并不如所设想中顺利，在伦理、资源、专业性等众多方面的问题影响着实际工作的开展与帮教活动的有效性，这也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 二、社工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服务困境探讨

### （一）“帮什么？”：帮教对象需求分析与目标制定困境

#### 1. 帮教对象实际需求难以挖掘

社会工作者对于帮教对象的需求分析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个案访谈法，主要方法其一是社工在访谈中直接询问“您希望得到什么帮助/您觉得现在最大需求是什么呢”类似问题，帮教对象及其父母的直接反馈其所面临的困境；其二是在访谈交流中通过自由联想法、抓住关键词句深入挖掘、观察亲子互动、比较同样问题下家长与帮教对象回答与反馈的异同等多种形式，将潜藏的困境与需求与帮教对象进行总结、对质、讨论。

第一种方法得到的反馈通常是片面的和表面的，回答内容通常包括几种类型：1、希望使此次案件对帮教对象未来的发展的负面作用最小化；2、希望能帮助帮教对象改掉坏习惯；3、希望帮助帮教对象重回学校/学习一门手艺/找到一个好工作；4、想不到需要帮助的，希望帮教对象自己好好反省，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笔者负责或参与的所有个案访谈中，未得到过与上述不同回答。这些需求代表着帮教对象及其家人最直接且最简单的诉求，但往往在使用第二种方法深入交谈后，能够发现帮教对象会产生越轨行为的原因并非是缺乏一份好工作或者缺乏法律意识，而是家庭结构、社会交往、童年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包裹之下。

这又面临另一个困境，这不仅对于社会工作者自身访谈能力与专业能力要求极高，能够及时抓住言语中不经意间吐露的、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言语表达进行深入访谈；还考验着案主及其家人配合度。

首先，在帮教工作中，社工作为受检察院或公安部门委托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员，其一定程度上会让帮教对象形成社工是权威机关的代言人的认知，使得社工权威得到错误的扩大；而帮教活动作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带着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人对其产生畏惧心理。角色上的差异与活动的特殊性，让社工与帮教对象存在的隐性的不平等地位，使得社工难以拉近与帮教对象的距离，放下戒心与自我保护，能自由与社工讨论涉及到一些隐私或者只会和信任的人交流的内容；

其次，对于某些社工认为重要的内容的反复深入讨论，有可能激起其警戒反应，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过诸如“你问这么多这个问题干什么”、“时间太久记不太清楚”、“这不是很正常吗”等回答，使得话题难以为继；再者，帮教对象与其家人确实没有意识到某些问题与认知背后具有的深刻意义与困境，对于相关的描述或回忆掺杂较多主观修改与模糊，影响社工的判断。

另一个重要因素，委托方的检察机关以及社会大众更多关注错误行为修正与法律意识的培养，而非去关注他越轨行为后隐藏的深层困境与问题的解决需求。委托方评估时也主要考察相关法律了解情况、认错态度是否良好等，这导致社工开展的更多专业性活动得到的关注与认可较低，容易导致社工丧失工作积极性，对于帮教对象真实需求的挖掘与研究热情也随之降低，使得帮教对象的真实需求更难以挖掘。

#### 2. 帮教对象实际需求有时难以满足

帮教对象在需求方面，不仅存在着上述真实情况难以挖掘的困境，另一方面，即使在帮教对象与各方配合，且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发掘出帮教对象真正存在的问题与需求，社会工作者也有可能面临无法根据实际需求制定目标，以满足其需求的困难。通过实际实践活动的观察、研究与相关学者研究总结，本



文认为该类困难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帮教活动开展受到委托方限定时间、提供资金的限制。社工介入帮教工作，主流形式即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这也是国内现行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购买服务，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委托方或者购买方的限制。

例如该市向 Y 机构购买帮教服务时，给与的要求是 1-3 个月左右的帮教时间，每个帮教个案购买费用是 2000 元，在截止时间前需要提供帮教总结报告与评估。当帮教对象自身问题较小，需求较为简单时，这个时间是较为充裕的；而当帮教对象自身情况复杂且问题较为严重时，在较短的帮教内想要使帮教对象得到有效地改变和提升，满足其真实需求，则有时存在较大困难；金钱方面限制则更为严重，购买所得费用不仅是用于帮教活动，更是机构正常运行、社工工资的主要来源，不够充裕的资金使得社工在制定目标时往往需要更多考虑到经费问题而显得束手束脚，也难免会使得社工潜意识拒绝或排斥帮教对象需要花费较多资金的需求。

在此双重限制下，社会工作者与帮教对象商讨帮教目标、交流明确其真实需求时显得容易瞻前顾后，甚至只给帮教对象开展最基本的法律教育以及其他一系列流于形式的帮教活动，以应付检察机关的审核，实际上可能对于帮教对象最重要的困境与最迫切的需求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与满足。这样，社会工作介入帮教工作的优势也无从谈起。

第二，社工能力有限，社会工作并非“全能专业”。社会工作在帮教过程中，看似扮演着众多角色与发挥着极大作用，可能是使能者、资源链接者、教育者、赋权者等，可以给帮教对象链接资源、提供指导、纠正错误认知，但社会工作者并非万能的，或者说实际工作中并不能如书中或者想象中一样开展工作，每一项工作都在实际进行中可能面临巨大挑战。

笔者负责过一个帮教对象是 13 岁男童小 X，因为猥亵罪被审查起诉，本案件背景描述详细，小 X 社会交往与家庭环境简单，导致犯罪的原因也比较清晰，看似对其的帮教应较为简单和顺利，但在经历法律知识普及、家庭关系优化等一系列活动后，最后一项对其进行性知识与两性相处模式科普介绍活动时，社会工作者通过网络、社会关系网等多途径也未能找到相关领域专业，最后不得不笔者亲自扮演教育者角色，组织这场教育活动。但笔者未受过相关专业训练，所讲解内容亦为网络资料以及现学所得，并不能保证专业性与有效性，那帮教对象对此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也无法得到可靠保证。类似问题会出现在各种环节中，其他帮教活动中，也分别出现过难以给案主链接优良工作资源、学习资源，对于案主家庭矛盾调解未能成功等各类问题。极大影响着帮教对象需求的满足，乃至可能使得社工在下次帮教工作对解决帮教对象问题产生自身能力的怀疑与担忧，而拒绝制定过高或可能更适合帮教对象但难度过大的目标。

## （二）“怎么帮？”：帮教手段与形式选择困境

### 1. 帮教方法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过于单一

社会工作通常提供服务有三大专业方法，即个案方法、小组方法、社区方法，显然在现行社工介入帮教工作实践中，主要运用的方法就是个案方法，小组与社区方法在使用时面临较大的问题。

小组方法的难以使用，一方面因为难以同时有案件背景类似、年龄类似的帮教对象组成小组，甚至在 Y 机构，同一个月内进行帮教的往往难以凑成一个小组最低人数。即使人数足够，每个帮教对象都存在特殊性差异，有的仍在学校学习，有的进入社会，有的赋闲在家，仅就空闲时间来说便难以安排，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定期开展的小组；每个帮教对象又具有不同的问题和需求，小组因此也难以形成凝聚力和共同目标。

而社区工作，由于保密的需求与限制，使得帮教对象只能作为社区普通的一员，鼓励或调动其参加社区活动，培养社区责任感以及其他能力或改变不良行为、体会社会活动或社区服务带来的积极感受，但是，尚且没有条件组织只针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社区活动，或者完全由涉罪未成年人组成的社区活动。这不仅使人员分散与不足的问题，其中也牵涉到会泄露其信息，使得其在社区生活中可能面临“不良少年”、“犯过法的”等负面标签带来的损害。

至于其他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技巧，在实际运用到帮教活动中时，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或者缺乏创新，形成一套粗略的框架后，所类似案件或者问题类似的帮教对象都使用其进行套入，一定程度上忽视帮教对象可能存在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例如家庭中存在问题的帮教对象，往往使用家庭情景模拟治疗法；面对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通过“日行一善”记录活动与奖励机制进行帮教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对于帮教对象起到纠正行为认知，改善家庭环境的作用，但实际上的细微差异和微小的个别化问题就被忽略，使得服务效果被弱化，二要针对每个帮教对象打造完全自适性、完全契合的活动，对于社工的专业能力与精力要求有过高，形成两难困境。

## 2. 保密限制下支持系统的孱弱

结合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对案主开展活动是社工最基本的工作思路与途径之一。但是在帮教活动中，由于帮教对象的特殊性，对其信息的保密的要求与保护帮教对象自尊心等要求，使得帮教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较为孱弱。以上文提及的小 X 个案为例，其社会支持系统分析如下表 1：

表 1 小 X 社会支持系统分析

正式支持	案主能得到的正式支持包括司法机关与法律的保护，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政策的支持与重视。包括对于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严格保密要求、手段规范化要求、资金支持等。	
非正式支持	学校	由于法律规定以及案主及其家人要求不希望扩大案件影响和被他人知晓（同下保密要求），无法向学校透露基本情况以建议其开展性、道德观、两性相处等相关教育与对案主加强约束和规范，所以学校暂时无法发挥支持功能与提供相应资源。
	家庭	家庭及家庭成员是案主在本次帮扶活动中最有效的社会支持，通过访谈发现其家人对其接纳程度高，对活动配合意愿较好，能给案主提供较好的物质、情绪、社会接触等支持。
	同辈群体	由于保密要求，无法通过社会工作者就此案件联系其同辈群体，建立同辈群体对于案主的支持系统，可以通过鼓励案主结交新的朋友、形成同辈积极行为榜样学习认知，辨认同类群体行为是否正确等形式，强化同辈群体对其支持作用。
	社区	由于保密要求，无法连接村委会资源提供各类支持，社会工作者可以鼓励案主积极参与社区内各类积极活动与劳动，增强自身认同感和成就感。
	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是案主社会支持网络中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列活动，在合理范围内能为案主提供认知行为矫正、负面情绪疏导等，并链接正式支持中对于案主有利部分，将影响最小化，效果最大化。

如表所示，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看似支持系统完善、并不残缺，但实际能运用，并发挥实际主要功能的仍然只有家庭和社工的支持。社工在帮教活动开展中，怎么帮，怎么在资源稀缺和可利用支持不足

的情况下组织活动，成为帮教具体开展中最大的困境。

### 3. 帮教对象低配合度限制帮教活动选择与开展

在现有帮教标准与机制下，大都只有被认定为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才会进入帮教工作中，社会工作者要面对的也是这样一类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此种模式一方面降低未成年人精神压力，减少进入司法系统对其未来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涉罪未成年人与其家长过度放松，认为“已经没事”、“没有影响”，而消极的对待帮教工作，对待帮教活动的配合度极大较低。

而当面临这类帮教对象时，在此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往往会通过“不通过帮教活动”、“评估不合格”等威胁来强迫帮教对象参加帮教活动。这就会带来两个负面的后果，其一是恶化社工与帮教对象的专业关系。社工以通过威胁强迫，一定程度上即社工在使用委托方赋予的权力，将自己塑造成规定的执行者角色，成为检察机关的化身，此时社工与帮教对象的专业关系是不平等乃至对立的，这种专业关系下，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受到挑战，诸如平等对话基础上自我袒露等社工专业方法也无法正常使用。其二是帮教对象参与活动态度消极、敷衍，设置产生抵触心理，极大降低帮教活动的效果。以笔者帮教过的小L个案为例，其由于寻衅滋事罪被审查起诉，后由于案情并不严重且认错态度良好被附条件不起诉。在对其帮教工作中，其父母在交流中就曾表露认为帮教工作就是“形式主义”、是“随便做做就行”的“小活动”、是“反正已经附条件不起诉，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工作，小L对于社工引导其参加社区志愿活动经常迟到早退，甚至除非社工强调不来参加活动可能会被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就不愿意来参加；针对其家庭不合理结构调整的家庭情景治疗活动，其父母参与配合度也相当低，通过是不是回消息、刷手机等行为对活动进行消极抵抗。诸如此类的低配合态度，是政策标准的不完善与社会工作认可度低等原因所共同导致，这使得社会工作者在工作开展、活动的选择与策划上陷入困境。

#### （三）“有效吗？”：帮教结果评估与回访困境

##### 1. 帮教效果难以界定与评估

现有社会工作介入帮教工作的效果有两个评估方式，第一个是帮教对象的反馈与访谈评估；第二个是委托方，即检察机关结合社会工作机构提交的帮教记录、视频、图片材料、总结报告以及对与帮教对象的考核与反馈综合得出。但存在的问题就是，此类评估方式过于主观化，缺乏科学有效的前侧后侧、心理变化等相关量化评估，导致帮教对象在实际困境与问题是否得到改善或改正难以清晰展现。

同时，帮教结果也难以界定。现在国内对于帮教效果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与定义，那帮教对象现下法律意识得到增强，性格行为也得到一定改变即算帮教取得较好成果，还是要考察到未来多久时间内，帮教对象实际发生变化且在做出越轨行为、触法行为，才能评估认为帮教取得实际良好效果。这个问题的不清晰，以及评估方式的不够精确与不专业，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对于社工服务的评估存在较大困境。

##### 2. 后续跟进与回访难以开展

在完成协商好与委托方要求的帮教工作后，后续的跟进与回访是保障帮教效果的有效途径与方式，但实际工作中却存在极大困难。在接到委托后，社工通常会对帮教对象开展期一个月到一年服务（根据各地区情况与政策不同而变化），而后根据评估结果，如果评估认为可以结束帮教，针对该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服务即基本宣告结束，在笔者实际工作中发现基本不会进行跟进和回访。这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尤其是司法社工机构，主要通过购买服务运行，资金来源有限，以Y机构为例，检察机关出资购买，按服务人次算，每个帮教服务2000元。如上文分析资金本就较少，服务购买结束之后，因为人力、财力难以为继，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除去通过网络能保持简单联系外基本终止，而且购买方也无后续跟踪的要求，资源的限制与无制度要求，导致后续相关工作面临着较大困境。

### 三、结论

总结全文，通过以笔者在 Y 机构开展帮教实践的经历与观察、对国内现有相关实践的分析，以及对于社会工作介入帮教工作的全流程、各阶段面临困境的探讨，总结各个阶段的困境，发现其根源总而言之即下面四个因素，或者说根本困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分别是：

#### 1、服务购买方带来的各类限制与消极影响

这个困境包括委托方对于社工结构提供的资金、时间上的限制；委托方对服务要求、服务目标、服务评估的泛化与非专业化；委托方对于形式，即各种文件材料的重视而非服务本身的重视的偏好等。

#### 2、社工与社工机构自身专业性与资源的不足

这个困境包括社会工作者自身各类专业能力的不足；社工机构社会认可度的缺失以及所以能够有的社会资本的缺失；社工机构自身发展资源的不足等。

#### 3、社工介入帮教工作相关制度与支持的不完善

这个困境包括社工介入的保障性与奖惩性的制度的缺失；社工介入地位未得到足够重视；诸如涉罪未成年人保密边界划定这类细化的、相关的制度规定的不完善与不清晰等。

#### 4、帮教过程中社工角色的混乱与定位的不清晰

这个困境包括社工角色受司法机关委托性质的影响；社工开展工作时定位不清晰；社工多重角色没有形成互动与和谐统一，而彼此分裂且孤立等。

这四个困境交织与混合，使得在各阶段产生不同的独特困境。例如帮教方法单一的困境，既有社工能力不足的原因，又受到制度不完善导致社工囿于保密原则无法更好行动的影响；帮教对象实际需求有时难以满足困境则在分析中就直接指出是受委托方的限制与社工能力的不足的因素影响等。而这些不同阶段的困境，又展示出这四个根本困境的不同形式或者方面，如社工能力不足，表现在帮教方法单一困境中，是活动组织的专业能力不足，而在帮教对象实际需求有时难以满足困境中则表现为收集资料的专业能力的不足。

所以，想要解决在社会工作介入帮教活动中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不仅需要关注各阶段的特殊困境，还要考虑到总结而得的四大根本困境，而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析，以及针对性的提出解决策略与途径，这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所在，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不断完善与成长的重要方向。

### 参考文献：

- [1]中国青少年犯罪协会，中国新闻网，2013，《青少年犯罪超全国总数七成呈暴力化团伙化趋势》（<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5-30/4872454.shtml>）
- [2]肖锋，2019，《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社区帮教研究——基于深圳市 F 区的实践》，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3]张文静，2018，《司法社工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矫正研究——以福州某社工中心的实践为例》，福州大学硕士论文。
- [4]钱刚、郭艳、张萍霞，2019，《归来吧，孩子！——社工助力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实践》，《中国社会工作》第 5 期。
- [5]席小华，2020，《“三法”制定和修改背景下的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中国社会工作》

作》第 10 期。

[6] 苏贻堆, 2016, 《福建将青少年社工引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关于〈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引入青少年司法社工的意见〉解读》, 《中国社会工作》第 16 期。

[7] 李慧织, 2014,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河南社会科学》第 4 期。

[8] 席小华, 2013, 《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的基础与现状——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第 1 期。

[9] 费梅苹, 2012,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的路径研究——基于上海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中社会工作实践的反思》,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10] 任啸辰、吕厥中, 2016, 《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现状、成因与消解》, 《中国青年研究》第 6 期。

[11] 席小华、徐永祥, 2015,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理论框架及具体内容》,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12] 王思斌, 2001, 《社会工作概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作者简介: 韩廷梁, 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徐婧怡

※ ※

### 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主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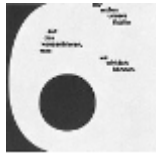
### “社会性别、多样化以及包容性”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在加拿大刊印出版

2019 年 6 月 1 日,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的港口中心, 河海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简称中心)与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社会性别、性以及妇女研究系(简称 GSWS, SFU)联合主办了“社会性别、多样化以及包容性”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加拿大两国的西蒙菲莎大学、河海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三峡大学、昆特兰理工大学等 5 所高校的 3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

河海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秀杰副教授代表河海大学致开幕词, 陈绍军教授主持了性别与社会专题报告会, 武艳华副教授、朱秀杰副教授、陈绍军教授分别在会议的三个专题上作主旨报告, 并参与了学术交流和讨论, 展示了良好的学术素养, 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获得高度评价。

“社会性别、多样化以及包容性”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于 2021 年 1 月由加拿大正式刊印出版( ISBN : 9781772870824 , SFU Library Digital Publishing Link : [http : //monographs.lib.sfu.ca/index.php/sfulibrary/catalog/book/83](http://monographs.lib.sfu.ca/index.php/sfulibrary/catalog/book/83) )。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社会性别、性以及妇女研究系 Habiba Zaman 教授, 中国河海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陈绍军教授、朱秀杰副教授,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印度和南亚研究中心 Sanzida Habib 副研究员等 4 位学者担任联合主编。中心前主任施国庆教授为会议筹备和论文集出版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 2017 年河海大学与西蒙菲莎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以来的互访、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论文集的出版将研讨会成果予以书面保存和在两国学界分享和传播, 凸显重要意义。在该备忘录的合作框架下, 双方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师生将继续以创新的精神、务实的态度推动双方更深、更广的交流与合作。



# 2020 届硕士毕业 论文信息统计表

## 2020 届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信息统计表

(答辩时间: 2020 年 5 月)

序号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导师姓名
1	陈小雨	农牧区合作社的生成、运作及发展——基于内蒙古 H 旗的调查	施国庆
2	郭力	合法性视角下积分入学政策实践研究——以昆山市为例	王毅杰
3	何珊珊	社会角色对流动青年女性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石德生
4	贺胜楠	牧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地权实践逻辑——以内蒙古赛罕嘎查为例	胡亮
5	洪雪晴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撤村并居社区空间治理研究——以马鞍山市 J 社区为例	何志扬
6	黄是知	异地中考政策下的随迁子女教育结果	胡亮、王毅杰
7	黄燕莹	回到农业——基于 S 农户生命历程的分析	顾金土
8	黄紫钰	跨越门槛: 积分入学政策与随迁子女家庭应对——以苏州市 S 镇为例	王毅杰
9	李鸿香	从草根探索到政府嵌入: 基于一个“淘宝村”生命史的研究	陈涛
10	李珍	回汉家庭中子代回族的族群身份建构研究	张虎彪
11	刘茜	扶贫产业发展中镇-村-户的关系分析——Z 县高村案例研究	陈阿江
12	芦丽丽	社会网络视阈下贫穷地区书画市场兴起的实践逻辑	曹志杰
13	罗章鑫	“背后出力”: 中产阶层家长如何参与补习	沈洪成
14	彭雪	向“城市”看齐: 课堂教学中乡村学生的言语行为	沈洪成
15	宋春雨	社会性别视角下村民参与“小菜园扶贫项目”的研究——以 P 村为例	朱秀杰
16	孙艺维	“生”还是“死”? ——环保风暴下乡村小企业行为策略研究	毛绵逵
17	王凯璇	师徒关系中的“人伦”与“功利”——以某国企不同部门的两种师徒关系为例	沈毅
18	王乐媛	基层妇女议事会实践困境研究——基于对 N 市 X 社区的调研	朱秀杰

19	王淼	远迁移民社会关系重构的实践与逻辑——河南省 Y 村个案研究	严登才
20	王上青	草原产权制度变迁与草牧场治理研究——基于翁牛特旗其甘嘎查的田野调查	施国庆
21	王璟	制度逻辑与社区公共服务外包实践——以南京市 FH 街道两个项目为例	叶南客
22	王悦	南京市大学生购书消费行为变化及原因分析	石德生
23	许剑	农村基督教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研究——基于 N 县 D 乡的基督信仰情况调查	张虎彪
24	杨倩	环境治理升级下乡镇工业的发展——基于港桥镇纺织产业的案例研究	陈涛
25	杨秋菊	城市化红利的分享机制——以盐城市城中村为例	徐琴
26	余佳琦	下乡抱团养老——基于杭州 C 村的一个案例研究	顾金士
27	余静	从共享到区隔：楼村村企关系的演变逻辑	陈阿江
28	张露	地震灾后民房重建中的基层政府：角色冲突与权责协调——以老街区居民小组为例	施国庆
29	张猛	从村落到社区：平利县易地扶贫搬迁 Y 社区治理研究	余文学
30	赵微	农村社区生活污水治理中的村民参与研究——以浙江省 X 村为例	陈绍军
31	郑乔乔	生计资本视角下返乡创业农民工生计模式转变研究——基于 L 县 N 镇 20 名创业商户的调查	何志扬
32	朱晨芙	亲属关系中的“义”“利”交织——相对疏离与过度嵌入的两个亲属网络的比较	沈毅

# 2020 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信息统计表

## （答辩时间：2020 年 5 月）

序号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导师姓名
1	陈秋静	组织发展理论视角：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行困境研究——以 L 街道社联会为例	毛绵逵
2	成梦	非营利组织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过程研究——以 A 机构的 D 项目为例	石德生
3	代妍	促进成年智力障碍者人际交往的小组工作研究——以南京 X 残疾人之家为例	陈涛
4	丁健欣	困境空巢老人社会支持的项目研究——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武艳华
5	郭丹平	随迁老人社会交往的互惠式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南京市 N 高校社区为例	王毅杰
6	郭欣	非药物干预轻度失智老人的团体工作研究——以“智爱家园”项目为例	施国庆
7	郭忠尧	农村丧偶独居女性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个案研究——以 F 市 M 老人为例	顾金土
8	惠黎	公益组织孵化器运营中的联动困境与对策研究——以 T 镇社创空间为例	严登才
9	蒋杨楠	社工机构与企业合作的研究——以无锡市 L 机构为例	沈洪成
10	鞠宁	增能视角下中青年妇女社区参与的介入研究——以 N 市 Q 社区为例	顾金土
11	郎瑶瑶	监护不力型困境儿童家庭的支持系统分析——以苏州市 L 项目为例	武艳华
12	李航	老年水库移民社会适应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 ——以浙江 Q 水库移民安置 XD 社区为例	陈绍军
13	李龙龙	小组工作对留守儿童学习认知偏差的介入研究——以龙祥小学为例	沈洪成
14	李琼	妇女更年期综合征问题的个案介入研究	顾金土
15	李松童	微公益创投中社会组织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 S 市 G 区为例	武艳华
16	刘文玥	社会工作者在公益创投项目中的角色与挑战——以 M 街道为例	亓迪
17	刘雅欣	社会工作介入独居老人精神慰藉的实务研究——以 F 机构爱心上门计划为例	胡亮
18	芦栌权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事件的社会工作参与机制——以 N 市 H 社区为例	秦贤宏
19	陆佳华	促进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研究——以南京市 D 社区为例	沈毅



20	陆双双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效果研究——以南京市 JY 社区营造项目为例	严登才
21	罗丹	中心城区小型院舍老人外出限制的干预性研究——以南京市 L 养老机构为例	顾金土
22	马尔骏	社工机构介入拆迁安置型社区自组织培育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 G 街道社区为例	石德生
23	毛昆	返乡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山东省 X 市 X 中学为例	邵占鹏
24	钱云	福利院儿童同伴依恋问题的个案介入——以模拟家庭儿童小 A 为例	张虎彪
25	冉美玲	社会工作介入“停车难”治理的路径研究——以 N 市 Y 小区为例	朱秀杰
26	沙海婷	生态系统视角下城市独居老人精神慰藉个案工作介入——以南京市 S 社区某老人为例	何志扬
27	师倩茹	宗教养老机构发展类型及困境研究——以江苏省八家基督教养老机构为例	王毅杰
28	宋如玲	和谐社区营造中的服务内卷化研究-以 C 社区为例	毛绵逵
29	孙旌程	政会脱钩背景下地方行业协会发展——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	王毅杰
30	谭婷	社会工作服务下沉的实现机制及其困境——基于锡山区民非企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	毛绵逵
31	王冉	中龄老人同辈精神支持小组实务研究——以 X 养老院老年小组为例	何志扬
32	王赛兰	项目制背景下社工机构的专业性实践偏差——以 N 市 L 街道公益创投项目为例	王毅杰
33	王晓月	南京市妇联信访工作的社工服务研究	朱秀杰
34	邬越然	城市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状况研究——以南京市 X 区为例	武艳华
35	夏梦雪	社区工作者身份认同研究——以南京市 S 社区为例	胡亮
36	许雨婷	自闭症儿童家庭照顾者压力舒缓的介入研究	亓迪
37	杨灿	小组工作介入随迁子女同辈交往问题研究——以 L 小学自然教育项目为例	张虎彪
38	杨晓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合作式评估模式研究——基于无锡市 L 机构评估实践的调研	亓迪
39	周海燕	村民参与污水治理项目运维的社工介入研究——以浙江省 FL 社区污水处理项目为例	陈绍军
40	周家钰	社区矫正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南京市鼓楼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调查	杨方